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现为斯坦礻畐大学Denise 0 ' Leary and Kent Thiry社会学教授' 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多年致力于研究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群众运动,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形态。着有Fractured Rebellion:丆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tho归n

Chinese Industry等书。

书籍设计:何浩封面摄影作品可吕布(Marc Riboud) 1971年摄于武汉

(◎ Marc Riboud / Magnum Photos)

封底摄影作品:蒋铎1966年10月1日摄于北京天安门前(◎蒋铎)

# 脱轨的革命

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直面毛泽东的时代,并给出一个详尽、坦率的评价,这一工作只能留待斯坦福大学一位杰出的学者替他们完成。… …对于想要考察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本书可以在许多研究课题上提供思路。而魏昂德的目标读者是大学生以及有想法的一般读者。就此而言,未来很长时间内将难以出现堪与本书媲美的作品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 1930一2019 ) 哈佛大学Leroy B. WiⅢams历史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

本书对关于毛泽东中国的众多著作以及魏昂德本人可观的社会学研究做了精妙总结。他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政治史与对共产党组织特征的细致观察结合起来,以此揭示毛泽东的初衷为何常常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毛泽东是「拥有狭隘、落后的观点且武断的领导人」。类似的深刻判断在书中俯拾皆是,它们无疑会激起争议,然而最终很可能为人们所赞同。

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

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魏昂德或许藉由《脱轨的革命》进行了一场冒险,以探索一种全新的社会学叙事,在这种叙事风格下,制度特点或者运转机制并不决定历史,而是融入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之中,共同塑造动态的历史进程。对于想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读者来说,这大概是近年最出色的一部著作。

赵鼎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这部深具洞察力的著作出自一位致力于共和国研究的杰出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之手。为错综复杂到令人目眩的众多事件提供了公允、审慎的论述,经验数据无比扎实,分析精妙老练。如果阅读确实是一切学问的基础,那么,要了解为什么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期待几乎无一实现,以及他留下的遗产为什么如此具有争议,你就需要读这本书。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 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中心教授

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何在晚年「脱轨」,发动一场又一场疯狂的革命,从而背离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复兴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脱轨的革命》对相关的结构起源和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分析。… …本书应当成为专家的必读作品,和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的可靠指南。它的引人入胜也将打动学界之外的一般读者。

齐慕实(Timothy Cheek)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堪称一部有关当代中国历史的创新之作。它以国际比较的理论视野和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毛主义的历史局限及其在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一一一一一一董国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魏昂德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时代的不平等如何依旧形塑着当今中国 …许多人会(因这本书)大受启发, (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会引起悲郁的回忆)。

《旁观者》(Thespectator)

魏昂德对于毛泽东掌权的时代的描述富有细节、严密复杂且充满力量… …到底是什么使得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愿意跟随毛泽东的指示,最终发起了一场对他自身政党的内战? 毛泽东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联还有许多待解的部分需要我们去探索,而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种关联时,魏昂德的书将会是绝佳的选择。清晰、精准、对于细节的令人惊叹的严谨,这本书是对于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的全面评价。

《泰晤士报文学増刊》(The Times LiterarySupplement)

# Blank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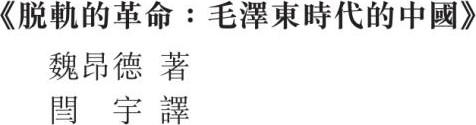
轨的革命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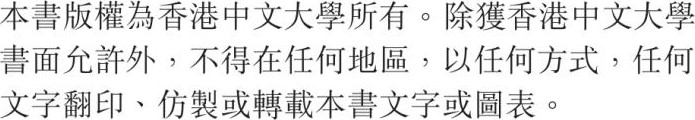
##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着闫宇译







 2019



### (ISBN) : 978-988-237-127-9

{PIhJi :



: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in Chinese)

By Andrew G. Walder

Translated by Yan Yu

Copyright 0 201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0 2019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127-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Richard M. Pfeffer

(1937-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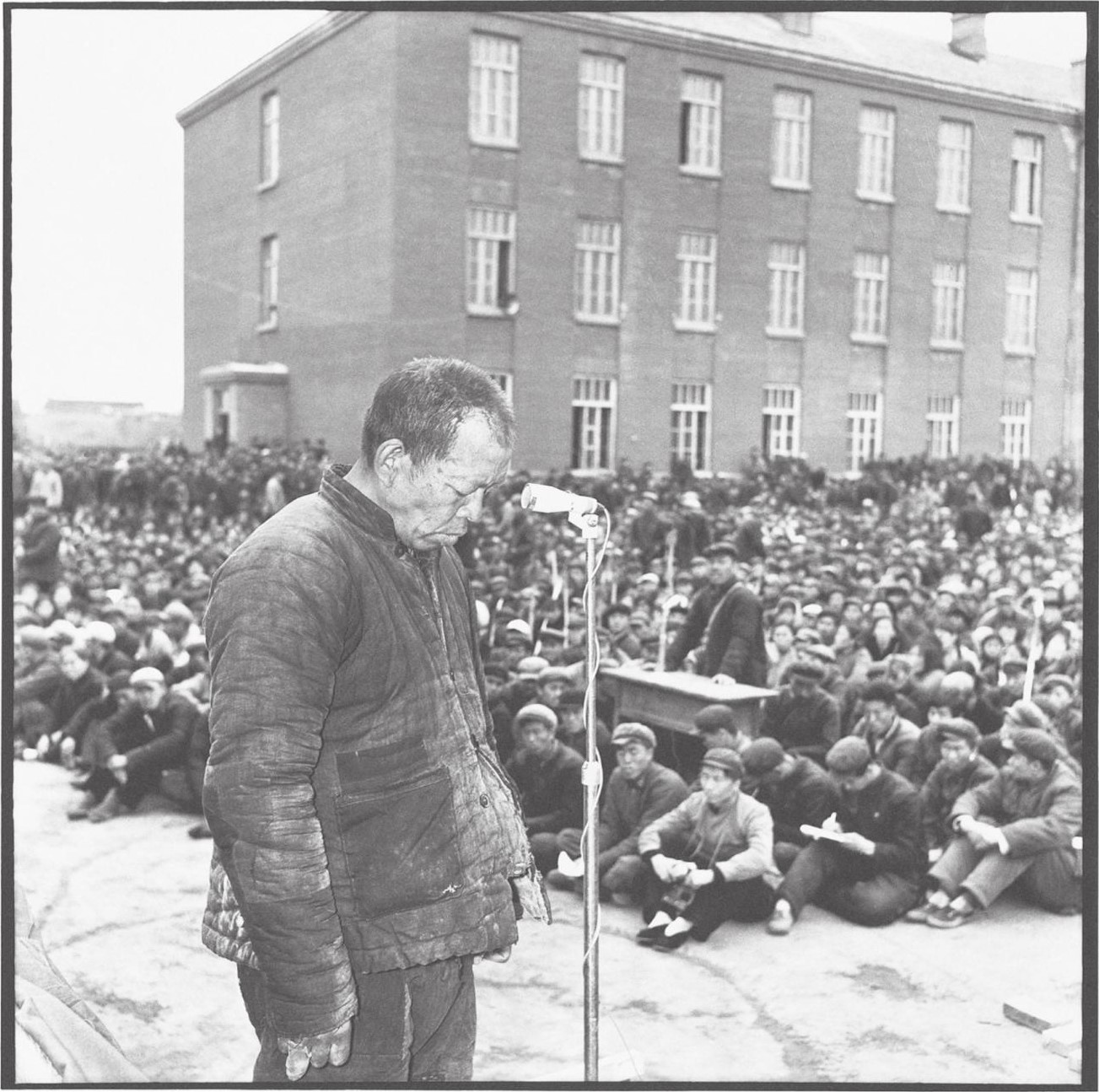
# Blank Page



1952年土地改革。在广东省佛冈县,农民因拥有四亩土地被打成「恶霸地主」,被判死刑。( ◎ Bettmann/CORBIS)



1952年土地改革。在广东省佛冈县,一名「恶霸地主」在判刑后立刻被枪决。( ◎ Bettmann/CORBIS )



19654 5 A 12 0 , irk 4 o (O Li Zhensheng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里的大字报。(ChinaPictorial,November

1967 )



196648 n 26 a , 

 7B o (O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



19664 8 n 29 a ' k f q' o (o Li Zhen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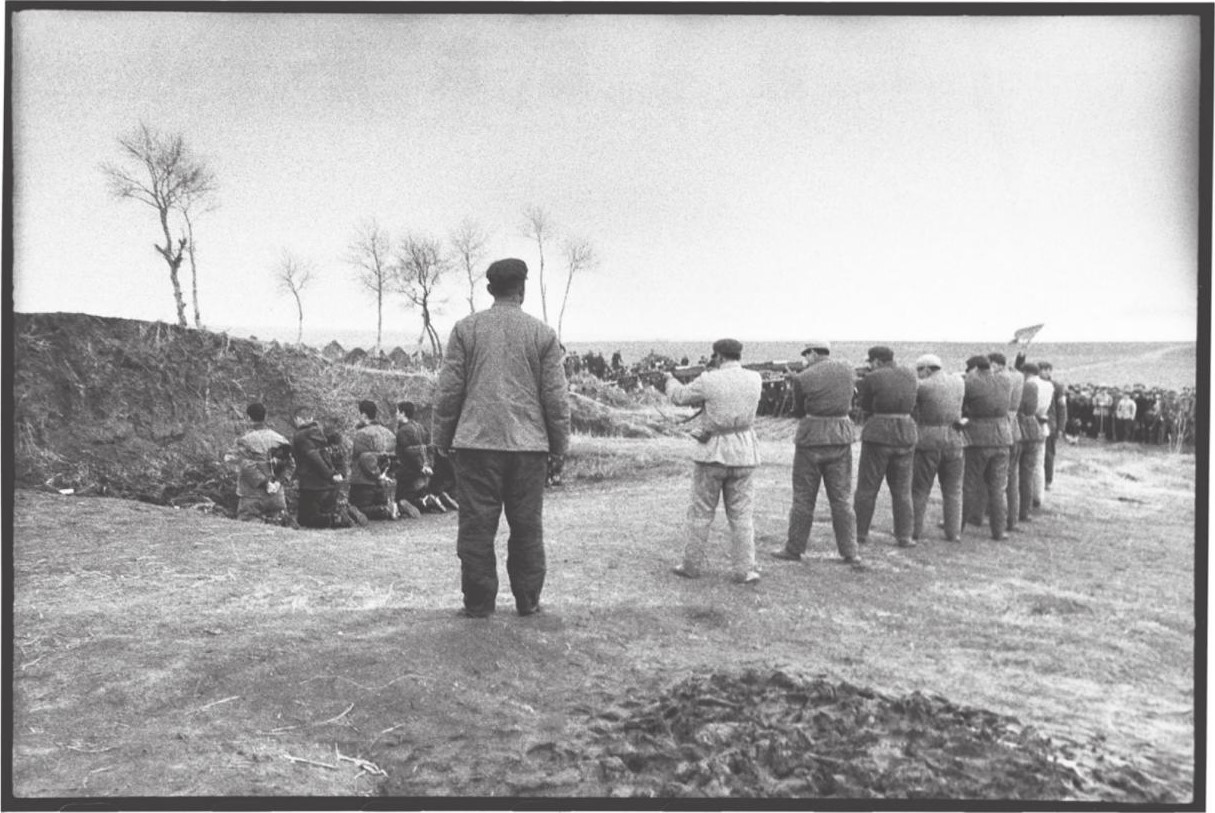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



196844 n , , o

J o (O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 fr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



1968年4月5日,哈尔滨市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群因政治罪被判死刑的人遭到枪决。( ◎ Li Zhensheng / Contact Press Images,丘om Red-Color News Soldier, Phaidon, 2003 )



1968年7月18日,广西省南宁市,在从「四二二」造反派手中夺取城市扌空制权的军管行动中着火的建筑。(NewCenturyPress, HongKong)



1968年8月5日,南宁市,「四二二」成员集体投降。(New Century Press,

Hong Kong )



1968年8月初,「四二二」成员投降之后在南宁街头被就地处决。(New

C entury Press , Hong Kong )

# Blank Page

## 目录

中文版序Ⅹ1Ⅹ

, ⅩⅩ1

|  |  |  |
| --- | --- | --- |
| 第1章 | 国家葬礼 | 1 |
| 第2章 | 从运动到政权 | 1 |
| 第3章 | 农村革命 | 4 |
| 第4章 | 城市革命 |  |
| 第5章 | 社会主义经济 |  |
| 第6章 | 共产党制度的发展 | 105 |
| 第7章 | 解冻和反弹 | 127 |
| 第8章 | 大跃进, | 159 |
| 第9章 | 迈向文化大革命 | 187 |
| 第10章 | 断裂的造反 | 207 |
| 第1 1章 | 瓦解和分裂 | 239 |

xv111 目录

第12章第13章第14章军事管控271 不谐之音与异见之人295 回望毛时代323

参考文献351 索引377



##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c, U erM De //的中文版现在可以让大中华地区更多的读者读到。这本书提炼了我三十多年来关于毛时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中国近现代革命是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社会革命之一,而由毛泽东担任领导人的这一历史时期,构成了这一系列社会革命的最终阶段,并在许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达到了激进的高潮。这段时期不仅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至关重要,并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来说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发展。

1980年代初我刚刚开始教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时,我的课堂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美国人。几十年之后,我的课堂上满是渴望获取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知识的中国学生。他们常常吿诉我中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是怎样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这一历史阶段,而本该详细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课程在大学课程体系中也是缺位的。我的这些学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毛时代发生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并且急切地渴求更加详细和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这本书并不是对于历史的简单叙述,也不是对于毛泽东本人的详细研究,尽管它的确采取了叙事的形式,并不可避免地把毛泽东放置在叙述的中心。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如果我们将他的动机和行动从叙述中抹除,讲清楚这些历史事件的模式将会变得非常困难。从根本上说,这本书是项社会学分

xx |中文版序

析-2---考察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起来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卜及这些结构如何制约-乁--扩大和改变了毛怿东所推行酌诸多举措)。本书的核心题一一;一一是毛泽东发动的包括百花运动一乁一大跃进以及文革运动的各个阶段)

、丨1

|  |
| --- |
| 的方针与路线做出调整 |

- 。本书的潜在议题,则在于毛泽东作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是如何带领着他的政党在1949年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却又随后在1950年代在新的社会结构面前遭遇种种制约与挫折。

本书分析的核心,是毛泽东与1950年代直接从苏联全盘复制过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持续斗争。与其他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是,毛泽东向这些国家建立新形式的官僚主义统治与不平等的普遍趋势提出了挑战。他在1960年代中期决定发动一场对抗这种官僚主义统治结构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在整个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激进的举措。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并且他自己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最终没有能够达到他默认的目标,却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如何将苏联模式的普遍性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相协调的难题。最终,毛泽东的继任者们领导着中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本书的读者将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转折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来说是多么地幸运。他们也可能会意识到,在某些方面,中国依旧在持续解决着1950年代苏联体制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

|  |  |
| --- | --- |
| 序亠  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前25年充满了动荡和灾难,这一政权展现出极端的施政风格,造就了独特的革命阶段。这段时期无疑被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纵观世界近代史,毛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时代,力度不亚于任何其他领袖。以毛泽东为绝对核心的领导集体做出各类决策,可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给民众带来灾难性创伤。随着新的史料被不断挖掘出来,一系列新的研究著作近来和继出版,厘清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化的人际关系和激烈的政治分歧。本书将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但更关注这些领导人在此之前做出的一系列决策,而这些决策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同时,以此建立起的组织体系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用来强化管理纪律和确保政令实施的工具,成为红色新中国的核心特征。  有两大组织架构至关重要:其一是共产党组织体系,严格约束着广) 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其二是从苏联借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一-制一-;' 给许多复制该模式的国家造成了 系列问题。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从北京发出指令,这些指令通过政治和经济两大架构传至地方各级,虽然达成了最初预想的伟大成就,却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灾难后果。撰写此书时,我始终将这一信念牢记在心:必须先了解中国的社 | Xl  Xll |

会结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系在1950年代的变化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决策制定和施政成果。而这些客观

xxii丨序言

的组织架构其实并不利于落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政策设计,甚至常常引起戏剧性的动荡和灾难性的后果。虽然本书大部分内容都以叙事文本的形式展开,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问题。

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造就了独特的政治体系,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崭新的社会结构,中央决策得以实施。然而,高层政令在传达的过程中往往不是被误解歪曲就是被过度解读,结局总是出乎领导人的预料。权力的集中和严格的纪律赋予了中共看似强大的力量,但也埋下了弱点和隐患。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支持者来说,几乎所有举措都没有按照预期的路线发展,结局常常出人意料,后果令人难以接受。可以说,毛泽东的大部分举措最终都适得其反:其原因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社会特征与西方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实际上,到共产主义统治的前十年结束时,中国社会与过去相比较也已经全然不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想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如此狂热地投身到这个时代的运动和冲突之中,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在内所有人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和组织背景。这一点对于今天来说特别重要:中国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已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之中,当时的社会特征现在几乎已经难觅踪迹。在本书中,我希望能阐明以下观点: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外化表达,这些制度成型于中共建立统治后的第一个十年,是讲述毛泽东时代故事的核心线索。

1973年,当我作为一名本科大三的学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第一节当代中国的课时,这本书的主题仍然非常模糊,只是关于一个封闭孤立政权内一系列事件的臆想。1983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第一次教这门课的时候,我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post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 ,讲述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建立新中国后所创造的新社会。在后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经济与社会痕迹已经在市场改革的浪潮下消失殆尽,但政 x111 治架构基本得以保存。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溯历史,有一点非常清楚, 1949年其实不是中国革命的结束,而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开端,之前的游击战争和国共内战仅仅是乐曲的前奏。

序 xx111

本书描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内容凝了我三十多年来研究的成果和教学的心得。我以有选择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社会学家,我也深切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权威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社会的不平等、政治冲突和民众的抗议运动。当然,还有其他关于毛时代的中国的叙述方式也令人信服,但不是我在本书中所要采用的写作方式。

我过去有关中国的研究,针对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术界读者。这些著述基于对其他研究的批判性解读,强调作者的概念性框架、新颖原始的数据源及分析模式。遗憾的是,这种风格对于学术圈之外的人来说阅读起来非常枯燥晦涩。而这本书极大地借鉴了我自己的研究和多年来所阅读到的优秀同行们的著作,而并不主要旨在面向专家。我试图整合自己对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了解,以一种既能适合学术圈交流、也能让普通人读懂的方式去写作。

在学术上和在制度上我都受益良多。在学术上的受益不胜枚举, 特别是在我自己研究领域之外的主题,需要大量借鉴和援引同侪们的研究和著述。在引用时我尽可能清楚地注明来源,对同一作者引用次数越多,就表明这些作品对我的启发越大。我在这里要尤其感谢白思鼎( Thomas Bernstein )、戴慕珍( Jean (i)、Dwight Perkins和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他们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草稿给出了宝贵意见。

我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和合著者一一喃京大学历史系的董国强教授。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章里,我引用了我们合作发表的研究成果。本书递交出版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的NancyHearst帮我审订了最终的书稿。在过去的近20年时光里,斯坦福大学为我提供了理想的知 XIV 戓家园。我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Freeman-Spogli国际研究所、人文科学学院和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慷慨的研究经费支持。在研究和写作的最后阶段,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为我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让我完成了本书大部分章节的起草。我还要感谢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Michael Aronson ,这本书和我其他的项目非常不同,我要感谢他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鼓励。

xxiv 序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段旅程的结东,这一漫长的旅途起始于1973 年9月,在巴尔的摩的一间教室里,我的本科导ßfliR1chardM.Pfeffer讲授的课程名为「中国政府与政治」。Richard是一位坚定的反战积极分子和中国问题专家,曾作为首批美国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他对声势浩大的文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也深刻了解在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中权力的滥用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社会主义的官僚独裁体系存在难以根除的问题。同时, Richard也是一个充满激情又要求严格的老师,他孜孜不倦地要求学生去批判地审视包括自身观点在内的所有论述,对学生的论文展示出无微不至的细心,会在每页空白处写上大量的批注,其中不乏犀利的评论,无情地指出偷懒糊弄或是逻辑错误的地方。他也是一位给予学生支持和精神滋养的导师,特别是当你开始走上研究正轨的时候。在此之前,我的本科课程显得很乏味;但那之后,一切突然开始变得清晰明朗。Richard的教学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他的开蒙之恩, 我永远无法奢望去回报。谨以此书献给Richard ,深表怀念之情。

1

## 国家葬礼

1976年9月18日下午3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站满了一排排衣着整齐的工人和士兵。他们沉默不语,低头默哀。当时,中国已有接近10 亿人口,人们自发在广场、村庄、工厂、院校和各单位组织起一场全国范围的缅怀活动。毛泽东已于九天前逝世,享年82岁。人们根据事前的安排各自站好,低下头默哀三分钟。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是当时名气并不大的华国锋。纪念仪式上,华国锋的致辞充满了对已故国家主席的溢美之词。毛泽东自1930年代早期就领导中国共产党,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面主导了国家事务。党的领导集体庄严地站成一排,旁人看来一片团结景象。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团结在10月6日就开始破裂,华国锋对毛泽东生前的激进派追随者动手了。他与其他党内高层秘密商议,命令其安保人员抓捕毛泽东的核心政治盟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她的居所被抓, 而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吿知要参加一次高层会议,当他们陆续扺达时,惊慌失措的三人被武装警卫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拘禁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几人对毛泽东鞍前马后。十年浩劫让中国政权瘫痪, 经济衰退,受迫害和死难者达到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四人都是当时中共十六人政治局的成员,参与党和国家核心政策的制定,而王洪文和张春桥更是位列政治局常委,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不久,四人被定性为

「四人帮」,被指控犯下反革命颠覆罪行。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其实只 2 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完成他的指令。在去世时,毛泽东依然是革命正当性的象征,但这是一场直接针对其政治遗产的核心要素的政变。四人帮的幕后主导恰恰是毛泽东自己。

27年前的1949年10月[[1]](#footnote-1)[[2]](#footnote-2)日, 55岁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人群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们相信,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外强入侵、殖民侵略和血腥内战终将过去。20世纪上半叶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可谓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希望建立宪政共和却惨遭失败,留下千疮百孔。1而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则是一个失败的多民族帝国。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一清朝(满清)于 1644年建立,在18世纪达到繁荣顶峰,但是却在19世纪后期走向衰败,同时面临着大范围内部叛乱和外强入侵。2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打败了资产阶级,也不在于共产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其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能够参与世界政治竞争、抵御外部侵犯的现代中国的崛起。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能够有效地管辖自身领土,保证边境安全,并拥有了处置小范围内部叛乱的能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管理中国社会中农村和城市事务的不再是乡绅士族,而是领薪水的国家官员。这些官员都是国家层级政权的组成部分,由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有效领导,并将政令传达至最基层的普通大众。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视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部分。而更深层面上,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过去的一个世纪则不堪回首。1950至1864年的太平军起义声势浩大,在十多年间波及清朝东南部四分之一的国土,起义建立起了太平天国,在它的兴衰过程中战乱频仍,夺走了超过2 ,000万人的性命。[[3]](#footnote-3)羸弱的满清政府不仅要镇压地方叛乱,还在多场反抗外强的战争中屡屡失利。1900年,以抗击外侮为旗帜的义和拳运动爆发,尽管义和拳组织受

到[[4]](#footnote-4)清廷支持,却仍旧在殖民国家的联盟前败下阵来,满清政府从此一蹶不振。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看似以较为温和的方式结束了帝制, 3 实质上只是为早已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画上了一个名义上的句号。[[5]](#footnote-5)

人们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然而很快就失败了。在国家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胜利。宋教仁是该党的创始人,在选举胜利中功不可没,却在之后不久被人暗杀。幕后主使是袁世凯,此人作为曾经的清政府官员,正欲谋求自身的独裁统治。[[6]](#footnote-6)[[7]](#footnote-7)中国很快四分五裂,在地方割据和军阀对抗中成为一盘散沙。71920年代,两大革命政党寻求联合, 希望以武力手段重新匡扶中国:一方是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领导;而另一方是中国共产党,最终由秉持激进主义的湖南游击领袖毛泽东领导。在192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让国民党内的有产阶级政治精英们惶恐不已,国共合作很快破裂,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一场旨在清洗共产党人的闪电突击行动中,数以千计的人遭到处决。

血腥的国共冲突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共产党在1930年代中期几乎被全数剿灭。而此时,命运的天平突然受到外部干扰: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于1931年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满洲里)并在1937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就遭到巨大冲击,国家满目疮痍,大约1 ,200 万人死于非命。[[8]](#footnote-8)

1945年,美国分别在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短暂的喘息之后,全面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在战时迁往位于西南腹地的陪都重庆,此时缓过气来,将矛头掉转,直指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共产党在中国北部持续进行着小规模地下抵抗运动,避免了与日军的正面交锋。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优势明显,但中后期节节失利,并在东三省的一系列会战失败之后开始迅速解体。当毛泽东在天 4 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已经被基本扫清,残余力量退守台湾岛,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已进军南部和西部的偏远省份,完成最后的占领工作。

无疑,国人都希望新中国的成立能结束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残局,迎来国家团结、和平和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但是,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革命时代远未结束,事实上,才刚刚开始。其即将带来的灾难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想象。

被视为定义毛泽东政治遗产的两大主要破坏性运动分别为1958至 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带来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中,全国人民都被调动起来,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打破生产纪录,并试图在短短几年内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发达经济体。大跃进中,党领导下的国家近乎无所不能,这一伟大壮举在十年前的人们看来不敢想象,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也是天方夜谭。然而,运动的结果竟是一场灾难:这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更让运动的发起者大失所望。在大范围人为造成的饥荒中,有接近3 ,000万人死去,工业发展严重倒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缓过气来。

大跃进带来了经济倒退、人口失衡的灾难,很快,文化大革命又带来了政治上的大混乱。1966年,毛泽东鼓励学生红卫兵攻击党内要员, 些许犹豫后,又允许工人参与到逐渐壮大的攻击毫无抵抗之力的地方党政官员的浪潮中。至1967年1月,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民政府机构近乎瘫痪,在之后的两年内才缓慢地得以重建,其中还不乏暴力事件。在此期间,各造反派联合前来恢复秩序的各部队,形成复杂的联盟关系, 相互争权夺利。许多地方人民政府功能尽失,彷佛回到了内战时期。中央发出号召,希望相互斗争的造反派可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胜利旗帜下」实现团结统一,但收效甚微。直到部队进驻并强力恢复秩序,文 5 革的这一混乱阶段才得以结束。

1968年夏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了戒严和军事管制,许多

市民都觉得斗争已经结东,社会安定即将到来。然而不幸的是,武装部队和人民政府又开始连手,以越来越强硬的手段打击他们的假想敌:阶级敌人和政治野心者。这一举动虽然有效重建了政府权威,但也让数百万人遭到刑讯逼供甚至肉体折磨。直到林彪神秘死亡,一系列事件才最终结东。当时的林彪是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离奇死亡。军队从民政部门撤走后,中国社会进入徘徊期,活跃在1960年代后期的那些红色斗士们又开始派系斗争,不时造成地区动荡。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76年4月,北京和其他城市爆发反对毛泽东政策的抗议活动。而仅仅六个月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这就是1976年9月天安门广场盛大集会的历史背景,厚重而复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中,有的在文革期间支持毛泽东的政策,狂热地攻击曾经的同志,践行毛氏革命的路线并诋毁那些将发展生产、提振民生置于革命之上的人;有的在这场风暴中得以全身而退;当然,也有的不仅丢了官职、饱受屈辱,甚至妻儿家属也跟着丧命,他们中的有些人在长期关押和流放后才被召回北京,从1970年代开始肩负重建秩序的任务。毛泽东维护自身政治遗产的最终计划,在其死后短短几年间就以十分戏剧化的方式被彻底瓦解。对于一个屡屡力挽狂澜,后又将中国置于二十多年极端破坏与无谓争斗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彻底的失败。毛泽东政策的破坏性让中国千疮百孔,并促使毛的继任者们开始重新思索。在接下来的30年间,他们将把中国带到惊人的新道路上去。

本书希望讲清这些事件和该时期其他的关键变革。最近的研究对国家领导层是如何斗争、背后的意图,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都已有深入的探讨。我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我不想赘述历史事实, 而是关注事件发生背后的原因。我的分析核心自然是毛泽东本人: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方式如何?又是什么想法或心态促使他这样做? 本书的核心论述是:无论毛泽东想做些什么,他的初衷与事态最后的走向通常是背道而驰的,最后的结果不仅出乎众人的意料,也与毛本人的

想法南辕北辙。为了理解其中原因,我们需要首先探讨在1948至1949 年间依靠武装力量统一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的革命机构组成,以及在漫长斗争中共产党所获取的历史遗产。我们要理解共产党是如何组织的,如何发展新党员,如何奖励有功者,又是如何惩处有过者的。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从苏联照搬来了经济制度,并认为这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但我们要充分理解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这两大组织体系党的组织体系和苏维埃计划经济体系一一一是毛泽东时代斗争与冲突的核心。毛的许多不满就是从此二者中来的,他的目标也因此屡屡搁浅。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是一个被古板的、不合时宜的革命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人物,以至于屡屡犯错、常常显得缺乏责任。然而,毛的个人失误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历史为何会以如此面貌发生。我的叙述将从毛对中国社会的干预入手,紧接着再分析干预的结果以及对他所缔造的政权和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在本书接下来的五章中,我将详细探讨历史跌宕起伏的发展。首先要解释的是:中国如何在1947年以后迅速成为强大、统一、特色鲜明而又存在巨大缺陷的民族国家。在第二章中,我将介绍共产党漫长的发展之路,讲述该党如何发迹,如何在斗争中吸取经验并影响后续的发展。共产游击和对日作战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核心基础,但是这一部分我不作重点讲述。在战时根据地延安,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强度的斯大林化,毛泽东吸收了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尤其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纲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这是毛自己的创造)。在延安根据地,共产党继续强化其策略,对党员的忠诚和服从提出了更高的要 7 求,达不到标准的党员遭到惩处。这一措施虽然为党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但过于极端,也埋下了未来的隐患。1940年代后期,游击战早就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调动全国人民的策略,让民众支持以传统战争为主要方式的国共内战。这一改变也深远影响着1950年代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1950年代,政权处在建设之中,社会革命也远没有停止。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简要介绍了当时城市和乡村的变革。历经好几个世纪的地租制度,连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在短短几年间就被摒弃。地主制度和佃户体系消失了,剥削他人的土豪乡绅也被处置。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独立小农国家。而在随后的几年间,土地却又被收回国有,农民被要求加入农村合作社。城市生活也被改写。选择留守大陆的店主、商人和富裕资本家们的财产尽被没收,私营企业不是并入政府管理的合作社就是被改造成国有企业。乡镇居民都需要登记在册并按要求上户口,因此与所居小区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团伙犯罪、武装黑帮曾经让中国城乡社会饱受摧残,现在都已销声匿迹,贩毒、卖淫和强收保护费的现象也被清除。城乡社会归于平稳,恢复了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建立了崭新而高效的民族国家,并希望以此彻底解决社会的公平与安全问题,这两大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人民。

在1950年代的建设中,这种新的国家秩序体现出浓烈的苏维埃色彩。192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立起了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第五章便描述了中国是如何迅速照搬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 这一决定注定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有其深层的缺陷,最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这一缺陷还远未显现。这种模式给苏联带来了飞速的工业发展,帮助苏联抵御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在战后依然发展强劲,并为苏联创造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威胁到西方列强。中国激进地采取了这种体制,但是在这种体制下,存款率高、投资率低,因此消费和生活水平都非常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仅仅略好于勉强糊口的水平。国家实行配给制,货品供应短缺,住房 8 条件糟糕,公共设施落后,这些问题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东都没有妥善解决。

在所有这些根本性的改变之下, 195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意志渗透进政府、社会机构和企业的方方面面。这一趋势在第六章有详尽讨论,学界对此有广泛的认同,但是并未深究其中原委。共产党并非寻求控制一切,关注的只是政府要害部门,关乎资源调配的核心机构,以及锻炼未来精英的平台。党的组织迅速学会如何调节资源部署、分配晋升机遇。这一举措迅速改变了民众入党的动机,并且最终改变了党员身份的意涵和人们入党的动因。在共产党还未锁定胜局之前,入党需要十足的奉献精神,要冒人身安全的危险,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在1950年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党员身份有助于职业发展,甚至可以更轻易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就能入党,那么他很有可能获得一份有权有势的工作,为亲戚后代谋取更多的特权。当然,要想始终能获取这些好处,就必须表现得对党忠诚,服从组织。

在1940年代,共产党是纪律严明、充满革命精神的组织,可是后来,入党成为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途径,党的架构成为裙带关系的工具,这一趋势让国家领导人十分头疼。毛泽东也为这一问题深深苦恼, 其政治设计中可能最重要的一条纲领由此形成。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并不认为这种趋势是层级官僚体系、控制不动产权、垄断晋升机会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相反,他认为这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对事态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以此提出的应对方案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想极力纠正这一现象,但是直至其逝世也没有解决。

前面的几章内容为毛泽东晚年的动荡局面做好了铺垫。在这几章中 9 存在着一个惊人的共性:事情的结局总是事与愿违,和毛泽东的初衷背道而驰。最后他不得不因此撤回政令,做出妥协,甚至改弦更张。1956 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二十大,从根本上了否定斯大林。从第七章开始,本书将叙述此后20年的大事,讨论中国对苏联阵营剧变所做出的反应。赫鲁晓夫的批评让许多地处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领导人不知所措,他们之前都忠实地践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毛泽东也身处其中,仿效斯大林的做法,搞个人崇拜,并建立起特色鲜明的红色政权。相比于赫鲁晓夫,毛泽东希望更胜一筹,推行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化进程。1957年2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毛泽东自信地鼓励普通老百姓积极建言、批评国内党政干部的工作,希望以此「纠正」党的行为,缓和民众心中的不满情绪,避免重蹈东欧各国的覆辙。没想到,事与愿违。在短短的几周内,原本胆怯的民众开始大规模地表达不

满,大有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独裁式统治之势。师生们组建起独立的报刊和社团,举行集会并在校园中发表演讲。工人们也变得活跃起来,要求涨工资并获得选举权益,各城市开始爆发罢工。农民从刚建立不久的农业合作社中退出,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参与到这场声势不断壮大的反对活动中。

毛泽东当时非常自信,认为当时共产党面对公开批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可是他错了。当年6月,毛泽东撤销了自己的政策,共产党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并常伴有报复行为。在一场巨大的反右倾运动中,许多批评者被当成目标对象,受到反党、反动和反革命的指控。那些或发表过批评意见、或参与过有组织抗议活动的人都受到批斗,还没有审判就已经被家人朋友孤立。他们丢了工作,被迫到农业合作社劳动,或是蹲了大狱,接受劳改。部分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领袖被处决。还有许多年轻党员,出于对党的忠诚和理想主义的想法,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批评 10 纠正党的不良作风,最终也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牵连。这是最后一次坦诚的批评运动,直到1970年代后期,人们才重新站出来,发自内心地对党的统治发表政治批评。

毛泽东依然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以崭新的、勇敢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反右倾运动还未结束,毛就发动了一场大范围的工业化运动:大跃进。第八章着重讨论了这一政策,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先前对国家各层面建立起的管控,鼓励工农大生产。党员干部督促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只为完成那些夸张而虚高的粮食、钢铁等的生产目标。大跃进最终造成了生产乱象和资源浪费,在浮夸的生产指标和极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官员不得不虚报产量。1959年7月,局势已经十分明朗:大跃进带来的经济破坏已经无法避免,党内高层开始思索该如何纠正他们的政策。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似乎准备更改政策方向。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将军向中央写了一封坦诚的书信,列举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却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路线。彭德怀被定性为叛徒,并丢了官职。毛泽东执意继续大跃进的路线,并发动第二次反右倾运动,凡是发表过批评或怀疑过中央政策的人都卷入其中。因此,大跃进又进行了一年,饥饿甚至席卷了大城市,农村的饥荒则更为严重,饿死了上千万人之多。

这是毛泽东连续犯下的第二次错误,但相比于第一次「百花齐放」运动,这次错误所造成的悲剧更为严重。大跃进的破坏和之后的余波又迅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事件在第九章都会详细论述。毛泽东允许党内其他高层修补经济上的破坏,毛的副手刘少奇直白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失败,这使得毛泽东很不高兴。他感觉到许多同志都不认同大跃进背后的核心理念。此时的苏联正在朝着赫鲁晓夫所谓「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发展,把重点放在科技、高等教育、培养官僚、和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并试图缓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毛泽东眼中,这是毫无原则地妥协,是苏维埃官僚向帝国主义世界低头的表现, 1 1 这无异于重新回到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特权阶级这一固化结构上去。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一向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革命者,与苏联的斯大林接班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发动了对苏的意识形态论战,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破裂

在毛泽东看来,他的许多同志在革命意识形态上有所动摇,苏联又改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此二者一定有紧密的联系。1963年,毛泽东已经年逾古稀,是该到考虑自己政治遗产的时候了。斯大林死后才过了三年,赫鲁晓夫就全面否定了他的政策,毛对此事耿耿于怀。毛泽东相信,虽然他的同志不会把他从主席的位置上赶下去,但他们可以坐等自己去世并淡出历史舞台。毛不相信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会继承他的革命遗志。而从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上看,毛当时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很精准的判断。第九章是一个小结,讲述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做出的一系列准备

毛泽东本可以轻易地一举清除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的路线不够忠诚的人,但这并不是一次寻常的领导层清洗。与之同步的还有基层老百姓的「造反运动」,学生们身先士卒,我们在第十章将做讨论。毛泽东动用大众媒体,公开鼓励高校学生造反派攻击那些教职工中的「走资派」和庇护他们的管理人员。学生们组织起红卫兵组织,不断地以暴力方式攻击

1章

教员职工、学校领导,最终又将矛头指向政府官员。他们的行为在大众媒体上被大肆赞扬,毛泽东也在天安门广场数次接见红卫兵。安保部门和军队接到指令,不得介入。然而,红卫兵自己却四分五裂,有些人不愿意遵从高层对运动的引导和控制,甚至开始攻击执行毛泽东指令的官员。

这些问题让毛泽东对学生造反派开始失去信心, 1966年末,他决定让工厂工人也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在第十一章,我会对这一举措的影响做出细致分析。中国各大城市迅速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许多工人要求涨工资、提高福利政策。另一部分人则被鼓动起来,对抗造反派的攻击,维护地方政府的权威。大街小巷上,不同派系相互争斗。到了

1966年底,绝大多数的省级政府都到了崩溃的边缘。面对着可能即将到 12 来的社会瘫痪,毛泽东指挥地方造反派夺权,与忠诚于毛泽东的官员们团结起来,一同取缔地方党委并恢复社会秩序。这一举措的典范就是上海一月革命。大批造反派工人和当时掌控宣传机器的张春桥联合起来,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建立起新的政府模式,在军方的支持下恢复了社会秩序。张春桥的夺权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被认为是人民的胜利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体现,人们将其视作蓝本,认为能以此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胜利并没有到来。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为了夺权,很快就陷入划分阵营、你争我夺的派系斗争之中。中央希望军队能起到帮助作用, 结果军队要么强行镇压拥护毛泽东的造反派,在中央面前失信;要么卷入地方派系斗争之中。中央的指令有时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有时又犹豫不决、缺乏果断。到1967年夏天,地方斗争终于失去控制,彷佛回到了内战时的局面。

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实施军事管制。1968年,大众造反和夺权运动结束,这一尝试以失败吿终。第十二章按时间顺序列举了军方为恢复秩序所做的一系列强制举措。军队将不肯罢休者视为反革命分子, 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恢复秩序,不容许任何反对行为的发生。数百万人被调查、关押和刑讯逼供,这就是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在全国清除一切形式的异见分子。大学校园空无一人,学生们都被送到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再教育」。教职员工则被解职,在乡下从事重体力劳动。政府官员被大批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或是去工厂车间参与生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此时达到顶峰,人们跳着「忠字舞」,表达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每个工作日早晨都对毛泽东的画像顶礼膜拜,「聆听他的教导」。

这一系列运动到1971年9月才停下来,第十三章将介绍中国在此之后的动荡时期。林彪元帅公开支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此受到嘉奖, 被提拔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左膀右臂和指定接班人」。不料,林彪却在此时死亡。官方的说法是林彪在刺杀毛泽东的 13 阴谋败露后,慌忙逃往苏联,但是遭遇飞机失事而身亡。文革运动在过去的五年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发动文革的正当性现在已变得千疮百孔。

巨大的转变紧随其后,军方开始从民政部门撤出。文革期间,国家总理周恩来极力消减其政治破坏力,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拥护者频繁攻击。现在,周恩来获取了毛的授权,开始着手修复文革带来的创伤。党的组织被慢慢地重建起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像以前那么狂热了, 公开的崇拜仪式逐渐减少。大学开始召回教职员工,小范围恢复招生。文革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政府官员被下放劳作,现在也官复原职。虽然刘少奇等人在文革中去世(刘在狱中死去) ,像邓小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还是熬过了文革的动荡,重新回到原先的要职上。

安定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早些时候的问题并没有被根除,现在又以冲突的形式显现出来。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林彪的作为,许多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和早些时候的活动者借此机会表达对整场政治运动的不满, 间接地批评了毛泽东的政策。先前的红卫兵、造反派和被下放的学生们发起了许多小型的独立思想组织。党内高层在毛泽东政治遗产的问题上又开始明争暗斗,下面的人也跟着制造冲突,派系斗争和游行在各大城市又出现了。不断发酵的事态在1976年4月4日和5日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人们发起纪念周恩来的活动,这

1章 丨

位共和国的总理在不久前刚刚去世。这些纪念活动很快就演化成一场公开的批判,人们指责那些违背周总理意愿,执意推进文革的官员。作为响应,邓小平再一次从领导人的位置上被撤了下来。

毛留下了一个饱经破坏的落后国家。在第十四章,我分析了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尽管遭遇大跃进之后经济急速下滑,和 1960年代晚期缓速衰退,中国经济在毛泽东去世时还是在增长的。但此时的中国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不用说追赶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工厂工人的平均真实收入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非常糟糕,人们住在拥挤而脏乱的公寓里,厨卫设施都是共享的。配给制依然运行着,消费品常有断货现象,部分商品 14 的供应还不及1960年代水平。大学教育体系几近瘫痪,公共机构的行政管理也无法发挥功能,因为有能力者被边缘化,政治敌对常常一触即发。生产线等资本设备陈旧,产品设计还是1950年代的老样子。许多农民依然处在赤贫状态,根据中国官方的标准,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膳食水平在亚洲几乎垫底。

毛泽东去世时的中国千疮百孔,想要修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毛泽东在世时给国家留下的破坏与落后,敦促其继任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建设的走向--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毛的接班人抓住了这一机遇,否定了毛的核心观点,选择了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这在毛泽东在世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对二者的反感是苏维埃式经济的核心概念, 自1950年代以来就被奉为圭臬。当历史的尘埃终于散去,中国转型为依靠出口增长的东亚大国,并帮助共产党得以重建,再次焕发生机。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政策中的严重问题,改革不可能有如此之规模。继任者们的改革并不是毛所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事实上恰恰与毛泽东的初衷南辕北辙。

# Blank Page

## 2章从运动到政权

建党早期,共产党经历过两次重大挫折,在国共内战初期也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因此,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可谓伟大的成就,对于部分党员来说,这简直就像是奇迹。第一次重大挫折,是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清洗运动。政变宣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人在城市内的组织网遭遇重挫。1927年4月,共产党共有党员5.8 万人,四个月后仅剩下[[9]](#footnote-9)万人左右, 1幸存者不得不转向城市地下活动大部分人撤回乡村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在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起的江西苏维埃政权,成为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一

共产党所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败,则是1934年国民党发起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运动,成功摧毁了江西苏维埃政权,剩余的革命力量不得不开始漫长而艰苦的长征。红军从1933年的15万大军鋭减到1936年的 2 · 3万人,这中间也只有一半人最终成功到达陕北的新革命根据地。[[10]](#footnote-10)共产党人不得不在这一干旱而多山的地区艰苦发展。3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摧毁了国民政府的许多军事力量,并迫使其迁都中国腹地(陪都重庆) ,相反,由于共产党人远处西北,并未与日军产生正面军事对抗。

即便1945年8月日本帝国仓促投降后,胜利看起来离中国共产党依旧很遥远。共产党军队进驻东北,并接受了苏军的补给。随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数量更多,武器更先进,因此早期战事对共产党十 16 分不利。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被一步步逼到北境,退到了临近中苏边境的区域。蒋介石命令自己的军队发起大规模攻击,希望将共产党的部队赶入西伯利亚的不毛之地。然而,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在数次关键战役失利后分崩离析,国民党对华东华北的控制权迅速地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短短一年时间,共产党就从失败的边缘挣扎回来,并迅速翻盘,击溃了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夺取胜利的道路深刻影响了1949年后的政权建设,也影响了国家领导人和党员们在此后数年内的观念和行为。然而,其中的核心元素并不是以战时根据地延安为代表的长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也不是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内的农村革命和党建活动,虽然在官方的分析中,这是共产党胜利的关键要素,并被写入课本,搬上屏幕。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来自于游击战:游击只是对抗日军侵略而选择的生存之道。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来自于对日本军队的武装抵抗:事实上,共产党有意避免和日军的正面交锋。和反,共产党的胜利来自于与国民党进行传统战争模式的内战。这留下了一个遗产:军事化的政党和传统式军队高度统一,人民群众被充分动员起来,以奉献之姿支持战事。共产党是枪杆子里来的政权,这为新的中国和国家未来走向打下了组织基础。



3 Apter and Saich ( 1994 190 194 )中有生动的详细描写。

### 如何解释共产党的胜利

政治革命可以说是两大组织之间的争斗:既有的建制派和崛起的新力量和互博弈。新崛起的一方希望在一定领土范围内获得武装夺取政权的正当性。[[11]](#footnote-11)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此方法理解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大家都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和战略都胜过国民党一筹,但共产党胜在何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解释认为,共产党的成功得益于农村革命,归功于毛泽东的领 17 导。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引入中国,并将革命力量转移至乡村。这一策略结合了游击战的精髓,建立起了基层政治组织, 充分动员贫穷的农民。[[12]](#footnote-12)对于这一论点,学界有三种版本,关于毛的策略为何能够得到中国农民的响应,每种版本都有各自看重的原因。

最早的第一种版本认为,日本侵华的政治影响帮助共产党取得了农民的支持。抗日战争激发了农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并以此取得了成功。在这一观点看来,残暴的日军在所到之处实行血腥镇压,农民们本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但现在却被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共产党一直在敌后活动,游击队在民众眼中成为了救国救难的光辉形象。因此,共产党团结起了新觉醒的农民阶层,与他们共同抵御外敌。 [[13]](#footnote-13)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胜利依托的是削减地租和土地革命。千百年来,土地制度一直是禁锢中国穷苦农民的枷锁,贫农长久以来没有一点生活保障,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革命,让农民有了土地,免除了他们繁重的赋税,获得了解放。[[14]](#footnote-14)共产党抓住这一关键,在政治上动

员起了这些农民。共产党帮助没有土地的农民和佃户取得了利益,释放出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因此获得了来自农民阶层无穷无尽的支持。 [[15]](#footnote-15)

第三种观点是第二种观点的引申,强调广泛植根于农村社会的意识传统,而不是阶级间的冲突。根据这种观点,共产党人的政策提高了贫农的生活水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看来,正是成就了「皆有所养」的要求。共产党作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对抗着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张的资本主义,自然获得了农民的支持。 [[16]](#footnote-16)

以上观点都解释了为什么游击策略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虽然部分解释了共产党人成功的秘诀,但并不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答案。共产党动员农民和创建村一级的政治组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某地区作为基础的。研究者原以为只要具备某些更易于获得成功的社会条件,共产党就能取得成功,然而,他们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反,他们发现有军队在的地方,共产党更加容易取得成功。[[17]](#footnote-17)党内领导人并不觉得他们的策略和具体的经济条件会有什么联系。

在他们看来,比比皆是的贫富不均已经足够酝酿革命变迁了。

在共产党军队牢牢控制的地区,革命在根本上是很脆弱的。一旦军事控制得不到保障,根据地很快就会解体。在1939年后期,侵华日军进一步巩固了对华北的控制,开始向共产党开展敌后活动的区域进军, 抗日根据地迅速缩小,党的干部发现战战兢兢的农民们的合作意愿不断降低。[[18]](#footnote-18)相同的情况在国共内战爆发初期的六个月也出现了:在华北战场,共产党军队战事不利,许多地方党组织都出现了背叛倒戈的现象, 原本实行的农村改革也改弦更张。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评价这一历史时期,「只要共产党军队在,地方干部就会推进土地革命,发动政治运动。可一旦军队撤走,先前在抗战时期加入革命的人就会考虑改变他们的立场。」[[19]](#footnote-19)

游击策略并不能解释共产党的胜利,另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明问题: 城市大会战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需要动员起大量人力物力。而抗日战争期间,游击策略虽然保证了共产党的生存和壮大,但打游击时并不太需要农民提供食品、物资和后备力量。国共内战一爆发,共产党就摒弃了游击战的策略: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向苏联部队投降后,毛指挥军队洪水般涌入东北,并开始全面动员、准备发动革命战争。红军此时已经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4年的47 · 5万人激增到1948年的280万 19 之众。[[20]](#footnote-20)这场大规模战争需要巨大的物力和人力资源,远远不是过去游击模式所能提供的。新的模式不仅改变了共产党控制下的社会面貌,也改变了共产党自己。全国人民被要求参与到对抗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中来,所有人必须支持共产党的行动,提供物资、劳力和人力的支持。在内战后期,中国的局面与二战末期苏联军队占领东部欧洲的情形是一样的。人民解放军从东北挥师南下,占领了主要国土,面积之大前所未有。自清朝灭亡后,像新疆西藏这些地区就再没有回归到中国的国家政权之下,现在也被纳入新中国的版图。

游击队员们在偏远的乡村地区活动,他们绝不是打败强大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事实上,共产党高度掌控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动员所有力量发动夺取土地的战争,才是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也是新中国政权的核心要素之一。如果想充分理解共产党赢得内战的原因,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在这一阶段共产党比国民党的军队更胜一一。

### 日本侵华的军事影响

国共两党的历史性斗争需要从日军全面侵华的前夜说起。1936 年,蒋介石在陕西大量集结部队,准备向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及其核心延安发起最后攻势。此时,红军仅有5万多人, 29 , 000支枪,毫无空军力量可言。相反,国民党拥有200万部队,空军有314架战机,十分强大。[[21]](#footnote-21)就在攻势发起前,蒋介石手下的两位将军将其武力扣押,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全境,并在一步步蚕食华北地区。两位将军并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其实已经派出秘密谈判代表在这一问题上与共产党方面达成了一致。蒋介石最后被释放,攻打陕甘宁边区的行动最后没有发生。 [[22]](#footnote-22)

次年,各方面都占尽优势的日军发动全面侵华,重挫国民党的政府 20 与军队。国军的精鋭部队被消灭,在最初的几周内, 18 · 7万名士兵牺牲。[[23]](#footnote-23)蒋介石的精英力量部署在上海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三个月内, 淞沪会战损失30万人,另有10万部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到1937年末,总共损失约37万至45万人,占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24]](#footnote-24)国民党军奋勇抵抗,让日军遭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伤亡,致使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采取了血腥报复,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25]](#footnote-25)

此后,国军依然顽强作战,国民政府迁入战时陪都重庆。到1939 年后期,日军在与国军的作战中共伤亡约50万人,短期内以闪电战的形式全面占领中国全境的计划破灭了。国军的抵抗让强大的日军也深陷泥沼之中, 1939年冬天,蒋介石指挥了横跨八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从1938 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1年12月7日,国民党军队又损失了130万部队。 [[26]](#footnote-26)

共产党的军队一开始本不能与日军对抗,保卫中国领土、实施正面作战的任务几乎全部由国民党军承担,因此国军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参与战争时,共产党的军队仅有3万人。1937年9月,八路军的番号正式成立,此后不久,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成立, 1934年红军江西苏区撤离之后的残部就在新四军中。 [[27]](#footnote-27)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共产党自身的战略弱点,因此实行了被他称之为游击战的策略,避免与日军主力部队正面交锋,与此同时积极保存和扩大军事资源。[[28]](#footnote-28)在抗日战争最初的两年间( 1937一1939 ) ,日军据守铁路沿线和军事要塞,并未深入乡村地区。当日军企图扩大控制范围时,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广布势力。[[29]](#footnote-29)此时,部分指战员建议立即开展运动战对 21 抗日军,认为游击策略收效甚微。他们主张与国民党军更加密切地合作,力图重创日军。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党内领导的支持, [[30]](#footnote-30)但是毛泽东坚持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并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化整为零,划分为小股力量并投入到募兵、政治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中。在这一策略下,共产党军队与日军的正面作战少之又少,日军的巡逻队和日伪军经常受到伏击,弹药物资补给队常常被抢。与日军合作的人被暗杀,铁路线被破坏,公路上到处都是地雷,通讯基站被破坏,就连电话线也被偷走。 [[31]](#footnote-31)唯一的特例发生在1940年。当时共产党军队控制的乡村地区越来越广,信心也越来越足,发起了对日作战中唯一一次主动而持久的进攻。在毛泽东授权下, 104个团协同作战,破坏铁路线、公路线、煤矿和其他日本控制下的基础设施。八路军伤亡22 ,000人,日军则损失约 3 ,0007,000部队。日军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和破坏行动,不仅重新占领了所失地盘,还屠杀村民,抢夺牲畜,建起了碉楼地堡。共产党控

制地区的人口从4,400万骤降至2 , 500万,八路军从40万人缩水至30万人。到1942年,共产党在华北平原90%的根据地落入敌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百团大战触发了日军强力的反击,毛泽东重新回到了游击策略上,再也不敢向日军发起另一场大型进攻了。 [[32]](#footnote-32)

就承担战事任务而言,国共双方是极不平均的。1940年1月,周恩来致信斯大林,报吿对日作战的积极影响。在信中周恩来说:自1939 年8月以来,中国共有100万士兵伤亡,但八路军仅损失3万人,新四军仅损失1 ,000人。在中国军队伤亡总数中,共产党军队仅占3 %。[[33]](#footnote-33)国民党军队虽然遭受重创,但依旧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坚持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会战是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即著名的日

22 军「一号作战计划」, [[34]](#footnote-34)这使国军再损失14 · 6万人。某份分析这样说道: 「日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致命一击,让后者再也没能恢复过来。」29一直到战争结东,国军都是「严重的溃败状态」。 [[35]](#footnote-3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都沾沾自喜,自封为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淡化。[[36]](#footnote-36)在绝大多数针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尖鋭批评中,有一份指出国民党军的军事成就是不容忽视的:「国军坚持了八年的战争,对手又是如此强大,从人员组织、士兵训练和武器配备上都遥遥领先。国军粉碎了日军以闪击战的方式一举击垮中国军队的幻想,并在上海、南京及华中和华北平原勇敢作战,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侵略者深陷中国的广阔领土。」[[37]](#footnote-37)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共有483 ,708人战死, 190 万人负伤,而中国有130万人牺牲, 170万人负伤。[[38]](#footnote-38)[[39]](#footnote-39)

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非常微小的。根据一份苏维埃第三共产国际在1944年12月的报吿,国民党战斗减员100万人,而八路军仅损失103 , 186人,新四军阵亡不过数千人,共产党军队伤亡人数仅占中方总伤亡的10%。 一位学者认为,毛泽东著名的人民战争思想有一个巨大的吊诡之处,即「人民战争思想其实并未被应用于对日作战之中」。 [[40]](#footnote-40)

### 日本侵华的政治影响

日军侵华不仅造成了军事层面的影响,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凝聚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从来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机器,国民党军队也并非由中央统一领导。在1927年清洗共产党人之后,蒋介石暂停了群众动员,并与地方军阀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地方军阀虽然在名义上宣誓效忠南京政府,但其实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41]](#footnote-41)在1935年的巅峰时期,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了三分之一的中国省份,涵盖中国中东部地区。其余领土不是被军阀控制,就是被日军占领(伪满洲国)。[[42]](#footnote-42)[[43]](#footnote-43)在军事力量的控制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1937年,在全国共有176个师,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只有31个。381937年,日军侵占中国沿海,并沿 23 着长江逐步向内陆推进,将国民党军队挤出了原有的核心卫戍区域,并对蒋的嫡系部队予以重创。 [[44]](#footnote-44)

为了团结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十分依靠军队力量,这在一位分析者看来,是「一个根基单一、只依靠部队力量的军政府,却还要在表面上维护国民党的领导。」40部队是政权的核心基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从未发展起牢靠的社会基础,也未曾建立强大的制度机构。对日作战中, 国民党军的惨重伤亡让国民政府丢失了根基。日军投降、国共内战爆发之后,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不再是共产党的对手。41常年的抗日战争弱化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同盟关系。在国民政府名义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机构丧失了功能,严重影响中央政府的征税和募兵。国民党只是多股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之一,且党内本身缺乏凝聚力,派系斗争很严重。

蒋介石之所以能将整个体系团结在一起,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众将领和党羽头目对他个人的忠诚。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走向衰败:「战争期间, 基层党务工作几乎停摆,各处的党内机构都被地方领导控制和利用,成为他们寻求自身既得利益的工具。」43

蒋介石早已意识到国民政府内部的组织性弱点,也很羡慕共产党人的团结守纪。1939年,刘少奇编写了党员的纪律与服从要求:「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所有党员必须将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区分开来,要毫不犹豫地为党的利益着想,二者有冲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甚至是自己宝贵的生命,为党,为无产阶级,为民族的解放献身。」441938年,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他们必须有一个紧密的组织结构,要有超过任何别的党派的铁一般的纪律。」反观自身,蒋介石对国民党扼腕叹息,觉得国民党人「争夺利益和权力,以公谋私,脱离人民。」451949年1月,蒋介石从总统的位置上辞职,准备前往台湾,国民党的失败已经难以避免,他在日记中写道·



1. Ch'i ( 1982, 3 )·
2. Eastman ( 1984, 130)·
3. Kirby ( 1984, 157一158)·
4. Ch'i ( 1982, 235 )·
5. 刘少奇939 Ⅱ 984 , 136一137 )。
6. Taylor (2011 , 157) ·

「无可辩驳的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瘫痪,党员建设、组织结构 24 和领导方式都出了问题。因此,国民党变成了没有生命的空壳,政府和军队丢失了灵魂,因此军队才会溃败,社会最终解体。」[[45]](#footnote-45)蒋介石从中吸取教训,退守台湾后,他立即建立起了更加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坚决地执行纪律,实现内部统一,绝不重犯在大陆的错误。 [[46]](#footnote-46)

既然蒋介石很早就意识到党内存在的团结和纪律问题,为何不早点解决呢?蒋的难处在于地缘政治,此外,国民党党员的社会组成也是原因之一。1927年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在大城镇发展较快。绝大多数党员都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许多都是文化人,一部分还相当富有。因此党内生活仅仅是他们考虑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国民党人所控制的区域资源丰富,不需要与草根阶层建立强大的联系就可以获取足够多的资源。党内职务和政府职位很容易成为谋私利的工具。而在农村地区,国民党人依旧延续了帝国时代的制度:允许地主士绅发挥政府职能,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是征税的权力。

### 共产党纪律的源泉

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的情况恰恰相反。1927年,共产党遭受清洗,被迫转入偏远而孤立的农村地区,那里自然资源匮乏,他们要依靠农村老百姓生存下去,因此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他们没有职业上的竞争性,没有大额财产,更没有经济利益。党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即使选择退党, 也无事能做。共产党人先是被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随后又遭到日军的攻击,他们不能背叛革命,不然就要坐牢、受辱甚至被杀。共产党干部为了生存,必须依靠党组织。

25 农村的现实环境给了共产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同时,他们极度重视纪律、强调团结,有时候都成为一种痴迷。但也正因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党纪党规的作用。共产党人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纪毫不含糊。在建党早期,党内的整肃是十分激烈的。主要的党内整肃是在1930到1932年,目的在于清理江西苏维埃政权游击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47]](#footnote-47)当时,地方指战员不服从指挥,毛泽东相信一定有暗地里的阴谋,他展开了一波大范围的处决,让党内检察官进行地毯式搜索,搜捕嫌疑人。[[48]](#footnote-48)当时另一片根据地,整肃也在同样进行着,「就像中世纪抓捕巫婆一样疯狂,地方干部人人自危,为求自保,相互吿发别人为反革命分子,结果被捕名单越来越长。」[[49]](#footnote-49)[[50]](#footnote-50)在共产党的党史记录中, 2 , 500多人卷入这一事件并被杀,而独立史学家估计,确切的死亡数字应该接近1万。511934到1937年,其余地方根据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严刑逼供、上百人集体处决的事时有发生。 [[51]](#footnote-51)

虽然针对内部叛变的指控和刑讯逼供从未停止,这些形式恐怖、对自身破坏力极大的整纪模式在抗日战争期问不断地被修改、优化和推广。1942至1944年,延安整风将党内纪律发展到了顶峰。1938年,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52]](#footnote-52)出版,随后被翻译成中文,整风运动依照其中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的纪律。

在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以后,一些党内领导在1937年10

月回到了延安。其中一名叫王明的人企图挑战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威。[[53]](#footnote-53)王明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苏联度过,并被斯大林熟知。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侃侃而谈,熟知马克思主义原理,远超毛泽东。毛泽东从未出国,之所以有领导权威,一来因为他是成功的游击作战指挥员, 来他在政治斗争中凭借自己的精明才智一步步巩固地位。王明以斯大林主义的真正解读者自居,企图颠覆毛泽东的权威,却以失败吿终。

回到延安后,王明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加强认识,不能仅靠狭隘的经验主义,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54]](#footnote-54)毛 26 泽东自然不甘示弱,展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巩固对党组织的控制,并仿效斯大林在苏联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形象。[[55]](#footnote-55)这种早期的个人崇拜现象一部分也是要与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相竞争。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是抗击外敌的象征,他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获得了国际的认可, 甚至苏联也不例外。 57

在建立自己的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政治秘书的帮助,尤其是陈伯达。1920年代中,陈伯达进入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劳动大学学习,后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56]](#footnote-56)陈伯达为毛泽东提供了推荐书目,帮助他学习马列的基本知识,并修改毛的写作文稿。毛泽东从两本苏维埃教科书学起,并学习了一篇刊载于《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的文章。

当然,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本书在1939年就有了中文译本。[[57]](#footnote-57)此书对毛泽东影响深远,塑造了毛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设计。毛泽东曾说,他没有通卖全书,只是着重阅读了每一章最后总结性的段落。虽然毛泽东并未深入阅读材料,但是他将自己的理解教条式地搬到了中国,没有进行批判式的学习。 [[58]](#footnote-58)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概要性地记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发展壮大与最终胜利,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毛泽东在随后的1950年代建设中就照搬了苏联的蓝本。然而,这本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这一方面,而是教会毛泽东如何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打压自己的竞争对手,保持统治地位。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政见的分歧就意味着党内斗争,必须区分出「正确」的一方与「不正确」的一方。每次政治划界就相当于一次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该书的核心观念是:即使社会主义已经建立,阶级斗争依然要继续,因为资产阶级的不良分子永远妄图渗透共产主义政党,这些人必须被彻底拔除。[[59]](#footnote-59)因此,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就被视作党内谋逆、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此书将斯大林神化,称赞他的个人崇拜,彷佛斯大林永远站在对的一方,从不犯错。毛泽东就模仿他的先驱,强化自己的权威,建立起个人崇拜, 27 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在这些政治设计中,陈伯达都参与合作,这些理念

最终成为毛的政治成果:毛泽东思想。[[60]](#footnote-60)

### 共产党的第一次斯大林式清洗

1942至1944年的延安整风完成了这一运动。[[61]](#footnote-61)延安当时是共产革命根据地的首都,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躲避日军的入侵,来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许多是都市人,左派观点十分模糊

他们中大多数先前并不是共产党员,怀揣自由信念,对民主依然充满理

想主义。64许多人反感严苛的党内纪律,结果被共产党初期官僚体系的独断和层级手段打压得很厉害。相反,党的领导人们始终担心国民党的特务已经随着长征的队伍渗透到了延安。

1942年2月,毛泽东的两篇演讲,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式启动。他批评了党内的三种「错误趋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标签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那些初到延安,没有革命经验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标签直指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内领导,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主观主义最坏的形式就是教条主义,不能仅依靠对马克思经典的学习来做事,而脱离了中国的客观政治现实。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反对那些将自身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的人,反对抛弃革命崇高信仰的人。虽然党内需要民主,但民主也要集中,党员个人的利益应该成全党的集体利益。毛泽东宣示,批评过去的错误是很重要的,能帮助根除这些问题,避免重蹈覆辙。毛泽东认为延安整风和过去十年党内的血腥清洗不同,也有别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处决党员干部的行为,因此将这次整风运动比作医生治病救人,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毛泽东的一番话激起了狂热的响应,但干校和党报的党政人员做出的反应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他们在党报上刊文,并张贴大字报,他们认 28 为教条主义说的就是没受过教育的党内官僚对文学和艺术的管控。他们希望政治和文学可以分开,获得独立于党内宣传的些许自由。此外,像著名小说家丁玲就批评延安社会对女性不够重视,男性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常伴有性别歧视。到目前为止,最具有争议也影响最广的是一个叫做王实味的党内翻译。他认为,官方批准的文学形式粗糙而不入流,希望设置更高的艺术标准。他说,在延安的许多党员干部都太无情专断,对待年轻而有理想主义的下属时方式欠妥,还排挤他们。他指出,延安已经出现了与干部等级挂钩的一系列特权,以及食物、衣物和住宿标准的



1. 在当时总计80万名党员中, 90%是近期加入的(ApterandSaich 1994, 267 )。
2. Apter Saich 1994 279 281 ) ·

分层配给。同时,他强烈批评部分已婚干部开始追求年轻漂亮女孩,甚至利用职权与他们发生男女关系的行为,这些干部更是无视自己共同患难但年华渐老的发妻。最后一项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毛本人在那时刚刚抛弃了从江西苏区一同到达延安的发妻,与从上海来的年轻演员江青结合。王实味强烈批评党内干部频频举办周末交谊舞会的行为,不顾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他将这些伪善通通报道出来,而受谴责的干部也为自己辩护,表示他们的愤怒。66

这些文章一发表,党内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便有了共鸣,可这些批评与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有所偏离的。毛泽东希望加强党纪,强化自身的个人权威。谁要是对这一原则发起挑战,毛泽东就决不容他。随后不久,整风运动立即转变为对这些人的批斗, 一匕人不得不坦白他们的「罪责」,并保证改进思想,但王实味拒绝认罪,据理力争。王实味随后被扣上了「五人反党集团」之首的帽子,是托派, 是叛徒。他随后在公开场合遭到激烈批斗,并被关进大牢, 1947年被处决。

29 让批评者闭嘴之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整风运动,特别要求揪出党内的叛徒和内奸。整风运动的责任落到了康生的身上,他与王明一起1937年从莫斯科学成归国。康生支持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并于1939年被委以共产党特勤工作和党内安全的重任。681941年,康生被任命为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首先针对的就是被冠以「托派」、「叛徒」帽子的知识分子。之后,整风运动逐渐扩大到整个党的体系,着重抓捕敌对特务,清除「思想偏离路线」的党员。 69



1. Apter and Saich ( 1994, 59一64), Cheek ( 1984, 30一37), Goldman ( 1967, 19一32), and Dai ( 1994, 3一30) ·
2. 对批评者和反对者的处理参见Cheek ( 1984, 3774 )、Goldman ( 1967, 32一50 ) 及Dai ( 1994, 31一75 )。王实味文章及类似观点文章的翻译参见Bentonand Hunter ( 1995, 69-83 )与Dai ( 1994 ) ,也包括批判王的内容。
3. MacFarquhar ( 1997, 290一292) ·
4. Apter Saich 1994 289 292), Teiwes and Sun ( 1995, 370一375) ·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可疑的叛徒和间谍,整风运动首先审查了党员干部的档案。调查员寻找那些有可疑背景和人际关系的人一一一其中包括曾参与国民党青年组织后加入共产党的,以及那些在敌占区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尤其是曾被逮捕后释放的党员)。在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人们要求「向党交心」,详细交代为什么参与共产主义事业,要与过去的政治立场彻底断绝。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就要粉饰自己的过去,对那些有可能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自然略去不讲。许多人显然在交代过去的时候很不诚实,负责党内安全的人员自然就变得怀疑起来。那些思想较为独立、质疑党的权威、怀疑政策正确性的人更成为重点调查的对象。

随着运动的深入,整风运动开始使用长时间的心理摧残、强迫审问甚至是刑讯逼供。关于地下间谍组织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这种情况下,坦白的人「多到无法控制」。审查员对这些刑讯逼供得来的材料深信不疑,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所谓的「阴谋活动」之中。许多人只是不堪折磨才选择「坦白」,本以为苦难到此结束,不料人们的互相吿发让更多

人卷入。审查员还作伪证,显得党内的谋反者数量庞大。 [[62]](#footnote-62) 30 整风运动让党内恐慌密布,许多党内高层也十分不满,因为他们的下属都被卷入其中,尤其是周恩来,在康生提供的指控中,他影射周恩来指挥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周恩来当然予以否认,随后的调查才让严刑逼供的行为公之于众。1943年10月,毛泽东意识到整风运动不得人心,因此更改了政策。他意识到整风运动可能会削弱党甚至导致分裂, 急令停止草率的处决和严刑逼供的行为。 [[63]](#footnote-63)

在1944年的报吿中,康生承认自己使用了严刑逼供,但是他始终觉得整风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提高了人民的意识」,「铲除了颠覆分子」。而事实上,许多问题让人后悔,尤其是刑讯逼供的老问题。针对这一点,康生归结于「经验不足」,认为在群众运动中,经验不足让人

惋惜但也不可避免,方式上的简单粗暴导致了标准的过度单一。许多党内同志认为,党的宽容只是不再进行大规模处决罢了,因此,许多人觉得拷打、虐待和武断的间谍罪指控变得不疼不痒,康生对此事深表痛心。许多人依然相信错误的指控和逼供得来的坦白,干部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有人一定程度上秉持这些错误的观点。[[64]](#footnote-64)康生解释道,在高压环境下「坦白」自己罪过的人中,其实只有不到一成是真正的敌特分子。 [[65]](#footnote-65)虽然毛泽东才是幕后的主导者,康生担起了整风运动的罪责。康生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被一再降职,直到1960年代还做着非常无关紧要的工作。[[66]](#footnote-66)虽然官方已经承认延安整风做的有些过头,但只认为做错的地方在于刑讯逼供,其余方面均是正确的,哪怕是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广泛的恐惧。整风之后,凡是不同意党内政策的行为都会被当作叛变看待。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说,「这就好比一根大棒:人们害怕被认为是叛徒,因此心存畏惧,但这也让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保持服从。」[[67]](#footnote-67)整风运 31 动强化了党的纪律和思想一致,对共产党此后的成功非常重要,谁要是唱反调,就会遭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延安是相对封闭而孤立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与真正的抗日战争主战场相去甚远。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铸造成了一支纪律高度严明的武装力量。严苛的党纪把服从一致性推向了极致,即使有一些代价,目的依然达成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抵御日军的最后一波攻击,但基层党组织几乎停摆。相比之下, 毛泽东强制重塑共产党,推行其本人领导下团结一致且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日军投降以后,留下了大量的侵占地盘,国民党军刚刚饱受战火摧残而亟待整合,想要重新建立控制地位,但他们面对的却是毛泽东领导的团结统一的强大力量。

###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阶段,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殊死较量。毛泽东最后成功了,但共产党的胜利在一开始并没有显现出来。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当时国民党军有 430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而共产党方面只有120万部队,装备也很老旧。[[68]](#footnote-68)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局面一度对共产党不利,到1947年的时候, 斯大林和许多毛的同事都劝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和解。但是毛泽东坚信内战一定能赢。蒋介石孤注一掷,坚持要摧毁解放军在东三省的精鋭力量,但没能成功。国民党军队迅速解体,国民政府也濒临崩溃,更暴露了连年战乱导致的各种弱点。共产党摒弃了游击策略,转向全面动员的传统战争模式。内战的最后几年,国民党可谓是全面溃败,历史学家们不禁要问:内战的结局到底是因为国民党太弱,还是因为共产党太强? 如果双方的领导人在决定性时刻做出的选择有所变化,战争是不是又会有另一种结局?

日军投降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迅速整合重组,并获得了新的名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将军带领的解放军主力在1945年晚些时候进军东三省,并获得了来自苏联军队的补给,迅速占领了这一地区。林彪将他的部队分成几个强大的战斗单元,充分发挥了早年在苏联学习的各种军事战略。林彪不愧是阵地战的行家,擅长反击、快速行军并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林彪全面借鉴了二战后期苏联红军在东欧战场对战纳粹德国的作战经验,并付诸实践,对抗国民党军。林彪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训练方式,再加上从日军缴获的充足物资(后期是从国军处缴获的美式装备) ,这场战争是可以打赢的。[[69]](#footnote-69)林彪信心满满,也帮助毛泽东下定决 32 一定要将战争进行下去,并获得最终胜利。

在1946年,国民党军还未从对日作战中喘过气来。国军保留下来的队伍中,有一部分部队装备精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器配备最好的部队,而另一部分纪律涣散,还时常抢劫老百姓。有些指战员对蒋委员长忠心不二,认为他是国家的大救星,有些则依然效忠于之前盘踞一方、之后供职于国民政府的军阀。国民政府内部分裂严重,指挥有时候得不到落实,团结就无从谈起。许多敌方指挥官不愿意参与到对共产党的作战中,希望彼此的政治对手承担这份损耗,坐收渔利。 78

在日军投降之后,国民党需要重建权威,但也遇到了问题:他们迫不及待地进驻曾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对于曾经与日军合作过的社会精英是一概不用。国民党的官员试图重新占有曾属于他们的社会特权,却让大众对此付出代价。79他们从未在农村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试图对农民征税,可是农民刚从饥荒中走出来,抗战时又饱受摧残。国民党强制执行繁重的税赋和劳役,甚至有时午夜突袭老百姓的家,民众自然怨念深重。国民政府的腐败也很严重,富裕的家庭反而不用交税。801948 年,国民政府的财政只有21 %来自税收,有68%来自滥印钞票,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士气也因此严重受损。

33 蒋介石深知这些结构性弱点,对自己也信心不足,觉得无法在长久的战争中取胜。他知道,必须及时摧毁共产党的精鋭部队,他拒绝和谈或是组建联合政府。1946年晚些时候,他发动了西至延安,东到沿海的大规模进攻,并命令部队深入东三省。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共产党节节失利, 1947年3月,延安失守。82蒋介石本想一举抓捕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层,摧毁共产党军队的指挥所,但是潜藏在蒋介石身边的特工却在两个礼拜之前将情报送出,共产党领袖们早就安全撤离。

共产党军队从苏联手中接管了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农村地区发展,与抗战时的革命根据地一样,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1947至



1. Westad (2003 , 148).
2. Pepper ( 1999, 7一41 ), Westad (2003 , 69)·
3. Eastman ( 1984, 80一81 )·
4. Eastman ( 1984, 86一87);亦可参见pepper ( 1999, 118一131 )。
5.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48)·
6. Westad 2003 152).

1948年,东三省的土改可谓是「无限制的革命恐慌」。[[70]](#footnote-70)[[71]](#footnote-71)共产党干部进驻农村,并向农民保证:地主、富农、敌特嫌疑犯以及其余阻碍共产党控制农村的人都会受到「批斗」,这些人要下跪、接受高音喇叭播放的指控,身挂批判大字报并头戴象征耻辱的高帽。他们还要经受审问,有时还被拷打,被剥夺睡觉的权利。这些批斗大会其实就是政治做秀的一种方式:人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新政权之下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积极地批斗和讨伐,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批斗会发展到最后往往是一顿暴打,虐待甚至是集体处决。共产党起初十分支持这种形式,但后来也发现程度过了头,效果就适得其反。

地主被打倒,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也被分给了农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财物,但是共产党立即要求他们向解放军支持食物、补给和劳力。这种军民关系与老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是不同的:早期的土地改革较为温和,不那么强制性,不涉及暴力,民众承担的战争支持也不多。但这次可不一样了:与抗战时期不同,全面动员的战争形式意味着民众要支撑庞大的传统军队。为了对抗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军需要大批的人力、武器弹药、后勤补给、马匹和运输设备。这一切都是无偿索取的, 34 没有一分钱报酬。庞大的军队一旦运作起来,就需要大量的粮食、后勤人员、衣物鞋子、武器和燃料。解放军士兵有数十万,干部指挥员又有好几万,再加上地方组织,这些都需要征用大量物资。 [[72]](#footnote-72)

这一边,共产党正在东三省新的根据地内迅速扩张军事实力,而另一边,蒋介石执意要摧毁共产党的精鋭力量。国民党的优势仅仅持续了一年, 1948年,战争发生了转折。毛泽东派遣自己的部队向华中平原的山区进攻,迫使蒋介石回防,保卫长江沿线的主要城市。共产党的反击让蒋介石夺取胜利的计划破灭了。1947年,解放军部队打败了华中的国民党部队。此时的毛泽东信心满满,在各大战区发动了对国民党的全线进攻。他指挥各部队作战,并自信地预测:战争将在五年内结东。871948 年4月,共产党重新夺回延安。6月,国民党军队缩水至360万人,而共产党部队扩大至280万人。 88

蒋介石加紧攻势,企图摧毁解放军在东三省的精鋭力量,将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他派出大量增援力量,其中不乏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部队。1948年的前三个月,在一连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中,林彪更胜一筹,将东三省南部的大批国民党部队分割成一块一块,并逐个摧毁。战争的走向被彻底改变。89随着战事的快速变化,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开始考虑撤离到台湾岛。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蒋介石别无依靠, 现在部队被打垮,蒋介石也丧失了党内的控制地位,许多部下逐渐对他失去信心。在城市,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急转直下,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受挫,包括学生在内的城市群体开始向往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先前也支持蒋介石,给予军事援助和贷款,但现在对他丧失了信心,援助也少了下来。901948年晚些时候,蒋介石彻底丢了东三省,损失了40万精鋭部队。 91

林彪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彷佛都证明毛泽东像预言家一样决 35 断正确。有了党内宣传机器的帮助和近期的军事成功,毛立即筹划夺取中国的北部全境。苏联方面和其他党内领导都觉得需要在1951至1952 年左右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不以为然。苏联在那时依然承认国民政府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长久以来都觉得最好的结局是应该成立联合政府,或者让中国分裂为多个政权。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夺取内



1. Westad (2003 , 168一172).
2.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50)·
3. Westad (2003 , 175一178)·
4. Westad (2003 , 181一211 ) ; Pepper ( 1999, 42一93 , 132一195) · 91 Westad 2003 197).

战的全面胜利就在眼前。[[73]](#footnote-73)解放军步步推进,许多党内领导担心战线拉得太长,部队也需要整编,但是毛泽东坚持迅速夺取内战胜利的策略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不要着急,并在1949年1月建议毛泽东和蒋介石和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同意,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在拖慢解放军的胜利速度,他不想看到多个政权画地而治、南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不顾斯大林的劝吿,命令解放军全面推进。 [[74]](#footnote-74)

### 完成军事亻占领

毛泽东的信心再一次被证明是对的。蒋介石的军队迅速溃败,军官将领和地方政府纷纷投降。整支部队向共产党投诚。位于东北的长春被林彪的部队围困了五个月之久,并最终于1948年10月投降,在长春之围中,约有16万平民死于轰炸或是饥饿。长春一役让许多国民党将领丧失了斗志,他们不愿再做无谓的斗争,让平民丧命。[[75]](#footnote-75)北京于1949年 1月和平解放,随后,天津解放。[[76]](#footnote-76)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于4月解放,上海在5月解放。国民党残部逃往广州,随后撤离至重庆,在1949年12 月退守成都之后,最终转至台湾岛。 [[77]](#footnote-77)

当解放军获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后,共产党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该如何划定中国最终的疆界?如何对待新疆、西藏和蒙古问题?明朝是汉 36 族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版图实际上只有1911年中华民国的三分之一。[[78]](#footnote-78)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是大清帝国,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满洲人领导。满人本在东北发展,于1644年入关,取代明朝。17世纪初,满清利用军事手段不断扩充疆域,将包括了新疆、西藏、蒙古地区

的非汉族区域纳入版图,这些少数民族区域奋起扺抗满清的扩张,被吞并后依然时常叛乱,直到大清灭亡。981911年以后,这些地区又获得了独立, 1921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蒙古独立, 1924年,蒙古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变为苏联的卫星国。99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非常反对的,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蒙古的国家地位,坚持清朝的疆界。而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高度依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默许了这一事实。直到1945年8月,国民政府才做出了些许让步:中苏签订条约, 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蒋介石是合法国家首脑的支持。100自此之后,只有内蒙古留在了中国的疆界之内。

对于中国的疆界问题,共产党本来支持非汉民族的独立。在1940 年代之前,共产党对新疆、蒙古和西藏的立场都是支持的:他们可以首先获得「全面的自治」,并随后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选择要不要与汉民族组成联邦体系。当时蒋介石政府的「五族共和」政策是主张多民族统一的,但是为了有别于「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就支持少数民族独立,认为「五族共和」只是「民族压迫的借口」罢了。在1932年的声明中,共产党「承认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力,即使造成中华的分裂也不为过」。1930年代,西藏地区一直在谋求独立,共产党就支持这一行为,认为是「民族自由运动」,能同时摆脱英国殖民者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控制。101这一连串政策的核心是:「中国」就是「汉民族」,明确地认可其余民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力。

37 可是在1949年之后,共产党的政策立即发生了大转弯,政府希望建立社会主义下的五族共和:藏族、新疆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和回族(汉族穆斯林)。一直以来,「五族共和」一直都是国民政府的立场, 而共产党则对其批评不断,认为这是民族压迫的掩饰。毛泽东与斯大林



1. Rowe (2009, 71一78)·
2. Rossabi (2005 , 3g31 ).

川0 Chen (2001 , 27)·

川1 Chen 2007, 131一32) Westad (2003 , 118一1 19)·

的特使在1949年讨论了这一新立场,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把少数族群从封建压迫中解救出来。 [[79]](#footnote-79)

对内蒙古和新疆的占领没有遇到太大阻碍,因为这些地区本身就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日军投降后,这些地区于1945年8月在国民党与斯大林的谈判下回归国民政府的管辖。[[80]](#footnote-80)但西藏是一个特例。解放军解放西藏时,敌人不是国民党军,而是藏人本身。清朝灭亡后不久,西藏的军队就将中华帝国的控制挡在高原之外,十三世达赖一直流亡印度,现在回到西藏,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并宣称完全的独立, [[81]](#footnote-81)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政权和军队都是独立的。日军投降之后,西藏一直在做外交努力,不愿归入中国政府,希望在国际上获得支持,保持独立。[[82]](#footnote-82)西藏向联合国、英国和美国求助,也试图与共产党和谈,但都失败了。川61951 年10月,解放军入藏,西藏军队人又少、装备又老旧,自然无法抵挡强大的解放军。在最后一刻,西藏还向印度和联合国求救,但是得到的国际支持非常少。[[83]](#footnote-83)西藏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北京方面开出的条件,同意归入中国,以此换来的自治承诺和宗教社会自由却十分模糊。

当时只有16岁的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 [[84]](#footnote-84)

共产党新的民族政策以汉民族的优越地位为核心。曾经被落后的封建制度压迫的藏民们现在都被「解放」了,许多藏民无法接受这一强制性的安排,也反对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新中国政府不断蚕食西藏的自治权利,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干涉西藏的社会和宗教自主。这自然引来了一连串的政治问题,其中就包括1959年被解放军镇压的武装叛乱。

### 38 政治遗产

毛泽东和其余的党内领导能从这一阶段的胜利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革命缔造了新中国,新的国家政权又会继承哪些革命遗产?

第一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相信毛的判断和领导。在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策略议题上都选择站在少数,但随后的发展却都验证了他的正确。毛是最早提出农村革命的人,当时许多党内领导还依然坚持苏联的教条,认为革命不能太快,要先在城市建立无产阶级基础。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重整了共产党,将其建卩一亠一殳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才在日军投降后有实力与国军作战。毛泽东最让人折服的是他对内战的判断。即使国共内战初期的战事对共产党非常不利,但他坚持战争,不顾较为谨慎的同志们的建议,认为一定能夺取内战的全面胜利,并命令部队加紧攻势。109国共内战的胜利强化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声望地位,成为能力超群、远见卓识的领袖。正如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所说,「毛泽东总能力挽狂澜,并最终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人们因此认为他有超凡的能力,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即使后期事实证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但人们对他深深的信服始终存在。」110 第二点,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党的路线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服从与严明纪律。这些特质在1940年代的延安发展到极致,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的历史中一直发挥作用。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党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什么要求,而在于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尤其是干部的绝对服从。一个人若是被党赋予领导地位,那么党也会同时要求他对党绝对忠诚、对党纪绝对服从。党对干部的一言一行严密监控,远超过对人民的监管,要是有人偏离路线或是发表异见,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党员干部要是不能做好被赋予的工作,就会受到处分,这一长期政策始终是共产党高度团结、服从党纪的源泉,这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直有所体现,也成为之后 39 的政治遗产。但这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有一定破坏性:有时候某些政策



川9 Levine ( 1987, 93一101 ), Westad (2003 , 172一178)·

Teiwes and Sun ( 1999, 13

已经造成了意料之外的严重错误,党却依然过度强调团结一致和执行命令。党的许多政策经常因此大幅度地左右摇摆,遇到负面结果想及时纠正,却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从长期的权力斗争中,共产党还总结出一项政治遗产,这一遗产并不是来自于革命根据地游击队员的坚韧和努力,而是内战全面爆发时所动员起的大众基础。在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建立起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从士兵将领和所辖人民那里获取大量的支持,支撑超大规模部队的运作。这一革命团体面对强大的敌人,能够依然为伟大的事业而斗争,党和人民不惜为此付出代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毛泽东将利用他自身的威望,推进一系列与内战策略相似的政策。就如某位分析者所说,「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从内战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无论敌人多强大,阻碍有多难,只要能动员群众,组织起足够多的意志和决心就一定能达到革命目的。然而,事实将证明:这一错觉是致命的,并让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Ⅲ



Levine ( 1987, 247一248)

# Blank Page

40

## 农村革命

大型社会革命虽然经常以反抗压迫的形式开始,却往往建立起更大、更强、更有力的中央集权政体。他们改变既有的社会制度,摧毁原有精英力量,建立起能够自上而下触及基层民众的崭新官僚体系。1在建立新政权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一道路快速、彻底地进行社会革命。在乡村地区,这一过程包含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这是一种强制的阶级斗争,摧毁了原有地方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打破了他们几百年来对于中国乡村的统治。第二个阶段是集体化。土地被集中到村一级的合作社,农民被吸收进农村的组织,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负债劳动力,并依附于新政权任命的地方领导者的威权。

### 作为阶级斗争的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视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并以此将权力一直延伸到中国的乡村。共产党清楚地意识到,要改变农村社会的结构, 促进更大程度的平等,照顾穷人的利益。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首先要做的是通过军队维护所辖区域的安全。随后,共产党派遣自



 Skocpol ( 1979)

己的干部抵达农村地区,指导针对阶级敌人和政治敌手的斗争工作,并建立起新的农村政府机构,以此帮助顶层权力有效地延伸到社会基层。

在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方面,农村革命策略是毛泽东标志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最早的提倡者,也是最坚定的卫道士,他不赞同马列主义原有的教条,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民。[[85]](#footnote-85)[[86]](#footnote-86)在1925至1928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农民运动。党内领导认为毛泽东是农村问题方面的专家,毛也帮助训练了一大批农村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随着国民党的军队一路北进。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和共产党内部的质疑,毛泽东坚定反驳道: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农村革命,只有彻彻底底地改变落后的农业社会结构,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中国革命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他独到的见解,阐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政治角色。他分析了中国南部地区农村的经济结构,甚至包括地下帮会和土匪山寨。他将中国社会分为八个区分鲜明的阶级分析了各阶级的特征,认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劳苦大众深陷苦难,种田者却无土地,地主阶级控制地方武装。[[87]](#footnote-87)在农业人口占到80%的中国毛泽东提出了相应的革命方案,「简单地说,中国的革命就是一场农民革命。」即将到来的国家革命如果不能将农民解放出来,让他们摆脱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就不可能成功。[[88]](#footnote-88)毛泽东写道,没有农民的支持, 革命不会成立。事实上,地主阶级是目前革命面临的最大敌人。 [[89]](#footnote-89)

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这一观点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显得充满争议。1926年,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过程中,原来被地主雇佣的农村民兵被保留下来。毛泽东建议将这些地

方民兵解散,因为他们曾效力于地主,将来会成为农村革命的阻碍。 [[90]](#footnote-90)[[91]](#footnote-91)地方民兵解除武装之后,随军的共产党干部就在占领区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农民组织开展了对

「土豪劣绅」的攻击,他们的财产被分给贫农,随后自身受到公开批判、 42 殴打甚至是集体处决。

协助北伐的苏联顾问被农村地区的暴力所震惊,在他们看来,这一情况威胁到了国共合作,不利于国民政府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在斯大林看来,国民党军队是反抗封建势力和地方军阀不可或缺的「资本主义革命力量」。许多国民党成员自身拥有土地,如果土地革命做得太过火,就会大量伤及他们的利益。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适当弱化农村革命的剧烈程度,党中央也希望能停止暴力,革命军中的共产党指挥员被撤换下来,农村起义和土地改革也被搁置下来。 [[92]](#footnote-92)

看似所有人都反对毛泽东的主张,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强硬地进行了响应,拒斥那些认为农民运动无意义、认为农民是乌合之众的言辞。相反,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并没有威胁到统一战线,反而让联盟更加牢固,动员起了中国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不以暴力方式打倒地主阶级,就不会有真正的统一战线。「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

10

毛泽东早就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一清。几个月前,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他认为「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原因有二,第一

「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第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一•一一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 …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毛泽东认为, 所谓「赤色的恐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在毛看来,「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

43 1927年2月,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长篇报道,分析农民革命问题。这是他对农民革命最细致的阐述。在报吿中,农民起义组织对抗地主富农,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后续共产主义土地改革的范本。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报吿中的阐述成为后续党员干部发动农村「批斗会」、开展土地革命的理论依据,这一形式也应用在了共产党对于城市的管治之中。在文章中,毛泽东认为暴力革命才是革命的根本,这一理念一直是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依然秉持这一观点。

报吿大力称赞了湖南的暴力革命,认为这很有必要,因此大书特书,强调对农村贫民的巨大影响力。有些人一旦发现做过了头就立马退缩,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想法,认为有失分寸是常有的事,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产物。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对农村革命的态度就能反映出他的立场,就能区分出他是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该归入反动派。在这份档中,明眼人都能看出内在的紧张局势,这种局势不久后就将使国共合作破裂。文章一开始就充满了毛泽东对农民起义的溢美之词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南和北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 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浃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



毛泽东 1926c 。

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93]](#footnote-93)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赞许有加,他的描述后来变成批斗大会的理论依据,贯穿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起的革命。「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外,公开羞辱也是农民起义的重要环节,并拥有长久效应: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 44 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釒司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94]](#footnote-94)

毛泽东认为这做得一点也不过分,农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要斗倒那些劣绅地主,这是他们罪有应得。「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 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毛泽东论述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花,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浃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5]](#footnote-95)

「过正」有时就意味着集体处决,造成的暴力和恐慌能有效撼动旧制度的基础。「枪决」只适用于最坏的土豪劣绅,通常是农民联合其他阶层的民众共同执行。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96]](#footnote-96)有人反对他这种暴力的行为方式,毛泽东都强硬地予以反驳。事实上,他认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 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97]](#footnote-97)[[98]](#footnote-98)文章发表仅仅过去一个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

毛泽东一向认为,革命运动的爆发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持,如果孤 45 立无援,农民是没办法突破桎梏的,因为地主劣绅掌握着地方民兵。 

个革命的政党也需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捍卫起义获得的根据地。

1927年8月,在大清洗仅仅四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他的立场, 「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71927年大清洗后不久,共产党人发起了好几次武装暴动,但都没有成功,因此退守偏远的革命根据地。[[99]](#footnote-99)在巩固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开始施行先前报吿中所描述的措施:在军事控制地区开展批斗大会。共产党动员起贫穷的村民参与其中,瓜分原有农村精英的财产,并对他们发表批评、批斗和当众羞辱。殴打和集体处决都是常有的事情。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江西苏区到抗日根据地,再到国共内战爆发,再到对整个中国的军事占领,共产党一直在进行阶级斗争,这成为共产党的一种基本手段,以此打破原有农村精英的政治经济基础,重新分配土地并启用那些忠于党的新领袖。

### 土地革命的政治影响

土地革命带来了政治上的深远影响,其程度不亚于经济层面。地主

阶级和其他类似人群被打倒 他们的财产被一分而光,本人受到当众侮辱、殴打甚至集体处决,幸存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也都被「斗倒斗臭」,再无崛起的可能,因此,旧制度在乡村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留下权力真空。填补这一真空的是政党国家的权力架构。政治活动家和党派成员从劳苦大众汲取力量,被动员起来参与土地改革,并以村庄领袖的身份加入新的国家框架。新中国与国民政府不同, 行使权力时,依靠的不再是原有的地方地主阶级和富商家庭。

这看似是土地改革,本质上却是一场政治革命。在运动发起者的设 46 计中,这是要彻底摧毁旧制度精英的财富和影响,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完全击垮。运动招募了新一代的党员和农村领袖,这些人将自身视为土地改革的先驱者。这些领导干部在新的党派国家中任职,并对其效忠。此外,党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彰显了巨大的力量,击垮了曾经的对手, 以不可想象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了社会制度。农民分得了土地,有了生活上的指望,新政权迅速获得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群的支持。共产党动员起大部分村民参加暴力批斗,这些活动经常以草率地处决地主、抢夺并分配他们的财产为结束,这一过程将暴力革命有效地传播到了乡村广大的人群中。

威廉·辛顿(WilliamHinton)是一位持有共产主义观点的美国人, 他在1940年代后期来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共事,对于这场农村革命,他留下了非常详细的回忆资料。在他的报吿中,他详细记述了山西中部的革命运动,当时日军已经投降,红军进驻此地,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铲除叛徒」。原来的村长、地方民兵领袖和曾经与日本人合作的地主被拉上批斗大会。共产党干部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批斗会,要求所有人必须参加,被批斗者被捆起来站在台上,干部对他们大声批评,指责他们的罪过,扇他们耳光,用拳头殴打他们。虽然所有村民都被要求参加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台来加入批斗。大会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共产党干部将村民分成几个小组,并逐个分析每个人在日军占领时期的表现。他们对村民保证:红军将会继续驻扎在这一地区,所以他们不必担心打击报复。在这些小会议中,党员干部指定了一部分人参加第

二天的批斗大会。第二天,批斗会的效果好了很多,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批斗会当中,人们纷纷表达对被批斗者的指控,并要求以暴力方式对待之。几天之后,一些更高级别的军队和党政官员来到这个村庄,批斗大会的规模就更大了,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两名被批斗者被判死刑, 二人被拉到村边,执行枪决。他们的财物也被没收,随后被分给普通村民。 [[100]](#footnote-100)

47 在惩罚了曾经与日军合作的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矛头指向富农家庭。1946年,他们开始攻击地主,指控他们在最近的饥荒中囤积粮食。农村干部领导召开批斗大会,强迫地主跪下来,并对他们进行殴打,逼他们说出自己的钱财和黄金藏在何处。这些人并没有被处决,一部分人逃离了这个地方。[[101]](#footnote-101)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后,对地主的批斗范围扩大,天主教堂也被包括其中。当地显赫家庭的族长都被拉上了批斗大会,人们咆哮着指责他们的罪过,殴打他们,要求他们坦白罪行,有时还对他们进行虐待,逼迫他们供出钱财所藏之处。大会变得越加暴力,许多被批斗者被活活打死,或者随后选择自杀,而他们的财产也被分给贫苦的村民,当地的天主教神父也没能幸免。 [[102]](#footnote-102)

到了1946年中期,崭新的农村政府机构已经建立,党员人数也多了起来,并成立了党组织。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有了红军和党组织的支持,官员权力非常大,没有人能够挑战他们的权威。这些新干部随即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威廉·辛顿详细介绍了这些农村干部和民兵首领的作为:腐败、强势欺人、霸凌群众、性骚扰甚至强奸女性,而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的村民对此毫无办法。[[103]](#footnote-103)在内战期间的北部中国解放区内,这一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党的领导层决定,派出一个15人工作小组,其中包括了县政府的官员、老师以及当地大学的政治活动家(包括威廉·辛顿在内) ,彻底调查此事并纠正错误。工作小组接管了村里的

5 1

领导权,调查了村干部以及党组织的行为,他们建立起了农民协会,选举出了新的干部,并重组了农村政府机构。通过对村民的采访以及小范围的小组会议,他们记录了改革之前土地的分配情况,将每个家庭都归入到贫农、中农、富农或地主四个级别中的一个。[[104]](#footnote-104)在这些访谈和小范围会议中,他们也征集了先前村干部滥用权力的报吿。[[105]](#footnote-105)

正如威廉•辛顿详细的记录所展示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建立的一种方式:它摧毁了旧制度的基础,扫清了新政治机构的障碍, 从先前被边缘化的阶层中招募新的干部,并对普罗大众保证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美好,这一切行为都使得新的党派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106]](#footnote-106) 48 在新建立的政权体系下,国家第一次能够直接从基层家庭征收税款

在中国处于帝国时代的时候,国家政权的机构只延伸到县一级,这是拿俸禄的国家官僚所达到的最低一层。县老爷负责征税,并维护地方秩序,他们雇用自己的幕僚,与当地其他贵族一起建立关系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土地,并通过了较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农村地区在本质上实行的是地方有产精英领导下的自治,这些精英办学校、经营寺庙、组织人事关系网,并捐献钱款,帮助扶贫。 [[107]](#footnote-107)

到了1940年代,地方社会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地方精英参与治理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先前通过科举考试的地方贵族参与地方治理。但现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乡绅不再进行地方治理,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只有少数举人秀才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取代他 49 们的是地方上的其他贵族:商人、大地主以及地方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充当协调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科举考试中走出的传统乡绅氏族拥有更加广泛的自治。[[108]](#footnote-108)

杨庆堃详细阐述了1948年广东省南清村的革命情况,他认为南清村1948年的局面并没有比帝制时代改变多少。在共和时代,县一级之下的政治秩序依然由非正式的地方小区领导担任,而县政府仅仅充当监管角色,每个村庄都是高度自治的权力单位,自从清政府灭亡后,分散的传统地方政府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农村的政治生活依然是松散的地方政权结构,中央政府并没有将他们有效地整合进国家体系。[[109]](#footnote-109)在杨的叙述中,村庄里修路修堤坝、挖运河、经营村里的学校、给地方民兵补充装备、抵御外敌的角色是由家族势力完成的,贫农和中农则自发组织起了庄稼保护队,抵抗强盗和小偷。[[110]](#footnote-110)他们也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建立了某种联系,有时候还会与黑帮或帮会建立同盟。在同一个村庄中,有时可能出现多个非正式的权力组织。 [[111]](#footnote-111)

新中国成立后,杨庆堃还对这一情况进行了五年的后续调研,并从基层角度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新政权的巩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与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同时存在的还有打土豪的活动,尽管村子里并没有公开的审判和处决,每个家庭都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有多少地、家里有多少财产都记录在案。牲畜先被充公,随后重新分配。家族财产也被迫交出,用于学校和宗庙的建设。 [[112]](#footnote-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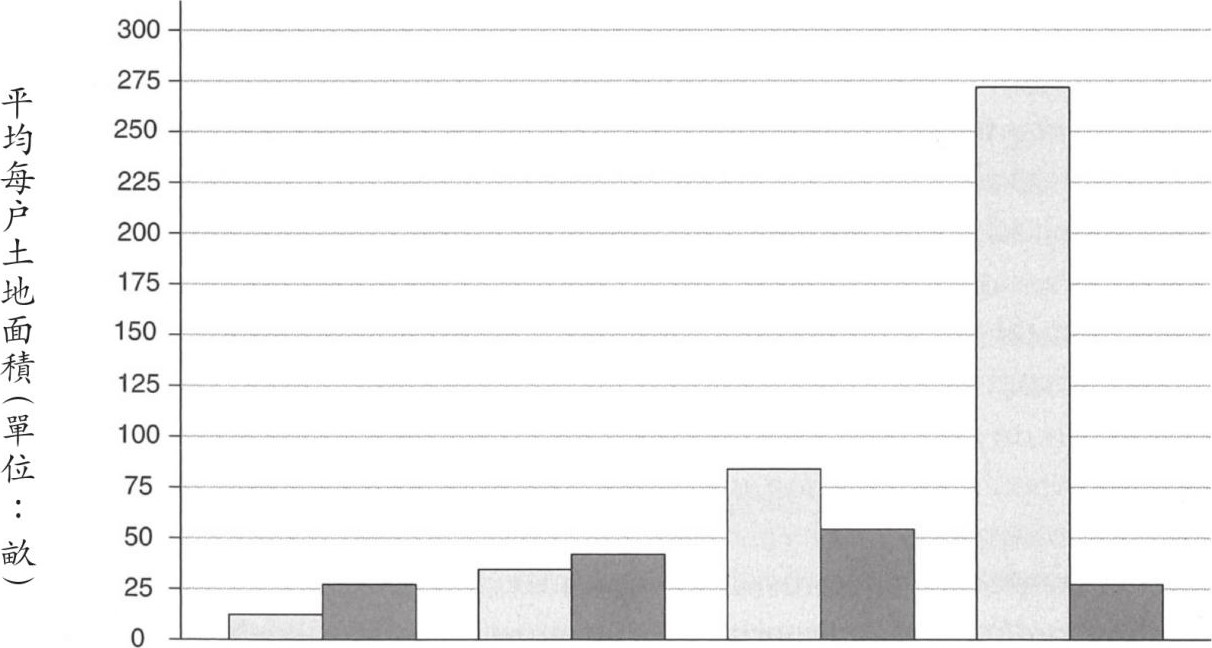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政治改变同样剧烈。在军队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庄稼保护队被解除武装,随后解散。当地民兵的装备充公,显赫家庭的影响被消除,他们中的许多人逃往香港,帮会组织的财产也被没收,不再发挥先前的社会功能,出现在农村的第一批国家代

理人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上面派遣来的干部。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 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爆发, 16个人没审判就被处决,也没有公开解释。随后恐慌在农民心中传播开来,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成为了人民的敌人,新的地方政府指派了一名新村长和副村长,新的民兵组织被建立起来,但直接受到区政府的管辖。[[113]](#footnote-113)杨庆堃总结道:「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就在南清村废除了旧的正式制度,完全解散了先前的非正式地方权力架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迅速向一个现代国家的模样靠近,国家的集体化中央政治权力高度强化。」[[114]](#footnote-114)

### 土地革命的经济影响

土地革命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同样剧烈。在短短的时间内,富农家庭的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到贫农手中,土地的分配情况相当平均。在 1930年代,贫农和贫下中农占到中国农村人口的57% ,却只拥有24%的土地,在土地革命之后,他们的人均耕地份额几乎翻倍,达到47%。而另一方面,富农和地主则遭受巨大损失。富农占到全国人口的3.5 % , 50 拥有18%的耕地,但是,在土地革命之后,该份额下降到了6.4%。地主是土地改革中最惨的一个阶层,他们不但要面对暴力批斗大会和处决,还损失大量土地。地主只占全国人口的2 · 5% ,却拥有40%的土地,现在,这一份额鋭减到了2%。[[115]](#footnote-115)图3 · 1说明了这一场土地改革的剧烈程度。贫农的人均耕地面积几乎翻倍,中农的份额略有上升,虽然富农的土地依然比旁人多得多,但也损失了原有的三分之一。在土地改革中,地主被彻底摧垮。显然,地主是土地革命政治经济层面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的人均占有土地量暴跌了90% ,在土地改革之后,他们拥有的财产也只是和普通村民一样多。 [[116]](#footnote-116)

图3 · 1土改前后各阶层平均土地占有量



贫农 地主

囗1930年代 丨950年代来源: Riskin ( 1987, 51 )

暴力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尽管人们也完全有可能在不使用暴力批斗、集体处决和政治手腕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土地并解除地主权 51 力。1950年代,战后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就进行了程度适中而有效的土地改革,让土地的分配更加公平,并且为小农繁荣创造了基础,奠定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种非暴力的土地革命中,地主虽然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和特权,不再统治农村经济,但是他们好歹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其余形式的财产也都得到了保护,更没有成为政治犯。

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国民党在岛内就进行了此种形式的土地改革,并左证了其可行性。在大陆期间,国民党的立法机构一直搁置此事,只是嘴上讨论,从来没有实施,在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建立起了更加集权和压迫的独裁统治,并最终将这一政策实施到位。1949至1953 年,台湾当局立法规定:农民的地租只收取当年产量的37 · 5% (八分之三) ,公有土地以及从日本人手中没收的土地被卖给无地的农民,价格上也打了不小的折扣。政府设置了土地保有量的上限,凡超过这一上限的土地都被廉价卖给了小农。地主虽然失去了土地,但是也获得了补偿, 得到了国有企业一部分的股份。拥有土地的家庭比例从原来的[[117]](#footnote-117)%上升到65% ,租用土地的家庭比例从原有的39%降至11 %。改革的程度没有中国大陆那么激烈,也没有分出什么社会阶级,从经济上或肉体上摧残这些地主们。不过,在台湾,地主的权力被彻底消解,独立小农组织起农村信用社和储蓄社,建立起运输机构并促进农村的产业发展。 36

### 巩固对农村的控制

就像政权巩固要经历很复杂的过程一样,农村的改变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50年代初期,如果党员和农村干部没能尽职履行职责, 党组织就要予以惩罚。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党员干部越来越只关注自己家庭农场的生产。有一些农村干部已经十分满意改革成果,觉得土地革命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是时候专注于农业生产了。因此他们更关 52 心经济,而不是政治活动,因为后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影响种田,更何况当个农村干部也没什么钱拿。许多农村党员雇起了劳力,让他们在田间劳作,这在一部分人看来是经济盘剥的一种形式。党组织对此事很关注,认为这一行为让党丢失了无产阶级本色。1951年,在村党组内掀起了一场「反右风」运动。有一成的农村干部和党员被撤职或开除,余下的也受到严厉批评,一部分还受到了轻微的处罚。[[118]](#footnote-118)

第二个问题是新的农村干部做事粗暴,这一点早在威廉·辛顿对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记述中已体现出来。他们压迫批评言论,为了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不惜使用强迫和恐吓的方式,还经常使用暴力威胁,甚至是殴打。干部们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上级领导要求他们必须完成给予的强制目标。1953年,为了解决这种权力滥用, 又一场运动展开了。和前几次一样,党和国家的基层干部遭受了调查、批评,有的被解职,甚至入狱。 38

在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那些解放军迅速占领的省份,新的农村政府虽然建立,但是根基不稳。例如,贵州省于1949年1 1月被解放,土地革命很快推行,基层政府草草建立。随即,新政府要求农民上缴大量的粮食以支持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农民们不堪重负,便组织起来抵抗。农村干部多是那些解放军进驻时表现合作的人,现在反倒带领民众扺抗政府。1950年1月,解放军进驻滇藏,反抗共产党的地方武装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共产党不得不从28个被围困的区县撤出。直到1951年,解放军才完全控制住贵州。解放军重新进驻该地区后,实行了所谓「恐怖」的强制措施。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解放军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压制。[[119]](#footnote-119)

1950年10月,中国加入朝鲜战争,自此之后,新政权更加注重内 53 部安全,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贵州的情况只是全国运动的一个缩影。就像土地革命一样,本场运动针对的是那些政治上和社会领域内被认定为敌人的群体,包括曾经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党员、黑帮罪犯、地方豪强、邪教首脑、地下机构领袖、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和寻常罪犯。镇压反革命让人们又想起了土地改革式的公开宣判、批斗大会、关押罪犯和集体处决。[[120]](#footnote-120)目前,学界对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死亡数字没有定论,但起码有上百万人。据一项分析统计, 1947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共有约150万至200万人死亡。[[121]](#footnote-121)党内统计数字表明,至少71万人在镇压反革命中被处决,另有120万人入狱。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往往更高。 [[122]](#footnote-122)

### 走向农村合作社

农村经济从内战中快速恢复,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小农体系将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农村市场复苏,家庭收入增加,新中国成立时虽然内忧外患,但是最初几年发展良好。[[123]](#footnote-123)然而,新政权的目的不是建立小农产业体系。在1953年毛泽东发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这一点就已阐明。土地革命为的是铲除地主阶级的势力,获得农民的支持,创造新社会主义的国家基础。接下去是要建立以苏联为模板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私人所有制的终结和集体合作社的开始。

1953年,土地改革刚刚完成不久,村干部就鼓励大家将每家每户的劳动力都汇聚起来,共享牲畜,互帮互助,共同生产。新政策下,粮食都是要「统购统销」的,这就意味着私人粮食市场已被禁止,所有的粮食作物都要拿到国家粮食采购站去卖,价钱也由国家规定。[[124]](#footnote-124)到了 1954年,所有的粮食供销都被强制国有化,每户除了国家规定口粮外的

「余粮」都必须卖给国家。虽然务农比城里的工作更耗体力,但是国家设 54 定的农村基本口粮却比城市居民要低。 [[125]](#footnote-125)

国家要从农民手中收集粮食,量和价都要国家说了算,上述政策还只是第一步。中国仿效苏联集体农业的道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进程需要多久。为了实现集体农业,通常来说,要先在独立小农中间建立互帮互助团队,这能够在播种和收割农忙时期尽可能地汇集劳动力。接下来要建立农业合作社,此时每家每户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耕牛、农具和农业机械归为合作社所有。家家户户都需要向合作社捐资,用于批发种子化肥,饲养耕牛,或是购买农机所需的燃油。和生产互助队一样,在播种和收获的农忙时节,合作社的成员们需要互帮互助。 [[126]](#footnote-126)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高级农村合作社,土地也不归农户所有,而是集

体耕种,整合进超大集体农场之中,实行集体所有制,负责管理的农村领导也由党直接任命。集体农场就像是一个工厂,参与的农户就好比员工,集体农场的管理者负责统筹一切事宜:农业生产、劳务分工、存储粮食、粮食买卖等等,农场的利润也由他们存入集体账户统一管理。 [[127]](#footnote-127)毛泽东始终要求中国的经济要尽快追随苏联的道路大步前进,其政策力度超过了苏联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预期。斯大林曾经建议毛泽东步子可以慢一些,在可预见的未来保留现有的经济架构,采取长期的政策,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工业的社会主义转型。但是,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按照《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所描述的苏联的集体所有制改革那样,快速地实现社会主义。[[128]](#footnote-128)斯大林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回避了自己在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贡献(或者说,是间接承认了当时的改革手段对苏联经济的破坏)。

在书中,斯大林认为要实现迅速的经济转型,单靠政治意愿是不够的。他强调,无论对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有「发展的法则」。[[129]](#footnote-129)斯大林也认为中国的经济过于落后,还不能直接转型为社会主义,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经济衰退。其他的党内领导,尤其是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子恢也赞同斯大林的观点,他们和苏联有更密切的联系,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认识更深,因此呼采取较为温和谨慎的方式。

在1950年代早期,毛泽东隐晦地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到了1960 年代初期,他写了许多没有公开出版的苏维埃政治经济「读书笔记」,公开批评斯大林的这一转变。[[130]](#footnote-130)事实上,毛泽东更加赞许早年斯大林的革命作为而反对后期的斯大林。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可以复制《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苏联成功的模式。毛泽东急切地推动革命,并不[[131]](#footnote-131)[[132]](#footnote-132)认为中国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贫穷落后。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并没有与他撕破脸,只是低调地漠视他的建议。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 毛泽东立即加速了自己的政策,号召建立起生产互助队和农村公社, 发起了集体化运动,力图在1960年代早期完成。511957年,毛与其他党内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对集体化的速度保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批评了其中一部分人,说他们是「右派」,并要求1958年之内必须迅速完成集 52

1951年,村干部开始组织生产互助队。到了1953年,有一半的人已经是互助队的成员。195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85 %。1955至1956 年,毛泽东号召集体化的脚步进入「高潮期」,高级合作社被迅速建立起来。1955年底,已有62%的家庭加入, 1956年底,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合作社成员。1957年底,毛泽东决定建立更大规模的高级公社,动员群众参加,到了1958年底,接近100%的家庭都加入了高级公社。[[133]](#footnote-133)整个过程快速高效,一切都看似顺利成功,尤其是没有发生像苏联一样的暴力事件,也没有遇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曾发生的饥荒问题。[[134]](#footnote-134)不过,地方 56 上还是有广泛的反抗,甚至是个别起义事件。底层干部为了实现上面强制派发的任务,有时也确实不择手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135]](#footnote-135)

### 村庄作为集体公社

集体化带来的,是一种彻底全新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形式。对于农户来说,土地改革带来的成果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贫农先是分得了土地,随后却立即收回国有。为了过上好日子,农户本可以自己决定地上种什么庄稼,劳动力怎么分配,可现在不行了。个体农户几乎绝迹,农户也只能在公社任务之余偷偷地搞点副业。农民们曾在集市上销售自家产的蛋、鸡、猪、手工艺品和其他产品,现在被全部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运营的采购站,收购主粮和其他经济作物。到了这一时期,所有的土地、农具和牲畜都被纳入集体所有制的控制之下。 [[136]](#footnote-136)

到了1950年代末期,集体合作社的数量翻倍,既是行政单元也是经济实体。高级公社的规模并不是单一不变的,在大跃进期间,公社的规模迅速扩张,十分惊人;但是到1960至1980年代,高级公社的规模略有缩小。后来,每一个县的农业人口都会被组织进入人民公社这是高级合作社新的名称。人民公社的领导小组是国家官僚机构的最低一级,配备有书记和委员会以及其他必要的官员,他们领的都是国家的薪水。一个人民公社一般有15 ,000人左右,通常覆盖了好几个村庄。每一个人民公社平均有15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有220户人家, 980 口人。生产大队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庄的人口,有时如果村庄很大,可能一个村里有两到三个生产大队;而村子很小的时候,一个生产大队可能就包含了好几个村庄。每个生产大队又被细分为许多小的生产小队, 般平均是7个。生产小队是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单位,相对来说规模很小,在1970年代早期平均只有30户人家, 145口人左右。[[137]](#footnote-137)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有自己的领导、会计和其他职员,他们的薪水并不是国家划拨 57 的,而是由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自理,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国家的官僚体系只延伸到人民公社一级,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领导本身就是队员,吃住和生产都在一起。

根据上级县政府设定的生产目标,人民公社的领导会对生产做出具体的部署。生产大队和小队的领导要负责完成这些生产计划,他们会对公社成员做具体分工,组织耕种、收割、加工、存储和运输。农民们因此获得「工分」,工分都详细记录在案,年终会算总分。公社若是年末有现金结余,就会根据每家每户所有家庭成员的工分多少分配这笔钱。公社的每个成员也会根据性别和年龄分到配额的口粮,这部分粮食是生产大队向粮食采购站交足份额之后剩下的部分。农村居民只能从生产大队获取粮食,因此没有闲余时间从事务农之外的活动。农民也要参加无偿的「服务劳动」,农闲的时候,在公社干部的领导和带领下去修路、修水利。农民作为一种劳动力,被牢牢地绑在土地上。

1953年开始,农村的集体化基本完成,并催生了国家采购系统。主粮(水稻、小麦、大麦、玉米和高粱)、油料作物(花生、油菜籽和芝麻)以及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甜菜和大麻类植物)都只能卖给国家采购站,买卖的价格也由国家规定。这一体制实行起来很简单,因为控制公社的是公社和大队领导,而不是具体农户。这些生产负责人直接对上级负责,生产指标的达标与否决定着他们的升降。此外,也没有其余的市场可供买卖。这一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决策机构可以控制农业贸易, 某种作物的具体比例也由他们说了算。 [[138]](#footnote-138)

在苏联的集体农业中,政府能够从农业领域量大价低地获取资源, 以支持城市地区的高速工业发展。粮食价格走低时,城市工人的薪水也相应变少,结余的资金就可以用于工业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种 58 植物都变成了主粮作物。农户单干的行为是严厉禁止的,更不能搞非农领域的副业,这让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苦。国家要求的粮食生产量很高, 但设定的购粮价格却十分低廉,这就意味着高级合作社里的农户们口粮很紧,现金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到了1970年代,除了烟草等「经济作物」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政府统一供销的农作物来说,政府提供的购粮价格仅够勉强维持农民的生产成本。 [[139]](#footnote-139)

从事家庭生产将受到责难,有时还会面对严厉的惩罚,因为只顾自己家庭生产的行为是和集体活动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想搞些家庭副业几乎不可能,鸡、鸭、猪和鱼塘等生产数据都控制在生产大队或小队手中,人们只是参加劳作,获取工分。和粮食一样,这些产品的供销也是由生产队统一管理的。有些生产队业主组织了一些非农业活动一一一建设队、手工制品作坊或者像砖瓦厂之类的工业组织,但利润都由集体管理并存入银行,人们绝大多数时间拿到的只是工分,能真的分到现金的时候少之又少。 [[140]](#footnote-140)

定期集市现在也几乎销声匿迹,作为中国乡村数百年来的一项特色活动,即使还有,也变成了偷偷摸摸的黑市交易。[[141]](#footnote-141)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运营的采购系统,国家从集体农场中收购粮食,量和价都由国家计划部门规定。计划经济的执行者试图确保集体农场中的农户们都有足够多的口粮,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而事实并非如此。国家过于重视主粮的生产,这使得过去在家庭生产模式下种类繁多的作物和副业产品生产大幅降低,导致农民开始以主粮生产为中心的农作模式。生产队里, 大家都过着相同水平的日子,差别之小甚至超过刚土改的时候。部分工作相对轻松,例如领导职位、拖拉机驾驶员、木匠都能挣更多的工分, 59 而整日辛劳但不需要太多技术的务农工作所得工分却较少。不过大家的收入几乎一样,村子里每家每户的生活水平也都差不多。

这些变化让村干部获得了比集体化之前更多的权力。根据李怀印所述,「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公社干部作为特权者的出现」。在之前,这些人都是参加过革命的人,或是在土地改革和建立公社的过程中表现活跃的人,许多时候「依靠自己的巨大努力、勤俭节约、贴近民众而获得了村民的敬重。」在集体化出现以后,他们反而利用自身特权,将自己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他们能靠自己的工作挣得更多的工分,真正付出的劳动却不是很多,收入都超过一般的壮劳力社员。这些发展其实都是新架构下的必然产物:「他们控制了公社内的所有经济生活,包括安排工作、奖励工分、分配农产品以及运营公社财政。」这一转变越来越依赖行政秩序、强制手段,有时村干部还会对农民言语侮辱、拳脚相加。这也让村干部开始有机会「参与腐败和其他不轨行为」, [[142]](#footnote-142)从苏联照搬的体制让农村生活变得官僚化,「农业的集体化不仅让国家能够触及最基层的农户,也催生了数百万基层的村干部,他们的数量庞大到已经难以被政府直接指挥。」[[143]](#footnote-143)

### 中国农村的转型

在短短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从前, 治理中国乡村的是地方精英,他们的权威来自于私人财产、教育水平和对军事力量的掌控。国家这一概念离村庄很遥远,就连征税也是交给地方精英,因此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自我管理。土地的归属也很多样,有的地主从祖辈继承掌握了大块土地,雇佣长工在田间劳作,也有的小农户自己拥有不大的田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秘密组织和宗教社团散播各地。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将教义传播到 60 乡村各处。土匪恶霸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雇佣军时而保护,时而欺凌, 农村生活在许多地方其实很不安全。

之后,中国共产党依靠武装力量建立了新的统一政权,将权力管辖直接延伸到中国农村,并有效消除了土匪恶霸、私人军队、秘密结社、宗教团队和邪教组织。真正保障这些革命性土地改革的其实是军队的力量,他们摧垮了原有的农村精英。国家延伸权力的第一步就是摧毁拥有权势的地方精英,并消除他们的经济基础。在摧毁原有权贵的框架后, 共产党让贫苦的农民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些人变成了土地改革中的活跃分子,在接受训练和学习教条之后,又成为了新一代的农村管理层。重新分配土地、均分财产之后,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同时也打破了世人曾经对它的怀疑。

与过往任何一个政体相比,共产党将权力延伸至农村基层后,迅速控制了农业生产。土地和牲畜重新被收归集体所有,国家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们现在控制了粮食生产决定、收获后的粮食作物、农产品的供销和利润分配。他们也控制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村人口,不让农户脱离集体公社。土改代表着农村革命的第一阶段,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并说明国家政权将权力延伸至最基层的农村生活。集体化则是农村革命的第二阶段,让农村经济朝着另一个方向迅速发展,国家的权力延伸更深入了,打破了千百年来以宗法制和农户为基础的农村结构。

## 章城市革命

自19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一直着重于乡村地区,在1947年之后,解放军逐步向南向西推进,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纲领就在这些地区开展起来。共产党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各地开展农村革命。而在城市,又是另一种局面。从1946年开始,共产党才逐步控制了各大城市,第一个实际控制的城市是从苏军手中接管的哈尔滨。在东三省之外,解放军第一个控制的是河北省的张家口市。解放军在1945年8月占领张家口,但是国民党军队又在1946年10月将其夺回。1在最初,共产党的策略是实行军事管控,除了国民党控制的国有企业之外,对当地的工商业所有制实行完整保留。在城市中,主要的侧重点还是维持经济稳定,促进工业发展,而不是着急摧毁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当时的政策是较为温和的,为的是保留国家经济实力,稳定工业基础,慢慢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上去。

尽管共产党在工会、学校、警察甚至是政府机构很早就有地下党在活动,但是想要运行大城市,共产党的干部显然太少了。此外,与农村不同的是,共产党在城市明显缺乏选民基础,而城市居民是这里人口组成的绝大多数,没有群众基础,事情就难以像农村一样顺利开展。在城



1. Pepper ( 1999, 332)·
2. Gao (2004, 14一16), Pepper ( 1999, 376一380)·

市中还有很多曾效力于国民党的党员、官员、工业资本家、工会代表、 62 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些人即使对新政权效忠,也是摇摆不定的,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其实对他们并不是很有利。

解放军最初占领东三省和华北各大城镇后,解放军因并未做好面对新任务的准备而常常出现违纪现象。有些部队和党员夺取了私有产业和手工艺作坊,拆走了工厂的设备,没收了城市居民的私有财物,号称这是「敌人的军用物资」。这些做法扰乱了城镇经济,共产党实际上需要一些组织的支持与合作,但这些行为反而创造了一种恐慌情绪。毛泽东不想这些错误重演,他命令解放军进驻城市时避免此类事件发生,要注意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当地居民。[[144]](#footnote-144)共产党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别无他法, 必须要依靠现有的职能机构和警察力量才能维护秩序。

随着时间推移,共产党也将农村革命的一些手法应用到城市中来。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似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不过动员群众的策略显得同样好用。为了在城市里巩固政权,共产党软硬兼施,动员起足够多的力量。和乡村一样,这一过程时有暴力发生,常伴随行事粗鲁、公开威胁甚至是恐吓。不过,仅仅是强制和恐怖并不能够阐明共产党如何完成其目的:共产党也建立起基层组织,允许他们对居民进行监管、奖善罚恶,深化对城市的控制。

1949至1956年,共产党使用了三种方法巩固在城市的控制。最激烈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群众运动,以此强化对城市的政治控制。其中包括城市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随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打击政府腐败和偷税漏税,没收了许多私人产业。第二种方法目的是改变目标群体的行为风格和做事态度。其中包括打击犯罪、吸毒和卖淫嫖娼行为,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革」运动。第三种方法是动员政府官僚体系完成具体任务,比如登记城镇人口,审查警察力量的可靠程度,对服务业和手工业进行集体化改革,以及将工业国有化等工作。

章

|  |  |
| --- | --- |
| 到了1950年代中期,最初扫除敌对势力、消除潜在批评的工作已经完成。共产党开始通过官僚体系的途径对民众展开控制。户口制度让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永久迁居很困难,若未经批准,旅游都不行。国家也建立了配额制度,根据社会地位和等级分配食物、住房和其他物资。政府任命的官员四处巡查居民的生活,和小区中的警察站合作并维持秩序。私营的手工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被公有化,纳入政府的管辖之下。找工作也由政府直接包办,不再是自由择业。根据社会阶层和政治背景,城镇人口全部注册登记、国家同时施行档案制度,跟踪每个人的行为记录和政治倾向。到1950年代后期,早期频繁使用的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和处决已经被国家机关单位和地方小区的日常官僚运作取而代之。  建立秩序  每当解放军进入一座城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撤掉该市的所有最高领导,换成随军南下的党员干部,并组建「军事管制委员会」。[[145]](#footnote-145)多数随军南下的干部都是北部根据地的老兵,生在北方,长在北方,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方言也不会讲。[[146]](#footnote-146)[[147]](#footnote-147)当时共产党遇到了严重的人才匮乏问题· 有城市经验的干部实在是太少了。先前做地下党工作的干部人数也不够,游击队员根本不适应城市生活。先前,有许多活跃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并随军南下,他们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不过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城市管理者和警察力量维护秩序。  1949至1950年,有超过六成的国民党员警在接受了「再教育课程」后继续留任。他们受到共产党从解放军里新训练出的一批警员以及原先渗透进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员的监管。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上海后建 | 63  64 |

立了小区组织,国民政府夺回上海后保留了这一套组织。[[148]](#footnote-148)上海解放后, 共产党充分运用了既有的小区组织,将其更新并扩大,建立了户籍制度和配给制度。和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新政权利用基层小区组织,动员广大人民参与到群众大会和政治运动中。 [[149]](#footnote-149)

在完成「再教育」之后,这些警察在上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他们取缔了街上的小商小贩,数量鋭减至原先的一半。为了合法经营,所有的出版物都必须登记在案。货币兑换业务被禁止。乞丐、扒手和其他流浪者都被抓起来、登记然后接受再教育。三轮车夫与城市帮会携手搞的诈骗也被禁止,伪造货币者被处决。原先的国民党士兵和官员都需要登记,如果愿意自己站出来,就会获得宽恕,要想隐瞒身份,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对待犯罪实行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政府还大力杜绝抢劫行为。部分国民党转入地下,从事暗中破坏、颠覆和刺杀行动,但都受到最严厉的打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措施变得越加严格,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新生的政权加倍努力地巩固自身,手段也愈加暴力。 10

新政权也明确表示,在华的外国人即使长期旅居于此也变得不受欢迎。他们被警察骚扰,房产被没收,许多外国商人、领事官员、教师甚至是留学生有时会被关起来。这些事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也屡见不鲜。随着迫害的加剧,一大批人被关押或驱逐,部分人还被杀死。在华外国人于1951年急剧缩减。尤其遭殃的是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以及下辖的育婴堂、慈善机构和修道院。在短短几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的外国人就只剩下从苏联和其卫星国家派来的顾问。

### 剿灭反对派 65

建国之初,维护公共秩序是主要目标,而在1950至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像村庄一样,解放军所到之处其实遇到了许多反抗。在城镇中,首要的难题是活跃在地下的国民党分子,他们暗中搞破坏,并进行暗杀活动。但是,这场运动同时也指向秘密社团、地下犯罪团伙和邪教组织。这些其实构成了中国城市生活特色的一部分,也有能力反抗新政权的建立。相对应地,共产党采取大规模集会、公开批斗、高音喇叭播放判决、广播其犯罪行径等方式予以镇压, 有时还包含大批公开逮捕和处决。[[150]](#footnote-150)批斗会都是精心准备的,充满激情, 民众到了最后都高呼要立即集体处决罪犯。有些人虽然被批倒,但是免于牢狱,不过在接下去的时光中,生活都受公安的监视。[[151]](#footnote-151)随着运动的深入,批斗大会和审判集会成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景象:在杭州, 超过45万人次的民众参加了1 ,545场批判反革命分子的集会。[[152]](#footnote-152)

根据官方数据,有120万人被捕并送到劳改营,超过71万人被处决。[[153]](#footnote-153)有事实证明,被处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党内领导的预期。毛泽东曾经想控制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处决的比例,让下属做事谨慎些,缓和运动的剧烈程度。毛泽东多次在报吿上批阅,指出处决罪犯的比例应该限定在总人口的千分之一。[[154]](#footnote-154)地方官员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自己在镇压反革命立场上显得柔弱,就尽可能按照这一比例落实,彷佛是完成目标份额一样。运动最初的档案指出,间谍、暗中破坏者和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是此次运动的目标,要被处决。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发现没有那么多人来达[[155]](#footnote-155)到千分之一的指标,于是名单中又加入了犯罪团伙成员和邪教组织的 66 首脑,他们被扣上了「地痞恶霸」的名号,在没有具体罪行指控的情况下也一并被处决。在整场运动中,先前的国民党士兵和官员以为只要登记身份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但他们也被捕,最后被杀。在贵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81名县长全部被处决,成都周边的乡镇长也几乎无一幸免。

这场运动扫平了一些有组织的抵抗,也剿灭了国民党残部的地下网络。暗杀和破坏行为数量鋭减。但是,共产党处决的人实在是太多。一份1953年的党内报吿指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蒙冤被杀。尤其遭殃的是那些解放战争晚期从国民党方面投诚的士兵和官员。共产党曾许诺那些自曝国民党身份的人可以获得宽大处理,但并没有履行诺言。判决开始变得不分青红皂白,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毛泽东曾一度叫停这一运动。 [[156]](#footnote-156)[[157]](#footnote-157)

很快,因为镇压反革命抓了许多人,原有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

从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监狱规模远远跟不上罪犯的人数,因此新政权建立了劳动改造营的体系。到了1951年年末,超过200万人被捕,有 67万人被送到了新的劳改所,被迫参加劳动,自身的生活成本就从劳动所得中扣除。到了195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30万人。劳改所条件很差,囚犯经常饿肚子,并常有殴打事件发生,因犯的死亡率非吊户[[158]](#footnote-158)冋。

### 镇压秘密教门、秘密结社和城市帮会

1949年1月,共产党禁止了秘密结社和秘密教门。政令中,政府谴责这些组织与国民党有勾结,还在抗战期间与日军合作,搜集情报,散布谣言,策划地方反叛。[[159]](#footnote-159)秘密教门的成员起初来自于迁入城市的第一

|  |  |
| --- | --- |
| 代农村人(诸如天津)。在华北,他们的势力很大,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一贯道」。1950年,政府签发了针对这一组织的政令。一贯道的教义是个大杂烩,包含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学思想以及其他从本土宗教借鉴的教义。共产党认为这一组织是对新政府的极大威胁, 在天津, 1951年时约有一百万成年人口,教徒就占了20万,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和商贩,以及第一代城市居民的女性。一22 贝,道、 教徒占到绥远省的11 % ,北平的15% ,成员数量还一直在增加。当时北平市政和公安系统中大约有1 , 100名官员都是其成员,当地的党组织和共青团成员也有参加的。在北平的一个区,有23 %的警察居然都是一贯道的成员。 23  一贯道显然有颠覆新政权的能力。一贯道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在一开始分土地时就和政府对抗。在共产党获得内战胜利之前,一贯道散播谣言,说共产党要施行共产共妻的政策。在朝鲜战争期间,一贯道号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将会摧毁新中国政权。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之前,共产党就批评这一组织,号召其成员退出一贯道,自愿回到户籍政策上来。镇压反革命开始后,一贯道首当其冲,其组织成员互相吿发,组织领袖被公开批斗,随后处决。宣判和处决都是公开进行的,效果非常好,有效地摧毁了这一组织。 24  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到秘密社团和犯罪团伙上。这些组织曾经在中国城市活跃一时,秘密社团规模很大,组织结构很完整,从第二代或更年轻的城市居民中招募成员,尤其是运输产业的工人们。在像天津、上海这样的港口城市,秘密社团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主要政治与经济力量,曾参与贩卖鸦片,开妓院,句柄头与货物运输,经营各类行会。这些组 | 67 |
| 织在苦工、码头工人、三轮车夫和货物装卸工中有相当多的成员。犯罪 | 68 |

黑帮相对规模较小,以地方小区为主。他们大多是农村恶棍,经常搞些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勾当。不过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他们反倒是



22 Hung (2010, 400), 401一403 ; Lieberthal ( 1973 , 243一244; 1980, 14一16) · 23 Hung (2010, 403一404) ·

24 Hung (2010, 404一417) ; Lieberthal ( 1980, 108一119) · Dikötter (2013 , 196一206)调查了20世纪50年代对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更广泛攻击。

唯一能给小商贩经营生意提供安全保障的人,但要收取保护费。[[160]](#footnote-160)

这两类群体都和国民政府统治期间贪污腐败的官员们有勾结,这也让国民党丧失了群众基础。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青帮。青帮和国民党的城市官僚体系有很大的重合,据传蒋介石也在1920年代加入过青帮, 并在1927年对共产党人的清洗中利用了青帮的势力。青帮在上海的大佬名叫杜月笙,与上海市政府关系密切,并和国民党高官来往密切。 [[161]](#footnote-161)在共产党看来,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组织即为颠覆分子。

共产党控制城市之后,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获得国民党员的名单,所以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员自报身份,否则严肃处理时,这一政策收效甚好。但是秘密结社和犯罪团伙是不会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的,要想让他们坦白自首,就非常困难。1949年1月,共产党占领天津,立马就对运输业的青帮采取打击措施。共产党在各个城区建立了新的运输公司和服务站,组织苦工成立运输队,在大街上游行,喊着口号谴责曾经的老板。共产党也建立了新的工会,为工人提供保护,取代黑帮老大和秘密社团先前的角色。苦工老板若是愿意合作、吿发他人,就能加入新的工会。他们被要求参加学习班,对共产党效忠,致力于新工会并批评「反动封建的秘密社团」。 [[162]](#footnote-162)

清除黑帮老大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要难。这些大佬经常恐吓那些加入新工会的人,甚至能让忠心的下属渗透到领导岗位上。党员干部很快 69 发现,新成立的运输公司和工会里居然出现了他们的卧底。1950年代后期,对黑帮的打击也被整合进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一大批人被捕,随后便是严酷的惩罚措施。所有被确定的苦工老板被逮捕,公开批斗又组织了起来,刑事审判被直接跳过。到了1951年春天,一大批苦工老板被公开宣判,随后处决,城市黑帮这才彻底销声匿迹 [[163]](#footnote-163)

### 打击卖淫嫖娼

随着打击秘密结社和犯罪团伙的深入,贩毒等罪行被有效遏制。打击卖淫嫖娼的工作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不过成效也非常好。从1948 至1950年占领城市以来,共产党就发布政令,宣布取缔性交易行为。稳固了对城市的控制之后,共产党关闭了妓院,将这些妇女送回农村老家,或是在城市就地安排工作。 [[164]](#footnote-164)

在共产党的分类中,从事性交易行业的妇女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不是罪犯。在共产党看来,妇女是被剥削的群体,有罪的是那些从中牟利的人。新政府关闭了夜店、酒吧和妓院,并禁止站街揽客。政府开设了再教育中心,强制她们参加。这里除了妓女之外,还有瘾君子和乞丐,不能随便离开。他们接受药物治疗、宣传教育和再就业培训,还要参加学习、互相批评和劳动改造。当被认为已经充分改造之后,他们能重获自由,走上新岗位,有些还介绍了对象,结了婚。但是绝大部分被驱逐出城市,被永远地送到了偏远地区。[[165]](#footnote-165)[[166]](#footnote-166)

对于妓院主人和皮条客来说,惩罚可就严重多了。在1950年的上海,政府就公开处决了两个持续招妓、不知收手的妓院老板。到了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所有妓院都被关闭,有些妓院老板还被公开宣判。1952年之后,这一行业只在小范围内运作,政府机构逐步将那些依然坚持卖淫嫖娼的人列为罪犯。到了1950年代中期,私有经济 70 几乎绝迹,卖淫嫖娼才被彻底杜绝。 31

### 限制劳工组织

国民政府时期,工会就已十分活跃,在日军投降之后又迅速兴盛起来。黑帮大佬控制的工会其实仅仅是一小部分,例如运输产业。而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主要行业都由工会掌控,实力非常强大。[[167]](#footnote-167)有些从属于国民政府,有些虽然是独立工会,但是长期有共产党员渗透。许多人将共产党的管治认为是对抗雇主的好机会。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 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工人们损失惨重,难以为继,许多工会都认为共产党接管之后,将会是一个弥补损失的机会。

1949年下半年,共产党逐个占领了中国的各大城市,一大波工会游行运动开始涌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会运动。[[168]](#footnote-168)许多工会组织起工人民兵参与游行,这些民兵是隶属于工会的,而不是来自公安系统或占领部队。许多曾经长期从事地下工人组织运动的共产党人也对这些工会活动表达了他们的同情。

共产党发轫于工人无产阶级,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应对这些罢工游行运动有天生的同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管理城市,维护秩序,复苏经济。这些工会罢工反而破坏了社会稳定,有碍工业复苏。此外,许多工会在过去和国民党有来往,共产党就更加怀疑他们发动罢工的动机了。

1952年初,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资深共产主义者李立三被罢免,理由是鼓励工会实行「垄断机制」,与中央政策相悖,推行经济主义一一无原则地关心工人福利,为后进工人争取权益。和劳工行业一样,共产党成立了新的工会,吸纳旧工会成员,指派新领导。有工会控制的民兵被解散。[[169]](#footnote-169)新的工会不鼓励罢工和其他暴力行为,尤其是当国有企业牵涉其中时更是如此。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工人罢工被认作是颠覆政权的犯罪行为,会立即受到惩罚。

### 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

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也臣服于新政权。他们的许多人都曾留学西

洋,马列主义者相对不多,大多数是崇尚民主和学术自由。[[170]](#footnote-170)[[171]](#footnote-171)这些态度是必须改变的。共产党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的想法,原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立足之地。1951年10月,《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正式阐述了这一运动的目的:「新时代的大学教师必须勇敢地批评原先错误的观念,一方面要反省自己,杜绝骄傲自满,另一方面要大胆地开展相互批评。」36 1951 年9月,运动规模开始扩大,京津两地20所大学的超过3 ,000名教职员工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改造学习」。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对美式生活的错误向往」,纠正「从英美学来的错误观念」。学术界的人们要学习「革命主义观点」、「服务人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维」。学员们要学习党的章程、马列经典、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共产党领导人的演说。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旨在「消除错误思想」。[[172]](#footnote-172)在国立浙江大学开展的学习运动非常典型,教职员工被要求参加讲座,相互批评各自的资本主义政治观点,还要写文章承认自己落后的世界观,若是 72 对自己的反思不彻底,还必须重写,直到认识透彻为止,表现不佳的还要面对批评大会。[[173]](#footnote-173)有些人实在无法忍受坦白的压力、不能改变自身观点,于是逃往香港,小部分人则选择了自杀。 [[174]](#footnote-174)

大部分坦白多少都包含着形式主义的表述,这些知识分子要表达对新政权效忠,赞同其意识形态,愿意为了先前的「资本主义行径」而作深刻检讨。一位教职员在1952年5月的文章中写道,「我感到无比的自责懊悔,我先前没有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自身工作的准则,对人民犯下了许多错误。因此,我将会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自己。我会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毫不动摇,更好地服务人民。」[[175]](#footnote-175)对于建国前的知名学者和他们的门生与友人来说,压力更为巨大。胡适就是一个案例。胡适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的学生们就被要求批评老师的「腐化反动」观点。胡适自己的儿子也没能例外, 在对父亲的长篇谴责中,胡适的一儿子写道:「我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新政权认为十分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众多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胡适只是其中一个。

这场运动最初的目标是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引向苏联,让他们脱离先前曾经求学或从事研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运动的核心理念是·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领域,知识分子最终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此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相对富裕的家庭,所以常被看作是代表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利益的群体。另外,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教员大多或 73 是有留学经历,或是曾与外国学者共事,或是接受过英美德等国的课程学习,或是在仿效西方大学而建立的中国学府学习,或是在由西方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资助建立的大学里求过学。苏联学者是这一时期新的革命模范,因为他们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推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如果教职员工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保留原来的工作,就必须和曾经的资本主义教育标准彻底决裂,并忠诚地站在苏维埃式的标准一边。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之后,这些压力陡增起来。一位受过外国教育的编辑在1952年7月的口供中说:「我盲目地崇拜欧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科学和文化… …直到抗美援朝爆发后,我幡然悔悟,发现了美帝国主义的颓废本质和美国侵略文化的丑陋… …美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致命敌人。」42另外一位说,「我现在明白,恨美国、爱苏联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开始讨厌美国之后,我自然而然地看到,苏联是可爱的,值得尊重和钦佩



41 Chen ( 1960,4斗部分其他著名教育家和学者作为谴责对象的叙述可参见 Chen ( 1960, 38 50 。

42 

的… …苏联专家无私地帮助我们,在全球事务上,苏联无条件地给我们支持。我感到羞耻,我过去与反动派分子站在同一阵营。」[[176]](#footnote-176)

学者越杰出,谴责西方的言论就必须越详细,广泛宣传这些陈述就越有价值。清华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芝加哥和加州理工学院受过教育,他的自我批评包括了在美国时的经历:

我第一次在美国生活的四年里,我看到只有摩天大楼、汽车和剥削阶级挥霍无度的生活,但我并没有看到垄断资本家对普通群众的残酷剥削… …我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好的,人民有言论自由… …我没有意识到,美国总统和所谓的政府官员是垄断资本家的

奴隶,报纸上报道的政治辩论无非是一个个统治党派的相互攻讦。 74

我1943年第二次去了美国,这是我一生中最可耻的一章。我以科学工作者的名义来到了美国,这个标榜自己是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国家。但实际上,在1945年初,苏联在东欧的辉煌胜利已经说明了法西斯德国的最终命运… …我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 却觉得这是我的「荣誉」。[[177]](#footnote-177)

一位原武汉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他为此感到羞耻。他觉得自己盲目钦佩美国的方方面面。他使用美国实验室的设备,并遵循美国的教学方法。他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苏联科学家米丘林(Michurin)更先进的理论,后者才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他承认与美国学者交换实验室标本是「极端错误」的,更不应该接受哈佛的经费援助,并为美国农业部收集标本。「我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者在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时,植物资源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名学者经过真诚的反思和努力学习,得出结论:「只有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米丘林理论,才有可能有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植物科学。」[[178]](#footnote-178)

上述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的坦白反映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对苏联的痴迷。苏联的米丘林是一位遗传学家,他主张后天获取的特征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种原理源自于18世纪的法国自然学家拉马克,可是学术界早就摒弃了这种理论,赞成门德尔的遗传学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179]](#footnote-179)因为米丘林的理论与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一致,所以被提拔为苏维埃官方科学,专门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遗传学。[[180]](#footnote-180)米丘林的想法是在他去世后由另一位原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 75 (Lysenko)发展起来的,后者在1953年写道:「我们惊奇地发现:斯大林的教导是对的,渐进、隐蔽、不明显的量化变化可以导致快速、激进的质变,一种物种就转化为另一物种,这理论适用于苏维埃生物学家在植物进化中的探索。」[[181]](#footnote-181)战后初期,李森科声称的科学依据受到苏联科学界的普遍质疑,他将这些指责定性为「理想主义」、「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共谋」、「西方思想」、「形而上学」、「种族主义」、「与实践脱轨」, 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将反对派的观点定性为「资产阶级科学」,是「美国人试图证明白人优于黑人的阶级压迫工具」,是「帝国主义阶段诞生的、与生俱来的科学混蛋,是形而上学、违背历史规律的形式主义遗传学理

一位1960年代的苏维埃科学家写道:「这愚蠢庸俗的谎话当然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只会增加科学家们的反对意见。」中国有许多顶尖的科学家似乎也被说服了。十年之内,米丘林和李森科被广泛认为是苏联科学的小丑,整个事件说明了科学对意识形态和无知政客的屈服。 [[182]](#footnote-182)

在[[183]](#footnote-183)包括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许多领域,中国学者被迫遵守那些他们明知是错误的理论说法,和那些他们认为是可笑无知的学术标准。一些苏联科学家到达中国大学时,对科学实验室的质量印象深刻,它们通常优于当时在苏联的科学实验室。其中一些人感到震惊: 科学家们在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受过良好训练,却要受到教条的束缚,凌驾在他们之上的反而是无知的领导,唯一的作用就是抑制实用科学的发展。这些景象让他们不得不想起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苏联发生的一切。50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和共产党试图建立的政治权威深受诟病,到了1957年「双百时期」,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批评者们开始谴责这种教条主义和其催生的愚昧无知。

76

### 没收私有资产

1949年之后,城市私营部门就开始急速衰退,甚至早于党的领导层宣布决定在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之前。政府机构开始接管银行和批发供货商,使企业变得难以获得信贷、融资和原材料,无法有效触及客户和市场。这些变化压缩了私营部门竞争和成长的空间。在1949至 1952年间,私营企业在开放市场的销售产出百分比从88 %下降到了 44%。私营企业越来越依赖与国家签的合同:私营企业在对公合同中的销售额同期从12%上升到56%。[[184]](#footnote-184)在最初几年,私营部门占工业产值的比例从63 %下降到39% ,被国营企业、合作社和联合企业取代。[[185]](#footnote-185)虽然政府没有对私营部门进行任何明显的发难,但私营部门逐渐受到国家政策的压制,不得不依赖国家机构。

对私营部门的逐渐挤压在1952年转变成直接的打击。共产党发起了打击「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杜绝城市干部滥用权力。[[186]](#footnote-186)那些担任职位、对新政权效忠的公务员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有些人「拒绝承认」罪行,就遭到强制性审讯和酷刑逼供,这导致了一连串的处决和自杀浪潮。很快,党的行政体系瘫痪,导致毛泽东撤销了这一运动。[[187]](#footnote-187)在被调查的约400万人中, 120万人因腐败罪被定罪,接近20万人是党员。 [[188]](#footnote-188)

随后,该运动转向打击私营企业。「三反」运动被整合进更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新的说法是,干部的腐败是私营企业家的商业行为造成的。新的「五反」针对「逃税、贿赂、欺诈政府合同、窃取经济情报和窃取国有资产」。工作组进入私营企业,要求查看账本,进行彻夜的审卂,许多企业所有者不得不「承认」腐败和逃税,揭露「非法利润」的来 77 源,透露「隐藏」资产。许多企业受到大规模罚款,随后倒闭。许多企业主「自愿」将自己的公司转交给政府,以此抵偿那些强加给他们的退缴税和犯罪罚款。[[189]](#footnote-189)到运动结东时,城市私营部门已经缩小到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7% ,仅仅是1949年的一半 [[190]](#footnote-190)

这场运动不仅是对私营企业活动的打击,所有能调配不受新政府控制的资源的独立组织都没能幸免。一个例子就是对私人慈善事业的打压。私人慈善是1949年之前中国城市福利救济的主要手段。1949年, 上海有近1 , 300个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是私人或宗教慈善机构。1949 年后,相对富裕的市民被允许继续经营这些慈善事业,建国初期,这有助于中共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慈善家被欢迎加入到新政府创办的市政协会中一一一澵政府仍然缺乏向弱势公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因此欢迎他们的慈善事业。

到了1951年,事态发生了变化。打击反革命的运动是私人慈善走

向最终关闭的第一步。打击的对象包含资金来自美国,或者职员里有美国公民,亦或和海外宗教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这些组织都被定性为颠覆政权而被强制关闭。与国民党政权密切联系的慈善机构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最后到了「三反五反」时期,私人慈善机构也成为打击对象。这基本上是对资助和运作慈善机构的社会精英的一次攻击,他们同样面对着莫须有的贿赂、逃税和隐藏资产的指控。政府机构还施加了大额罚款,发布政令关闭这些慈善机构或要求他们合并进入政府运营的慈善中去。到1954年,上海的私人慈善机构几乎绝迹。 58

### 户籍登记制度

在这段时期里,城市地区建立起一套户籍制度,并最终将城镇居民锁定在原地,并迫使农民离开城市。1950年代末,若是没有合法的城镇户籍,就没有公民身份,没有官方地位,就不符合食品和衣料配给条件,就找不到住所,无法就业、上学、结婚或加入军队。591953至1956 年,制度基础建立,同时完成的还有农村的农业集体化与城镇的工商产业国有化。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要防止农村人口未经授权迁移到城市,并将「过多」的城市人口送回农村,或让他们迁居到有工业发展规划的内陆城市。 60

1954年底颁布的规定设立了城市居民区派出所,开始接管人口登记、执行居留身份的审核。同时,政府建立了城市街道办事处,并提供了资金,用以维持10至15名工作人员的薪水。611955年6月,法规规定了永久户籍制度:要想搬家,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招待所需要凭单位或地方政府授权的旅行证件才能入住。1955年8月,国家颁布了第一条关



1. Dillon (2007)·
2. Cheng and Selden ( 1994, 644)·
3. Brown (2012, 29一47), Cheng and Selden ( 1994, 652一653)·
4. Cheng Selden 655)·

于城市粮食配给的规定,巩固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191]](#footnote-191)除了1958年和 1959年混乱的大跃进期间的短暂崩溃之外,这一制度有效地将农民隔在了城市的大门之外,不需授权的旅行直到1970年代末才渐渐放开。 [[192]](#footnote-192)

### 强化邻里小区

户籍登记制度是1950年代管理城市邻里小区的关键。城市分为几个城区,通常一个城区包含数十万人。城区又被分为几个街道,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每个街道平均又被分成约八个小区,每个小区由几百个家庭组成,由居民委员会负责。居委会又分为若干居民小组,通常是住在同一栋楼或一条街上的15至40个家庭。[[193]](#footnote-193)

所有这些城市组织的官员都由共产党直接任命。城区、街道委员会的员工从国家领薪水,但小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志愿者性质。他们巡视所负责的地区,查看是否有过夜的客人或其他未曾登记但居住在 79 当地家庭的人。他们张贴宣传海报,负责公共广播系统,负责政治宣传,带领居民阅读新闻报道,召开政治会议,以此传达政府信息。他们还开展卫生运动,帮助管理粮食等物资的配给,调解家庭之间或家庭内部的纠纷,还负责婚姻咨询。他们巡视邻里,调查任何不寻常的东西, 并检查陌生人的身份。因为家庭几乎没有私人电话,居委会座机作为公共电话数量翻了一番,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监管,拨打电话都要登记,要是接到来电,还要跑去通知具体居民。 [[194]](#footnote-194)

1955至1956年快速完成的社会主义产业转型,是巩固新政权对城市经济和城市居民控制的最后一步。在高度公开的动员运动中,剩下的私营企业主被迫向国家「捐赠」自己的公司,或将其转为「公私联营」的所有权性质,其实质是一步步迈向纯国有化。此前的企业主在国有企业中获得股份,在很多情况下继续担任经理人职务。国有企业在1957年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 ,「公私联营」性质的企业类别也很快从政府统计资料中消失。 [[195]](#footnote-195)

随着城市经济逐渐转由国家控制,一个新型工作组织的轮廓形成了。这就是在城市居民生活中发挥中心作用的「单位」。单位制成为城市社会组织的第二大支柱,与小区组织和户籍制度配合工作,一起管控城市公民,并把人口固定在特定地区。户籍登记制度建立、工商行业转移到国家控制之后,国家机关就掌握了分配就业机会的权力,而工作分配情况几乎是永久性的。[[196]](#footnote-196)工作单位越来越多地承担原先私营经济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开始提供住房以及其他物质配给。养老金也由工作单位负责管理,国家医疗保险和残疾人保险也是如此。[[197]](#footnote-197)工作单位也发挥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控制作用,在许多方面比居民委员会更有效。他们组织政治学习,在工作和空闲时间召开政治会议,组织计划生育运动,批准结婚和离婚申请,并授权城市之间的旅行活动。他们的党组织负责组织政 80 治运动、执行国家政策,安全部门进行政治和刑事调查,将违规者移交给司法部门。 [[198]](#footnote-198)

### 革命化的城市

这些城市转型加上乡村革命,使得新中国将其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触及小区、工作场所和每家每户。新国家的能力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家极为类似,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传统帝国时代,国家的权力架构达不到县一级。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但是国家建设的努力被军阀派系

主义和外强殖民入侵破坏。而中共是一个更加纪律严明的军队,在军事上征服中国之后,进行了严格的政权巩固,集中打击妨碍中央对国家控制的一切阻碍。中共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但是国家建立的基础却依托于一个完全外来的,实际上是西方的模式。

1950年代中共决定性地结东了数百年来由地方精英间接统治国家的历史。在国民党时期统治地方的有产精英力量被彻底摧毁。国民政府时期猖獗的农村盗匪、有组织犯罪和政府腐败的情况稳步受到控制。秘密结社和地下教门被压制,无处不在的贩毒和性交易得到有效遏制。这些都是新中国统治者开辟的新天地,国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不再受外国军事占领,主要沿海城市也摆脱了殖民者控制。新国家动员了数百万士兵开赴朝鲜半岛,与西方优势军队势均力敌。

然而,前八年革命式的国家建设是为更深层次转变做的铺垫。中共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仿效的是一个20世纪文明所独有的新 81 形式:苏维埃式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新文明建立在两个支柱上:一个完全拒绝市场机制、由官僚管理的经济体系,和一个全权掌控社会和经济的纪律严明的党组织。这两个支柱中的每一个都有明显的缺陷,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来说,这些矛盾将会越来越明显。二者都要与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倾向做斗争,这将困扰毛泽东的一生,刺激他在人生最后20 年终发起了具有强烈破坏性的运动。为了了解接下来2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就必须研究计划经济的官僚主义特征,同时研究不断发展壮大、使中国的统治体系如此独特的党组织。而这些就将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第5章 82

## 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破裂后,便以摆脱苏联发展模式而著称。作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策划者,毛泽东成为了中国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代言人。但是,毛泽东晚年的所作所为,让人难以理解其早期对全面采取苏联模式的热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期毛泽东是苏联经济模式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较于他的同事,毛泽东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全面的方式采取中央计划经济模式。[[199]](#footnote-199)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影响,该书由斯大林主持编写,简要叙述了苏联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200]](#footnote-200)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希望中国尽快全面采取苏联模式,但是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他才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在1953 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事实上与斯大林1929年提出的「总路线」较为相似。3中国与其他战后社会主义集团成员一道,贯彻落实了斯大林体系成熟时期的核心元素:由纪律严明和等级分明的政党实行绝对的一党执[[201]](#footnote-201)政、大力扩展内部安全机构、塑造一位占主导地位的最高领导人。与政治体系相配套的是强调收归国有、国家掌控经济的经济模式,侧重于发展重工业和武器建设。

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了深入而广泛的关系,忠实遵照苏联 83 模式设计建立了各类党政机关、教育体系、研究机构、管理国有企业。苏联在中国建立了两百多家工厂,成为中国新工业体系的核心。一万多名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来到中国,参与三百多个主要工业项目的建设,大约有四万多中国人在苏联和东欧接受培训。[[202]](#footnote-202)[[203]](#footnote-203)中国在许多方面全面实施了苏联蓝图,比苏联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方案。

考虑到四十多年之后苏联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被摒弃,毛泽东对于全面实施苏联模式的热忱似乎主要来自于他的政治信条。但是当时,人们有充分理由对苏联模式充满信心。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一战当中被轻易打败,但是30年后,苏联作为二战当中经济最不发达的主要参战国, 扺挡住了攻势更为强烈的德国,在欧洲单独作战的同时实现反攻。人们普遍认为,苏联1930年代开展的工业化运动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联体系下所制造出来的军需品是德国的两倍之多,并且在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支撑与其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远不和称的军队方面,苏联展现出了优越性。[[204]](#footnote-204)而正是在东三省采取了这种战时动员模式,毛泽东才得以最终战胜了国民党。

早在1930年代,在这种模式展现出战时优越性之前,苏联经济就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而同时段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还深陷经济大衰退的泥潭之中。从1928年刚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到与德国开战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 · [[205]](#footnote-205)% ,而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8从1928到1949年,苏联经济年均

增长率为3 ·2% ,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倍。[[206]](#footnote-206)考虑到位于乌拉尔山脉西侧的大部分苏联领土在1941到1944年的战争期间受到重创,苏联经济增速可以说非常可观。苏联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从1950到 1956年,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为3 ·4% ,而美国增速仅为23 %。[[207]](#footnote-207)[[208]](#footnote-208)在苏联高层眼里,最能够展现苏联经济体系活力的事件,莫过于1957年苏联发 84 射了世界上第一颗绕地卫星。这种经济模式帮助苏联成为世界性大国, 对革命后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斯大林模式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蓝图,同时提供了一种围绕该蓝图的统一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这个时期的一位观察者认为, 「特别是在革命之后,国家就会利用现有的思想帮助他们度过高度不确定的阶段,让他们的行为更具合法性、更加协调。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往往会导致他们模仿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不是仅仅考虑纯粹的效果。」1

### 作为增长机器的国家社会主义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社会主义增长模式如此成功?快速的持续增长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并非由市场需求和金融市场所推动。在短暂的资本主义历史当中,总需求的波动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衰退,而且经济危机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最终在1930年代出现了大萧条。在苏联体系当中, 市场需求并没有刺激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也不存在。国家计划者通过向工厂下达每年增长的生产计划指令而确保有效需求。国家提供融资,通过与国家生产计划和匹配的国家银行体系分配投资和生产资金。因此, 苏联模式当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所拥有的不稳定性。

苏联体系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以更快的速度积累资本。苏联政府并没有放手让个人消费储蓄和私营企业投资生产波动来影响经济增速,而是

自己出手管控消费和投资。苏联根据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划分标准决定生产计划。生产性投资提高生产原料产量,而工厂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产品。生产性建设包括所有现代工业强势领域:矿产、冶金、化学、石油、机械制造、机动车辆、航空、武器,还包括这些产业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设施。非生产性投资指的是所有终端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而非制造业中可利用的产品。它不仅包括所有消费产品:成衣、家居装饰、自行车、私人电话、民用汽车等,还包括针对私人消费的零售和服务行业。房产也名列其中,因为房屋在有人居住之后就会贬值,并不能用于物资生产。[[209]](#footnote-209)

苏联模式牺牲非生产性投资,将大量投资转向生产性行业,从而获得快速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当中,重工业发展庞大,而消费品领域极其落后,住房拥挤、质量低下。为了能够建设现代经济和国防所依赖的重工业,消费者做出的牺牲便被视为可以承受的代价。

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出发,非生产性投资属一种浪费,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从社会角度和经济角度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损耗巨大的消费领域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消耗大量资源就是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每年都会对电视机、音响设备和私人汽车进行重新设计,吸引消费者。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市场推销和广吿,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大批基本相似的产品陈列在货架上,利用奢华包装,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整个经济领域都致力于非生产性任务,刺激消费者购买价值有待商榷的产品:市场营销、零售、广吿。购买了新的消费产品之后,一些产品尽管还能继续使用,但是已经不再新潮,便被抛弃了。[[210]](#footnote-210)对于一个正统的苏联经济学家来说,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浪费王国,本可以用于社会理性生产的资源却被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上,仅仅为了商品流通、刺激不必要的家庭支出。对于希望寻找到一种能够快速推动工业化经济模式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看法深得其心。

为了能够在生产资料领域维持投资最大化,国家拥有所有生产性资 86 产和金融行业。国家内部基本上不存在私营企业和私人金融行业。国家经济计划者做出所有生产和投资决定。金融领域不再是经济动荡的危险来源,而是作为国家生产计划的一部分,用于分配资金。这同样要求国家经济计划者为基本上所有的产品制定价格。通过这样的方式,计划者能够保证资源流向优先领域。

控制价格当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农业,旨在为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力提供便宜的食物。集体农场是这一体系当中的固有部分,因为国有机构管理这类农场,控制了收割和分配。集体农场需要按低价向国家出售配额粮食和其他食物,本质上说就是从农村获取盈余来补充城市工业。便宜的食物是增长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食品价格低廉意味着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就能够让国家向工人支付较低的工资。再加上在消费产品和城市佣人房屋上限制投资,这就使得国家产业能够积累更多盈余,以更快的周转速度投入(生产性)工业的扩大之中。概括而言,简易版苏联经济模式就是:国家为了刺激储蓄和工业投资,限制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等到经济发展进入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才能实现消费繁荣。

### 工业体系

苏联发展模式创造了一种非常简洁的管控方式。15每年,工厂会收到两份计划:生产计划和供应计划。生产计划通过表格形式呈现:每一



1. Kornai ( 1992, 13 1一159)·
2. 以下段落以1979到1980年我在香港对退休的工厂管理人员进行的采访为基础撰写。这些受访者来自于中国,这些访谈是对中国工厂权力研究的一部分(Walder 1986, 270一272 ;受访者5、23、55及65 )。Kornai ( 1992, 110一130 )为计划制定过程和如何操作提供了系统的回顾。

行表示国家计划者给工厂设定的年度生产定额;每一列表示可以向哪些终端消费者出售产品。生产计划反过来就是供应计划:每一行表示计划 87 者预估工厂完成生产计划所需要的各类供给配额;每一列表示工厂可以从哪类工厂购买计划内的所需供给。整个工业体系就是生产和供应计划相互交织的网络,在企业和国家采购机构中建立复杂的联系。

企业之间大体上根据生产和供应计划进行协商。生产计划当中的购买方将会在年初与企业碰头,与企业敲定产品规格和发货日期。工厂的采购部门也会前往供应计划中所列出的企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计划完成了,生产者和供应者之间就会以国家固定的价格完成交易,资金在国有银行企业账户中划拨。一家工厂的资金计划提前预支一部分生产资金,用于完成计划。完成计划意味着工厂实现了既定的利润目标,基本上所有的利润都上交给国家金融机构,用于工业投资。工厂只能自留一部分利润,用于奖励管理者和工人。

表面上看,在一个安排如此有序的经济体当中,似乎没有给创新留有余地。这样的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因为生产和供应计划当中经常出现隔断。计划者希望通过利用资源提升效率,但是通过这样的价格机制并不能够实现目标,因为价格机制只是计划交易背后的会计手段。相反,计划者通过制定严苛的计划鼓励效率:并不是生产需要的所有供给都列在购买计划当中。计划者想当然认为管理者会将资源储藏在仓库, 如果不会,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高效利用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料和浪费,或者节约利用燃料能源。

供应计划当中还有一个隐藏在计划经济结构当中的问题:「计划内」供给往往并不是购买企业所需要的产品规格。供应计划当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规格尺寸。产品质量,例如钢铁厚度、拉力、某一尺寸或某一设计的闲置部分等,需要通过采购部门和供应企业进行协商。有时候,供货商会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生产所需规格的产品。通常供货商同意按要求 88 生产,但是最后配送的产品却并不满足合同所规定的要求。怨愤的企业通常没有什么合适的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苏联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合同法》,供货商也没有动力去满足顾客的需求一一一在计划体制内,基本上不可能失去顾客。除非这家企业的管理层级别够高、影响力够大,可以

在党内疏通关系,否则供货商并不会惧怕对方企业。管理层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对供给货物进行再造,或者是将它们放入仓库,寄希望于与有该类货物需求的公司进行产品交换。

在操作上,管理者通常会采用易货贸易来应对紧张的供给。这属计划经济当中的创新做法。社会主义工厂的销售部门规模极小: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坐在办公室,等待生产计划当中的终端使用者前来碰面。而供应部门规模更大,对于完成生产计划来说也更为重要。供应部门会派出采购人员寻找供给,而本公司则用对方生产所需的货物进行交换。通常采购人员会到一家曾经帮助过他们解决供应问题的熟悉的工厂。而其他时候,他们会参加大型「订货会」,事实上就是地方政府为企业解决供应问题所举办的大会。

正是如此,人们的聪明才智击败了官僚的精心计划。管理层意识到工厂完成生产计划唯一的限制就是供给不足之后,便开始在仓库当中囤积货物,对冲未来供给不足的风险。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工厂能够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但是没有上报,而是将产品储存在仓库当中。这些货物就能够被用于交换未来生产所需要的供给。这导致了在企业层面普遍出现囤货情结,这些货物远远超过了工厂自己生产所需的货物。采购人员经常发现很难直接安排满足双方生产需求供应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一方需要先接受他们生产不需要用到的产品,不过由于这些产品处于供给不足状态,可以与其他有需求的企业进行交换。因此,工厂仓库当中储存了既不向消费者出售、对企业也没有直接用途的成品,但是这些成品可以用于交换,获取工厂所需的供给货物。简言之,计划者也加入到这个复杂的游戏当中,与国有企业管理者抗衡。计划者试图粗 89 略计算松散的资源,通过制定严格的计划强迫管理者使用这些资源。而管理者的应对方式,则是为了普遍存在的易货贸易,囤积供给和其他产吅,而这种方式加剧了供给不足问题,使得大批货物囤积在仓库。



16 Komai ( 1992, 228一261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回顾了囤货的影响。这是他为有关问题所撰写的经典著作当中的浓缩部分。

对于熟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人来说,这一复杂的易货贸易对生产无济于事,并且非常不必要。一个更为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允许「计划外」稀有货物供给市场的存在,货物的价格由稀缺程度来决定。工厂可以出售和购买供给货物,将其分配到使用率更为高效的地方。工厂可以将囤积的货物转化为现金,那工厂就有动力清库存。以此便能解决整个经济当中供给短缺的问题,并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

由于一些现实原因,这一明显的解决方案被排除在外了。第一就是企业管理人员不能与那些不在生产或是供应计划之列的企业进行货币交易。国有银行管理着企业的资金,仅仅允许在官方授权下进行转账业务。第二,如果企业管理人员的衡量标准仅仅为完成生产计划,且所有的企业利润都要上交给国家,那么管理人员就没有经济上的动力为了现金出售库存。出售货物所得利润都会划拨给国家,而管理者仍然需要面对稀缺货品供给不稳定问题,市场无法预计,而价格也无法确定。当然,最终的束缚还是来源于政治。允许稀缺物资出现在自由的补充市场有可能推翻整个计划经济,因为管理层改变了「计划内」供给的用途, 在计划外盈利。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这是对资本主义的让步。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他们都不愿意做出让步。毛泽东和与他同时期的党内领导人对这样的解决方案也深恶痛绝。

### 短缺经济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对该经济模式缺陷的总结最为精 90 辟,基本上解释了这种模式覆灭的原因。他恰如其分地将这种经济模式形容为「资源约束」,而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为「需求约束」。[[211]](#footnote-211)从公司角度出发,需求约东经济中的生产只有到消费者不再购买产品时才会终止。如果没有顾客,生产却继续,就会增加成本、降低利润,有可能威胁公司的生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都不用考虑这些因素。国家计划

会确保需求的存在;企业不仅仅会收到生产配额,还会收到一个购买他们公司全年产品的消费者名单。社会主义经济属「资源约束」型,因为生产不会终止,直到计划完成,或者直到企业耗尽供给货物。这类资源约束型经济使囤货现象变得普遍,这点我们刚刚提到过,这也是所有采用这种经济模式的国家所面临的工业管理问题。[[212]](#footnote-212)这种可悲的结果是因为资本利用效率低下。这种经济模式为了快速发展,将大量投资导向重工业经济体系,这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会导致占优势地位的重工业产业资源极度浪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会高效产出大量「社会意义上浪费」的产品,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通常生产出来大量粗制滥造的重工业货物,而且效率极为低下。

出现亏损的企业也会受到补贴。在这种体制之下,从未听说国有企业会倒闭,理由有如下几点。即使企业在账面上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公司仍然为当地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此外,公司会将在职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算入生产成本。体量较大、成立时间较长的企业承担了支付养老金的重任,导致公司生产利润下降,但是它们仍然为国家的福利体系提供了资金。再者,社会主义下的公司会为员工建造和维护公共住房、提供服务,而其他地方提供不了类似的福利。最后一点,由于公司处在生产和供应相互交织的体系当中,需要为其他企业提供产品,满足其他企业的供应计划。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关闭一家社会主义企业给政府造成的大量损失,有可能远远超过补贴这家企业、让其继续生产的损失。关闭一家企业会导致工人失业,侵蚀提供和维护公共住房及相关服务的基础,将养老金支出负担转嫁到政府身上,强迫计划者为被关闭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91 寻找替代品。毫无疑问,企业越大,那么它作为雇主和供货商,地位就会越重要,仅仅因为账面亏损关闭企业所带来的代价也会越大。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非常依赖企业,正如企业也非常依赖政府。 [[213]](#footnote-213)

由于投资侧重于重工业,以及企业受到软性预算限制,整个苏联集团的工业在利用物资效率方面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即便是在1965年后的体系成熟期,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的工业所享受到的投资比重远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工业投资在全国投资当中所占比例平均达到40% ;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仅占25 %。[[214]](#footnote-214)这些数据和之前的讨论表明,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向工业倾注大量资源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高效利用资源。一项研究发现,在1960到1988年期间,处于成熟期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改善工厂效率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仅为 27% ,而资本主义经济当中,贡献率则达到65 %。[[215]](#footnote-215)而这正是毛泽东 1950年代急于在中国国内推广的体系。在之后的数年当中,毛泽东需要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要义的基础之上,解决这一体系固有的缺陷问题。而这些核心要义是他从1930年代苏联的教义中所汲取的。后来证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问题基本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 企业福利供给

社会主义经济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企业特有的商业周期而造成部分人失业,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管理层没有动力为了降低成本而削减劳动力。企业要支付的工资为年度预算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当中,不会用利润率来衡量企业,所以每年要支付的工资也都是定额。但是社会主义企业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职能不仅仅局限于提供就业。在苏联集团当中,企业单位成为发放全套国家保险、福利、公共住房和其 92 他服务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也是如此。1950年代末,中国版的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城市「单位体制」,而这一体制不断发展,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时代。对于居住在城市当中的中国人而言,规模较大、待遇较好的单位成为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强大中心。 [[216]](#footnote-216)

中国单位体制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就业终身制:除非是因为刑事犯罪和政治上犯错需要服刑,否则职工不会被解雇。相应地,职工也不能在其他地方取得就业机会。在完成学业之后,劳动局(或者是其他管理大学毕业生的人力机构)会给城市居民分配工作。除了那些可以在体制内升迁的管理人员和党员干部,所有职工在职业生涯当中会一直留在同一单位。无论他们是一直留在单位还是在党政系统上得到提拔,都由行政决策支配工作分配。 [[217]](#footnote-217)

除了提供终生稳定就业,单位还会发放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事实上,这些资金就来源于单位。[[218]](#footnote-218)员工可以拿到基本工资,这一部分的成本涵盖在单位预算内,列入到企业生产成本或者是国家机构支出预算内。单位中,养老金是现金支付,退休员工要在每个月月底前往出纳室排队领取养老金。如果单位规模较大,或者有资源,还会为员工直接提供医疗诊所和住院服务。大型国有企业通常会提供医院,为员工的学前儿童提供托一儿所、幼一儿园,有些单位还会设立小学。

单位还是福利房的主要提供机构。在毛泽东时代晚期,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单位建设、维护和分配的公寓当中,而且公寓往往就在单位大院里。[[219]](#footnote-219)当时并不存在房屋利伯维尔场,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通过市政府。所以许多大型的重要单位,例如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相关机构,就会形成综合性小区,员工都居住在

93 单位大院当中生活,在单位大院里养育家庭,退休之后也继续住在大院

由于1950年代私营企业都被关闭,单位相应承担起之前由市场所提供的服务。单位会为员工及其家属设立食堂和伙房,提供公寓中往往并不配备的淋浴设备和澡堂,这些都曾被视为奢侈品。单位还会设立小卖部和杂货店、理发店、美发廊,建造礼堂用于举办演唱会、上演话剧和播放电影,为运动队建造体育馆或者是操场,如果单位没有足够的资源建造,那就会组织队伍参加市级联赛。有些单位甚至还会为不居住在单位大院当中的职工提供班车接送,还有一些会为员工和家属定期组织和提供假期旅游。[[220]](#footnote-220)

在大型国企工作的职工还有可能定期通过企业间易货交易获得福利。有时候采购部门会购买大批较为稀有的消费品,例如收音机、手表、名牌自行车,后来还包括黑白电视机。这些消费品会优先发放给一些员工及其家属。一些单位还会与集体农场建立稳定关系,用产品交换稀缺粮食。许多单位在重要的节假日还会努力为员工提供烟熏火腿、鸡肉、瓜果等稀有食物,调动员工积极性。

对于城市单位自给自足发展到何种程度, 1980年代中期对中国第三大城市开展的调查当中有所记录。8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在单位里享受到食堂、医疗诊所服务、澡堂;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单位提供婴 一儿日托中心和图书馆;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礼堂、电影院,还可以享受到单位组织的假日旅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运动队;四分之一表示拥有理发店和单位内部运动设施;五分之一表示单位提供班车接送。27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提供同等福利;它们手头上的资源各异,导致所能够提供的生活质量也就有所不同。大型国企和高级别政府机构比其他单位享有更多特权。在市场经济当中,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异会决定不同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和水平。在中国,工资非常低,且差距并不大,因此不平等来源于单位提供生活用品和服务的能 94 力,基本上所有这些用品和服务都是免费提供,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收费。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开展的调查表明,不同规模和级别的企业之间给职工提供的服务和福利存在巨大差异

单位还决定了个人身份。标准的个人身份识别是通过单位人事部门发放的工作证来实现的。每位职工还会有个人档案,记录了家庭背景、阶级成分、教育背景和政治表现。档案集工作记录和治安文件于一身, 保存在单位当中。如果档案不转,就不能换新工作。29如果想要到另外一座城市旅游,必须出示单位许可。如果是公务出行,单位会帮忙购买火车票或者汽车票,少许情况下还会购买飞机票。如果是出于个人目的旅游,只需要单位出具一份个人出行旅游许可函。正式登记结婚需要单位同意;离婚也要取得单位同意。3

#### 消费紧缩

货币和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意味着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可避免的消费品短缺现象。消费紧缩是苏联增长模式的核心:为了将投资转向重工业生产性领域,对于消费品的投资和所有非生产性投资全都被忽视。有三种方式可以解决普遍存在的消费品短缺问题。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价格调配,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方式。稀缺物品的价格攀升到只有少部分人群才支付得起。在社会主义体



1. Walder ( 1992, 532)·
2. 同上。
3. Lee ( 1991 , 329一342) and Walder ( 1986, 91一93)介绍了文件系统。
4. Whyte and Parish ( 1984, 25一26) ·

系当中,生产并不是为了创造市场需求,因而物资短缺就会一直存在, 稀缺物品就会永远只提供给那些可以出高价购买的人群。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排队分配:价格保持不变,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判断,寻找仍有库存的物资。消费者站在队伍当中排队购买,希望在轮到他们之前,供给都不会中断。在这种方式当中,消费者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零售 95 站点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第三种方式就是通过行政分配:价格固定, 给个人或者家庭发放票证,允许他们购买限额内物品。对于一些较为重要的物品,例如公寓或者是汽车,个人或者是家庭会被添加到一份购买顺序单当中,轮到他们时就会通知他们。相比较于第二种方式,行政手段更省时间和精力,理论上而言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多、更平等的机会购买稀缺物品,但是地位较高的人群仍然会有特权。

在战时的苏联和战后的苏联集团,行政分配比较普遍。拥有市场经济的美国和英国为了动员民众全力应对轴心国,也曾选择性采用行政分配手段;英国所采取的分配制度比美国更为全面,在战争结束之后也持续了几年。随着苏联集团各成员在战后逐渐恢复经济,食品和基本的消费品供应情况有所改善,行政分配也逐渐被弃用,通过排队进行分配变得更为普遍(但是房屋和私人汽车还是通过行政分配)。审慎消费、在零售站点排长队变为常态,成为苏联集团国家当中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 [[221]](#footnote-221)

中国的人口更多、更穷,因此需要谨慎处理食物供应问题。中国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相较于更为富庶的苏联集团国家,中国的消费品供应更为短缺,也更为基础(没有摩托车、电视和汽车)。1953年和 1954年大城市曾经出现过为了基本食品排长队的情况,在这之后,大城市因为聚集了大量不满的消费者,而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显著挑战。中国在1955年迅速推广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行政分配体系,涵盖大批食品,包括主食和主要的消费品(还有房屋)。[[222]](#footnote-222)这一体系一直沿用了整个毛时期分配体系最底端是满足基本需求:食物和衣服。主食(大米或者是米粉)、肉类、食用氵由、布料都是需要供应票证才能购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体系,票证是通过各省发放,只能够在发放省份进行兑现。票证根据居住地点发放:如果一个家庭居住在单位分的房子当中,他们就会 96 收到由单位发放的票证;如果他们住在单位外,就需要通过居委会拿到票证。这些票证的重要性可以从它们的样式中体现:彩色印刷,设计与普通国家货币一样精美。

价值含量颇高的耐用消费品同样是通过分配,但是并不是定期供应。如果在资源较为丰富的单位当中工作,那么就可以优先分配到这些物品,同理,级别更高的人也可以优先分配到。通常,单位和居委会制定「产品票证」购买顺序单,允许个人在国营的零售站点购买特定物品价值含量最高的票证就是三大名牌(凤凰、永久、飞鸽)自行车购买票证,这些自行车分别在上海和天津生产。自行车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主要城市的主干道在高峰期会出现车山车海,统一向前缓慢行进。尽管一些自行车质量较差,但是也非常普遍。这类自行车轮胎经常会漏气,自行车辐条经常断裂,自行车车架不经意间就散架,零件也很快就会生锈。名牌自行车会使用高质量钢材和橡胶,耐久、可靠安全。

其他价值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分配。脚动缝纫机当时属必需品。这种缝纫机仿制1950年代苏联的缝纫机,而苏联的缝纫机又是仿造1920年代美国胜家缝纫机的款式。人们需要缝纫机才能够高效利用分配来的布料:成衣对于票证的利用更加低效一些。最具价值的物品就是房子了。1950年代中国城区当中的住房极度受限。随着人口增长,一户人家需要挤在更为狭小的空间当中。刚登记结婚的年轻夫妇需要在单位或者城市居委会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分到房;只有在正式登记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递交申请、被添加到等待名单当中。分居和离婚并不能构成递交住房申请的充分理由(显然,离婚率非常低; 1980年代随着房屋供给有所增加,离婚率也随之升高)。家庭不断扩大,通常住在一个大开间当中,所以要向上提交申请,希望住更大的房子。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有个人厨房,也没有设备齐全的私人浴室。

脱

公寓当中有自来水,或者说有水槽,但是厨房设备和浴室都在走廊里

(或者在室外庭院中,亦或是在街道边) ,与邻居共享。在单位和居委 97 会,民众运用自己手头的所有方法去影响政府,提高自己在名单上的排位,说服当局自己有急需。邻居或者是同厂工人如果分配到新房子,通常会在那些没分到房子的人当中引起抱怨。在毛泽东时代晚期,这样一种做法塑造了一种城市文化,就是越来越沉迷于让政策制定者帮助自己在分配物资上获得优待,与他人建立利益交换的关系网络,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富足。 [[223]](#footnote-223)

### 经济问题的政治影响

这一套经济制度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极力并快速推动实施的。了解该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固有的缺陷很重要,因为应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政治意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和苏联产生分歧,最终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1960到1970年代中国严重的政治冲突,都是因为在解决上述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所导致。

这一经济制度实施后,制度设计的缺陷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这些缺陷,在苏联早就有所体现,东欧的卫星国当时正在与之抗争。在苏联集团内部, 1950年代正是积极讨论如何提升制度设计的年代。[[224]](#footnote-224)他们曾经动员资本投向处于发展初期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现在,很多人认为应当仔细审视明显的制度缺陷。如果工业体系继续浪费投资和资源,那么基本上就不可能改善生活水平。必须摆脱时下无望的官僚主义经济组织模式,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三个解决方案,每一个均有不同的政治影响。第一种方案,是将现代科学管理技术应用于计划经济,这一方案在苏联越来越受青睐。[[225]](#footnote-225)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应用现代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 可以完善投入产出规划。这一解决方案严重依赖精英官僚部门里训练有 98 素的科学人才,尽管不会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和对经济的控制,但却意味着党的官员不得不向技术专家让渡相当大的权威。这一方案也意味着那些具有宏伟和不切实际野心的政治家需要面对专家的意见,而这些建议往往会给那些由政治驱动的计划设限。这是一个根据科学原则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愿景,由大型官僚制度当中的精英专家执行计划。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辅助计划经济。1950年代的南斯拉夫和1960年代的匈牙利是这一做法的先驱,当时苏联集团内部对这一方案也正进行着广泛的讨论。[[226]](#footnote-226)这一解决方案需要彻底终结投入产出计划的制定,给予企业管理者更大的自主权,并由企业管理者对生产和销售负责。在这一方案下,企业会对自身的盈亏负责,商品的流通基于市场价格,价格则会反映商品的稀缺性。国家将维持对所有权的垄断,但企业的效益将以利润为标准而不再仅仅为了满足配额。理论上说,随着企业管理者对价格和成本越来越敏感,他们会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供给。同时,赚取更多利润的企业将会支付更高的工资和奖金,提供更好的住房和服务。这一解决方案依靠利润激励和市场机制来辅助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经济学家是率先提出并支持这一方案的群体之一而孙冶方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他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这些想法。 [[227]](#footnote-227)

第三种解决方案则是毛泽东比较推崇的方案。这一方案本质上是政治原教旨主义的一种形式,将战时经济的原则理想化。毛泽东非常喜爱内战最后一年东三省的那种政治动员模式,当时党委书记为了满足「政治需求」,鼓励企业和员工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承诺,为大众的

脱

利益作出个人牺牲。毛泽东认为,只有政治动员能够释放大批工人的创造力,并挖掘出传统方式无法挖掘出来的闲置资源一一一在传统的苏联官僚主义模式下,囤积和低效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解决方案使得党委书记掌握企业,大幅降低了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专家所具有的权威。这 99 一方案拒绝被繁文缛节所东缚,包括那些维系组织的官僚规则和条例等。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被巨大官僚机器所掌控的根本现实, 而仅仅是将经济的掌控权交到了政治领袖手中。

1960年代,毛泽东在选择自己认可的方案的同时,也对前两种方案进行了强烈的政治批判。[[228]](#footnote-228)科学管理的解决方案赋予官僚主义当中的专家以权力,在毛看来,这些专家肯定会在计划和个人偏好当中体现「资本主义」观点。毛泽东决不允许他的革命党授予官僚专家以权力,他也不希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通过稳定的官僚事业逐步提升社会地位以获得权力。这一方案将无可避免地导致阶级分层的资本主义复辟。奇怪的是,毛泽东将庞大官僚机构下的科学管理视为资本主义,让它看起来是站在市场竞争经济的对立面。通过拒绝这一模式并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毛泽东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方案的否定。

在毛泽东心中,依靠市场机制来改善激励机制和成本效益是一个更为糟糕的选择。对他来说,这完全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化方案对于解决社会主义问题毫无裨益。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一制度不再像光辉岁月时有效,一定是因为党的干部没有扮演好动员的角色来使这个制度有效地运转起来。党的作用就是动员企业和员工取得更大的成就,提高效率,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奉献。党的领导和强调努力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补救社会主义制度的低效和矛盾。不认可这一点,就必然会导致占统治地位的官僚精英阶级变得狭隘,也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苏。这就是毛泽东在1958至 1960年大跃进期间试图呈现的愿景。在大跃进这场略带耻辱的运动失败之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确保在毛泽东离开政治舞台后, 中国不会诉诸官僚体系或用市场解决问题。

# Blank Page

第6早 100

## 共产党制度的发展

自1920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成为一个革命性组织,占据偏远而孤立的农村根据地,在日占区界线后方组织村庄,在日方或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中开展地下活动,转移力量参与内战。1950年代,共产党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对城市和农村进行了改造。然而,随着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其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革。1949年前,共产党是一个为了开展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成立的组织。为了管理中国,共产党迅速扩张,招募具备新技能的各种新党员,同时对城市和农村进行管理。11950年代,共产党忠实地采用了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使得庞大而复杂的官僚系统不断扩大成为意料之中的必ㄠ士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共产党有120万成员,军队有91万人。21940年代末在东北的动员运动大大助长了共产党和军队的规模扩张。在中共军队夺取大陆期间,有大批新成员涌入取得胜利优势的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总共有450万名共产党党员,他们构成了统治5 · 41亿人口的新政权的核心。3共产党即将展开一场深刻而让人始料未及的转型。



1. Vogel ( 1967 )为最早分析这些影响的学者之一 
2. Lee ( 1991 , 16), ⅤanSlyke ( 1986, 621 )·
3. Lee ( 1991 , 16)·

|脱

### 从政治运动到执政党

在共产党胜利前入党和胜利后入党所蕴含的意味不同。中共将胜利 101 前入党的党员称作「革命干部」一一一这是对其在冒险和牺牲的年代里所做贡献的一种官方地位的认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党员占据了新政权的高级领导岗位,他们的家庭也取得了特权地位。他们的子孙同样继承了这种优待地位,在入党、入学和工作分配上也会享受到特殊待遇。那些在胜利前便参加红军的士兵也享有相似地位一一「革命战士」,他们的子孙也会得到类似优待。

革命干部的身份认可了一个事实,即内战胜利前入党,代表了对事业的忠诚,这一事业需要面对巨大风险和困难,甚至有可能牺牲生命或者残疾。内战胜利后入党的人就不一样了。随着时间流逝,共产党巩固了其对经济和教育系统的控制,入党成为了对现有政权表达忠诚的行为,可能会在地位和工作晋升方面得到好处。当然,人们仍然期望党员牺牲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艰难的任务,在严格的党纪下将个人信仰放在一边。无论个人动机如何,入党带来的风险和牺牲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够与早些年代相提并论,反倒是潜在的利益巨大。51950年代,共产党逐渐规模壮大,大学、公司和工厂里都有招募党员。他们有着不同于革命一代的技能和生活经历。截至1965年,共产党党员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1949年后入党的人数远远超过革命干部的人数,比例超过3 : 1。



1. 详见Kraus ( 1981 )。第三个种类适用于「革命烈士」的后代,「革命烈士」指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人。Barnett ( 1966 )与Vogel ( 1967 )还在革命后代当中做了身份区分。
2. Oksenberg ( 1968, 92 )评价就并不那么客气:「共产党代表了上升的康庄大道,吸引了大量机会主义者。」
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2000 ) ,第12卷, 页1227。

党 丨

### 共产党的影响范围

党组织是新中国的核心,随着苏联体系逐渐铺开,共产党对工作分配、物资产品分配、学校招生和政商领导岗位的任命进行控制。其影响范围上至所有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下至农村、工厂车间和办公室。从本质上来说,共产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委员会链条,从北京最高领导组织到基层都复制了和似架构的委员会,共产党拥有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对每一层的政府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控制。最高级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由20名正式委员和6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229]](#footnote-229)名最有影 102 响力的委员组成政治局常委,定期举行会议。毛泽东作为党主席,处于这个结构的最顶端。政治局是规模更大、基本上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央委员会所设的下属机构, 1956年中央委员会包括约197名正式及候补委员。他们不定期举行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较小。7

北京的中共中央下辖29个负责各省事务的省委。省委书记是各省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主持省委工作,与人数更少的省委常委定期举行会议。这种结构在政府中层层复制,直到基层。省委下面是市委和地区党委;再往下是县委及区委;再往下是农村公社、大学、工厂以及其他重要组织的党委组织。

这种共产党委员会的全国性网络对各级行政决策起到控制作用。例如,省长本身就是党员和省委常委一一一如果党委书记与省长并非一人。市长、县长、厂长和大学校长也是这种情况。如果各级行政长官不是党委书记,那他们往往会是常委,并兼任党委副书记一职。通过这样的方式,共产党的全国组织在各层面相互平行,同时又与各级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相互交织。

等级结构的底层是党支部。一般党员都是通过党支部融入党组织。每个党支部平均对同一办公室、工作间、学术部或集体合作社中的15 名成员进行监督。党员参加闭门会议,需要遵循党的纪律,由党支部书记来行使有关监督权力。反过来,支部书记从属总支部,特定的支部书

|脱

记又是总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总支部书记从属党委书记,通常也是党委委员。

103 这就是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所拥有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首先,这是一个直接从属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单一等级制度,需要忠实地实行上级下达的指令。没有党委书记的同意和党组织的支持,各级均不得自行作出重要决定。其次,这个等级结构异常庞大。

1955年,共产党已经有940万党员,到1965年,人数已经翻了一番,到 1 , 870万。81965年,全国共有[[230]](#footnote-230)万多党委, 4 ·2万个总支部和120万个基层党支部。[[231]](#footnote-231)第三,数百万个共产党职位虚位以待:每个党委都有一名党委书记和几名副书记,另外还有行政人员;每个总支部和党支部都有一名书记和副书记。因此,党组织决定了几十万共产党干部的工作机会,理论上,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将步步晋升,在这个等级结构内一直晋升到位于北京的中央权力组织顶峰,没有其他方法能到达顶点。

尽管规模庞大,党组织在各个地区和组织中并非均匀分布。党员相关统计总数很容易让人误解:一直以来,工农身份党员超过党员总数的 80% ,大多数党员都是农民。10总数掩盖了党员集中在特定机构和岗位上的事实。共产党将其影响力集中在决策、资本投资、资源分配和发挥权力之处。也就是说,城市的党员比例大于农村;大型重要组织的党员比例高于小型的非重点组织;而最高决策者中的党员比例也大于普通职员和工人的党员比例。

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进行的多项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关注重要机构和岗位具有悠久传统。11

1990年代,城镇地区有17%的成年人是党员,农村的该项比例只有5 · 8%。在城市,机构的重要性不同,其党员比例也各有不同。国有企业员工中,党员比例几乎是小型集体企业的两倍( 19%比9% ) ,政府

党 丨

当中党员比例是学校、医院和研究组织的两倍( 64%比33 % )。在城市和 104 农村,职级越高,党员比例就越大。在农村,只有4 · 6%的成年农民是党员;村庄(或生产公社)里担任党组织各级职务的人当中,有22%为党员;在村内(或生产公社)担任高级别职务的人当中,有78 %为党员。

在城市,党员比例也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级别越高,党员越多:有 8%的体力劳动者是党员, 15 %的白领工人是党员,中层干部中有49% 是党员,而85 %的高级干部都是党员。 [[232]](#footnote-232)

这些数字说明了共产党在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具有战略性,有选择性地投入。统治共产党的人都是杰出的精英。由于党组织的目的是控制政府和经济,因此党组织会集中在行使权力、分配资源、对人员和资源施加权力的地方。对应地,服从上级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渗透程度也因不同社会场景下共产党的覆盖率不同而产生差异集体农场的农民受到共产党日常命令的影响最少;蓝领工人受到的影响可能大一点。在权力和资源集中的环境当中,政治纪律强度和政治干预随之上升。 [[233]](#footnote-233)

### 政治监督

共产党不断壮大的网络呈现出政治权力公开、外显的一面。同时它也在隐蔽的政治监督网络下壮大一一一这是公安部负责的一个全新国家安全网络。这个机构的目的并不是维护公共秩序,而是巩固新政体的控制力量,从而保护共产党的权力。秩序维护的公众面孔一一一包括户籍登记、街道组织、学校及工作档案,还有工作单位 似乎使得这个隐蔽网络的国家安全机构作用并不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安机关是政治权力的公众面孔得以一直存在的幕后基础,和苏联克格勃以及东德斯塔西的运营方式相似。

105 从1949年开始,公安部模仿苏联克格勃,建立起一套层级机构覆盖区域和地方。由秘密官员和情报人员组成的该网络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城市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这个网络对国外机构建立起反情报业务,监视有反动倾向的人员,保护用于经济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免受蓄意破坏。14要开展这些任务,公安部及其区域机构将秘密的办案官员(带薪专业职工)和情报人员(非职员市民)安插在政府办公室、大学、工厂和其他机构中。1950年代,公安部曾下达命令,要求大学人事部门中要有约三分一为国家安全秘密官员,他们要在学校中建立情报人员网络,撰写卷宗一一这些卷宗独立于人事部门留存的个人档案一一从而对教职工和学生的政治倾向进行监视。151950年代中期,国家铁路系统的安全官员手上有超过10,000人的情报人员网络。 16

公安部招募和培养三类情报人员。第一种,「密工」(secretinvestigation agents) ,负责监视潜在的社会反动窝点。这类情报人员的汇报内容包括他们在监视学校、工厂、宾馆、饭店、电影院,特别是监视与外国相关的组织过程中观察到的信息。第二种是「商干」(caseagents) ,雇用这类人员并不是为采集一般情报和监视,而是渗透到目标人群和组织内,作为持续调查的一部分一一一尤其是教堂和其他与国外有联系的组织。第三种则是「挂靠」(criticalassetguardians) ,安置在战略基地、工厂及其周围一-一-比如铁路网、重点制造工厂、邮政及通讯系统、与军事武器计划相关的基地。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办案情报人员,防范蓄意破坏,避免敏感信息泄露。

情报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政治积极分子和党员在需要的时候会配合工作,但由于他们公开的政治倾向,可能不会被所调查的目标人群所信任。「坏分子」则是另一个极端,招募他们的目的正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进



1. Schoenhals (2013 , 17-26, 3076) · Schoenhals的研究基于内部文件、训练手册和专业期刊。
2. 同上,页63-64 
3. 同上,页5
4. 同上,页58一82。

|  |  |
| --- | --- |
| 入其他可疑组织。他们如果进行配合就可能会被豁免入狱,但前提条件是他们需要吿发同伙。1950年代肃反运动中被调查者由于协助提供了其他人的信息,而时常得到庇护。18第三类人既不是忠实的革命积极分子也不是政治嫌犯,而是那些被劝说上报他们在办公室、教堂、国外贸易组织和银行所见所闻的人。19招募的手段包括敲诈,强调爱国主义情怀和政治忠诚,更甚者是含蓄地暗示奖罚并重。20只要这个监视网络保持隐秘,它就能一直发挥作用。公安部详细制订了情报人员和官员之间的机密通讯流程,他们在固定的安全屋或临时地点会面,通过加密的通讯方式和特殊电话交流。21这个监视网络主要基于人工情报、口头通讯和手写纸质文档。毛泽东时代开始后不久,中国的国家安全情报人员发展出了渗透力更强、技术更复杂细致的各种监视方式。  发展党员  在一个由党组织挑选国家等级制度中领导人选的社会里,党员身份就成为了个人晋升和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如果说城市中只有17% 的成人是党员,农村更少,只有6%的人为党员,那么很明显,入党这件事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在共产党胜利后入党的党员往往是通过长时间表达政治积极性、忠诚于党的政策和单位领导之后,才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在学校或者单位加入共青团,很有可能在这些组织中升任领导职务。工作中,他们通常早到迟退,讨论党政策的时候第一个发言,第一个明确表示支持。如果党组织命令他们汇报同事的所说所为,他们会照做。如果组织要求他们公开谴责一个声称犯了政治错误的人,他们也会这么做。形成了积极和忠诚的政治记录后,他们就会自荐成为党支部 | 106 |
| 成员候选人一一一或者被邀申请。核查过家庭记录和其他个人档案材料 | 107 |



1. 同上,页93。
2. Schoenhals研究中提到了三种类型的人,参见Schoenhals ( 2013 , 85-109 )。
3. Schoenhals研究中提到了招募策略,参见Schoenhals ( 2013 , 138一169 )。 21 同上,页170一204。

后,顺利通过核查的申请人就会成为预备党员,然后接受指定联系人辅导监督,由这位联系人负责「发展」他/她。以预备党员身份接受一段时间的密切观察后,就能成为正式党员了。 [[234]](#footnote-234)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入党。1949年后的成分历史背景调查数据显示, 22和[[235]](#footnote-235)岁入党的人数最多,在23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入党人数快速下降。23如果一个人35岁前都还没有入党,那这个人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入党。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成为党员是得到晋升、离开行业领域或工作车间的主要方式。一旦毕业、进入工作单位,党员身份就成为了一个人是否能获得工作晋升机会的唯一重要影响因素。一个人的职业由他参与党领导活动的积极程度所塑造,而职业生涯早期作出的决定会影响其塑造程度。[[236]](#footnote-236)

在这个时期入党的人有着怎样的特征呢?成分历史背景调查分析中浮现出一个清晰的视图,让我们有机会在保持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 估计某种特性对入党几率影响几何。[[237]](#footnote-237)首先,在其他条件保持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入党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这可能是由于在男性所主导的党组织中向来歧视女性,也有可能是因为文化因素,或者因为女性要承担比例极为不相称的家庭重任,使得她们在工作单位更少参与到能够形成积极政治记录的活动中,从而导致女性申请入党比例降低。第二个是父母原因:如果父亲已经是党员,那么其子女成为党员的几率是那些父亲为非党员的两倍。这可能是由于父母对子女施加更多压力,使其在政治活动中更加积极,因而申请入党;也有可能是党支部更加倾向招募党员子女。第三,职位高低对是否申请入党有着很大的影响。基层领导人入党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多一一一表明他们首先证明了自己的基层 川8 领导能力,而共产党也希望确保这些领导人接受党纪规范。

在这些估算中,有趣的是,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多种特性,其申请入党的可能性是以乘积增长,而非以相加之和增长。例如,一位男性如果他的父亲是党员,他本身同时也是基层领导,那么他申请入党的可能性是父亲非党员、自身非领导的女性的12倍( 2 × 2 × 3 )。而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入党的可能性反而远远低于其他人一-一专业人员入党的几率仅为非专业人员的16%。这表明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存在怀疑, 1957年后这一点愈发明显;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党纪之下。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一一但是并非特别重要。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其入党的可能性是高中未毕业人员的70% ,但相对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入党几率并没有提高 [[238]](#footnote-238)

### 阶级划分和家庭出身

1920年代末,共产党采取了苏联对人口进行阶级划分的做法。在苏联,阶级划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但事实上,政治身份已经成为了整个家庭的特征,代代传承,且受到官僚政治规则的影响而得以加强。1920年代,苏共将苏联人口进行划分,将「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阶级敌人」区分开来。划分完成后,被纳入无产阶级的人们享受特权和机会,而属剥削阶级的人们则面临各种歧视和机会限制。[[239]](#footnote-239)官僚政治的阶级身份起到了以下几点作用:社会公正、社会建构和政权巩固。无产阶级能优先入党、晋升,也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因为在旧社会,正是这些人群受到了压迫。剥削阶级家庭中的个人,从前能在各种有利的环境中享受巨大的优势,而如今只能面对各种形式的歧视。 109 通过为那些从革命中受益的家庭提供特殊照顾,新精英阶层藉接受高等教育而得以形成,取代在革命中失去地位和权力的旧精英。这些新精英比从前的剥削者家庭更加忠诚,而剥削阶级则被视为对无产阶级政权抱有敌意。他们被冠以阶级敌人之名,时常被辱为「人民公敌」。 [[240]](#footnote-240)

1920年代末,阶级划分在苏联被深度强化。它们成为了1928至 1931年间在苏联爆发的「文化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些有「小资产阶级」背景的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和旧知识分子,成为了共产党积极分子的打击目标,被称作异类阶级文化的反动代表,他们被降职,更有甚者被开除或被驱逐出城。这场运动体现了斯大林的新主张, 即便没收旧剥削阶级的资产,消灭了物质基础上的阶级差异,阶级斗争还是会加剧。他断言,阶级敌人会密谋阻止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 [[241]](#footnote-241)苏共在1930年代初逐渐弃用阶级歧视, 1937年斯大林颁布的新宪法正式结束了阶级歧视。然而,这个举措并未能阻止那些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在1937至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划分为阶级敌人。 [[242]](#footnote-242)

苏联放弃了划分阶级做法很久之后,中国开始追随,并对国内人口进行阶级划分。和苏联一样,阶级划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解放」该地区时男性户主的身份来界定的,属「档案身份」。[[243]](#footnote-243)土改期间,干部们根据工作组下乡调查得来的土地所有情况和个人政治记录,对农村人口分配阶级。阶级附着在家庭上,按照经济状态和男性户主的政治情况进行划分。在城市中,阶级划分以永久档案中的个人书面自述为基础。每个人被要求完整叙述他们的全部工作经历,描述自己所在岗位和父母的职 110 业。同时也要求详细汇报自己和父母的政治记录。对每个人进行全面、仔细的背景调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编纂档案和划分阶级的干部经常向对象的同事和其他家庭成员求证,确保自述的一致性和真实性。对于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或正准备申请入党的个人,背景调查最为彻底。

和苏联一样,将家庭划分成「忠诚」(无产阶级)和「敌对」(剥削阶级)的努力却遭遇到很多界定模糊和自相矛盾的困扰。所谓的模糊不清有两种形式。首先,很多人一生中从事过很多不同职业。有人可能从贫困家庭出身,自己创业,之后累积了一定的财富;也有人可能出身富裕,但在事业中经历破产或失业。日本入侵和内战期间,这种混乱情况非常普遍,使得家庭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员的上下流动可能会使得阶级划分成为随意的主观判断。其次,对于大部分人口而言,无法明确纳入无产阶级或是剥削阶级。在农村,共产党采取苏联的划分方式,将农民分成「贫农」、「中农」和「富农」,另外多加两种分类:「贫下中农」和「地主」,这样才能涵盖农村里出现的普遍情况一-一许多家庭经营自家农场或依靠自家劳动力做小生意。对于城镇专业人员、白领、教师和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同样的情况。由于他们未参与到物质生产中, 既不像马克思主义定义的那样被剥削,也没有雇用他人或拥有可以称之为剥削者的资本。一如中农,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也被赋予了模糊的政治

阶级划分系统中也充满了矛盾。首先,「阶级」和政治立场结合在了一起。在苏联, 1920年代人口阶级划分之前加入共产党的党员,无论入党前家庭背景或者个人职业如何,都一律归入无产阶级。中国也同样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中共胜利之前入党或加入红军的人,即便来自富裕的剥削阶级家庭,也被认作革命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引了很多爱国学生,而当时高中和大学教育仅限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共产党本身就是由富裕农村家庭的孩子所建立和领导的,在漫长的运动当中,共产党也吸引了很多拥有相似背景的人。1990年代进行的成分历 1 1 1 史背景调查显示,被归入革命家庭的男性户主,其阶级地位和教育水平都惊人地高,仅次于被定义为剥削阶级的人。 [[244]](#footnote-244)

反之,情况也成立:无论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卑微,一旦加入国民党或军队,均会抹去其无产阶级出身,成为敌对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党军队有意逃避战争,而国民党军队积极对抗日军,对于这些国民党退役军人而言,这种划分方式极为恶劣。可见,根据职业划分阶级所展现的模糊性在划分政治立场上也表现了出来。有很多人普遍在内战后期放弃国民党而选择加入共产党,面对这种情况,模糊性就更加明显了。

阶级划分的另外一个矛盾点在于它们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一个生长在被归为地主或资本家家庭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家庭财产已经在他们出生前被没收,从小在贫困中长大,他们仍然会被视作地主或资本家。

父辈或祖父辈是国民党官员或国民党军队官员的孩子也是一样使先辈已经被处决或逃到台湾,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党胜利后,革命干部和士兵被分配到领导岗位,之后很可能会升任到更重要的岗位上。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孙也会被视作革命分子,哪怕他们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拥有宽敞的住宅和佣人伺候。

尽管这些标签本意是固定不变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政治调查和根据个人行为而发生变化。那些曾成功地向新政权欺瞒自己过往的人,他们的过往可能会被揭露,于是他们的政治标签就会改变。在之后的运动中,如果与当局发生冲突,那么他的家庭可能会被归入到更低的阶级中。这些标签的灵活变通,或者说是韧性一-一-其实根本上是模糊不清所带来的产物一一一意味着很多人永远都无法确定体制内的有利地位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这些官僚阶级身份可能随时因为个人行为或再调查而改变。[[245]](#footnote-245)

1 12 最大的模糊,是阶级划分与性别有所重合。家庭阶级是按照男性户主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只能在男性血统中传承。这就意味着一个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的女性可能会与革命或者无产阶级背景的男性结婚, 从而享受男方身份赋予的安全感和特权。这样的女性所生的子女可以继承由更优阶级所带来的好处。阶级划分当中的性别特点对中国城乡婚姻选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46]](#footnote-246)在马克思理论里并不能找到这种做法的源头,

但这表现了对于传统社会父权倾向的一种认可,而共产党曾公开将这种传统社会批判为「封建」。 [[247]](#footnote-247)

阶级标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大类。「红色」阶级包括革命和无产阶级家庭。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享有特权。「普通」阶级包括旧中产阶级。他们在革命中保持中立,或摇摆不定,既没有受到优待,也没有受到惩罚。「黑色」或「坏」阶级为「剥削阶级」或「反动分子」的家庭(见表

6· 1 )。

表6· 1家庭的政治划分

|  |  |  |
| --- | --- | --- |
| ( 1 )阶级划分 | ( 2 )标签 | ( 3 )城镇人口比例( % ) |
| 「红色」阶级革命阶级无产阶级  「普通」阶级  「黑色」阶级剥削阶级反动阶级 | 革命干部、革命士兵、革命烈士贫农及贫下中农、工人、城镇贫困人口  中农、白领、知识分子、教师、专业人员  资本家、地主、富农  国民党党员、官员或士兵,「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 | 4 ·4  77 · 8  14·4  3 ·4 |

来源:栏1及2 , Kraus(1981) ;栏3 , WalderandHu(2009,1405)

这些标签成为是否能够入党的重要标准,而革命家庭出身的个人也会受到特殊照顾。[[248]](#footnote-248)在毛泽东时代,如果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一致, 那么带有革命阶级标签的人入党的可能性大约是来自一般无产阶级家庭的两倍。相同条件下,非红色阶级 旧时的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和政治反动分子一-一相比于其他阶级更难以入党。来自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其入党可能性是专业人员的两倍,而来自革命家庭的人入党的几率是专业人员的四倍。

### 政治忠诚和职业晋升

正如共产党根据忠诚度筛选入党资格,党组织同样也或多或少根据政治忠诚度来决定大学是否录取、工作初次分配、是否晋升。党员身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尤其对于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来说,但其他标准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其中两个标准实际上也带有政治色彩 一个人的政治活动记录和由世袭阶级卷标赋予的家庭背景。

在中国教育体系当中,升学充满竞争,达到教育阶梯的顶层尤为困难。1965年,大约有3 ,290万-儿童进入小学,只有9%能毕业并接受初中教育。只有15 %的初中毕业生能顺利毕业进入高中。高中毕业生已经是优中选优的人群,但是也只有36%能被大学录取。对于1965年入读小学的人来说,仅有1.3%能入读高中,进入大学的人更少,只有

0.5%。371960年代中期,是否能被高中和大学录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准就是标准化的入学考试一--一高中入学考试为全市或全县统考,大学入学考试则是全国统考。然而,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精英林立的系统 114 却被深深嵌入在录取流程中的政治标准所影响了。

第一个标准便是家庭的阶级标签。如果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接近分数线,来自革命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申请者更容易被录取;而来自剥削阶级或反动分子家庭的孩子则必须考到比录取分数线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38大学录取的机制被设计成「平权运动」的一种公开政治形式,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提拔「红色」阶级。这种对无产阶级家庭的优待,向这些1949年前无法享受教育的无产阶级学生敞开了教育大门 。1930年



1. 本段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 1984 , 965一966、969 、971、1001、1023 )。
2. Rosen ( 1982, 12一66 , 11一47, 83一109)·

代后期,中国高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于富裕家庭,顶尖高校里,几乎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都非常富裕。[[249]](#footnote-249)尽管政策有其自身意图,但是在为红色阶级提供的特权当中,来自革命阶级家庭的学生受益远远多于来自无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此外,小资产阶级乃至旧剥削阶级学生的高校录取率非常高

表6.2反映了1960年代中期,阶级标签对北京两所顶尖学校录取率的影响,这两所学校分别是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在两所学校里,非红色阶级学生的录取状况远比录取政策所规定的要好。清华附中是一所顶尖的住宿学校,位于北京郊区,主要接收北京地区的考生。令人震惊的是(栏1 ) ,来自革命家庭的学生百分比远超于革命家庭学生所亻占中国城 1 1 5 镇人口的百分比(栏5 )。这显然是由于首都聚集了众多身居要职的革命干部。同样让人咋舌的是,从栏2可以看出,来自小资产阶级甚至剥削阶级的学生所占比例也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重(大于1.0即表示比例过高,小于1.0则表示比例不足)。在清华附中,来自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属少数,与其在城镇人口中的百分比远不相称。

表6·2 1960年代中期两所顶尖学校根据阶级背景划分录取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阶级标签 | ( 1 ) ( 2 ) 清华附中录(栏1 ) / 取百分比(栏5 ) | | ( 3 )  清华大学录取百分比 | ( 4 )  (栏3 ) /城镇人口百  (栏5 ) 分比 | |
| 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小资产阶级「剥削」阶级 | 1 1  24  55  1 1 | 14  7  ,  8  0 | 0  4「0  11 | 0 ,49  2 · 0  2 · 9 | 77 · 8  14·4  3 ·4 |

来源:栏1及3 , Andreas(2009,70) (如果数据有出入,取二者估算值平均数) ; 栏5 , Walder and Hu ( 2009, 1405 )

在清华大学,阶级占比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所吸引的申请考生来自于全国各地而并非仅限北京。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从栏4中看出,革命阶级学生所占比例虽然高于其在人口中的比重,但相比清华附中的占比低了不少。和比清华附中,无产阶级所占比例更高,但仍然低于其在城镇人口中的比重。很明显可以看出,小资产阶级和「黑色阶级」一,,一一一一一旧社会的精英阶级一一一,,一一一在大学中所占比例比其他阶级要高。如此精英云集、考试导向的系统在实际操作上与阶级政策的意图相对立。

旧精英持续拥有优势的理由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在父母受过教育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比较有优势:家中有更好的教育资源;父母有能力辅导孩子完成学校作业;特别是这些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更高。中国的旧精英们仍然能找到方式在这种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尽管受到政策歧视。这就成为了1960年代中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废除入学考试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标准是政治参与积极程度,理论上来说,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人都可以编写一份有力的政治记录。这些标准与入党时所要求的态度和行为一致。由于高中生和大部分的大学生年纪太小,不能申请入党, 1 16 在学校中的政治参与积极程度是通过参与共青团活动而体现出来的,尤其是通过在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各个高中和大学均有活跃的共青团组织,这些组织直接隶属于党委,包含全系列团支部和领导岗位,完全仿照了党组织本身的结构。曾在这些组织中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记录就非常有力,这些记录会被保存在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如果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与录取分数线擦边,或是学校或特定的项目考虑是否录取该学生,这些政治记录就会被摆上桌面公开讨论,甚至成为决定性要素。 41 尽管对于大学期问入党的学生来说,党员的身份已经是对党表示政治忠诚的标志,但是在学生毕业分配工作时,还会考虑类似的两个政治标准一一一阶级背景和政治参与积极程度。例如, 1965年,北京大学中



1. Andreas ( 2009, 23一32 )生动地记录了在精英大学中共产党是如何掌控政治资格和机会的分配。
2. Shirk ( 1982 ).

有7.8%的学生已经成为党员,而清华大学则为13 %。[[250]](#footnote-250)这些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程度最。结合阶级背景、大学成绩和导师意见,大学毕业生可能会被部委、研究机构、国企和研究生项目录取。已经入党的毕业生选择余地更大。

政治标准和精英标准在晋升过程中显然存在冲突。随后进行的几项研究清晰地表明这种潜在的冲突是如何被解决的。本质上而言,共产党创造了两种独立的职业道路,这两种职业生涯要求具备不同的资质。 [[251]](#footnote-251)毫无疑问,想在政府、企业或事业单位中担任重要领导角色,必须早早获得党员身份,但不一定需要大学学位。[[252]](#footnote-252)在决策岗位上,党员获得晋升的几率是非党员的8倍多,相比其他个人特性而言更具决定性。之前的教育背景所扮演的角色和上文中我们看到的获取党员身份情况相似高中毕业生获得晋升的机会提高了2 · 5倍,但大学毕业生并没有额外优势。

相比于大学录取和工作分配中强调政治标准,党员身份对于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经济分析师、政府规划人员或者大学教授而言作用并不大。1960年代中期,这些职业收入颇丰,德高望重,但党员身份对 1 17 其能否获得这类精英职业完全不起作用,反而受教育程度对他们极其重要。获得高中文凭的人成为一名精英专业人员的几率差不多能提高到9 倍,大学毕业生更是高达14倍。党员身份并无影响。专业工作以正统教育为基础,别无他选。虽然看起来共产党政权对党政企官员的教育水平并不重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很多党员多数在年轻的时候就已入党,尤其是那些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忠诚和领导能力的人。尽管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在入党前就已经获得大学文凭,但是

共产党拥有一个庞大的成人教育系统,挑选有领导潜力的年轻党员接受继续教育。根据工作单位党组织的推荐和支持,党员可以以成人身份进入普通高校。这个项目最显而易见的典型做法就是工作单位党组织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推荐某人。这些学生也被称为「调干生」。地区政府也会组织大规模业余成人教育项目,目的是提高领导素质。相比之下,党员接受这些受支持的成人高等教育几率是普通人的五倍,完成大学成人教育后,他们被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几率也是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四倍。[[253]](#footnote-253)

### 权力和特权

入党对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会有立即的影响。但无论是对某级别党委书记在内的党干部而言,还是对一个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干部 1 18 来说,入党显然可以提高未来职业晋升的可能性。中国拥有一个单一的全国干部等级系统,最高为1级,最低26级。部级和部级以上干部通常是6级以上;中层干部,一般是部门负责人以上,为15级或以上。[[254]](#footnote-254)生活水平的差异并非由收入差异导致。金钱收入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但购买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物质富裕程度。特权源自那些决定一定等级官员特权的规定,干部无需支付或只需支付一笔名义上的费用便能享受这些特权。

特权还体现在个人专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达到一定等级的官员不用骑自行车,但却能得到由工作单位提供的汽车(配备司机)。他们在国内出行比其他人更方便。对于长途旅行,高级别的干部有权乘坐舒适的软座或者软卧,避开拥挤的人群和为大众提供的不舒适硬座。高级干部能得到更大更优质的公寓,更有可能配备私人卫生间和厨房。最高级别的干部可以一家人独占一套平房,有佣人和保姆伺候,还配备随时待命的司机和座驾。在一般大众还需要等待分配的时候,高级干部有更多机会得到食物和日用品。旅游的时候,他们能住上更好的酒店和旅馆;在餐厅吃饭时,他们也能有单独的干部包间,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菜肴。

级别还会影响官员获取信息的能力。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在印发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安全级别分类,视乎官员等级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阅读文件。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阅读指定的文件和报吿。共产党发行数份内部报纸和简报,内部版本所涵盖的信息远远多于公之于众的版本。《参考数据》是新华社出版的一份限制流通的简报刊物,刊登国外新闻译文,相比较毛泽东时代对所有干部发行的同类刊物《参考消息》而言,《参考数据》含有更敏感的信息。《内部参考》由新华社发行,每日两期,刊登专为国内政治精英提供的国内新闻报吿,其中包含实施国 119 家政策时遇到的问题、自然灾害、地区抗议和其他不适宜广为发行的新闻题材。[[255]](#footnote-255)高级干部还能获取禁止公众阅读和观看的外国书籍和电影。

尽管干部的生活水平和特权严格按照等级制定,但是他们享有的特权还是相对适度,生活水平和一般人也不会有太大差别,除非他们晋升为高级干部。毛泽东时期,即便是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起市场经济时代的富人而言,还是比较逊色。与之后和比, 时基本上没有大笔消费。即便存在贪污,也不多见,数额也很小。尽管如此,在一个消费似乎持续紧缩的经济体当中,伴随级别而来的特权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干部身份能让一个人避免粮食配给和短缺带来的贫困局面,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舒适、便捷,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体验这样的生活。

### 封闭的等级制度

在一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当中,权力和特权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然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共产党官员和处在自由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务员相比,有几个明显的差异特征。第一个区别在于, 官员不能拥有任何个人财产,而且除政府岗位外,他们不能再有其他生计来源。需要明确一点,他们有储蓄账户,也有家庭财物,但没有大额财富或独立的收入方式。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只征收名义上的租金,但所有权不属他们。汽车属他们单位,费用由组织支付。即便他们在职时间很长,或是身居要职,也不能累积大量财富。他们所拥有的特权直接反映了其级别,只要他们的政治立场正确,就能一直享受这些特权。

120 第二个区别和第一个息息相关:干部除了服务党国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不能从政府岗位上辞职,做咨询工作或开展私人生意,不能移民。他们无法选择退休,也不能依靠个人存款生活。他们无法调职到其他单位或者省份重新开始生活。如果他们试着离开体制,或者远离活跃的党组织活动,会被理解成政治立场不坚定,忠诚度下降,违反党组织纪律。从这个职业道路上退出,唯一的选择基本上是被迫而且并不具备吸引力:降职或开除,伴随而来的就是与级别相连的特权也会被实时剥夺。 48

这些隐含的后果往往会在有关干部特权的讨论中被忽略。有特权, 就有代价。干部完全依赖党组织提供给他们所享受的生活和特权,他们只要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一直享受这些特权。党要求服从和忠诚,并不止于入党或是官员任命。干部肩负压力去履行政策,有些政策根本没多少意义,他们要完成任务,要辨别和惩罚工作单位中被指不忠的人。比起其他社会组织一•一一一一一可能除了职业军事官员一一一一一一一他们受到更多体制纪律的掣肘。他们不能公开反对上级所下达的极端命令,要一直



48 Oksenberg ( 1976 )分析了对达到政治体系顶点的领导者的影响,但是他之前的研究也提到了体制内所有职业都没有辞职这一选项(Oksenberg 1968 ,

66一67 )。

活在一种认知下,即一旦他们无法履行或服从党的政策,就会严重危害现有的身份地位和未来发展机会。如果被评价为表现不达标或不够忠诚坚定,就可能会造成终生影响,而在这个体制里,雇主就只有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他们接受整肃,或者是接受类似1942至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对潜在敌人实施的审查。这可能会丧失身份地位,甚至招致牢狱或劳改之灾。这些压力对于中国干部的影响远甚于其他社会群体。

### 变革中的困境

从革命党到政治官僚制度的转换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一旦决定追随苏联模式就注定无法避免。如今激励人们入党的因素、成为党员后获 121 得的职业优势、以及共产党所重视的质量和动机,较之常年革命斗争中的对应因素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和职业晋升途径,成为了通往权力和特权的道路,成为了一个大型的官僚体系,如一部政治机器般运行,存在着全世界官僚政治结构共同面临的所有问题。

195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巩固后不久,毛泽东开始担心这些发展变化,认为这些情况威胁了革命牺牲和斗争的理想信念。一个由希望得到岗位晋升和特权的人员所组成的官僚政治系统,有可能用一种压迫来代替另一种压迫。毛泽东的大部分国家领导同僚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发展趋势,反而认为这是向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形式演化的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依靠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现代的工业组织,创造一个现代而繁荣的国家。在这种模式当中,党对权力进行垄断,但是实现这个愿景,也需要依靠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社会主义未来愿景在斯大林时代成为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印记。当然,这条道路无法通向民主,更加无法通往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但相比于斯大林时代早期,这个体系现在更稳固,也更处在意料之中。打击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运动暂停了;有关持续开展阶级斗争和打击地下阴谋的宣传现在被定性为令人遗憾的历史错误;受害者从劳改营中被释放,罪名被平反。如果他们能避免出现变为异己的迹象,就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不必担心可能会因为虚构的政治罪名而被起诉。公开将伟大领袖吹捧成国家英雄和天才反映了无知和国家落后,表现了封建主义心、患,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令人懊悔,同时也导致在斯大林强人管治下出现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毁灭。

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这种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观点偏离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毛的未来蓝图与众不同,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党国演化成一个稳固的官僚主义组织,由官僚统治下属,对革命理想仅仅 122 给予华而不实的口头承诺,实则希望得到职务晋升和物质享受。毛泽东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呼唤斗争和牺牲精神,他认为正是这些精神取得了过去看似不可能的胜利一--一过去的成功并非是因为精心策划,也不是因为依靠科学技术专家,而是凭借党和社会的动员来征服自然、战胜那些试图从内部覆灭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最终决定粉碎这个机器,从头来过,依靠他那能够与斯大林比肩的天赋所带来的威望和地位,动员群众推翻党的建制,体制内成员彼此争斗。自1957年起,毛泽东花费了几年时间和几次政治事件,才得出这一论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23

|  |  |
| --- | --- |
| 早解冻和反弹  1956年前夕,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系列改造。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又紧接着着手建立集体农场。私营工商业消失,生产性资料都收归了国有,为跟随苏联路线的官僚经济打下了基础。共产党的权力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深入各类工厂、办公室和农村。地位不再取决于财产的多寡,财富在代际之间不再传递。作为替代,人民可以根据在官僚体制当中的地位,享用全民公有的财产和服务,而在官僚体制内的地位又取决于党。教育机构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都被重新改造,人们纷纷与西方的影响划清界限,学习「先进」的苏联教条。过去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联系也被切断。尽管中国并不直接听命于苏联的支配,但是还是被划入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势力范围当中。  这是清朝灭亡之后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国家,基本上涵盖了清帝国之前所有的领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现代国家,吃着皇粮的官僚体系一直从北京延伸到城镇小区。在1956年这个节点上,中国领导人可以满意地回顾过去,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加强了自己对于中国的统治;共产党军队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打成了平手;中国还以惊人的速度大步向前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 | 124 |

联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农业化的时候发生了暴力和饥荒事件,但是中国并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顺利地推广了农业集体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胁迫和恐吓助推了这些变革。1950年代早期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导致一百多万人被处决,上百万人被关入监狱。「三反五反」运动强制剥夺了原属城镇商家和企业主的资产。思想改造运动强迫那些接受过教育的民众公开放弃自己原有的看法,让他们承诺改造自己的反动观点,并且宣誓效忠于共产党。一系列反对偏离正确社会主义教条的运动经常将矛头对准作家和学者,称他们拥有错误和颠覆性的观点,有时候还将他们的观点视为反革命阴谋,即便是党内最著名的学者,也难逃其害。

这些改造运动发展之快,远超计划。毛泽东极力推动中国直接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1953年他提出了党的总路线,批评那些希望改革步伐更缓更稳的领导人,有时候甚至是威胁他们。毛泽东将斯大林麾下的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改革应当渐进的言论,毛泽东极不耐烦。总之,毛泽东希望快速进行工业化,认为按照苏联路线对经济进行改造肯定可以让中国成功。尽管有人建议以更加谨慎和平衡的方式发展工业,但是毛泽东极力要求新建立的农场提高粮食产量,要求重工业提高产出。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可以从党内对于毛泽东领导日益高涨的狂热崇拜中看出。《毛泽东文集》得以出版;他的个人肖像挂在全国各类办公室和工厂当中;毛泽东思想在1945 年之际还被写入了党章,作为共产党事业的指导。以毛泽东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但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同时期发展截然不同。1956年事件造成的影响重创中国,在领导层当中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且导致了中共第一次政治危机。自此之后,差不多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前夕,这种成功感和乐观都不再出现,被一系列导致混乱的危机所替代。

### 125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阵营的动荡

共产党早年进行的这些改造也同样发生在东欧,二战结束之际,苏联军队一直占领着东欧这些国家。它们在1953年的发展水平和1956年

的[[256]](#footnote-256)中国和差无几。但是,改造的结果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导致1953 年年中发生了一场危机。中国1957年的政治危机一直被认为归咎于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场批判给苏联阵营带来的变化,就是终结了三年前斯大林死后开始的一系列内部变革。

那些掌控了苏联势力范围内东欧傀儡政权的「莫斯科社会主义者」全都执行了社会主义快速改造的相关政策,压制政敌,清洗异见者,开展目标宏伟的工业化项目,基本上与中国所执行的政策和差无几。与毛泽东一样,东欧国家领导人效仿标准的苏联模式,按照苏联1930年代晚期那样的模式进行改造。主要领导人将斯大林视为模范,经常陷入领袖狂热崇拜的怪圈。

这些国家高强度的社会主义建设导致了严重的混乱。这一点,在 1949年独立建国的东德体现得尤为突出。新政权原来希望通过强权建立统治,但是1952年开始集中建立社会主义。东德打压私营企业、攻击新教;由于投资转向重工业,工资有所降低;实行配给制,出现了食物短缺;对于那些反抗的人群进行「阶级斗争」。11950年代初期,有接近 50万民众逃至西德。由于警察和边境守卫也加入了逃亡至西德的队伍当中, 1952年最初几个月的逃亡人数激增。人口外逃严重影响了东德的经济计划,高技术人才流失,最后在1961年建立柏林墙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257]](#footnote-257)保加利亚也出现了困难的初期迹象,从1948到1950年,集体化的迅速推广和严苛的压制行为导致了经济出现困难,各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起义。 [[258]](#footnote-258)

斯大林去世之后,新一届苏联领导人有意调整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政策,放弃了一些在卫星国招致广泛不满的政策。这给变革带来了一丝机会,但动乱也随之而来,因为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1953年5 126 月,保加利亚多地发生罢工和游行示威。[[259]](#footnote-259)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宣布了让

货币贬值、降低购买力的新经济政策,在1953年前三个月零星出现了罢工和游行。随着贬值流言四起, 4月和[[260]](#footnote-260)月份有超过32,000名工人加入到了罢工和抗议游行当中。[[261]](#footnote-261)[[262]](#footnote-262)月1日,贬值政策正式实施之后,成千上万名工人走出位于波西米亚地区比尔森市的斯柯达汽车工厂,上街抗议,其他市民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他们与民兵和安全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有所伤亡。由于军队拒绝向民众开火,示威游行人群冲入政府建筑实施破坏,殴打不受民众欢迎的官员,将斯大林和捷克共产主义领导人哥特瓦尔德(Gottwald)的半身像扔出窗外。直到内政部从首都布拉格派出特殊部队之后,暴动才被镇压。

比尔森起义马上被两个星期后在东德发生的更大规模暴动所冲淡, 后者涉及范围之广,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新生政权的生存。与捷克斯洛伐克相似的经济政策触发了一波抗议:在新的工业体系下,工作节奏有所加快,但是工资却被「调」低。工人们收到比以往更少的工资之后,马上开始罢工。6月中旬,柏林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游行,有超过50万市民加入到罢工工人的队伍当中。他们聚集在共产党和政府部门前,强烈要求自由选举。刚开始在经济上做出让步之后,政府似乎出现了瘫痪状态,动荡蔓延到了东德地区所有工业城市,最终导致了6月17号的大规模叛乱。随着危机逐渐扩散,政权面临倒台,最终通过实施戒严、苏联军队和坦克大规模干预才恢复秩序。数十人被杀害,许多人被逮捕还有一群人被处决。6紧跟在捷克暴动之后的东德起义,动摇了苏联阵营当中共产主义领导人的信心,让后斯大林时代的新一届苏联领导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政策。

苏联的应对措施是推行解冻政策,放松在公开场合下的压制,暂缓 127 建立社会主义的极速步伐。他们总结道,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只是实施方式过于高压。斯大林曾经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在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初期就被清洗和处决,之前发生的镇压行为都归咎到了他的头

上。[[263]](#footnote-263)去斯大林化运动始于莫斯科,逐步释放了政治罪犯,压抑的政治氛围也有所缓和。随着对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批判声音逐渐抬头,卫星国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由于在改造中过于依赖压制政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当中操之过急、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而牺牲民众生活,而受到批评。苏联给东欧国家下令,执行「新路程」改革:弱化「阶级斗争」,开始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知识分子少一些教条、多一些开放。

由于现在公开对那些涉及「镇压浪潮」、「经济冒险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领导人进行批判,苏联于是强迫阵营内的国家进行改革,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要求资深领导人下台。例如,走强硬路线的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Råkosi)就被迫将总理职务让给改革派纳吉•伊姆雷(Imre Nagy) ,后者在经济和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开启了改革新路径。[[264]](#footnote-264)此时,将工业收归国有提高产量、大清洗和政治恐吓、对领导人进行夸张式吹捧等激烈行为已不再受宠,这些行为因为破坏经济、招致不满以至于使政治发生动荡而受到指责。随着赫鲁晓夫在苏联逐渐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下令建立特别委员会,重新查与斯大林有关的受害者案件,释放劳动营当中的上千名囚犯。 [[265]](#footnote-265)

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成为第一个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国家。1950 年被赶出苏联阵营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日益式微的苏联官僚制度开展了全方位的批判。[[266]](#footnote-266)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批评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超过波兰。1955年1月,波兰共产党发布了一份严厉批评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文件。非官方批评者更加直言不讳,在之后的一整年当中,评论的底线有所拓宽。不满大多源自党内,忠诚的共

产主义者对共产党最近的行为表示了强烈反对。高压统治和审查是他们不满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们也反对苏联计划经济当中固有的官僚中心主 128 义。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经济学家,根据南斯拉夫之前提出的诸多观点,制定了官僚经济去中心化的计划,从市场经济当中借鉴方法,创造更高效率和更高生活水平。

这些变化趋势与中国同时期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毛泽东仍然推动中国向着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上进行改造,似乎忽视了苏联阵营当中的自由化趋势和缓和行为。他在1953年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快速推动集体化和国有化,而当时苏联正批判卫星国推广的这些政策,将它们视为「冒进主义」。1954年针对作家胡风和「胡风分子」进行批斗的全国性运动,以及1955年「肃反运动」中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运动回潮,与东欧逐渐扩大的解冻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自1930年代末开始打造的斯大林式个人崇拜没有受到影响。1956年2月,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展开沉重打击和激烈批判之后,毛泽东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些冲突和差异。

###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

尽管去斯大林化运动在苏联阵营当中已经发酵三年之久,但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还是震惊了整个苏联阵营。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讲话也远远超过了许多苏联领导层的预期,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做过头了。表面上看,演讲的主题为「个人崇拜」,但是赫鲁晓夫又详尽描述了1930年代末那场重创党内领导层的清洗运动。这一举动前所未有,有着深远的意义。苏联领导层在此之前已经将处决忠诚共产主义者的罪名归到斯大林副手、前安全警察首脑贝利亚头上。现在,赫鲁晓夫明确指出,斯大林自己就是个混蛋。在这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演讲当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具有施虐倾向的杀



Ⅱ Brown 2009 272一276), Milenkovitch ( 1971 , 54一120) ·

手,他精心营造的个人崇拜是他邪恶独裁的荒诞表现形式。[[267]](#footnote-267)

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观察员都在场,包括许多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苏共二十大前夕就有迹象表明斯大林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是当代表们听到毛泽东在来信中高度赞扬斯大林时,都赶忙站起来大声 129 欢呼。[[268]](#footnote-268)直到会期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才在一场事先并未安排的闭门会议上发表他的「秘密报吿」。这对斯大林是毁灭性的打击。赫鲁晓夫为斯大林「严重滥用权力」。在他的指导下,「大范围逮捕和流放上万人、未经审判或正常调查就处决民众,制造了危险、恐惧,甚至绝望。」对「反革命」进行大规模地下阴谋的指控非常「荒谬、狂暴、有违常理」。无辜的人民在古怪的指控前认罪,「因为各种施压、施暴的方法导致他们失去意识,剥夺了他们的基本判断能力,夺走了他们的尊严。」在这份冗长的演讲中,最令人震惊的段落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引用最近调查得到的数据,描述1930年代清洗的残酷程度。在1934年中央委员会13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当中, 98名,也就是70%的委员都被逮捕、遭到处决。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1 ,966名代表当中, 1 , 108名代表因为反革命罪名被逮捕。演讲给观众带来的震惊也被记录在文件当中(「会堂大为愤慨」)。[[269]](#footnote-269)[[270]](#footnote-270)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对伟大极为狂热」,还要求人们对他进行「令人作呕地错误」吹捧。赫鲁晓夫将他描述为一个无能的领导人、一个懦弱的战时指挥官。他在战前不久对苏联军队的清洗致命地削弱了苏联的防卫体系,他的集体化运动损害了苏联农业。

用赫鲁晓夫传记作者的话来说,赫鲁晓夫的演讲「是他做过最为勇敢、鲁莽的事情。」[[271]](#footnote-271)二十大结东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人们对演讲的内容开展了长时间的论辩,大多数赫鲁晓夫的同事极力认为他应该克制对斯大林的批评。在演讲前一天,讲稿还在被不断修改。赫鲁晓夫的讲话

远远超出了同事们的预期,在演讲情绪高涨之际,他甚至还加了许多戏剧化的夸张动作。3月初,经过编辑后的讲话文稿打印在小红本上,上面印有「绝密」,分发给了党内各委员会和国内的党外活动家。 [[272]](#footnote-272)

130 2月25日晚,有人向会议的外国代表做了口头汇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属斯大林主义者的卫星国领导人,感到非常震惊。讲话文稿送到波兰领导人贝鲁特手中时,他正因为肺炎住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当中。他在阅读文稿时心脏病发作,并且在3月12日去世。[[273]](#footnote-273)波兰共产党之前就已经着手去斯大林化运动,现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讲稿进行翻译,打印了一千八百多份,分发给全国各地党内小组。鉴于波兰共产党对斯大林批判已经有苗头,在党内分发讲稿就必然导致讲稿流传到海外。《纽约时报》在3月中旬发布了讲稿中的一些段落, 1956年6 月5日,发布了讲话全文译稿,在世界范围内流传。[[274]](#footnote-274)中国领导人在3月中旬西方媒体发布一些节选片段之后,就收到了讲稿全文。 [[275]](#footnote-275)

赫鲁晓夫的演讲在苏联阵营当中产生了间接影响,甚至还波及了朝鲜,而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一直致力于建立个人独裁,让逐渐不合群的朝鲜政权免受苏联和中国的影响。金日成的个人权力建立在新的意识形态之上,被称为「主体思想」,事实上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概念下的自力更生,在国家深度依赖两个强大靠山苏联和中国的情况下寻求国家独立。1956年6月金日成访问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之际,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批评了他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他努力在国内营造个人崇拜。这些情况怂恿了朝鲜共产党内对金正日持批判态度的异见者。8月底,一些亲中派领导人和亲苏派一道,直接对金日成发起了挑战,指责他的经济政策和日渐高涨的个人崇拜倾向。金正日展开大清洗,一些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在北京和莫斯科寻求避难。不久之后,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批评金日成用逮捕和处决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此外,还批评他用国外间谍和阶级敌人的名头定性批评者。中苏代表团前往平壤,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观念」,但是只取得了暂时和有限的让步。 21

### 波匈起义 131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更为深远,动摇了两个国家已经处在危机中的政权, 1956年10月,危机达到高潮。波兰基本上抵挡住了苏联的入侵;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起义时,也迅速溃败,直到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军队大规模入侵匈牙利, 才得以重新恢复共产党统治。

在赫鲁晓夫演讲之前,波兰共产党就已经成为对斯大林时代进行批判的温床。在总书记贝鲁特3月中旬突然去世之后,奥哈布(Ochab),æ 任总书记一职,开始自上而下进行自由化建设,并配之以从下到上的激进化运动。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各地组成独立的讨论小组;成百上千名囚犯被释放,批判性文章出现在官方媒体上。天主教得以恢复;工人开始因为工资和工作环境而受到鼓动;农民开始抱怨国家强迫他们必须以国家制定的价格进行销售,要求去集体化;党内干部和警察也有所泄气。

奥哈布试图在强硬派和坚持走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派系中寻找中间道路。他最初的行为之一,就是恢复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的党籍,哥穆尔卡是一个温和的领导人, 1948年被时任第一书记的贝鲁特排挤,之后被捕, 1951年被开除党籍。贝鲁特直到1954



1. Chen (2015 , 108一114) ·
2. Machcewicz (2009, 35一86) ·

年才因为苏联发起了去斯大林化运动,而被迫释放哥穆尔卡。哥穆尔卡成为了改革和波兰独立的象征,不久之后,情况就失控了。6月,工业中心波兹南的工厂工人上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之后马上升级成大规模起义,超过半数的市民都加入其中。波兰共产党如坐针毡,以工人为首的示威游行人群与警察和波兰军队发生了冲突,导致74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276]](#footnote-276)

镇压波兹南之后,事情继续在党内发酵,哥穆尔卡支持率迅速上升,于是重回政治局,迅速替代了奥哈布成为最高领导人。[[277]](#footnote-277)在没有苏联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选出了新任波兰领导人,这一事件让苏联方面开始担忧:更糟糕的是,波兰人民还要求被派到波兰任国防部部长的苏联 132 元帅下台。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迅速转移到华沙,更多的苏联军队被派往波兰边境。赫鲁晓夫要求在华沙进行一次会面,但是被拒绝。10月 22日,波兰许多城市发生一系列大规模集会。在华沙,超过50万人上街抗议苏联干预。叛乱还蔓延到了农村地区: 1957年底, 85%的合作社都被解散,完全是给集体化开倒车。赫鲁晓夫在没有受邀的情况下,坐飞机到华沙,与他同行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进行几轮剑拔弩张的谈判之后,苏联决定终止入侵,让哥穆尔卡稳定波兰局势,事实上在 1970年第二轮波兰动荡发生之前,他成功稳定了波兰的局势。 [[278]](#footnote-278)

赫鲁晓夫对于波兰妥协是因为匈牙利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7月份,苏联坚持要求作风强硬、近似斯大林的匈牙利共产党书记拉科西· 马加什下台,他被指在任期内主导了一系列对党内领导人进行清洗和处决的事件。他前不久刚罢黜了任总理不久的改革派人物纳吉·伊姆雷

1955年以「右倾」的罪名将他逐出共产党。在赫鲁晓夫2月份的讲话之后,拉科西被迫妥协。之前许多共产党人因为被控「铁托代理人」而被判刑或是处决,而拉科西现在恢复了他们的声誉。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拉伊克•拉斯洛( L z16 Rajk) ,他在1949年被拉科西处决之前, 曾任匈牙利内政部部长。恢复声誉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削弱了拉科西的威信,因为他曾利用对拉伊克的指控罪名,大规模逮捕了诸多党内领导人。[[279]](#footnote-279)在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主要围绕裴多菲俱乐部展开反抗行动,这个俱乐部是在赫鲁晓夫那场演讲之后由拉科西于1956年3月所建立的。这个团体逐渐变得激进,成为反对拉科西的阵营中心。苏联方面非常警惕,对拉科西能够恢复秩序丧失了信心, 7月中旬,苏联赶走了拉科西,转而支持格罗·埃诺(Erno Gero)。 [[280]](#footnote-280)

10月份,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在一次官方批准的拉伊克的公众葬礼上,纳吉向在场的人们保证,斯大林主义也会最终被埋葬,现在拉伊克已经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殉道者。一天之后,纳吉被允许重新加入共产党,并且成为能够通过改革稳定匈牙利局面的人当中最具威信的那一位。街头游行迅速变得激进。10月2日, 5 ,000名学生在布达佩斯科技经济大学门前集合,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苏联撤军,进行党内选举, 将斯大林主义者从党内领导层当中移除。他们坚定地支持波兰「国家独 133 立运动」,要求「言论自由」和「媒体、电台自由」。第二天,也就是10月 23日,学生聚集在布达佩斯电台门前,要求电台向全国宣读他们的宣。电台的主任同意了学生的要求,通过当地的扩音器制造了一场虚假的电台广播。学生们知道他的诡计之后,便包围了电台。同日在布达佩斯的中心广场,巨大的斯大林半身像被推倒,上千名民众欢呼雀跃。 

晚,赫鲁晓夫要求格罗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但是纳吉拒绝与苏联签署派遣军队到匈牙利恢复秩序的协议。他宣布戒严,要求匈牙利军队执行。但是已经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还是在10月24日凌晨进驻了布达佩斯,包括6 ,000名士兵和700辆坦克。他们迅速被人群吞没,街上

的人群用燃烧弹和小型武器与军队进行抗争。匈牙利军队也与示威人群一同作战。 [[281]](#footnote-281)

在叛乱发生期间,纳吉替代了格罗成为党的领导人,并且成立了包括其他政党领导人在内的联合政府,那些政党在1940年代曾被迫解散。随着街头游行继续蔓延,赫鲁晓夫一开始决定撤回苏联军队。毛泽东表示赞同,并建议他让「匈牙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然而在两起事件发生之后,两个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第一起事情是, 一撮人群包围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抓住了安保人员,用街灯以私刑的方式处死了他们(包括布达佩斯第一市委书记) ,以报复他们大规模射杀抗议者。不久之后,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并且要求苏联军队永久撤出匈牙利。赫鲁晓夫下令大规模入侵匈牙利,导致2,500人死亡, 2万多人受伤。700名苏联士兵在斗争中牺牲。在入侵后的镇压运动当中, 超过10万人因为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超过20万民众穿过边境逃至奥地利。纳吉曾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内避难,虽然他得到承诺可以安全离开 134 南斯拉夫,但是最后还是被捕入狱,在1958年与他的国防部部长一道被处死。匈牙利不得不从零开始建设。[[282]](#footnote-282)

### 步调不一致: 1953年后的中国政治发展

这些事件震惊了中国高层领导,对毛泽东构成了威胁。尽管毛泽东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党内领导人开展大规模清洗,但是中国在1953 年后展开的一系列运动当中持续地迫害「反党团体」和「反革命分子」。这个时期最主要针对的是左翼作家,他们曾经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但是他们最开始就对于那些社会主义官僚要求民众严格执行的社会主义教条感到恼怒。[[283]](#footnote-283)[[284]](#footnote-284)这些作家要求对人物和故事进行有区别地描述, 少一些刻板印象;对于从事宣传工作的官员而言,他们就是眼中钉。 1954年和1955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受到批判,丢掉了编辑职位:他们当中较为著名的有冯雪峰和丁玲。本质上而言,这是当年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让他们消除独立思想运动的翻版。311955年夏天,对于丁玲的指控升级为成立反党阴谋集团。她和她的追随者被撤职,同时被拘留接受调查。 [[285]](#footnote-285)

这些人基本上都承认了对他们的指控,因为希望能够减轻惩罚,但是有一个人拒绝承认错误,还与指控他的人发生争执。这就是著名作家胡风,他曾是人大代表、《人民文学》编委会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他于1954年7月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篇长篇报吿,指责共产党对文学和诗歌进行机械和教条式审查,他还指名道姓地要求与一些负责宣传工作的官员断绝关系。共产党对这份报吿采取的措施十分严苛,看起来与和关事件的严重程度并不相称。紧接着1955年就开始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286]](#footnote-286)胡风和他的亲密同伴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对与胡风观点相近的人展开了清查运动。超过 135

2, 100名作家和编辑因为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受到调查; 92人被关入监狱,数十人被撤职。 [[287]](#footnote-287)

对于文学界开展的迫害范围有限,不过却从属更广泛的镇压浪潮, 并最终藉1955年7月开始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而达到顶点。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档案进行高强度审查,对个人政治历史重新调查,审讯嫌疑犯,并且进行秘密谴责。这场运动在1957年以各种名义得以延续,超过1 , 860万人遭到调查,超过257, 551人被视为反革命分

子或是「坏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被送去了劳改营,或是被下放到农村,在「监视下」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1 ,717位被批斗的对象自杀。 [[288]](#footnote-288)

简而言之,比起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阵营内的解冻和部分自由化运动,斯大林去世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势头与斯大林时代晚期的大规模迫害更为相似。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达到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大清洗的迫害程度。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置于一个在政治上非常尴尬的位置。中国与其他苏联阵营国家的发展步调不再一致,因为中国选择继续按照斯大林模式发展。

### 百花齐放

苏联阵营发生的事情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对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那篇演讲,中国收敛了对毛泽东的吹捧,开始强调党内集体领导,并且开始自我解冻。面对10月份在欧洲的动荡,毛泽东开辟了新立场,开始支持开放和批判政策。尽管他的同事极力反对,但是毛泽东还是展开了整风运动,让普通人也加入到了批评教条主义和滥用权力的队伍当中。这在政治上非常精明,而且出人意料,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当时的政治思想状态。作为去斯大林化的一大潜在目标,毛泽东摆出姿态,支持开放和大众对党的权力进行限制,从而将批评意见引蛇出洞。

136 毛泽东偏离了他作为斯大林忠实追寻者的形象,看似是一个自私的手段,但可能并非如此。毛在1940年代确实在延安开始树立个人崇拜。他所领导的政党也通过大量恐吓和威胁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统治, 并且他还支持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社会主义快速改造。但是,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批评、为苏联效忠的卫星国共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还并没有出现在毛泽东的身上。毛并没有对中共领导层开展大清洗,没有

像斯大林那样展开公开审判,也没有大规模处决党内官员。他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确实期待太高,但是苏联阵营当中所出现的混乱和暴力事件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同时中国也没有出现东欧国家那种叛乱。毛泽东有正当理由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阶段处理得较为成功。

尽管如此,中国对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演讲还是有所防范,最开始去斯大林化运动的步伐缓慢而稳当。赫鲁晓夫的演讲使中国领导人颇为意外,同时也警醒了他们,与其他共产主义兄弟政党(还有赫鲁晓夫的同事)一样,中国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容。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做得有些过分了,他没有认可斯大林取得的成就。他们和赫鲁晓夫的同事一样,都担心与斯大林决裂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威,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帝国主义敌人的力量。让他们感到尤为恼怒的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人格的攻击,在毛泽东看来,演讲并没有为区分斯大林的错误和成就提供理论依据。中国领导人开始担心,如何将中国最近的历史发展与斯大林时代区别开来,如何将毛泽东与斯大林区别开来。 [[289]](#footnote-289)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主要观点表示,对于斯大林进行过度诽谤是错误的:他的贡献远超他的错误。显然,文章转移了对毛泽东树立个人崇拜的批评。毛泽东之后又发表了两篇讲话,第一篇是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呼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民主党派被允许保留下来,象征着所有爱国同胞「统一战线」,尤其要与那些 137 组成大部分「民主」政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为著名的是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发表的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一一噫味着对文艺界和学术界有所放松,对于非马克思主义、但是能够满足国家发展建设的观点更加开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不相似。这些讲话,和4月5日的社论,对过度压

制、忽视集体领导、将观点的相异转为政治错误或是犯罪、在经济政策方面操之过急等进行了批评。[[290]](#footnote-290)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是进行去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相对温和而又平衡的方法。

这些讲话起初对鼓励人们公开论辩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人们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洗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记忆犹新。但是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发生了具体且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刘少奇和彭真让安全部门减少逮捕、判刑更轻、少用严刑酷法。[[291]](#footnote-291)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当中被摘除。[[292]](#footnote-292)此外,八大的政治报吿当中认为,在之前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对于农业和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解决了阶级斗争问题,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293]](#footnote-293)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就是将康生降职,他是1943年党内恐怖整风运动的主要策划人,在这场运动当中他帮助毛泽东掌控全党,并且开始建立个人崇拜。康生从位列第6的政治局委员,被降到位列第15位的候补委员,在国家领导人当中排第23位,一下子降了17位。[[294]](#footnote-294)党代会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中国共产党开始偏离斯大林主义倾向。[[295]](#footnote-295)

### 整风运动的分歧

毛泽东希望整风运动再往前进一步,但是遇到了阻碍。他在4月5 日《人民日报》社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当中,呼吁普通人 138 加入到批评共产党错误的队伍当中,但是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吿当中并没有将这一点囊括进去。[[296]](#footnote-296)党内高层认为整风运动是有必要的,但是

对[[297]](#footnote-297)于方式产生了分歧。毛泽东支持「开门整风」,鼓励普通民众也来批评党政官员。另一种方式就是「闭门整风」,让党员就其他党员的缺点进行互相批评。毛泽东并不认为在党内进行整风教育足以避免让民众非常不满的权力滥用现象。他认为,党外人士也应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他感觉到,让他们有透透气的方式,会给社会和政治带来更多和谐。反对开门整风的人认为,外界公开对党进行批评将会让党内干部意志消沉导致政治动荡。

党内分歧让毛泽东和邓小平站在了一边,另一边则是刘少奇和彭真。匈牙利事件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公开批评会导致混乱,而毛泽东则认为只有开门整风才能够避免类似匈牙利事件出现。毛泽东最终取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298]](#footnote-298)中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官方定性可以从第二篇《人民日报》社评当中窥见: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社论驳斥了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观点,他认为匈牙利暴乱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反过来说,也是苏联体系不可避免的发展产物。中国方面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体系,而是领导层犯下了错误,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矛盾」。换句话说,匈牙利事件是因为领导层错误的做法,而不是苏联体制存在问题。党内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些行为是可以被纠正的。呼改变体制是错误的,这是对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一种修正。 [[299]](#footnote-299)

这是一种具有局限性的保守教条。中国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会发生改变。体制没有出错,因此就无法对管治方式和经济组织进行改革。

问题在于官员个人的错误品行。中国将维持从苏联学来的体制模式。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中详细阐述了上述观点。[[300]](#footnote-300)这就是他对于开门整风的论据,毛泽 139 东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在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具有创新性的领导人。在这篇长达四个小时、观点杂乱的演讲当中,他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党和人民的矛盾是正常的,并不应当被视为阶级斗争。对于党的批评不一定就代表敌对阶级发动了反革命运动。如果一个政党不能够接受批评、将所有批评者视为阶级敌人,那么这个政党就会犯错,导致匈牙利叛乱那样的事件。 [[301]](#footnote-301)

毛泽东的演讲是希望进一步推动整风运动。他在演讲当中多次提到,党内有干部反对开门整风。[[302]](#footnote-302)毛泽东之后还在多个小型场合发表了类似演讲,整个3月他都不在北京,而是在外巡讲。[[303]](#footnote-303)在他「百花齐放」的演讲之后,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事实上蓄意破坏了毛泽东的呼 ,组织了一场针对一位作家的谴责运动,这位作家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党内愤世嫉俗和无用武之地而意志消沉。[[304]](#footnote-304)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非常生气,因为报社并没有宣传他有关于「矛盾」的新观点,后来他将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其他主管宣传的官员叫到自己的住处,训斥了他们。[[305]](#footnote-305)[[306]](#footnote-306)毛泽东的批评终止了他们的拖沓行为。对于该政策持主要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彭真,最终妥协。《人民日报》4月中旬发表了一系列五篇社论,批评那些反对开放和「百花齐放」的人。531957年5月1日,整风运动正式开始。百花运动仅仅持续了五个星期,虽然很短,却高潮迭起

#### 民众的回应

中国各城镇党委机构举办座谈会,欢迎民众对干部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批评。[[307]](#footnote-307)人们发现国家对批评者并没有马上进行报复,这之后,就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党的干部需要面对下属提出毫无保留意见的批评。这些是下属们以前并不敢表达的想法。对于党的干部而言,批评的结果就是让人感到羞耻、意志消沉。随着批评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干部的同事、还有一些党员高级干部对批判表示赞同,批 140 评浪潮越演越烈。整风运动马上超过了原有的边界,开始攻击苏联模式固有缺陷。

共产党在城市的工作场所所设立的新型控制模式遭受了尤其严苛的批评。批评者抱怨,在每一个组织机构里,党员都掌控了所有权力:党员干部甚至能够驳回专家的决定,忽视那些经验更为丰富、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所提出的建议;党的干部缺乏能力,会在工作上犯错,对下属公开表示不尊重;他们为自己争取特权,任命配偶担任自己工作单位内的高收入职位;党员经常在晋升当中被优先考虑,即便他们并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有些党员甚至都不识字。 [[308]](#footnote-308)

记者也抱怨他们不能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抱怨审查制度让他们失去了做这份工作的尊严。他们抱怨自己并不享有获知政府决策的权利, 希望有更大的自由进行真实报道。他们抱怨,报纸已经成为仅仅重复政府官员话语的机构,记者和编辑都不允许进行独立思考。更为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指出,共产党对记者的要求就是让人民保持无知。[[309]](#footnote-309)

学术界对于党的制度尤为愤恨。他们公开谴责党对于自然科学进行严格限制,同时几乎摧毁了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强迫他们遵从已经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他们谴责共产党死板地遵从苏联教条和学术

崇拜苏联的事物,而对于美国的事物却膝跳反射般反对。国家不允许出

现批判思维,如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受到惩罚;在他们缺乏能力管控的领域,无能的党委书记对教学进行监视;教工和研究人员被以往的政治运动所恐吓,都不敢发表看法。一些领域的研究由于无知的党委书记机械的教条态度而被中止。经济学家公开谴责他们学科发展有所衰退:数据和调查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受到谴责,学者被迫仪式般地重复来自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论述,「例证」建立在简单的算数上。 [[310]](#footnote-310)

在以往反对自由思想运动中幸存下来的作家和编辑公开为自己之前 141 的观点进行辩护,并且撰写了讽刺性的文章,讽刺共产主义官员的教条主义。其中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文章,嘲讽了党的干部不经思考便遵从教条主义,而且经常改变党的路线

现在的高级干郐… …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 …这种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特征,是他们的理论虽然几经反复,却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曾经错过,他每一次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向都是正确的。 …这种人的思想的特点,我看就是「随」, 也就是自己从未思想过。他自己随随,是无关紧要的,但他是领导者,于是被领导者们可吃苦了。 [[311]](#footnote-311)

这些批评可能刺激到了党的干部,他们之前只习惯于听到担惊受怕的下属对他们表示应和,在很多机构,批评者偏离了原定的道路,很显然对体制展开了批评,而不仅仅是干部的个人行为和态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现在的情况甚至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还要糟糕,共产党完全脱离了人民:「民众想要推翻共产党,杀掉共产党人。」这位教授表示,如果共产党不在根本上改革自身,那就会倒台被推翻。[[312]](#footnote-312)沈阳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描述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艰难场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一两年,共产党开始超越了人民,享受特权,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党的声誉一天天下降。越来越多带有不纯目的的人加入到共产党当中。他们加入共产党,因为可以获得荣耀、权力、影响力和金钱。他们对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讨好共产党,屈从于共产党, 在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共产党 …必须废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宪法就是一堆废纸,共产党没有要去遵守宪法… …就集会、集社和出版的自由权利而言,它们只是纸上空文;事实上,民众只能成为顺从的臣民,或者说用更为直白的词,就是奴隶· 应当建立起普选体系,同时废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人民应当拥有自由成立新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权利,自由出版,开放与论空间, 142 监督政府,打击廉价的褒奖,鼓励民众反对糟糕的现状,即便这意味着反对中国共产党。[[313]](#footnote-313)

另一位批评者甚至控诉党不再像过去那样与人民站在一起,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压迫人民:「(党)不再站在人民群众当中,而是站在群众背后实施统治。」政治活动家一边在公众场合为民发声,另一边却在背地里检举他人;他们装作大公无私,实则不顾他人、以邻为壑。[[314]](#footnote-314)还有一位批评者抱怨道,党员为了在这种压抑环境下生存,必须进行自我审查和自我疏离:「要想成为一个党员,必须将自己视为疯子或行尸走肉。只有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他们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315]](#footnote-315)

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而非干部个人的缺点。然而,专家学者的异议还并非是党内领导最为头疼的事。最终导致「双百方针」急停的原因, 是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独立运动以及更令人不安的工人集体动乱。

在首都,北京大学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这里在历史上曾是20世纪初期学生运动的发源地。随着5月中旬出现的第一批海报,学生运动迅速蔓延。校园中心建起了一堵「民主墙」,吸引了大批人贴文读文。这堵墙也引来不少公开辩论和演讲。独立的政治社团和讨论小组和继成立并发行各自的报刊 [[316]](#footnote-316)当月,北大内还贴出了赫鲁晓夫讲话长篇节选的译文。[[317]](#footnote-317)最常见的抗议内容包括镇压反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不公,党的领导对教育机构的负面影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明显错误的指控,刻板坚持苏维埃教育模式,学术课程过度政治化,以及党员干部以教条式思维对待非党员教师和学生。还有一些批评意见质疑人民的生活水平是 143 否像党所宣称的那样得到改善,认为党的专制进一步扩大了党和人民之

间的距离。 [[318]](#footnote-318)

在所有发表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最著名也最具争议性的发言来自邻校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直言不讳的法律系学生一一林希翎。[[319]](#footnote-319)[[320]](#footnote-320)在5月23 日的演讲中,林公开质疑党对胡风及其同案犯的定性,并指出胡对党中央的建议完全符合「双百方针」。胡风就艺术和文学给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将他定性为反革命的依据是毛泽东在1940年代初期的论断,而这些论断早已过时。因为胡风与他人有过「秘密通信」就认定胡风组建了一支「反党小组」,林希翎对这一指控不屑一顾:「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为什么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仍未得到党的纠正?「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随后,林希翎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吿」中所述的斯大林所犯过错与中国的错误相比较:「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林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 是因为她曾在一个地方法院实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审查涉嫌反革命的案件,当然,这些罪名显然是不成立的。她所说的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制度上:「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 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68

林希翎直言,中国的苏联模式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仅靠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等表面措施难以得到纠正·

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拤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 …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瞋压人民,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笗的办法… …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因为还有很多衔道 144 者,他们想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

林在发言的最后提到了那些在武汉、南京等地做动员工作的学生, 并呼吁全国上下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她看来,匈牙利事件起因之一就是为了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69

一星期后,林在北大作了第二次发言,详述了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滥用植根于苏联模式的组织结构。她也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从何而来:「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下,「我们并不是以德才来衡量一个人,而是看他是不是党员• 一些人为了享受特权而争着抢着入党;不入党就没



1. 同上,页27。
2. 同上,页27一28。

有出路。」70这些问题深深扎根在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新型组织架构中, 而新的组织架构却带着强烈的「封建性和法西斯性」以及「买办性」色杉乊/

「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71

赫鲁晓夫的讲话对林希翎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过去对斯大林印象很好,苏共二十大上对他的批评让我很生气。但是,在我读过这份秘密报吿后,我才看到真正的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建立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必须以制度本身为依据。」毛对反革命分子的过度迫害,「受到斯大林错误论断的影响。斯大林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鋭。」72

林希翎崇尚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她对波兰、匈牙利、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思想家们不断努力摆脱斯大林式的过去深感钦佩,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些尝试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对党内整风运动的设想。林并非是唯一一个持类似看法的,也不是最极端的,还有人比她 145 更大胆。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北大百花学社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呼组建新的政党、开放多党竞争。73民主墙上还有海报把根据政治地位划分阶级比喻为一种变相的种姓制度,认为人事部门就是通过这种划分掌握新的统治基础。

在这一时期,常有持异见者批评中国已经完全建立了新的特权阶级。最极端的言论中有一则出自一位匿名人士(可能是一名中年党政干部) ,阐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内部人士的想法:

我是那么无力,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抗争精神。我只知道如何生活在领导的指示下。我每天吃得很好,拿着高菥水· ·许多领导耸郐享受着有宴会、有别墅的豪华生活。为什么要活得节?有多少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页1 页0 页0一一 4 7 页10 页4-57

人学会了假意服从,对领导卑躬屈膝,但面对群众的时候却把自己当成高官和贵宾? · 二十年来,我看透了这些做派的人。面对敌人时,我血红的眼晴里充满了愤怒,我愿抛头颅洒热血;但面对共产党的专政,我却是那么懦弱无力… …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热血、汗水、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捍衔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一边压迫着人民一边过着奢靡生活的官僚。他们就是一群法西斯,因为心中的恶而聚在一起,用愚民的手段扭曲真相。 [[321]](#footnote-321)

这位匿名人士还对毛泽东不屑一顾,指责毛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我反对毛主席最近向共青团中央作出的指示,『党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任何偏离社会主义的行动都是错误的。』这一指示实际上是在说: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如果有人反对太上皇,他就是在犯错误,应该马上被拉去砍头。」他还将毛泽东和秦始皇和提并论,后者建立了一个残暴的政权,以背信弃义、焚书坑儒而闻名:「陛下,就因为您的一声令下,多少人没了理想和希望!陛下!在您面前,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

什么! 1949年以来,您杀掉了七十多万人(还不包括自杀的)。照着您 146 的心愿尽情杀人吧!杀光所有中国人!」[[322]](#footnote-322)

这位作者还出言讽刺延安共产主义的神话。「独裁者,你变成了洪水猛兽。在延安… …你杀了多少所谓嫌疑犯?你却称之为『内部净化』… …在所谓的延安圣地,就因为提了提大厨房、中厨房和小厨房的事,王实味被清算… …他现在被弄到哪儿去了呢?没人知道。抗日大学的学生在前线拼死抵抗的时候,你却在延安沉迷酒色。你在窑洞里活得可真是苦!」[[323]](#footnote-323)

因为一些不言而喻的原因,媒体并没有公布这些批评的声音,也没有公开报道这些学生运动。但是党员们通过《内部参考》以及其他数据中的机密报吿对这些情况是有所了解的。[[324]](#footnote-324)这些公开表达的异见表明整风运动在走下坡路,而这正是反对整风运动人士所担忧的。毛泽东开始对自己犯的错误感到不安。他错误地将屈从当作认同,低估了1950年代的镇压造成的怨恨,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心中的愤懑。他错误地以为, 1956年中国的相对平静是因为人们对政权还有坚定的信任。

新成立的独立社团和出版的刊物,以及要求终结一党专政的呼声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更令人震惊的是,学生运动快速蔓延到全国上下,许多人将之与开启了现代革命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北大的学生积极分子前往天津动员学生群体。[[325]](#footnote-325)全国各地的校园纷纷效仿建立「民主墙」和「自由论坛」。截至5月底,北京全部的高校(共计31所)以及武汉、上海、南京、吉林、天津、兰州等地多所大学都开展了类似的校园运动。[[326]](#footnote-326)没上大学的高中生则罢课示威,甚至破坏校舍和设备;武汉、西安、广州、沈阳等地的校园也不乏类似示威,原因是大学生们对工作分 147 配及其他一些事务颇为不满。[[327]](#footnote-327)武汉、南京、成都、青岛、桂林等地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展开示威游行。[[328]](#footnote-328)许多学校的共青团组织变成了异见者

考虑到之前发生在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工人们的抗议实际上是更大的潜在威胁。工人们组织起来抗议新计划经济下的工作条件。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全国工人抗议浪潮的缩影,这股浪潮始于 1956年并在双百运动期间到达顶峰。1957年春,上海587家企业发生劳资纠纷,超过200家发生罢工事件,涉及近3万名工人,另有700家企业内出现其他形式的抗议。这是继1949年10月以来,上海劳工运动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工人浪潮。根据1957年的一份党内文件显示,当年春天中国爆发了一万多次罢工,学生纷纷抗议,群众走上街头请愿和示威。上海的大部分劳资纠纷都发生在刚从私营转为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原因是改制降低了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取消了过去他们和私营老板已谈妥的福利待遇。正如前几年的柏林和比尔森一样,国家接管企业后就将工资和待遇「下调」。工人们大举抗议官僚、专制的劳资关系,公然诋毁党委书记和「傀儡」工会。 [[329]](#footnote-329)

农村地区的抗议活动也随处可见,直接的导火索是上一年快速组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的组建并非出于农民自愿。农民公开表达不满情绪,时间长达几周。而在1956年底,情况越演越烈。后来的党内报吿对此有详细说明。村民抱怨新政干预个人时间的支配,干部队伍管理不善,职位安排和收入分配过于随意,收入大幅缩水,分配食物数量和质量下降。新任村干部行为「粗鲁」、「压迫与欺凌」村民,他们不仅挪用、浪费公款,还辱骂、捆绑、殴打出声抱怨的村民。这份报

吿引用了一些农民的原话:「合作社没比劳改营强多少」,新的集体生产 148

「带来的痛苦比收入多」。 [[330]](#footnote-330)[[331]](#footnote-331)

虽然对农村的抗议活动记录较少,但有数据显示,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而且后果严重。在江苏省内,有农民强行自留收割的粮食,顶撞村干部后退出合作社。851957年4月中旬至5月底,浙江省内某县33 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发生了闹事事件,农民们纷纷退出合作社。该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参与率从91 %掉至19%。村干部遭受殴打,家中发生打砸。山西和广东也爆发了类似的大规模暴力事件。[[332]](#footnote-332)[[333]](#footnote-333)在边境地区,激进的集体化催生了强硬、组织严密的叛乱。

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引起警惕。毛泽东最初一直坚持自己的「开门整风」,没把学生的抗议和罢工当回事,认为没必要对此过分担心。但毛泽东无法打消同事们的担忧,而且很显然,情况即将失控。最令人不安的是,一部分最尖鋭的批评来自年轻党员,共青团组织正在成为异见中心。遍布全国的学生运动、工人的群众抗议以及年轻党员的批评,都是此前东欧大规模运动的征兆。这些征兆预示着重重威胁,最终使得领导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后续的事态发展证明,部分领导人对整风运动的担心是正确的,该运动确实会破坏社会稳定。毛泽东最终改变主

,下令进行严厉的镇压。 [[334]](#footnote-334)

### 反弹:反右运动

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重新定性整风运动,认为这次运动已经沦为「右派」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无情攻击,而这批人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袒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论述背离了中共八大确立的党的路线,即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矛盾。党内 149 整顿实际上变成了党对人民的整顿。在双百运动期间提出过批评意见的人成了反右运动针对的对象。此外,民主墙被取消,坚持发声的学生和工人被捕,独立社团和刊物被强行停业。

过去鼓励自由批评的论坛现在转而谴责那些在过去几周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在犯错误。反右运动的时长远远超过双百运动,并持续到 1958年初。党内发动党员记录双百运动中的批评性话语和行动。被划为右派的人士,不仅会在工作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还要被关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先前对党批评得最凶的人甚至被当众批斗。关于批斗的人数和规模,地方党委都有相应的指标。这就导致那些善意直言的人沦为受害者。[[335]](#footnote-335)反右运动不仅在大学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人员比重较高的组织中开展得风风火火,也蔓延到工厂和农村。农村的反右重点是中学老师、旧时的地主、富农以及那些抱怨村干部腐败、滥用权力的人。 [[336]](#footnote-336)[[337]](#footnote-337)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文终于在2月份发表。毛在当月就同一题目发表了演讲,很多观众听取了该演讲的录音。而文章的内容与演讲内容略有不同,新增了对「过分」批评的警吿,强调这是不能被容忍的;此外,文章提到了阶级斗争。原来的演讲花了大篇幅指责斯大林未能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批评, 反而把所有的批评都视为敌对势力,从而「把矛盾混合起来了」。同这一段一样被删去的还有一句话:「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 就有坐监狱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演讲中引自赫鲁晓夫的内容同样被删去: 1930年代有90%的苏共大会代表和80%的中央委员被杀 150 害。毛在之前的演讲中还提到,出于「必要原因」而杀掉了「少数个人」 (而实际上, 1951到1953年间杀掉了70万人。1955年之后又杀掉了8万人)。毛泽东把过去一年的学生闹事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也被文章删去。

该演讲公开发表的文字修订版粉饰了毛泽东显而易见的政治判断错误:他过去信心满满地强推整风运动,却被事实打脸。上述修订以及毛掩耳盗铃般地宣称之前所为是为了「引蛇出洞」,实则是为毛在全体党员前挽回面子。然而,此举更深远的目的在于把阶级斗争重新列为党的中心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所确立的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不再坚持。[[338]](#footnote-338)知识分子和专家参与经济建设的计划也被搁置,而前者更是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分子。中国的去斯大林化政策就此草草结束。

反右运动涉及数千万参加过抗议和集会的民众,以及数十万吿发受害者或者充当情报人员的积极分子。1958年初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共有 55万人被划为右派。[[339]](#footnote-339)他们根据其罪行严重程度被分为几类。有一小部分人因其言行被认定为公然反革命而被执行死刑。这其中包括一些组织学生暴力抗议活动和罢工的领袖。94多数人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刑期不定。最严重的服刑二十多年,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被释放。罪行较轻的被送去劳改农场,其中一些人在1960年代初被释放。其他人受到降职、降级、降薪等处罚,不过仍可以留在原单位留用考察。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他们才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他们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因为像「地主」或「国民党」这样的右派标签能够影响整个家庭。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其本意是为了增进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却反而彻底毁掉了原有的联系纽带。

有轻微的迹象显示,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威信和判断受到了间接但是公开的质疑。95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不同意刘少奇对反右运动的看法一一一越是强调阶级敌人的危害,越是让毛泽东先前的判断显得大错特错。经过几个月的斡旋,两派最终就反右运动的性质和范围达成妥协。961957年6月,毛泽东被迫放弃双百方针。而另一边,因为其「秘密报吿」而引起东欧动荡的赫鲁晓夫勉勉强强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仍被控行事鲁莽和作风强硬,犯下一系列错误。他面临着政治局多数成员的严厉批评,但他最终得以扭转局势,指控反对派为「反党集团」并将他们逐出政治局。97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是因为推动自由化改革而引火烧身,当然赫鲁晓夫面对的问题更为严峻。赫鲁晓夫在之后几年得以扩大去斯大林化政策,而毛泽东却很快回到了他最初的角色当中,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倡导者。自此,中苏两国的意识形态向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 98



Goldman ( 1967, 202一242 )。

1. Hoffmann ( 1974, 146一147), MacFarquhar ( 1974, 224)·
2. MacFarquhar ( 1974, 283一289) ·
3. 同上,页289一310 ; Leese ( 2011 , 63一64 )并不赞同这一解读,认为毛泽东掌握着更坚实的权力。
4. Taubman (2003 , 3 10一324)·
5. Lüthi (2008 , 71一74).

毛泽东因为其推行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草草结束而颇为受挫,他将精力转而投入快速建设经济的斗争当中。他利用党来发动这场斗争,动员手法恰如内战的最后阶段。正如我们所见,相较于1957年的反右整风,这场斗争的结果对中国而言更具灾难性,对毛泽东的个人形象而言更具破坏性。

# Blank Page

152

|  |  |
| --- | --- |
| 早大跃进  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跃进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最终以失败收场,并造成巨大灾难。其失败是必然的,但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大跃进背后的经济论断存在严重错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现其崇高目标。灾难则是大跃进的政治因素所致:两场旨在肃清党内不忠分子的大规模运动促成了大跃进的开展和持续。反右运动不单单是针对1957年春批评共产党的党外人士,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年轻干部也成为受害者。他们本来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通过公开批评来纠正党的错误,但这些批评却被定性为政治不忠,是站在「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立场。毛泽东由此断定,这说明中国的阶级斗争还未结束,在党内也有所反映。一些党员的意见被认为体现了剥削阶级思想,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惩罚。据说,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旨在从政治上削弱党,阻止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  随着反右运动与大跃进相结合,对大跃进的热情支持和对其成功的坚定信心成为政治忠诚的主要标准。对其措施或主张的质疑,或者对其问题的如实汇报,则成为政治不忠的表现。在严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大跃进政策正在造成灾难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 153 |

的第二场肃清运动开始了,那些汇报问题或者主张减速的人成为打击对象。这阻碍了对路线的纠正,酿成了大跃进最惨重的后果,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

## 大跃进的起源

1950年代,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经济加快步伐向苏联模式转变。在毛的干预下,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完成速度比最初计划的大大加快。这使农业在1955年和1956年出现严重问题,负责经济规划的领导人就粮食生产和其他方面的过高指标提出了警吿。他们说,「冒进」会导致经济失调,损害长期经济增长,造成农民生计困难。1956年和 1957年期间,他们成功制止了毛泽东对过高产量指标的盲目追求,但这没能持续多久。

反右运动期间,在1957年9至10月举行的中共会议上,毛泽东大力反击,强烈要求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生产目标。他把经济政策问题变成政治忠诚问题。他宣布,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右派分子提出的批评意见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他宣布,反对「冒进」的中共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他指责称,这种错误的政治路线导致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态度软化,从而鼓励了「资产阶级」和「富农」在1957年发动的反扑。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想法,源于他在1957年11月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在前一年的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新的苏联五年规划将是共产主义建设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1957年5月,他宣布苏联「重要产品」的产量将在15年内超过美国。在私下谈话中,赫鲁晓夫可能对毛泽东说,苏联第七个五年规划的目标是到1970年,使苏联人均工业产量超过美国。3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 154 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乐观,尽管专家们和经济规划官员坚持认为, 这样的宏大计划不切实际,但他和赫鲁晓夫都不以为然。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增强了他的信心。身处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给北京的中共领导人



1. Bernstein ( 1969), Teiwes and Sun ( 1993 ; 1997; 1999, 20一52) ·
2. Teiwes and Sun ( 1999, 67一69).
3. MacFarquhar ( 1983 , 16) ·「重要产品」包括铁矿石、生铁、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水泥,以及一些消费品,如糖、毛织品和皮鞋。

打电话,说反对冒进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可以远远超过那些谨慎的领导人的看法。 [[340]](#footnote-340)

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鼓舞了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公开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超越英国。这在他回国两周后成为党的政策。[[341]](#footnote-341)毛泽东打算通过政治动员来迅速实现经济突破。在第一个五年规划( 1953至1957年) 期间,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这种增长高度失调,这是苏联模式的通病。工业增速是农业的五倍,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缓慢,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征调用来养活工业劳动者。 [[342]](#footnote-342)

毛泽东对建议谨慎行事和平衡发展的规划部门官员很不耐烦。他相信,集体化和大规模动员会克服所有障碍。[[343]](#footnote-343)毛泽东拒绝了陈云和邓子恢等人关于各产业平衡发展的意见。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陈云希望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对轻工业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可购买的生活消费品,而轻工业的利润积累将为重工业投资提供资金支持。陈云的想法类似于上世纪20年代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在苏联提倡的那一套,但布哈林的主张被斯大林否决,并且在斯大林铲除政治对手的过程中被定性为右倾错误(苏联历史短训班就是这样讲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就源于短训班)。[[344]](#footnote-344)虽然陈云的想法与斯大林执政早期的苏联正统观念背道而驰,但非常符合对苏联发展模式的回顾性批判式思考。1950年代,苏联发展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被广泛采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明显过时,在精通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人眼中是思想狭隘的,落后时代20年。

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组织变革和政治动员来实现粮食供应的迅速突

破,从农村征调更多的粮食,以支持对重工业的更大投入。毛泽东相 155 信,更大和更多的「社会主义」公社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对现有资源尤其是劳动力的集中动员会实现产量突破。和传统的苏联模式一样,资本投资被过多地直接投向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等行业。 [[345]](#footnote-345)

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错误看法还不足以酿成大跃进的巨大灾难。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是这些看法与政治运动和结合的产物。政治运动使经济政策蒙上了政治忠诚与否的色彩,与阶级斗争划上等号。大跃进未能刺激经济增长,而大跃进的政治因素把它变成了一场灾难。

在1958年1月的中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和其他反对冒进的领导人。他声称,这种错误路线给右派分子壮了胆。在随后几个月的中共会议上,他继续批评那些强调平衡、规划和经济规律的人。他说, 这些原则只是基于「迷信」和「教条主义」。毛泽东宣布,中国从此以后将「政治挂帅」,强调人的因素和群众的热情。专家不再主导决策过程。他们对合理规划和科学标准的信奉是「资产阶级迷信」。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将取代专家。专家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权力。[[346]](#footnote-346)毛泽东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发动「技术革命」,批评「右派思想」, 「破除对专家和苏联模式的迷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么强烈地坚持他对经济的看法,从本质上转向个人独裁,不容许任何反对意见。持有不同政策观点的人受到严厉批评。1958年期间,他直接接过经济指挥棒,绕过产业部门的经济规划官员,让省委书记和国家党组织执行他的命令。毛泽东发出党内阶级斗争的警吿,这加大了提高产量指标的政治压力。他把「反冒进」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观。他警吿说,党内存在分裂风险。他声称几个省出现了「反党集团」,导致1958年5月对「反冒进」的 156 省级领导进行了高调清洗。周恩来和其他官员被迫作出自我批评,有几人被撤职。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甚至似乎被取消了总理职务。 [[347]](#footnote-347)

这些威胁迫使各级干部对大跃进表现出绝对的热情。制定产量指标的会议变成了对「反冒进」错误路线的批判大会。1958年期间,随着反右运动蔓延到农村地区,曾经反对快速集体化和指出问题的人也成为打击对象。[[348]](#footnote-348)这压制了所有反对意见,并使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成为政治忠诚的标准。

遭到毛泽东反对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应该让政府部委司局和供职于这些机构的规划者、专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来确定经济目标和投资重点。这一方案由陈云设计,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苏联在二战后就采用了这种现代化的做法,按照一套官僚程序把经济规划从上至下传达给省和地方政府。而在1958年期间,毛泽东却把规划工作从他们手中剥离,交给省委书记来做。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氛围中,省委书记们不得不积极响应。对大跃进的规划演变成了充满政治色彩的誓师大会。在很多会议上,各级党委书记竞相承诺大幅提高粮食、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这使党组织本身掌握了巨大权力,代替各级政府作出经济决策。这还使各级干部承受了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全心全意的支持, 然后努力兑现他们的承诺。

党委书记们夸下海口大幅提高工业产量,这使毛泽东大受鼓舞。 1958年5月,他宣布自己之前太过保守,现在只需要7年时间就能超过英国, 15年时间就能赶上美国。[[349]](#footnote-349)钢铁指标大幅提高。1957年的全国产量为500万吨,规划官员最初对1958年设定的目标为580万吨,但到了 1958年9月,省委书记们承诺的数字使全年目标提高到1 , 100万吨,

1959年的预期目标更是高达3 ,900万吨。[[350]](#footnote-350)为了实现这些承诺,对重工业 157 的资本投资出现飙升,主要通过从社会主义阵营进口设备(通过增加粮食出口来偿债)来提高产能。1958年的资本投资目标最初是145亿元, 后来迅速提高到386亿元。 [[351]](#footnote-351)

党委书记们同样承诺大幅提高农业产量。1957年的粮食产量为L95 亿吨,而在1958年期间,指标迅速提高至3 · 5亿多吨。[[352]](#footnote-352)和重工业不同的是,尽管农业指标大幅提升,但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却只有小幅增长。为了实现不切实际的产量指标,农村地区的干部进行了激进的组织变革,对农民们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 农业大跃进

增加粮食产量的战略严重依赖于扩大灌溉和垦荒面积。水坝和沟渠所覆盖的区域超出了公社的范围,所以第一步是把现有的公社合并成更大的公社。1957年,大约有7万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包括大约15个生产大队(大致上等同于村)。而在1958年期间,这些公社被合并成大约 2 · 3万个大公社,平均每个公社包括50多个村。这使干部可以动员大量劳动力进行大型建设项目。 [[353]](#footnote-353)

公社内部也作出了调整。农业生产以军事方式进行组织,农户被要求上交个人财物一一一一一一•炊具、桌子、椅子和橱柜一一一一一一舼公社使用。所有人都到公社食堂吃饭,不再自己储存和准备食物,而是大家共同完成。工分的记录被暂停,因为对农民的时间和精力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农民可以在食堂随便吃,不再受到定量供应的限制。为了让妇女和老年人参加劳动,公社建立了托儿所和幼见园。在修建食堂、幼儿园和办公楼 158 时,农民被分配到这些项目当建筑工人。在某些情况下,私人住宅被推倒拆掉,充作建筑材料。农民按照军队的方式被组织成大队,通常男女分开。劳动基本上没有报酬,而且是强制性的。如果拒绝劳动,就无权到公社食堂吃饭,但只有公社食堂才有饭吃。 [[354]](#footnote-354)

大跃进这场生产运动像军事运动一样组织起来。河南省的一个模范公社建立了28个生产兵团,每个兵团下设团、连、排和班。农民被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服从领导和命令;积极劳动;不能迟到或早退;与资本主义思想作不懈斗争;互助合作。农民每个月至少要劳动28天, 每天早晨军号一响就必须起床,一起吃饭,同时睡觉。这个模范公社用兵营取代私人住房,男女分开, -儿童住在单独的房子里。 [[355]](#footnote-355)

在大跃进之前,公社的劳动很有规律,随季节而定。春耕和秋收是最忙碌的时节,冬天则是农闲时间。但大跃进打破了这种规律,农民总是忙个不停,不是在田里干活,就是在从事大规模灌溉项目、道路建设和垦荒。为了帮助省领导实现大幅提高的工业产量指标,公社建立了小型工厂。为了完成省里的钢铁产量指标,各村建起了原始落后的临时炼钢炉,昼夜不停地运转。劳动力被用于农业生产以外的地方,这常常导致照料和收割作物的农民太少。以前按照农事季节作息生活的农民发现,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了出来,公社干部对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356]](#footnote-356)

新的人民公社对集体生活的强调远远超过了集体农庄,还使农村官僚机构大幅膨胀。农业生产各方面的集中指挥需要更多的各级公薪干部。公社通常有至少30名干部,生产大队有10名,生产队有5名。这大大高于两年前的数量。

在集体化之前, 1名公薪干部通常负责7个村。现在,每个村需要 159 提供大约5名干部的薪水,到了公社级别还有全职的公薪干部。[[357]](#footnote-357)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意味着新的农村官僚机构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全职干部, 这进一步压榨了农村收入。另外,这个新的官僚阶层对农村资源拥有集中支配权,而那些资源以前是在农户或者村政府手中。他们控制了更多的资金,作出开支决定,掌握了村民的时间、劳动甚至食物供应。这为小规模腐败、特权和滥权创造了条件。

## 官僚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欺骗和自我欺骗成风,最终导致大跃进酿成灾难。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不得不随波逐流、盲目服从。起初,在目睹了对「反冒进」的清洗后,全国各级干部纷纷不切实际地承诺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并表现出对前景充满信心和热情。这种自我欺骗还意味着,赞同那些明显适得其反的措施会产生积极成果,而且完全照办,根本不顾常识。然后,自我欺骗演变成向上级浮夸虚报,结果被当成榜样加以宣传和表扬,这使其他干部面临更大压力,他们也竞相效仿,弄虚作假。随着问题的增多,虚报又发展成瞒报。事实被隐瞒,言路被闭塞,哪怕作物枯萎、饥饿蔓延,也坚持宣称一切顺利。后来,尽管饥荒日益扩大,但先前虚报的粮食大丰收已经使农村干部作茧自缚,他们不得不向国家上交更多粮食,这导致饥荒进一步恶化。欺骗的最后一种形式是声称农民隐藏粮食、吃得太多,那些说没有粮食可交的农村干部是在说谎,他们囤积粮食供自己享用。这导致农民越来越少的储粮被剥夺,即使饥荒已经非常严重。

160 恶性循环的第一步是省、市、县和下属各级党委书记在小组会议上进行新的规划,承诺来年的产量指标。最初的几轮小组会议举行的时候,正是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毛泽东把反冒进和党内右倾错误公开联系起来之际。这些誓师会议就像一场拍卖,最高「出价」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高「出价」裹挟了其他人,因为没有人希望被视为落后分子。 23 ,当” 省级干部举行区和市级规划会议时,他们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下属承诺很高的产量指标,好让他们可以完成省级指标。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要求下属承诺的产量指标之和往往高于省级指标,以防范可能出现的产量缺口。随着这种层层加码现象向下逐级蔓延,产量指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这些不断提高产量指标的要求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之间互相冲突。短时间内提高粮食产量的要求与现实和冲突,因为只有在扩大灌溉



23 Oi ( 1989 59 62),

和垦荒面积之后,才可能提高粮食产量。农村干部从田地里调走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建设项目,修筑大坝、水库和沟渠,以及开垦荒地。这转移了种植、栽培和收割作物的劳动力,影响了粮食产量。抽调劳动力进行土法炼钢,或者把劳动力调入公社和县政府建立的新工厂,也会造成同样的问题。农村干部只能促使农民更努力、更快速地工作,来完成那些相互矛盾的指标。

相互欺骗循环的第二步是推广一系列模范样板,据说这些做法对实现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很有帮助。其中两种方法是密植和深耕,被党组织和新闻媒体大加推广和赞扬。密植是指提高播种的密度,使用更多的化肥,以此来增加有限耕地的粮食产量。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一是在播种时需要使用更多的种子,二是秧苗互相争夺阳光、水和土壤营养,导 161 致作物发育不良和歉收。这不仅导致粮食减产,还使种子和化肥被大量浪费。尽管如此,这种方法的成功事迹仍被媒体热心报道。深耕同样具有破坏性。它把肥沃的表土(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是又薄又少)埋入深深的地下,把贫瘠的底土翻到表面。 [[358]](#footnote-358)

地方干部不顾一切地想要实现不可能完成的指标,结果弄巧成拙最终带来巨大损失。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破坏果树等宝贵资源,以便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另一个例子是在不适合小麦或其他谷物生长的田地上种植粮食,导致副食品减产。最令人震惊和伤害最大的,是为应对化肥不足而普遍采取的一种措施。由泥砖和稻草建成的农民住房被拆掉,用来给田地施肥,使某些地方的很多农民长期无家可归。[[359]](#footnote-359)由于匆忙上马, 没有请教土木工程师和其他专家,灌溉项目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某个地方的灌溉系统造成内涝,盐分侵入表土层,使农作物产量大幅减少。匆忙建成的大坝在雨季容易垮塌,引发可怕的洪水。为了种植粮食,山坡被梯化或被砍光树木,导致水土严重流失和河道被淤泥堵塞。 [[360]](#footnote-360)

失败是必然的。如果干部汇报说,这些在政治上备受赞扬的做法存在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政治谴责,被批评为对党和大跃进缺乏信心。各级干部对问题心知肚明,但不敢开口,而且积极封锁消息,以免他们弄虚作假的事情曝光。几年后,他们会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向上级报吿饥荒,是因为「担心被打成右倾分子」。而当干部向公社报吿饥荒时,领导却明确警吿他们,说这是「右倾思想」,他们「看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生产大队的干部被要求汇报更高的粮食产量,「没有这么做的人遭到批斗和殴打」。[[361]](#footnote-361)地方干部领着参观代表团踏上经过精心策划的 162 行程,以免他们发现当地的问题。如果党派来的调查员发现了隐瞒饥荒的证据,就会受到地方干部威胁,有时甚至被禁止离开当地。[[362]](#footnote-362)地方干部少报死亡人数,殚心竭虑捏造统计数据,这种行为常常得到上级领导的默许,因为他们同样希望只报喜不报忧。 [[363]](#footnote-363)

统计系统被完全政治化。各级党委必须认可汇报给上级的统计数据。在大跃进的第一年,统计机构被吿知,「我们的统计工作是为了服务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需不需要和需要什么的问题由别人来决定。同样,计算方法和标准根据我们所服务的人的要求而定。」[[364]](#footnote-364)[[365]](#footnote-365)如果省级统计人员抱怨他们的党委汇报虚假数据,他们就会被吿知,「大跃进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你所能做的,就是服从省委的决定。某一天,中央政府可能会向你要真实数据,你必须确保随时可以向他们呈递所有的真实数据。」311959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忽视的地步,国家统计局提交了真实报吿。结果,统计局领导因为「政治觉悟低」和试图「给大跃进吹冷风」,而被迫进行自我批评。统计局被要求「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在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起反攻。」[[366]](#footnote-366)

## 官僚压迫的恶性循环

农民并不总是自愿遵守对他们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干部都满腔热情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赞同明显错误的指示,提交虚假的报吿,掩盖严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是不对那些不听话或者试图说出真相的人进行威逼恐吓和采取令人震惊的暴力措施,官僚自欺欺人的把戏就无法再持续下去。于是,农村的大跃进染上了浓厚的暴力压迫色彩, 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问越演越烈。彼此欺骗的党组织不希望听到坏

消息,就算真有坏消息,也会故意曲解它 163 农村地区的大跃进从一开始就极具破坏性。尽管自我审查和虚假报吿的现象铺天盖地,但在1958年4月,中央政府确实收到了大规模食物短缺和粮食危机的真实报吿。到1958年下半年,饥荒即将来临的迹象显露无疑。1959年初,饥荒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367]](#footnote-367)

虽然问题越来越多,但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一个他从未动摇的观点大跃进所代表的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其成绩远远超过其缺点。对大跃进的批评是阶级斗争的体现,是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发动的进攻。他在 195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一大二公的公社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 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368]](#footnote-368)

毛泽东指责地方干部推行政策用力过度,做事太急,能力不足,制定的目标过高。他承认饥荒报吿是事实,但坚持认为问题不是那么严重,而是因为基层执行有误,大跃进的原则没有错。 [[369]](#footnote-369)

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收成数据被严重夸大,导致粮食征购过高。[[370]](#footnote-370)省级干部谎报称上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所以他们需要上交的粮食也相应增加。1958年真实的粮食产量为2亿吨,只比上年增长2 · 5 %。

164 但官方的粮食产量数据被荒唐地夸大到3.75亿吨。[[371]](#footnote-371)[[372]](#footnote-372)出于明显的原因, 省级干部发现不可能完成更高的征购指标。由于1958年饥荒蔓延,公社陷入混乱,导致作物歉收, 1959年的粮食产量下滑15 %。省级干部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毛泽东似乎已经在说大跃进的问题是他们的错。

省级干部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可以承认上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是假的一一一一这肯定会遭到政治惩罚,或者可以归咎于下属。很多人选择了后者。1959年1月,广东省报吿称,粮食是有的,但被农户藏了起来,当地干部默许了这种行为。他们报吿称,搜查村庄的工作收效很大,找到了被隐藏的粮食。安徽省提交的报吿这样写道:「农村地区粮食短缺问题不是因为没有粮食,也不是因为国家征购的粮食过多,而是因为思想问题,特别是地方干部的思想问题。」这份报吿解释说,囤积粮食是因为地方干部担心公社不让他们保留足够的粮食,或者是为了避免明年指标增加太多,又或者是他们怀疑其他干部扌日留粮食,把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

毛泽东已经被迫承认大跃进存在严重问题,但不愿承认其总体设计有问题。因此,他欣然接受了上述说法。他认为「隐瞒粮食」的问题「非常严重」,要求加大努力找出更多粮食。[[373]](#footnote-373)于是,打击「瞒产私分」的全国性运动开始了。如果各级干部坚持说没有更多粮食,农民已经在挨饿,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为阴谋反对大跃进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反对毛主席。

这场运动演变成了政治斗争。不承认隐瞒粮食的村干部和普通农民遭到批斗和威胁,最后常常升级为殴打甚至折磨。多年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村干部说:「如果你不打,你就会被打。你打得越狠,说明你的立场就越坚定,对共产党就越忠诚。如果你不打,就会被当成右倾分 165 子,很快会被别人打。」[[374]](#footnote-374)在某公社,县委指示从当地最高级别的干部查起。在传达这一指示的会议上,几位公社干部被捆绑殴打,其中一人当场死亡。[[375]](#footnote-375)坚持说没有多余粮食的农村干部遭到批斗和殴打。很多人被降级或开除党内职务,但至少保住了性命,而有些人不堪忍受,自寻短见。 [[376]](#footnote-376)[[377]](#footnote-377)

这场运动对农民更加残酷。为了找到被藏起来的粮食,农民的家被翻了个遍,户主遭到拘留审问,面临坐牢威胁、殴打甚至折磨。43就算没有发现隐藏的粮食,家具和其他家庭财产也会被洗劫一空,使很多忍饥挨饿的农户更加穷困潦倒。有时,农民的家被推倒,以此惩罚那些拒绝交出隐藏粮食的人,甚至停止提供口粮,让他们活活饿死。很多地方建立了「劳动改造大队」,被怀疑隐藏粮食的人被迫进行高强度劳动,而他们得到的口粮少得可怜,只能忍饥挨饿。在疯狂搜查粮食的过程中, 无论地方干部多么凶恶,都找不到什么粮食。这场运动仅仅使饥荒变得更加严重。 [[378]](#footnote-378)

1959年7到8月,正当反对瞒产私分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如何「重新调整」大跃进,缓解毛泽东被迫承认的几个严重问题。很多领导人敏鋭地意识到了饥荒的蔓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和亲戚们进行了一番交谈。军队领导人通过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关于家人境况的报吿,意识到了饥荒的问题。这些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大跃进的很多核心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他们希望说服毛泽东改变路线,避免进一步损失。

不幸的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毛泽东反应激烈,因为对大跃进的批评明显意味着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夸耀,问题不是出在地方干部执行有误。[[379]](#footnote-379)他听说,一些中央委员私下里直言不讳地讲大跃进的坏话,说

166 土法炼钢炉「无用」,整个政策是「骄傲自大」的产物,质疑毛泽东关于「缺点」只是「一个指头」和「成绩」是「九个指头」的观点。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些人把他的专横跋扈比作「斯大林晚年」的专制独裁。 [[380]](#footnote-380)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大跃进的缺点。收到这封信后,毛泽东决定反击。他的反应是强烈和报复性的,抹杀了调整大跃进政策以防止灾难进一步恶化的任何可能性。[[381]](#footnote-381)他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要求严厉批评彭德怀和其他几位高级领导人,说他们结成「反党集团」,发起「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升级了他关于党内阶级斗争的言论,以个人名义指责彭德怀等人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缺乏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382]](#footnote-382)[[383]](#footnote-383)其他高级领导人,甚至是那些心里和彭德怀等人看法相同的人,也跟着站队并以同样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在8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党内的根本「路线斗争」·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 …初上庐山,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 …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其实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 …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题了,而是反右的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进攻。[[384]](#footnote-384)

随后,毛泽东又在8月中旬写了两篇措辞更加严厉、情绪更加激烈的党内通信。「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

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 167 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

的。」[[385]](#footnote-385)毛泽东不允许这一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386]](#footnote-386)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后对斯大林主义思路的充分运用。政策分歧代表阶级斗争,最高领袖是真和和智慧的唯一源泉。质疑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叛徒。关于彭德怀的官方决议把问题定性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他们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要求全党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所有人被要求颂扬大跃进的正确性,批判所有质疑者:「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387]](#footnote-387)

于是,第二场「反右」运动开始了,这次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场运动导致几千万人饿死。共产党正在修正错误以缓解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然而这场政治运动却将党的纠错重心转移。中国徘徊在历史性饥荒的边缘,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做法最终把中国推下悬崖。反对各地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运动,强化了反对「瞒产私分」的运动,使全国一千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惩罚。 [[388]](#footnote-388)

168 任何合理的观点都会认为,灾难的根源在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强制性大规模动员。如果各级干部没有热情响应党中央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果指出这些要求明显存在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会被惩罚,有时甚至遭到暴力对待。毛泽东错误地认为,问题出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猛烈逆流」。他把问题归咎于反党集团和阶级敌人的破坏 [[389]](#footnote-389)

毛泽东不是把农村的暴行和饥饿归咎于他所命令推行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认为「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权力。在贯彻执行错误运动的过程中,农村干部是毛泽东最忠诚、政治上最狂热的代理人,他们对随后发生的灾难负有责任。1960年底,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写到,问题「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390]](#footnote-390)中央委员会指责「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篡夺党和行政领导权,以反右倾运动为掩护,他们… …采取地主和国民党的手段,比如任意殴打、逮捕和杀害,实施大规模阶级报复… …各级领导和干部变成控制和镇压人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冷血杀手。」[[391]](#footnote-391)

总而言之,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官僚体系强制要求干部无条件忠诚, 动员干部对臆想的敌人不断进行阶级斗争,而在于潜入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颠覆活动。毛泽东根本不相信,忠诚的地方干部在必须服从中央错误政策的压力下做出暴行。1960年12月,在河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信阳事件时,一位官员表达了他开展对敌斗争的决心

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 169 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 …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 …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392]](#footnote-392)

在权力滥用特别严重的河南省信阳专区,数千名农村干部被撤职, 一万多人被批斗,每个县都被下达了几百人的犯错干部处理指标。[[393]](#footnote-393)由于犯错者被当成在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地主和富农,这些「坏阶级」群体也被挑出来受到迫害。

## 饥荒的规模和原因

直到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饥荒才被官方承认。饥荒死亡人数是被严格保护的最高机密。据说周恩来收到了一份详细报吿,该报吿声称死亡人数达到几千万人。他立刻指示官员销毁这份报吿的所有副本和原始数据。61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公布人口数据。毛泽东去世后,政府开始发布人口和农业统计数据,人口统计学家立刻发现了饥荒异常严重的确凿证据。

直到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及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才可以准确可靠地计算大跃进对人口的影响。对于人口超过六亿的中国来说,全国平均值背后的含义令人震惊。从1957到1960年,粗死亡率(crudedeathrate)提高2·5倍,出生时预期寿命从49 · 5岁降至24.6 岁,婴儿死亡率翻了一倍多。在1958年后的四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千多万(表8.1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早死亡人数」逼近 3 ,000万人。



1. 同上,页61-64。
2. 同上,页406707。
3. Aird ( 1982, 278), Coale ( 1981 , 89)·
4. 人口统计学家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得出了对饥荒死亡人数的最终估计。Ashton及其同事们( 1984, 614, 619 )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950万, Banister ( 1987 )估计为2, 890万, coale ( 1984 )估计为3 ,070 万,数据基本一致。Yang ( 2012, 421一425 , 428一430 )根据中国学者的非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不同估计方法,对各种估计进行了评估,认为其中3 ,600万是可能性最高的数字。其他学者(例如, Dik。tter2010, 324一334 )认为,档案记录实际上可以支持高达5 ,000万的数目。这类数字不符合对应年龄的人口数据。为了使更大的估计数目可信,全国人口普查将不得不在早期人口普查中低报真实的人口数据,并在之后的人口普查中夸大人口数据一一一这

现在,虽然饥荒已经被官方承认,但对于饥荒的规模和真正原因,

中国政府仍然不愿意承认。大饥荒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洪 170 水、干旱和暴雨。64这种解释与天灾破坏和作物产量的地区数据和矛盾。 1959年,饥荒达到高峰时,只有9 · 6%的播种面积受到天灾影响, 1960 年为16 · 6% , 1961年为20· 1 %。只有9 ·6%的播种面积连续两年位于指定的受灾区域。1959年天灾造成的破坏并不比1956年和1957年更严重, 那两年粮食收成还有所增加。65在减少的粮食产量中,只有不到13 %可归咎于天灾。如果大跃进的政策没有禁止把粮食送回农村,那么饥荒就不会发生。 66

表8· 1大跃进所造成的人日影响

粗出生率 粗死亡率 初生婴儿 婴儿死亡率

人口

年份 (每千人出 (每千人死 预期寿命 (每千人死

(百万)

|  |  |  |  |  |
| --- | --- | --- | --- | --- |
| 1956 39 ·9 | 20 · 1 | 47 ·0 | 143 | 619 · 1 |
| 1957 433 | 18 · 1 | 49 · 5 | 132 | 633 ·2 |
| 1958 37 · 8 | 20 ·7 | 45 · 8 | 146 | 646 ·7 |
| 1959 28 · 5 | 22 · 1 | 42 · 5 | 160 | 654 · 3 |
| 1960 26 , 8 | 44· 6 | 24, 6 | 284 | 650, 7 |
| 1961 22 ·4 | 23 ·0 | 38 ·4 | 183 | 644· 8 |
| 1962 4L0 | 14·0 | 53 ·0 | 89 | 653 · 3 |
| 1963 49 , 8 13 · 8 54·9 674·2 | | | | |

 生人数) 亡人数) (岁) 亡人数)

来源: Banister ( 1984, 254 )



可能性不大。coale ( 1984, 64一74 )解释了生命表方法。

1. 官方报道还将饥荒死亡人数降至最低,将死亡人数定为1 ,700万,根据一项未公开的「优化」方法计算,该方法将过高的超额死亡率归因于「自然原因」。Yang Jisheng ( 2012, 421725 )批判性地评述了中国作者的估算范围。
2. Peng ( 1987, 651 )·
3. Li andYang (2005, 843) · Kung and Lin ( 2003 , 66一67 )在气候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方面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表8 ·2大跃进期间的粮食产量与征购

|  |  |  |  |
| --- | --- | --- | --- |
| 年份 | 粮食产量 (百万吨) | 粮食征购 (百万吨) | 人均自留粮食 (公斤/人) |
|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 193  195  200  170  143  148  160  170  188  195  214 | 40  46  52  64  32  40  39  41 | 284  273  268  193  182  209  229 231  256 261  282 |

来源: Li and Yang ( 2005, 846 )

这些年份准确的农业统计数据发人深思。1958年,真实的粮食产量仅增长2 · 5 % (表8 ·2 )。此后收成大幅减少,到1960年几乎下滑30% , 然后再次逐渐增加。大跃进对中国的农业造成巨大破坏,直至1966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对粮食产量的强调导致其他食物产品大幅减产。1960年的油料作物产量还不到1957年的一半,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年份都要低。1962年的甘蔗和甜菜产量比1957年减少三分之一,肉产量减少一半。 [[394]](#footnote-394)

但中央最初使用的却是大为不同的粮食产量数据。最初报吿的

1958年粮食产量为3 · 75亿吨,而1980年公布的真实数据是2亿吨。 [[395]](#footnote-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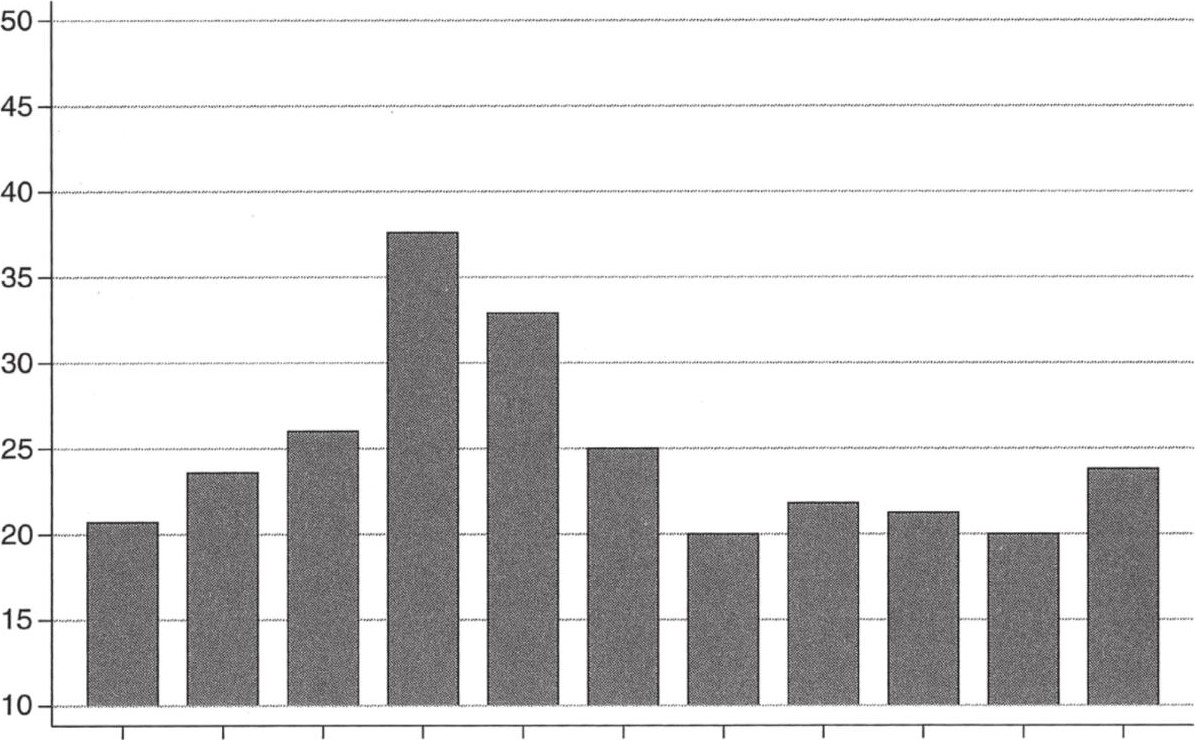
1959年,报吿的粮食产量为2 · 7亿吨,但真实数据是1.7亿吨。直到

1960年饥荒达到历史性水平,中央才报吿了较为真实的1.5亿吨收成数

据(真实数据为L43亿吨)。[[396]](#footnote-396)与此同时,公社连续两年被要求上交更多的粮食。1959年,在粮食产量减少3 ,000万吨的情况下,国家征购增加了1 ,200万吨。1960年,当饥荒无法再被忽视的时候,国家征购减少至 4,700万吨,但这仍然太高,与1957年的征购量持平,而1957年的粮食产量比1960年多出5 ,200万吨(表8.2 )。正当收成开始减少的时候,粮食征购占粮食产量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接近40% ,比 1956年提高了近一倍(图8 · 1 )。

172

图8· 1国家粮食征购亻占收成的百分比( 1956一1966 )

粮食征购占比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份

来源: 4kLi andYang ( 2005 , 846 )计算得出

留给公社的粮食大幅减少,从1958年的每人284公斤降至1960年的182公斤(表8 · 2 )。大跃进政策带来了深重且长期的破坏,公社的人均粮食供应直到十年后才恢复至1956年的水平(图82 )。这是因为粮食分配长期偏向城市。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供应中断,而来自城郊公社 173 的饥饿难民使情况更加恶化。乞丐在街上游荡,粮店爆发冲突,小偷小摸和持械抢劫变得更加普遍。70从1957年到1961年,上海的猪肉供应减少近90% ,其他食物供应也很少,导致大范围的营养不良。北京的1961 年死亡率是1957年的两倍。71尽管如此,城市获得的粮食供应足以避免

图8 ·2集体公社自留的粮食( 1956一1966 )

300

275

公 250 斤

一 225 每

人 200 一 175

150

125

100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份

来源: Li and Yang ( 2005, 846 )

政府努力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外界隐瞒这些问题。为了帮助逃荒的难民,国际红十字会打算提供粮食援助,但遭到中国断然拒绝。72中国继续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粮食,以偿还贷款。731959年的

1. Brown (2011 ; 2012, 53一75)·
2. MacFarquhar ( 1997, 3) ·
3. Ashton et al. ( 1984, 630一632)·反共产主义人士发布的关于饥荒的频繁报道通常被认为是有偏见的
4. Dikötter (2010, 72一83 ), Lüthi (2008 , 109-111 , 153一154) ·

1 81

粮食净出口实际上增加了逾50%。1960年,即使是在饥荒严重程度无法再被忽视的情况下,粮食出口还在继续,但数量有所减少。直到1961 年,中国才成为粮食净进口国。[[397]](#footnote-397)中国拖延了两年时间才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导致粮食净出口达到近700万吨。按照每天2,000卡路里的基础代谢量,这么多的粮食可以供应1 ,600万人近两年时间。[[398]](#footnote-398)中国领导人为了面子而制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使饥荒进一步恶化。

## 工业大跃进

从统计数据来看,大跃进对制造业的破坏不下于对农业的破坏。考虑到对农业的破坏造成了严重饥荒,工业受到的关注少得多是可以理解的。工业衰退,产量减少,工人下岗。大跃进对工业体系的破坏虽然没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但却造成了持续多年的工业衰退。

原因很容易理解。正如第五章所述,苏联工业体系是「资源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在这种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当资源供应一一一燃料、原料、零件 短缺时,生产就会停止。大跃进的目标是一举打破阻碍生产的资源限制,扩大整个工业体系。中国想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来实现这一点。现有的工人被要求更努力、更快速、更长 174 时间地工作。产能迅速扩大。地方政府建立大量的新工厂,动员农村公社的劳动力进厂工作。产量指标全面提升。在压力下,各级党委书记承诺大幅提高钢铁、煤炭、化工、石油、机械和机动车辆的生产指标。通过促使所有人更努力、更快速地工作,以及榨取工业体系中的每一分冗余资源,供应增加带来的良性循环会消除资源对工业的限制,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这种想法在毛泽东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对党的干部也具有吸引力。通过在工业体系内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借鉴自苏联的笨重官僚体系会焕发生机,党的领导会使人的潜力发挥到以前无法想象的地步。只要党不懈地动员人民和物质资源,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就可以实现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一一一正如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一夜之间,短缺经济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从短期来看,只有加快现有工作速度,工厂才可能满足大幅提高产量的要求。要想加快速度,可以改变或放弃旨在确保产品质量、工人安全或固定设备维护的程序,可以强制工人加班,也可以雇用大量的新工人。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地方官员迅速建立新工厂或扩建已有工厂,以此响应提高产量的号召。他们从附近的公社雇用大量的新工人, 这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分流的一部分原因,最终导致粮食减产。在 1958年和1959年,中国各地的县城和乡镇报吿称,工业就业人数大幅增加。增加的人手几乎全部从事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以低资本投入来提高产量。

加快现有工作速度的要求,完全无视工程和技术人员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工人安全和固定设备维护而建立的程序。这常常使党委书记和党内积极分子与白领人员和技术熟练工人之间产生矛盾分歧。党委书记坚 175 持要求加快熔炼钢铁的速度,寻找稀有合金替代品,减少化学质量检查。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指出,以更快的速度加热炼钢炉会浪费稀缺的燃料,改变化学成分或跳过质量检查会导致产品不符合下游用户的钢铁技术规格。但他们的担心都被置之不理。在机床或生产线操作中,党委书记发现,通过减少质量检查、提高工作速度或延长工作时间,可以加快操作速度。

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工会干部知道,这些提议会导致固定设备的损坏、危及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工业事故,以及不符合质量标准因而浪费稀缺资源的瑕疵产品。但党委书记压制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在「释放群众创造力」的会议上,政治积极分子提出了上述快捷方式和革新,在工厂里 (和媒体上)受到表扬。就浪费、质量和安全问题提出反对意见的工程和技术人员,被批评为「资产阶级专家」,说他们的反动观点是基于「迷信」。在反右运动后,少数人「愚蠢地」坚持他们的反对意见,认为党的大跃进可能适得其反。

183

这些预测很快变成现实。工厂出现了许多工业事故和设备故障。工人被迫长期轮班,因为疲劳而犯错;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不顾安全规定,造成死亡事故; [[399]](#footnote-399)超负荷运转或没有按时进行检修和保养的设备发生故障。即便故障没有导致伤亡,也要停工进行耗时的维修。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产量仍然在提升,至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产量提升的同时,质量在急剧下滑。因此,生产者面临一个选择,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选择并非难事。他们本来可以承认其产品不合格,宣布它们不能使用,不把它们包括进生产指标中, 把它们重做成可用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指标无法完成,用来生产不合格产品所消耗的劳力、材料和燃料都被浪费了。

于是,党委书记一边倒地选择宣布所有产品合格,并运送到最终用 176 户手中,压制管理人员、工人和工程人员的反对意见。这意味着他们把问题转移到了使用其产品的工厂。整个工业体系的工厂收到的钢铁容易碎裂或弯曲,无法用来生产他们的产品;零部件无法用于他们的装配过程;机床损坏或失灵;货车总是出故障。尽管可以使用的投入产品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个工业体系突然面临合格投入品的严重短缺,无法维持工业生产。

一场旨在克服资源限制的生产运动,反而导致了资源危机。中国各地的工厂收到的是他们无法使用的投入品。他们不得不耗费额外的能源和劳力,把不合格的投入品重做成可用的投入品(如果可能的话) ,或者试图把无用的投入品交换到能够重做(和极度需要可用投入品)的其他工厂。

工业衰退正在形成,原因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环境下造成衰退的金融恐慌和需求鋭减。中国的苏联式工业体系本就受到资源的限制,反而还系统性地大量浪费资源,造成一连串短缺危机。电力、汽油、燃油和煤炭被大量消耗,生产出来的却是无法使用的产品。[[400]](#footnote-400)

177 图8 · 3工业总产值( 1957一1965 ) (元)

200

180

160 工

'业140

120

100

百万 80 丿乙

60

40

20

0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年份

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3 , 214 ) 图8 ·4国有工业就业人数( 195 1965 )

30

25

国有

20 就业

人数

冖

百 0

万

一

5

0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年份

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3 , 126 )

185

到1960年,工业体系中所有的闲散资源都被耗尽。1961年,工业产值暴跌。到1962年,工业净产值下降近50% (图8 · 3 )。工业体系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产量直到1964年才恢复。在1958年和1959年生产高潮期间新增的工人纷纷下岗, 1958年之前就从事工业生产的部分工人也下岗了。[[401]](#footnote-401)非农就业人数从1960年的近6,000万减少至1962年的4,200 万,国有工业就业人数从1960年的2, 130万减少至1963年的1 , 120万(图 8 ·4 )。[[402]](#footnote-402)其中很多任务人都是在大跃进早期从附近的公社迁移而来。现在, 他们被迫大规模返回公社。中国的城市人口从1957年底的9 ,950万暴涨至1960年的L307亿。到1962年,这一数字减少至L167亿。[[403]](#footnote-403)[[404]](#footnote-404)中国工业企业数量在大跃进早期翻了一倍多,但现在急剧减少,因为在农村地区 178 建立的很多新工厂纷纷关闭。到1965年,工业企业数量比1957年还

## 中央计划导致的衰退

苏联工业体系的设计旨在排除市场资本主义典型的商业周期和金融恐慌所导致的不稳定性,确保持续稳定增长。毛泽东希望,他的大跃进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贡献。但结果适得其反:旨在避免衰退的工业体系反而出现了大规模衰退。1960至1962年的饥荒不是创新,而是不幸地重现了1932至1934年苏联的灾难。中国在之前的集体化运动中, 幸运地避免了这种灾难。 [[405]](#footnote-405)[[406]](#footnote-406)

中国经济在1960年代初的衰退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一样严重。 1929至1933年,美国人均收入下滑32%。1959至1962年,中国人均收入下滑35 %。但中美经济衰退的原因有所不同。美国经济大萧条是市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直到1940年才完全恢复。中国的经济衰退完全是错误的政府政策所致,在放弃这些政策后,经济恢复得比美国更快。到1964年,中国恢复到大跃进前的产量水平,只用了两年就摆脱低谷。 [[407]](#footnote-407)

中国的经济危机有政治和组织因素。之所以说有政治因素,是因为毛泽东作出极其错误的判断,固执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其他领导人,也是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批评作出过激反应,为了压制批评而发起了猛烈的反右运动。那场运动阻止了对大跃进政策的及时纠正,而政策纠正本来可以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之所以说有组织因素,是因为上级向下级施压,导致省级、区级和基层干部不切实际地承诺大幅提高工农业产量,也是因为这些干部在面对如实汇报问题和虚报成绩的选择时, 179 选择了后者。毛泽东的干预导致中国的经济体系和以全民动员为基础的政治组织遭遇重大挫折。1948至1949年,毛泽东在东北失败的边缘获得胜利,其方法是对军队和党组织提出远超普通限度的要求。十年后, 他又采用同样的方法,但这次却是从胜利的边缘遭遇失败。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和思想舵手的威信遭到严重削弱。大跃进灾难产生的政治后果在几年后才显现出来,当它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出现时,对中国造成了沉重打击。

|  |  |
| --- | --- |
| 9早迈向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可直接归因于毛泽东的专横和错误领导,必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出人意料的是,这没有导致他被赶下台,也没有严重削弱他的政治地位,但在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毛泽东被迫放弃了他不切实际的看法。其他领导人,甚至是那些最初支持大跃进、默许毛泽东打击彭德怀及其「反党集团」的领导人抓住此次机会,纠正这一时期的政治错误。他们暗中试图引导经济政策走向,摆脱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来加快工业发展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修复严重受损的经济。  毛泽东最初同意取消大跃进政策。在农业方面,这意味着把庞大的公社分成更易于管理的单位,关闭公社食堂,结束军队式的劳动力动员,恢复生产队和多个地方的个体农业,提供更加明确的生产激励和奖励。在工业方面,这意味着把权力交还给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尊重他们的意见,结东党支部组织的急功近利的生产活动,以加薪和奖金的形式激励工人。在全中国,这意味着不再坚持认为经济政策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现代社会主义阵营中盛行的、关于如何弥补苏联式经济缺陷的想法受到更广泛的倾听,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有更大的自由去思考和表达被意识形态拥护者压制的观点,大学招生不 | 180  181 |

再强调阶级成分和政治忠诚。

毛泽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些变化。他将之视为暂时的让步, 以纠正大跃进无意中造成的问题。即使是在最可怕的经济衰退和饥荒期间,把大跃进如实描述成灾难的坦白言论仍然令毛泽东感到愤怒。经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一过,他就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虽然毛泽东确实批评自己过于乐观,但他从未承认大跃进背后的核心想法是错的。尽管所有证据都表明事实正好和反,他继续声称,大跃进的成绩远远超过其缺点。

更令毛泽东不安的是,以顽固的刘少奇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公然挑战他关于大跃进有很多成绩值得表扬的说法。同样令他不安的是,有人呼为1959年被错误地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和1957至1958年间被打为「反冒进分子」的人们平反。这一切暗指毛泽东犯了根本的「路线错误」。而且,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有限解冻导致了明显反对毛泽东看法的观点出现。这些观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不久,毛泽东指示忠诚的下级干部反击这些趋势,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

## 从毛的大跃进中拯救中国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终于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要求恢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停止强制占用生产队和社员的资源,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工分制,增加社员收入,恢复农村集市,认真实行劳逸结合。2几周后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作了有限的自我批评,承认向公社所有制转变的速度过快,推动的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太多。他承认,改变所有制和农业组织形式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3这些举动意味着终于允许进行姗姗来 182 迟的纠正,停止大跃进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大跃进导致大规模饥荒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毛泽



1. MacFarquhar ( 1997, 13一19) ·
2. 同上,页12-13 ;有关「农业十二条」节选的英文版,可参见ng ( 2012, 437 )。这些措施在1961年的「农业六十条」中得到扩展并正式化(MacFarquhar 1997,

4578, 63一65 )。

1. Yang (2012, 4377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 364一367 )。

东不再坚持认为问题是因为「瞒产私分」。他向农村地区派出了由其政治秘书和其他高级干部领导的调查队。在饥荒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亲自前往农村地区进行调查。[[408]](#footnote-408)[[409]](#footnote-409)调查结果令他们震惊: 直到政策被明确纠正和他们亲自深入农村,他们才真正了解到大跃进期间地方干部使农民遭受的苦难有多深。

## 责任归属

饥荒被中共高层承认后,就很难再继续宣称大跃进的成绩远远超过其缺点,以及把问题归咎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阴谋。1961年1月,党决定对个体农业、活跃农村市场、注重工业技术能力和物质奖励、加强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做出让步。[[410]](#footnote-410)但对于问题的原因,党内看法不一

1962年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规模空前的工作会议,旨在总结经验,在经济危机问题上「统一思想」。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党委干部,史称「七千人大会」。 [[411]](#footnote-411)

会议先是以小组形式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起草的一份报吿。该报吿大力肯定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总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指出了「党中央」犯下的一系列错误。[[412]](#footnote-412)这导致干部们纷纷怀疑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政策本身有误,而不是地方执行不力。这激怒了大跃进核心政策的坚定捍卫者, 促使毛泽东指示刘少奇让他的起草委员会修改报吿。在哪些高层领导人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起草委员会产生了分歧。有些委员强烈认为, 党的整个领导层都负有责任,包括毛泽东本人。这导致其他委员竭力为 183 毛泽东辩护,说他的领导是必不可少、没有错误的,他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 [[413]](#footnote-413)

刘少奇向大会作报吿时,先是小心谨慎地称赞了毛泽东,但也说了几件公然反对毛泽东看法的事情。他说,从1959到1961年,农业产量大幅减少,工业产量下滑40%。他认为,大跃进其实是大后退。他指出:「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违背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刘少奇还直言不讳地谈到责任归属:「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刘少奇把大跃进背后的核心政策称为一次「试验」,说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414]](#footnote-414)[[415]](#footnote-415)

刘少奇的评价比毛泽东的评价负面得多。他关于承认错误的讲话, 不管是不是有意挑战毛泽东,导致大会延长了几天,而很多代表觉得必须捍卫大跃进的正确性,向毛泽东宣誓效忠,他们把大跃进的问题归咎于「异常严重、长期持续」的自然灾害。可能最响亮、最热情的支持来自于军委领导、政治局常委林彪。他在这次会议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就像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打击彭德怀一样。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武汉。刘少奇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拯救经济的措施。这些会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比七千人大会作出的判 184 断要可怕得多。刘少奇说,党还没有充分面对现实。他认为,中国正面临深重的危机,需要的不是常规调整,而是「紧急措施」。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骇人的判断。他同意采取紧急措施,但认为这份报吿把形势看得过于黑暗。[[416]](#footnote-416)

尽管如此,刘少奇稳步推进恢复措施。1962年5月,他制定了经济调整计划,说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够稳固,这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在他的指示下,一系列旨在巩固经济基础的措施出笼。城市人口大幅下降,到 1962年底,有1 ,000万人回到农村。基建工程减少,个体农业试点扩大。受过批评和处分的「右倾机会主义」被重新甄别,可能翻案平反。 13 毛泽东无疑感觉到党的领导方向正在发生偏转,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驰。尤其令他不安的是,个体农业受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的好评,实施范围超出了他的预料。他开始强烈反对个体农业,严厉批评那些推广这种做法的省级干部。141962年7月,返回北京后不久,毛泽东把刘少奇叫到他的宿舍,当面批评他把形势看得过于黑暗,匆忙取消大跃进的很多政策。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回答:「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食,要上书的!」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位高层领导人敢对毛泽东这样讲话。毛泽东回击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肯定觉得,刘少奇顽固强调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说明刘少奇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不再致力于毛泽东最珍视的目标。「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想法。他已经敏鋭地意识到了赫鲁晓夫是如何在1956年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他在 185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讲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某些高级领导人说他的行为像「斯大林晚年」。从事后来看,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即使他不必担心失去对党的领导,他也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他死后,他的核心理念会被否定。

## 暂时的解冻

大跃进是向知识分子发动的总攻,是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贬低。从反右运动开始,大跃进从始至终都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



1. 同上,页508 
2. MacFarquhar ( 1997, 209一233) ·
3. 这段对话是在刘少奇妻儿撰写的刘少奇传记中提到的,由Yang ( 2012, 506一 507 )翻译。亦可参见Dikötter ( 2010, 337 )。「三面红旗」是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口号。它体现了毛泽东对推动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Yang2012, 87 )。

人文研究领域。阶级斗争也必须在学术界有所反映。外国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批评和压制,传统的人文科学也是如此。不管是哪种学术或者艺术,只要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积极支持党的总路线,就会被批评和压制。老一辈知识分子被送去搞体力劳动,失去了他们在大学和学术机构里的领导职位,被热烈拥护党的年轻一辈取而代之。工程师被要求向农民和工人学习,数学等学科和科学理论被忽视,只注重教授实践技目厶匕匕 [[417]](#footnote-417)

党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也取消了这些适得其反的政策,开始把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作为经济恢复战略的一部分。这带来了短暂的科学文化解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但这次,是刘少奇发起解冻,目的不是促进对党的批评,而是让中国的知识精英重新参与到经济建设的紧迫任务中去。1961年年中,党宣布知识分子不必总是向党交心,可以通过为中国发展作贡献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的爱国精神。[[418]](#footnote-418)[[419]](#footnote-419)随后,很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得以平反昭雪。许多人被允许返回之前的工作冈L-u位亠。1 表8 现出了尊重知识分子的新态度,他们的学识和技能不再被贬低为植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迷信」。 [[420]](#footnote-420)

186 新政策允许更自由地使用来自于资产阶级的科学理论,甚至是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家开始就经济改革发表意见,类似于在东欧和苏联被广泛讨论的看法。这些看法植根于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在斯大林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得到进一步发展。[[421]](#footnote-421)不久后,和苏联集团一样,中国的主要经济刊物也发表文章,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润和效率、价格和市场机制的角色、数学模型应用于经济

规划的前景和资本利息的效用。[[422]](#footnote-422)所有这些想法先前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孙冶方是引领这些讨论的人之一,他在1956年首先提出这些想法, 1961至1963年期间再次提出。 [[423]](#footnote-423)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短暂的文化复兴。被禁书籍再次出版;除了正统的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其他的文学形式受到公开鼓励;艺术本身一一一一一一•与阶级和政治内容无关一一一一一一啲内在价值得到更广泛的推崇。官方报刊批评文化官僚如暴君一般,对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只想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424]](#footnote-424)在这一时期,中宣部副主任召开了一次大型文学会议,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鼓励作者谴责群众运动和急功近利的项目,在文学作品中把大跃进描绘成一场不幸的悲剧,而不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乌托邦,如实讲述农民遭受的苦难。

尽管这时允许讨论先前被禁止的想法,但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学里,比1957年的时候显得更加迟疑。和百花齐放时期不同,这时没有民间杂志或团体。最富有批判性的表述实际上来自于党内级别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主要是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和百花齐放时期不同,这些官员的批评不是针对党,而是针对毛泽东近期推行的政策和那些政策所体现的政治思维。

这项活动的一个中心是由彭真担任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在七千人 187 大会的分组讨论会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毛泽东本人应该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承担部分责任,彭真是其中之一。[[425]](#footnote-425)北京的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作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 但也可以解读为对毛泽东领导方式及其近期政策的婉转批评,但当时并没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邓拓的杂文就是例子。由于毛泽东不满意

《人民日报》没有对他的百花齐放政策提供及时和足够的支持,邓拓被解除《人民日报》总编职务,转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426]](#footnote-426)[[427]](#footnote-427)[[428]](#footnote-428)他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专栏, 1961年3月至1962 年9月期间共发稿152篇,其中很多杂文可以解读为间接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官员的专制领导、无理行为和傲慢自大,对科学的贬低大跃进背后的无知臆想,以及对如实汇报坏消息的诚实官员的处罚。2 大概在同一时期,其中很多主题都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得到详细阐述。「三家村札记」涵盖一系列话题,主要作者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他们用同一个笔名发表文章。廖沫沙做过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家,在为该专栏撰稿时是北京市委高级官员,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明朝官员海瑞的剧本。刚正不阿的海瑞批评常年不上朝、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皇帝,对他说如果不把田还给农民,缓解农民的困境,那么整个王朝就完了。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海瑞骂皇帝>的文章,把1566年海瑞给皇帝的一封奏疏翻译成白话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但… …内外臣工谁都知道。

188 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429]](#footnote-429)大跃进结束后,吴晗在毛泽东一位秘书的劝说下,写了这些文章和剧本。那位秘书曾在1959年听到毛泽东抱怨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讲真话。毛泽东积极响应,称赞了吴晗的作品,多次亲切接见了这位历史学家,还送给他一本亲笔题赠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430]](#footnote-430)

## 重[[431]](#footnote-431)提激进看法

这一宽松时期是短暂的。毛泽东很快重提其看法,恢复他对政治议程的掌控。1962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对大跃进的悲观评价、对个体农业的热衷和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风」。31毛泽东警吿称,个体农业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他问道:「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他把单干风归咎于党内「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化程度不好的人:「党内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毛泽东认为,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判断是正确的。 [[432]](#footnote-432)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其政治信仰的核心。这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泉。 [[433]](#footnote-433)

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 …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鞗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郐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434]](#footnote-434)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毛泽东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这很快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1962年底展开试点,一开始是为了打击农村地区的腐败和滥权。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问题是掌握基层领导权的阶级敌人所为。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于中国的农村。这场新的运动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索。[[435]](#footnote-435)这场运动花了一年时间成形。基本做法是派遣工作组下乡调查地方的权力滥用。但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范围应该多大?应该派遣多少个工作组?应该多么严厉地对待打击对象?多少干部应该被撤职?领导工作组的应该是可能替直接下属掩盖错误行为的县委,还是应该由区委或省委负责,完全不让地方干部插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场运动时断时续,没有一个明确的焦点。[[436]](#footnote-436)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先前在大跃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但刘少奇也完全赞同农村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体现。他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敌人已经控制公社并渗透进党支部的前提假设。1964年,刘少奇开始主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融入自己的想法,把范围扩大到城市机构。他指示组建更大规模的工作组,由更高级别的干部组成,由更高层级的党组织领导。他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非常严厉地对待参与腐败和滥权的地方干部。刘少奇的激进立场和积极开展这场阶级斗争的做法,最初得到了毛泽东的衷心支持,因为这完全贯彻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看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庞大的工作组被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发起大规模调查,处罚了很多地方干部。这场运动以群众大会和批斗会的形式展开,有时还会出现殴打和自杀的情况。 [[437]](#footnote-437)190 这是1949年以来对全国党组织的最大打击。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激进的工作组甚至要求接管当地领导权。[[438]](#footnote-438)城市机构同样遭到严重破坏,企业和大学里的机关党委成为调查对象。刘少奇展现出对全国党组织行使其权力的决心,指责那些拖后腿的省委书记。 [[439]](#footnote-439)

人们也许以为刘少奇的立场会取悦毛泽东,但到1964年底,毛泽东对刘少奇开展这场运动的方式表示强烈反对,尤其是刘少奇竭力维护自己作为激进政治路线倡导者的权威。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政治局同僚赶下台的消息,和随后北京认为苏联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看法,可能触发了毛泽东的这种担忧。[[440]](#footnote-440)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痴迷,而且更加激进。这使得毛泽东担心出现「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更加令他不安的是,新的苏联领导层指责赫鲁晓夫的经济政策「轻率愚蠢」,批评他的领导风格蛮横粗暴,对其他同志盛气凌人、缺乏尊重。[[441]](#footnote-441)毛泽东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显然更加恶劣。刘少奇如此激烈地开展这场毛泽东主义运动,似乎是想「谋朝篡位」。

1964年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和方法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在12月举行的会议上,他公开批评刘少奇开展这场运动的方式。[[442]](#footnote-442)他指责说打击的范围过宽,打击的干部级别太低。毛泽东坚持认为,这场运动应该专注于党的干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打击腐败。在后来的会议上,当毛泽东继续展开批评时,刘少奇作出了反击。这对中共高级领导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态度。刘少奇在会上公开质问毛泽东,说他不明白什么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请毛泽东解释一下。第二天,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毛泽东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最后不点 191 名地指责某些人试图阻止他出席会议,表达他自己的看法。[[443]](#footnote-443)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否定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发布了新的会议纪要。新的会议纪要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区、省和中央党机关里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44]](#footnote-444)依靠这份会议纪要,毛泽东从刘少奇手中夺回了阶级斗争话语权。

通过彻底整肃基层党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造成了巨大分裂,当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这些分裂便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在城市地区最为明显。1964年秋,这场运动扩大到城市, 1 , 800家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成为针对目标,重点不在于打击腐败和滥权,而在于打击向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 [[445]](#footnote-44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企业内部造成分裂,南京大型国有企业扬子江机械厂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446]](#footnote-446)这家大型生产厂处于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之下,第四机械工业部负责业务运营,南京市委负责党务。这家企业由国民政府成立于1945年,很多任务人和职员都来自于那个时期。这些「旧社会人员」的身份不同于后来进厂的年轻工人、技术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退伍士兵。

1964年9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派出由六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进厂调查,组长是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有军方背景。他作为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代表,认定这家工厂的党委领导班子,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于是,工作组对这个党组织进行了深入清洗。党委书记被撤职,近半数的中高层干部被当成其小集团的成员。几乎所有干部都遭到批斗,还有很多任务人和技术人员被视作他们的忠诚追随者。这场运动的开展可以说是对南京市委的含蓄指责。

192 1965年1月,在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做法后,第四机械工业部的工作组被命令进行自我批评,减轻处罚力度,缩小打击范围。先前被清洗的很多工厂领导得以复职。工作组在1965年7月撤离,几个月后,第四机械工业部派遣一位退伍军官作为这家工厂的新任党委书记。厂长以及其他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党支部书记在清洗中幸免于难,保留了他们

的职位。这是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南京市委之间的一次妥协。虽然清洗中途停止,但工作组仍然大权在握,并任命了新的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导致这家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发生严重矛盾,最终这些矛盾未能得到解决,从而造成巨大分裂,在1966年秋演变成公开的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一所顶尖大学,它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全国性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北大造成的分裂,为1966年6 月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1964年7月,康生命令抽调十名干部,以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组成一个小型工作组,对北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查。工作组约谈了很多愤愤不平的干部和教师,其中说话最不客气的是晢学系政治指导员和资深党员,他们卷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该校党委领导的一系列冲突。[[447]](#footnote-447)这些教师中包括聂元梓,她是党委成员,几个月前刚成为晢学系党总支书记。工作组在8月底提交了调查报吿。报吿认为,北京大学里有很多政治上不纯洁的分子和外国的间谍而该校党委对此无所作为。康生接受了这份报吿关于「坏分子」已经渗透该校党组织的结论。

1964年10月,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开始了全面的调查,同样是由那位中宣部副部长带队,组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宣传、文化和教育单位干部。1 1月底,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北大党组织确实走了资本主义道路。1965年1月,他们开始对所谓的阶级敌人 193 举行批斗大会,很多党支部书记和常委被指责从事反党活动,学校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罪名是纵容公开的颠覆活动。

对于这种做法,工作组的很多成员,以及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都觉得太过火了。1965年1月,在北京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佩云作了自我批评,但也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一场激烈的争论接踵而至,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站在陆平一边。邓小平也是如此,他批评康生煽风点火,认为北大党委领导班子无过错。1965年3月,邓小平指示中宣部对北大和工作组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之前导致运动出现裂痕的问题。

形势逆转,激进的工作组成员和他们在北大的支持者陷入不利局面。在1965年3至7月举行的三次会议上,工作组被批评犯了「左」的错误。支持工作组乱扣帽子的北大党委成员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以及支持她的很多哲学系教师。现在,那些站出来指责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人不得不在他手下工作。这起事件造成的裂痕将在一年后再度显现。 [[448]](#footnote-448)

## 中苏决裂

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以来,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在大跃进期间进一步恶化,因为苏联公开质疑大跃进。毛泽东不满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尤其是他们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对缓和超级大国紧张关系的渴望。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 194 始恶化,最终在1963年决裂。两国之间最后的交流表明,当时这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政权在思想上存在很大差异,导致中方清楚地表达出一个观点,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报复的心态来实现这一观点。

1963年7月,中国的这一观点出现在一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声明中。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立场的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去斯大林化。[[449]](#footnote-449)中国认为,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发动侵略。只有通过武装斗争,而不是姑息妥协和对全面裁军的天真呼,才能实现世界和平。核武器没有改变斗争和革命的必要性,苏联不能以核战争的威胁为借口,放弃对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支持。社会主义无法仅仅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和平竞赛而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放松对内部阶级敌人和间谍的警惕,认为旧社会阶级不再存在,这是资产阶级观

点。对「个人崇拜」的攻击只不过是苏联强迫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更换领导人的借口。 [[450]](#footnote-450)

作为响应,苏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惊讶地表示,居然有共产党会支持个人崇拜,这早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观念。显然,言外之意是中国维护错误的毛泽东个人崇拜,这体现了斯大林主义最糟糕的特征。他们还坚持认为,核武器确实导致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性质发生「激进、本质」的变化,因为核战争既会消灭一小撮资本家,也会消灭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苏联指责中国的立场缺乏阶级内容,完全无视会在核战争中牺牲的亿万劳动人民的生命。随后,苏联和美国在7月20日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导致中苏最终分道扬镳。 [[451]](#footnote-451)

关系破裂后,中国准备针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这项任务由

康生领导,他指挥一百多名写手,分成八个工作小组,入驻钓鱼台国宾 195 馆。他们相继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政策的评论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 1964年7月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九评>。[[452]](#footnote-452)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内容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

这篇文章描绘了一个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反复攻击的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供物质刺激,允许高薪,扩大收入差距,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取代社会主义的管理方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清洗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控制了党和政府。结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赫鲁晓夫实行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这是在开社会主义的倒车。 [[453]](#footnote-453)

然后,这篇文章谈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中国的教训。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关系到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核心问题是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无产阶级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454]](#footnote-454)这篇文章没有说如何实现这一切。这将成为两年后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

## 毛泽东准备发动对党的攻击

毛泽东为即将到来的风云突变做着精心准备。虽然其他领导人几乎总是对毛泽东个人非常恭敬,但他不确定,如果他的意图被提前获悉, 会不会遭到联合抵制。直到他的忠诚追随者各就各位,他才准备发动对 196 党的攻击。毛泽东不仅想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开除某些地位突出的共产主义者一一一•从他选定的接班人、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开始;还想对整个党组织进行大清洗,彻底肃清在言论或行动上表现出「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倾向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在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及其思想的影响下,修正主义干部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全国性的阴谋。这一判断很快将变得清楚明确。他打算通过一场大规模运动,把他们清除出去,但运动的方式和期限还未确定。

只有在那些对毛泽东的忠诚超越了对党组织的忠诚的拥趸者的支持下,毛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拥趸者已经在过去的冲突中证明自己完全忠诚于毛,会毫不怀疑地执行他的命令。毛泽东的行为恰恰符合反党阴谋的定义。从1964年底到1966年中,他采取措施,为夺取对党、政、军和安全部门的控制权打下基础,巩固他不容置疑的个人领导权,开始发动对党的攻击。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两个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和林彪。江青之前在中国政坛上并不活跃,没有担任政府或党内职务,多年未曾公开露面。 1960年代初,她开始活跃于艺术界,宣传革命题材的歌剧和戏剧,批评革命前的传统艺术主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策划发表文章,严厉抨击那些没有传达革命思想的剧作家和文艺作品。这期间,她和上海宣传部里志同道合的意识形态主义者结盟,尤其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是张春桥的下属,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和《解放日报》编委。[[455]](#footnote-455)当江青无法在北京媒体上发表抨击那些作者的文章时,她在上海得到了及时的配合。在她更加积极镇压艺术界的所谓颠覆活动之际,她得到了军队和军方刊物的帮助,林彪让她随意使用这些资源。在军队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严厉批评北京文宣干部马虎松懈,同时表扬了林彪和康生 197 等人。 [[456]](#footnote-456)

林彪表现出了对毛泽东始终不渝的忠诚。在内战的最后阶段,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挥领导证明了毛泽东的必胜论断。在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大力支持毛泽东打击「彭德怀反党集团」, 热情赞扬大跃进。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部长后,他把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一支彻底的毛泽东主义军队,高举游击战的传统和人比现代化武器更加重要的思想。他在高级军官会议上说,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组织了一场高调的活动,在全军上下宣扬毛泽东思想。根据林彪的授意,从1961年起,他命令编辑和发表毛泽东语录,后来汇编成册,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红宝书」一一一《毛主席语录》。 [[457]](#footnote-457)

另一位效忠毛泽东的重要人物是康生。1940年代初,他领导了残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阶段。由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打击范围太大,他受到批评,实质上是替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承担责任。此后, 曾经作为最高领导层一员的康生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在1950年代[[458]](#footnote-458)担任省级职务。在1956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被大幅降职,似乎是因为在共产主义阵营去斯大林化的浪潮中,安全部门的大规模镇压导致普遍反感。58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康生召回北京工作,帮助他打击修正主义和思想倒退,主持编写针对苏联的评论文章。康生的升职完全是因为毛泽东的照顾,他完全依赖于毛泽东对他的支持。 [[459]](#footnote-459)

陈伯达也是如此。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和康生一起负责了1940 年代初的整风运动。陈伯达始终支持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立场和毛泽东 198 在大跃进后对失败原因的不同看法。1958年,中共理论杂志《红旗》创刊,陈伯达担任总编辑。很多左派作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毛泽东的行动提供思想依据。1960年代期间,《红旗》实际上变成了毛泽东的非官方喉舌。和康生一样,陈伯达的地位也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支持和照顾。 [[460]](#footnote-460)

另一位重要的追随者是总理周恩来,但他和毛泽东是另外一种大为不同的关系。周恩来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甚至比毛泽东的职位更高。作为总理,他领导着国务院和中央政府,素有精明强干、孜孜不倦和光明磊落的声誉,以及求真务实、对党忠诚的美名。最重要的是,自从1930年代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泽东,每次毛泽东因为所谓错误攻击别人时都站在他一边,包括对彭德怀的攻击。每当他被指责偏离毛泽东的思想时,他都会进行长时间的自我批评,并发誓效忠。毛泽东很看重周恩来的忠诚和办事能力,但他的忠诚不是因为信奉或者赞同毛泽东的看法。 [[461]](#footnote-461)

毛泽东为了确保他的追随者们掌握国家权力,从1965年11月开始采取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措施,清除那些可能阻碍他颠覆中国政治秩序的人。他把彭德怀从北京调到偏远的西南部,突然撤销杨尚昆的中共中央

办[[462]](#footnote-462)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在党内高层之间沟通上下、传递文件信息。汪东兴对毛泽东忠心不二,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无论到哪里都陪着毛泽东。62 1月,他命令对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展开调查。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军队的日常事务。在军队的政治化、对现代化武器的看法和士兵的训练等问题上, 罗瑞卿和林彪一直不和。3月,在一系列严厉的批斗会之后,罗瑞卿试图自杀。对解放军的指挥现在完全处于林彪和毛泽东的控制之下。 [[463]](#footnote-463)

彭真和陆定一是被清除的最后两个障碍。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还领导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和刘少奇是长期好友和同事。彭真曾公 199 开反对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发动的整风运动。[[464]](#footnote-464)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认为毛泽东应该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承担部分责任。对于 1964年和1965年文学界和知识分子遭到的攻击,彭真努力缓和对他们的政治攻击,坚决主张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465]](#footnote-465)[[466]](#footnote-466)在这些事件中,彭真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有着密切合作。

3月底,在刘少奇出国访问后,毛泽东出手了。刘少奇离开期间, 毛泽东把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叫到杭州,批评彭真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包庇「反党分子」,抵制他的命令。他威胁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664月2日,《人民日报》批评北京宣传机构里存在「黑路线」。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下属被逮捕。北京市委遭到大清洗,几位重要领导干部自杀。 [[467]](#footnote-467)

通过这些迅速、精心策划的行动,毛泽东确保了他对国家宣传机构、军队和各级党组织沟通渠道的个人控制。北京的安全保障工作被重新调整。军队和公安部队由新任命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统一指挥。[[468]](#footnote-468)当毛泽东公开出手时,刘少奇正身处离北京很远的地方。现在,毛泽东谋划中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拉开帷幕。

|  |  |
| --- | --- |
| 早断裂的造反  1966年5月,毛泽东开始了对党内高层的清洗,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但是,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文革的最终结果。在一开始,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文革过程中也被迫几次三番地临时易帜,改弦更张。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对事件的意外发展和忠诚下属的行为感到沮丧。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但发展方向不断出乎其本人的预料,迫使他去回应并重新思考。文革的确摧毁了原有的国家官僚体制,并达到了清洗所谓修正主义者的目的,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影响都超出了毛泽东心中原有的设计。事实上, 我们很难确定毛泽东当时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发展完全超出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高层领导的意料。  从某种角度上说,文革是一次大规模清洗,旗号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毛泽东眼中的修正主义者。上至党内高层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下至农村公社或国营工厂的支部书记,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如同1930年代末的苏联一样,很多人从岗位上被揪下来,遭到驱逐。而不同的是,在苏联,那些被肃清的人都被送到劳动营或是被处决;而在中国,这些人首先会被关押一段日子,期间会有一部分人死于监禁或选择自杀,但绝大多数受到的是标准对待:被造反派当众羞辱并遭到暴力殴打,随后被短暂地关进临时牢房,并最终下放到工厂或乡间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相比于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大多数在文革中受迫 | 200  201 |

害者都幸存下来并最终回归公职。

但是,文革绝不仅仅是对党内高层的清洗:大清洗只是罢免一些人,并不会动摇体制的架构和根基。文革的目标其实是要彻底颠覆从苏联照搬来的官僚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简单的革命委员会,将革命干部、军干部和造反派代表融合,仅保留极小部分来自旧官僚体制的机关人员。这一设计的本意是希望建立起纪律严明的政治等级制度,由经历过反复考验、绝对忠诚于毛泽东的人为核心,并以类似解放战争时期战时动员的模式管理中国。最终,中央部委里70%到90%的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农村,送往所谓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

中国原有的党政合一体制遭到破坏,新体系随后建立,整个过程既有自上而下的政治举措,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毛泽东从政治体制顶层开始,迅速重组权力,第一阶段在1966年夏末即宣吿完成。中央委员会中大批人员被清洗,既有的结构被摧残殆尽,功能几乎瘫痪,任何抵抗都毫无意义。各政府部门或是被迫缩减规模,或是多个合并为  ,而决策的制定权则被转移到所谓的革命委员会手中,这些委员会由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组成,并直接向他单独汇报工作。随着文革的不断发展,这些非正式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张,攫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在十年动荡中,无数人被打倒,政党合一的官僚体系结构逐渐被摧毁,最终土崩瓦解并停止运转。在党政顶层,毛泽东的拥护者们尽管在党政职位上毫无制度性的权力基础,但他们倚仗着毛泽东的权威,疯狂地破坏和蹂躏原有的国家官僚体系。

文革的另一个显著成果是动员起基层群众参加造反运动。这些造反派攻击各级党政机关中那些被认定为对毛泽东思想不够忠诚的干部。最初,重组国家权力机构的首要原因之一便是为群众造反铺平道路,并让其按照毛泽东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表面上,学生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8 月戏剧性的爆发看上去混乱无序。实际上,这场运动由派驻学校的全职 202 「特派员」所监控、指导;他们负责上报地方局势,并向学生造反派传达



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56一160).

丨

建议、鼓励和指示。这一政治体系极具影响力,在1966年夏秋两季直接引导着学生运动。但是,这一制度逐渐被人操控,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出现的问题也越演越烈,因此遭到了民众抵制,并最终走向瓦解。

## 国家权力的顶层重构

1966年5月,对北京「反党集团」的批判开启了一连串的党内清洗运动,严重破坏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的行政机构。到7月,北京市的十位副市长都已被免职,北京市委书记处的成员仅剩两人,到10 月,这两位也最终未能幸免。同时,有81个部门的一把手或副手被监禁。[[469]](#footnote-469)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下属的部门也被严重破坏: 234个中央宣传部的干部被免职,整个部门被缩减到只剩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处。中共中央组织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组部整个领导层都在8月被免职,二百多个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受到了审查。 [[470]](#footnote-470)

这些变化标志着国家权力结构的剧烈转变。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位于首都的其他党政部门逐渐丧失职权,并最终停止运作。 

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接管了他们的领导职能,其成员都是绝对效忠毛泽东的人物。5月末,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人数规模于次年迅速增长。小组的核心成员无疑都是毛泽东的忠实心腹,他们早就为人所知,而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的背书。这些人几乎都来自宣传或安全部门,经验丰富,在之前反对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其中没有人在当时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也没有人担任过政府部门或经济系的负责人 [[471]](#footnote-471)

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由陈伯达领导,此人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的马列主义导师,也是党刊《红旗》的总编。文革中,《红旗》这一刊物成为 203 中央文革小组的宣传机器,传播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康生也是要紧人物之一,他在1943年将党的整风运动引至过于暴力的局面,并在最近领导了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的大型写作组。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两个重要的副手,分别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于1938年成为毛泽东的妻子,在党内或政府部门并没有正式职位;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先前曾帮助江青在文艺领域抨击自由化倾向。其他的关键成员也都是以辩论家或「理论家」的形象为人所知,是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坚定拥护者:其中,姚文元是张春桥在上海宣传部时的下属,王力、关锋、戚本禹和穆欣虽较为年轻,但与陈伯达或是康生都有过共事的经历。

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了毛泽东的司令部,用以指挥文革运动,攻击、压制和破坏现有的党政国家体制。中央文革小组在建立新秩序上其实没什么作为,在破坏原有权力架构上倒是一把好手,其政治权威完全出自毛泽东的支持,行动路线则是基于他们对毛泽东各项意图的揣度。然而,毛泽东的心思其实常常捉摸不定,并且经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模糊不清。开始时,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写作小组,大概由十来个人组成,第二年却迅速发展成一个小型官僚组织,在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占据了七栋别墅。原先,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其职能现在彻底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中共中央的官僚队伍遭到清洗,相应部门职权急剧萎缩,中央文革小组的规模和权力也就逐渐扩大。

对毛泽东来说不幸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组织,充满内部矛盾,明显缺乏协调。其成员流动性极大:到 1967年1月,原来的19位成员和顾问中超过半数不是遭到清洗就是被迫靠边站。小组成员公开相互攻讦,而且几乎没有明确的权力分配界限, 也不存在任务的具体分工。此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方式也从未规范统一: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定期的书面报吿,针对同一事件,毛泽东会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不同的口述汇报,他自己似乎也不甚关心政事,很少



5 关于这些人的传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演变的更多细节见Walder ( 2009, 14 )。

|

参加会议,经常远离北京,住在其他省份的别墅里。更糟的是,陈伯达和江青都不领导召开小组会议,这两个人都没有行政经验,却都是古怪 204 脾气,难以相处。相应的责任就落到了总理周恩来的肩膀上。虽然他并不是小组的正式成员,但周恩来为其设定了会议日程,并能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说话行事。[[472]](#footnote-472)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派成员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倾向,因此在这整个时期一直都试图巧妙地削弱他们的行动效果,降低其破坏性影响。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周恩来怀有相当大的不信任,常常试图限制或阻挠周恩来的工作。

1966年8月,毛泽东重整了党内高层,降低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职务,令其在政治排序上大幅落后;同时,毛泽东提拔了很多中央文革小组中较有资历的成员,并将林彪提升到第一副主席的位置,指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林彪对民政事务毫无概念,仅关注军事事务。周恩来反而因此接管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原本的职责,他不定期地召开非正式「中央碰头会」,发挥此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功能。但毛泽东和林彪几乎从不参会。[[473]](#footnote-473)[[474]](#footnote-474)这些变化显然使周恩来成为新权力结构的中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文革时期国家权力机器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周恩来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治权威,但因为基本上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得经他之手,所以周恩来事实上影响了各项事件的进程。

中央项目审查小组也在这一时期组建起来,并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其前身是1966年5月末为调查北京「反党集团」而建立的委员会, 成员包括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乎全部成员,此外还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林彪的妻子叶群。成立该小组是为了审查、揭露、逮捕并监禁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叛徒」。随着清洗规模的扩大,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也在增长。

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的规模最终发展到数千人之多,只要被怀疑为地

下叛徒,就会遭到组织调查。他们和遍布中国的半独立群众组织一同办 205 案,后者代前者在各个地方开展调查。9到1968年,中央委员会中一共有88位成员被怀疑为「叛徒」、「间谍」、「通敌分子」而遭到调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的活动通过全国性网络展开,到1968年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他们大量利用威胁恐吓和身心折磨进行刑讯逼供,这一问题在最基层尤为突出。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重演 19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但是对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的指控其实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所作所为都没有太大关系。和反,这些被审查的受害者都背上了难以置信的背叛罪名:「从事地下反党活动」、「充当国民党或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在建国前有背叛革命的行为」等。

## 发动群众造反

文革还动员了一场自下而上攻击原有官僚体系的群众造反。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学生和工人先后被赋予建立群众组织的绝对自由,批判并「揪出」在他们看来怀有修正主义倾向的干部。文革的这一面和毛泽东在1956至1957年发动的「开门整风」运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 1957年时毛泽东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群众组织,也没有鼓动群众去罢免个别干部。接近十年之后,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判断与1957年相比有着根本不同。此前,他认为老百姓对个别干部的善意批评足以纠正党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认为修正主义趋势的发展已经带来极大威胁,只有发动一场大规模运动才能彻底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打碎原有官僚体系,并培养出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防止中国走上苏联道路。

但是,毛泽东也没打算放任群众造反组织自由发展。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控校园活动,煽动和支持学生造反派,通过内部渠道鼓励造反,并有力地削弱在职干部的权力。中央文革小组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推翻原有的政治秩序,这不禁让人想起建国前在国民党控制区



 Schoenhals (2008a).

|  |  |
| --- | --- |
| 域内的地下共产主义运动。而到了1966至1967年,类似的活动变得更加公开直白,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领袖实际上却保持着私下甚至是秘密的联系。  正如中央文革小组本身,造反派的活动刚开始规模也很小,但起步后发展迅猛。自1966年6至7月起,中央文革小组内的年轻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以及为数不多的调查记者就开始在北京的各大高校活动,和学生中的造反积极分子建立联系,提供内部信息和建议。随着红卫兵运动在8月份迅速发展壮大,《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几百名记者被征调为特派员,安插在遍布全国的大学校园里,人数最终有上千之多。他们和红卫兵领袖建立联络,向北京的上级提交定期报吿,并经常向学生造反积极分子提供信息和建议,吿知文革运动的最新政治动向。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报吿被汇编成《文革简报》,每一期只印刷不到20份,呈送给毛泽东和他指定的其他几位高层人员。这为党内精英提供了除《内部参考》外另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内参》是由新华社提供的内部简报,历史更久远,流传更广泛,此时《内参》也从1966年8月起增发《文化革命动向》特刊,发展到11月时,每天都会有两期发行。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利用这个情报网络监控学生运动的最新态势,并引导其走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同时,他们还借此发现并提拔那些有前途且愿意合作的学生领袖,反之警吿那些在他们看来言行失当的人。到1966年底,这个网络已十分庞大,发现、逮捕并批判许多不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一些特派员开始常驻校园, 参与策划造反组织的活动,充当红卫兵得到情报和获取建议的权威来源,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和校园造反组织之间的直接纽带。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挑选出中意的学生造反派系,并巩固与他们的联系。随后,北京学生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建立起「联络站」,为当地的红卫兵提供建议和指导。这使得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了更为公开和直接的影响力。到1966年秋,中央文革小组会定期邀请他们所认可的红卫 | 206  207 |



1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79 8 1 ), Walder (2009, 169一170) ·

兵[[475]](#footnote-475)领袖到钓鱼台总部参加磋商或是战略会议,甚至在中南海核心政务办公区或者人民大会堂举行各类活动。

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也采取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措施帮助学生造反运动。新闻媒体一直鼓励学生造反派的活动,从不吝惜褒扬的笔墨。自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集会,与造反群众会面,官方媒体对此发布了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最后一次集会安排在1966年11月,至此已有共计约1 ,200万人参加了这些群众集会。[[476]](#footnote-476)如果学生们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政治运动,那显然就会荒废学业: 6月中旬,不准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被彻底解除,所有课程和期末考试因此全部取消,学位授予、工作分配和国家高考被中止。现在,学生们除了留在校园里参加造反运动之外无事可做。同时,另一条重要指示要求学校在暑假期间必须继续开放宿舍并提供餐饮。到8月末,中央又颁布了两项法令,命令公安机关和军队方面不得干涉红卫兵的活动。这些指令一直严格执行到1966年12月,但之后安全部门得到指示:对那些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造反学生采取行动 [[477]](#footnote-477)

尽管有上述诸多措施,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发觉其实他们非常难以掌控红卫兵运动。派系分裂、相互攻讦的现象层出不穷,屡屡需要中央文革小组的干涉。通过愈发直接和公开的强硬控制手段,中央文革小组确实得以将运动引至他们希望看到的方向,但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学生造反派的抵制和反抗,情况变得愈发棘手。最终,安全部队在年底得到指令,受命严厉镇压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者,并逮捕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红卫兵。

## 大学红卫兵

说到对红卫兵运动的幕后操纵,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个标志性事件,这张大字报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 拉开了文革的序幕。1966年5月25日,七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马列主义的教师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北大校长(同时也是校党委书记)和 208 另外两位领导,指控他们是修正主义者、与北京反党集团不清不楚、密谋阻止群众的自由动员、将造反运动引导至小规模会议以便施展「阴谋」控制等等。大字报认为,这些人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一群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 [[478]](#footnote-478)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先驱事件,这张大字报自此拥有了神话般的地位,也使其作者成为了政治明星。但是,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学生。相反,大多数其实是党内相当有资历的人。在后来, 聂元梓就以该大字报主要作者的身份而闻名全国,其本人实际上就是北大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已经45岁的聂元梓是一名拥有革命经历的干部,日本侵华时期离开高中校园,并在延安成为一名共产党积极分子,她在党内的资历很深,拥有广泛的人脉,在精英圈关系甚多。即便如此,她却十分有理由抨击当时的北大领导层:她和她的盟友们于两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攻击学校领导,并在社教运动调转方向后遭到批判。此时她和她的同事正处于政治阴云之下:顶头上司是曾经试图推翻的领导,而其中很多人都正要被调离北大。 [[479]](#footnote-479)

这张著名的大字报其实是康生在幕后一手策划的,他向北大派出密使,安排对校领导的批判。康生的特使向他们保证,这一次必定一举定乾坤。大字报在校园里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引起骚动。康生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大字报的副本,毛泽东就此看到了机会:他下令将大字报内容全国广播,并刊载于各地党报党刊,还附上亲自撰写的社论,对其大加称赞。北大领导人却因此难逃厄运。第二天,他们就受到批判并被免职,北大党委近乎瘫痪,由大批高级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北大校园,接管了学校事务,并迅速展开行动。工作组和聂元梓及她的同僚展开合作,对学校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大清洗,手段则基本上沿袭了此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激进模式。[[480]](#footnote-480)在整个首都乃至全国的大学校园里, 209 学生积极分子、政治指导员和共产党员们也都纷纷效仿聂元梓,组成战斗队,对学校领导展开攻击。

批判对象涵盖了全北京的大学党委,很多人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可能被卷入北京的党内清洗,他们感到极度恐慌。这些担心不无道理: 

周之内,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遭到批判并被撤职。他之前将人文学部的师生送到了偏远的农村,以便将学习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响应当时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系列号召。但是,科学和工程学部仍然得以留在南京市中心,人文学部的学生和教师对此事深感不满,十分愤怒。校长坚持立场,并试图以反对毛主席的名义让批评者噤声。而此时,他却因此被拉下校长的宝座,被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 [[481]](#footnote-481)

与早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工作组被派往大学和高中,旨在发动群众展开批斗、组织清洗基层党员干部。7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期离京后回到首都,反而批评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随后,工作组撤出校园。毛泽东将这种「错误路线」归咎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将两人进一步边缘化,贴上所谓「修正主义者」带头人的标签,为进一步打压二人奠定基础。[[482]](#footnote-482)当工作组撤出时,他们遭到反对者以及毛泽东激进派追随者的指控,谴责他们「试图削弱群众运动」,从而「保护党内的当权派」。后续更为仔细的考察表明,实际上工作组一直在帮助发动学生攻击学院领导,摧毁了大部分校园党组织。但是,这也使得校方和学生问产生了深刻矛盾并彼此对立,无意中为后来红卫兵运动的派系分裂埋下了祸根 [[483]](#footnote-483)

工作组进驻一所大学时,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工作组可以保留原有的党政领导班子,让他们自己去清理下级的干部队伍。如果工作组拒绝这种做法,并逼迫整个领导班子靠边站,那么他们又面临进一步的选择:是有选择地清洗掉一些人,同时肯定其他人的忠诚; 还是采取更激进的方式,认定整个党组织已经彻底腐烂?工作组们最初还会有些犹豫,但不久后大多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做法。[[484]](#footnote-484)然而,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会有人不满和反对,学生、党员和干部因此闹得四分 210 五裂。如果工作组保留了原有的学校领导班子,那就意味着先前效仿聂元梓批判学校领导的人将面临秋后算账的可能;如果工作组认定一部分学校领导是可靠的,而另一部分人应该成为清洗的目标,那么这部分人在学生和教师中的支持者自然不乐意,工作组将失去很大一部分人心, 造成基层分裂;如果工作组选择批判整个校园领导班子,就会大量疏远原本与学校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党员干部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会有人开始怨恨工作组,他们言辞激烈,要求撤换工作组。

如果工作组完全放开限制,任由学生批判学校党委领导,则还是会面临问题:允许批评任何人就意味着工作组无意中让造反运动成为脱缰的野马,容易引起混乱。许多工作组担心无法控制局面,因此会试图限制暴力活动的规模,或是控制带头的学生积极分子,这就会催生激进派学生对工作组的敌意,因为他们觉得工作组这是在试图「镇压」学生运动。

北大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 6月18日,工作组进驻不到三周,就吸收了聂元梓进入队伍,并对整个北大党组织进行了大清洗。身居要职的行政人员及威望较高的教师成为清洗目标,被控吿阶级出身不纯,或是有海外联系。随后,几乎任何一个在之前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前任校长一边的人都遭到了清洗。到了7月初, 20名党总支书记中只有一位免于清洗 那就是聂元梓本人。只有不到8%的学校干部被认定为政治清白,而三分之二的人所面临的指控大到足以让他们被当即罢免。 [[485]](#footnote-485)

很快,工作组就发现自己很难控制学生运动。北大的情况与不到十年前短暂的「双百运动」形成了惊人的对比。1957年,学生同样被动员起来,在墙上张贴大字报,但双百运动期间,学生们是在抗议威权政党统治和受斯大林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僵化教条主义,同时要求更多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有些人甚至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秉承1919年五 211 四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学生站在一场日益壮大的运动前沿,希望中国追随苏维埃阵营的自由化趋势。

十年后,情况却大不相同。现在北大的学生积极分子和他们在全国各校园的同龄人一样,争先恐后地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激进且狂热的批斗者。他们批判曾接受过海外教育或是拥有自由主义名望的教职工,其中许多人也是早先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中的目标。同时,学生造反派也攻击那些在他们看来促进了「阶级异己分子」影响的党员干部。

这种狭隘的教条主义本就十分荒诞,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学生造反派展开了严厉而极端的批斗活动,对受批判者施以言语暴力和身心摧残。激增的批斗会像极了土改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对待地主或是其他阶级敌人的仪式。在此过程中,被批斗的对象被迫戴上高帽,脖子挂上沉重的标语牌,受到高声谴责和极端侮辱,被粗暴地推来推去,头发被拉扯,胳膊被反绑,同时还要双膝跪地,做出「喷气式飞机」的姿势。有一些人更是惨遭毒打。北大在这方面再典型不过: 6月中旬,工作组记录的就有178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暴力对待,其中数人不堪屈辱而选择自杀。

6月18日,北大校园再度爆发大规模批斗会,工作组最终决定限制这种不加约东的暴力活动。近70名干部和教师被拖到临时搭建的平台上,脸上涂着黑墨水,遭受踢打和大声指责。更有甚者,据称有两名女性干部被剥去部分衣服,而一名年轻男子以摸其私处的方式羞辱她们。一系列暴力批斗会的大多数受害者是学校的党委委员或是更低一级的支部书记。工作组派成员到校园各处阻止暴力活动,并为受害者提供紧急救助。 [[486]](#footnote-486)

工作组批评了这种暴力行为,并且向中央书记处呈递了一份报吿,

谴责这起「六·一八事件」。此时中央书记处仍然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 212 导下开展工作。两天后,这份报吿作为中央文件分发全国各级党委。文件中称,工作组的这一行为是「正确而及时的」。有了这个新指示,全国各地的工作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那些坚持暴力、拒绝服从的学生。那些不服工作组管控的学生被孤立、批评和拘留。挑战反抗工作组权威的则被给予警吿,并以惩罚相威胁。而那些要求撤换工作组的,或者要求学生和教师自己主导文革运动的,则可能要参加批评会,还会被指控为从事反党活动。在这场短暂的运动中,工作组重振了自身的权威。几乎每所学校里都有和当一部分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被批判,有时候还被贴上政治标签,他们的名字也作为麻烦制造者被工作组记录在案。 [[487]](#footnote-487)

正是这份文件和巩固工作组权威的举措给了毛泽东充分的理由。7 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愤怒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措施,他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并在大学校园里「搞独裁」。其实大多数工作组都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校园修正主义的指示,毛泽东对此却视而不见。正是暴力活动使得工作组有选择地控制校园里的一些好斗分子,毛泽东对此也不闻不问。毛泽东命令所有工作组在7月底前撤出校园,此后学校将自己展开文化革命运动。 [[488]](#footnote-488)

毛泽东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工作组受到批评并撤出校园后,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将团结一致,攻击学校干部。但事与愿违,因为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深刻的分裂。毛泽东没有考虑到,事实上大多数工作组并没有禁止对学校党组织的攻击。校园里的部分激进派学生却因此大受鼓舞,他们与那些激进的工作组形成了统一战线,而且支持工作组反击那些挑战他们权威的少数学生。另一面,与工作组合作的学生本就占多数,工作组撤出后,他们控制了校园,并且组织学校文革委员会的选 213 举,这些委员会自然也被他们所主导。

这就为严重而持久的校园分裂奠定了基础。那些与工作组发生过冲突的少数派学生几乎都遭受了惩罚,他们要求运动的批判目标从学校领导转到工作组成员上来。少数派指责那些和工作组合作的学生密谋镇压学生造反派,所以没有权利领导校园文革。此外,他们还要求工作组成员必须回到学校接受批斗,承认先前企图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

然而,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认为这些指控无异于在打他们的脸。他们觉得声明自己和激进的工作组在清洗中合作是正当的,是心怀不满的少数派夸大了工作组的错误,歪曲了事实。少数派指责多数派是「修正主义者」或「保守派」;而多数派则暗示少数派遭到的待遇是罪有应得, 这些少数派学生现在只是想借此洗白自己的政治案底。整个8月里,大学校园充斥着两大阵营间吵吵嚷嚷的辩论,有时候甚至出现争吵打斗。随着红卫兵组织成立,这两个阵营几乎在所有校园都走向了分裂,形成少数派和多数派。 [[489]](#footnote-489)

多数派控制着学校,为了展示他们的革命资格,多数派组织了批斗会,并将批斗对象集中到临时牢房和「劳动改造队」中,让他们挖沟或是扫厕所。相反,少数派希望把焦点集中在工作组的错误上,并质疑多数派赢取选举的正当性。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期望通过鼓舞学生运动来继续反对修正主义,他们现在估计是大失所望。从一开始,大学红卫兵就怀揣各自的想法,因此只顾互和争斗。

## 高中红卫兵

高中学生的造反活动最初比大学生的更加显眼,而且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盛赞。第一个采用「红卫兵」作为名字的学生组织于1966年5月 214 末在清华附中成立。为了争取独自建立组织的权力,学生们先和学校当局斗争,后又与工作组周旋。他们张贴大字报挑战工作组,还起草了好几篇文章,表达他们想要参与造反的精神。同时,北大附中也在进行一场类似的斗争,另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前身「红旗战斗小组」,也对派往他们学校的工作组发起了挑战。

工作组被撤回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格外关注这两个学生组织,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在与高中生领袖举办的座谈上, 江青和其他领导人对其大加赞扬,并邀请学生领袖上台讲话。读了学生们的文章后,毛泽东予以热情回应。在8月1日写给学生们的信中,毛泽东肯定了学生的大字报,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还赞扬了高中生们的激进立场。他命令将其中两张大字报连同他的回信一起,在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刊印并分发给所有参会者。毛泽东还抓住这个机会表达了他对北大附中「红旗」的支持。他在公开信中写道:「你们在 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490]](#footnote-490)

在这次表扬之后,毛泽东邀请了大约1 , 5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参加8月18日盛大的红卫兵集会。超过20名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收到了邀请。当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并说明自己的身份时,毛泽东响应说:「我果断支持你们!」几天后,这次接见见诸《人民日报》的报端。在这次集会上,一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领袖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枚红卫兵袖章,她曾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随后, 一张她在为微笑着的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照片登上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头条。在之后的几天里,国家媒体发布了这些高中生激进分子的发言和大字报的节选。 [[491]](#footnote-491)

与党内领导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一样,造反派学生在教育领域对党的 215

「阶级路线」采取了一种极为激进的立场,突出强调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入学时看重阶级出身和政治积极性,并且批判对学术成就和考试成绩的狭隘关注。这种思想非常合乎第一波高中红卫兵的立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党员和革命干部家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的早期红卫兵领袖都拥有「革命家庭」的背景,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然而,伴随着一幅著名对联的流传,麻烦也开始了。这幅对联称赞了来自革命家庭的学生,并贬低了来自「坏分子」的学生。这就导致了高中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重大分裂。

这幅极具冒犯性的对联声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作者们辩称这是要表达党的阶级路线,但很多学生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意思是革命者的孩子是世袭的政治贵族,天生就是「红色」的,而其他人无论在后天多么忠诚,先天就低人一等。对联同样冒犯了那些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背景但父母不算是革命英雄的人。毫无意外,很多学生开始批评这幅对联,认为内容很不成熟、弄巧成拙。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8月初的红卫兵集会中上升为暴力冲突,当时学生们为了抢夺话筒而大打出手,有人还被刺伤。 [[492]](#footnote-492)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担心围绕这幅对联的争论会分裂并削弱正刚刚起步的学生运动。一些成员要求学生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同时,江青和康生提出了更为温和的解释,以试图澄清阶级分析如何为世袭政治地位提供正当理由,以及如何权衡实际的政治忠诚和家庭背景,可收效甚微。[[493]](#footnote-493)反而越是想分清这些政治标签,就越难以平息相关的争论。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对暴力的使用,这直接导致了高中红卫兵运动中的第一次派系分裂。工作组撤出后,暴力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高中校 216 园和城市小区。高中生红卫兵抓住党委书记、中学校长和老师同学,对他们进行暴力殴打,有人死于批斗,也有人选择自杀。[[494]](#footnote-494)高中生激进分

子也从校园涌出,攻击目标人群中的一些人。在公园和历史古迹里,他们对教育部门和团委的干部、知名小说家、编剧以及京剧演员进行了批斗,用拳头和皮带狠狠殴打他们。红卫兵在城市的居民区街道上游荡, 恐吓「反动」家庭的成员,闯入他们家中,把他们押至批斗场所。期间, 红卫兵发放了传单,要求「黑阶级」家庭将他们的财产上交给公安局, 并立即离开城市。

这些家庭的成员被聚集在高中的操场或是小区的公园里,遭受批斗和殴打。受害者常常被关在卡车后面的车厢里游街示众。在8月18日第一次天安门集会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共有1L4万户被抄家,价值4,480 万人民币的外汇、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被没收,还有230多万册图书和 330多万件绘画、艺术品和家具。在西城区,从1 ,061户人家那里没收来的图书、绘画、卷轴和其他物品被焚毁,大火连续烧了八天八夜。同时,北京有7 · 7万户居民被赶出家门。暴力活动在8月的最后一周达到顶峰,平均每天有超过200人死亡。8月中旬之后的四个星期里,据北京官方统计的死亡总人数为1 ,772人。 3 1

首个公开反对此类暴力活动的是来自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是发起红卫兵运动的组织之一,且在8月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他们对席卷全城的暴力发出了警吿,并且发布了<紧急呼吁书> ,谴责那些以「红卫兵名义到处殴打一些人… …进行流氓活动」的「混蛋和胡涂虫」。<呼吁书>要求各校「真正的左派」应联合起来,制止「流氓行为」。那些有此类行为的学生应该被开除出红卫兵的队伍。 32

<呼吁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一一与先前的大字报不同,这份文件没有得到媒体的宣传,而暴力和恐怖的浪潮则在8月末达到顶峰。



3 1 这总结了Walder ( 2009, 142一142 )中更长的一段描述。9月,上海发生了 354起打人致死事件和704起自杀事件,高中学生殴打了超过1万人,有接近1 ,000人严重受伤(Perry and Li 1997, 11-12 )。同样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117一131 ) ,其中有一段对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恐怖」更长的描述。

32 Walder (2009, 145 )·

217 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发布了一份对红卫兵运动的<十点估计> ,觉得很多学生「草菅人命」,认为这是「法西斯」行径,而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真正的红卫兵」的作风。 33

然而,毛泽东却并不同意。学生呼吁制止暴力,可他的观点恰恰相反,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则和毛泽东保持一致,他们认为要造反,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受害者所受的伤害则是可以接受的。私下里,高层干部也知道了运动的暴力趋势,但他们也只能表示无可奈

34

从学生运动一开始,江青就明确地向学生造反派表明,针对被批斗者的暴力行为不算逾矩。她向高中生做了几次讲话,在7月28日的一次演说中,江青说道·

我们不怕乱。乱和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

一周后,红卫兵发布关于暴力问题的<紧急呼书>。江青起初并不反对,但态度很快改变。她确信,一些立场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会将其当作压制学生造反派的借口。工作组限制了暴力的传播,毛泽东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也不愿意看到学生造反派受到任何限制。8月23日,暴力活动达到最高峰,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很不耐烦·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北京太文明了,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斗左派… …急急忙忙发呼吁书。」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也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在8月下旬指

218 挥小区派出所协助红卫兵甄别「反动家庭」的一次会议上,他说:「群众



1. 同上,页146 
2. 接下来的几段内容 148一

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8月21日和8月22日的两份官方指示也表达了这种态度,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地方部队和警察方面严禁采取任何措施限制红卫兵的行动。

考虑到毛泽东的态度,对红卫兵暴力的限制就只能全靠红卫兵自我约束了。[[495]](#footnote-495)红卫兵组织自我监管的努力在高中红卫兵中滋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促使其走向分裂。周恩来曾多次试图限制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8月下旬,一个叫做「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团体宣布成立。创立者之一是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下属的儿子。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周恩来就是幕后主使,但该组织的立场与其高度相似, 且周恩来在该组织成立后迅速提供了组织支持,二者的联系恐怕应该不只是巧合。「西纠」也成为红卫兵组织的第一个跨校联盟。

纠察队规定了一套基本原则,坚持「非暴力斗争」的方式:「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这一禁令「没有例外」,哪怕是对那些已经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纠察队也提供了明确的界定:「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等等都属体罚及变相体罚, 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被禁止的侮辱方式包括「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他们说的「逼供信」是什么意思呢?「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招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

因为周恩来无法使用常规警力,纠察队就成了他控制局势的主要工具。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建立了直接联系纠察队的专线,并且派出 219 国办工作人员和这些组织进行沟通。在之后的天安门广场集会上,周恩来邀请了纠察队的一些成员登上主席台。他接见了纠察队的领袖,并让助手为纠察队提供办公场地、资金、制服、交通工具和打印设备。纠察队的传单也由国务院的印刷厂专门大规模印制。

纠察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履行职责时,他们与来自大学的少数派造反分子产生了冲突。少数派闯入政府办公室,抓捕先前担任学校工作组成员的人,并把他们拉到批斗会上去。这使得纠察队潜移默化地和大学的多数派形成了暗中的联盟,中央文革小组随即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以重新调整和引导红卫兵运动。这使得「西纠」的学生站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面。

## 造反派的崛起

在8月和9月,各大学的少数派都处于守势。他们无法在校园论辩中占得上风,便将目标转移到了校园外面。行动的先锋是两所重要学校的少数派:「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前者大胆地在国防部门口发起了长时间静坐抗议;后者则在地质部门口多次示威,最终闯入并占领了地质部办公楼。 [[496]](#footnote-496)

8月26日,「北航红旗」在国防部门口静坐,目的是让曾进驻北航的工作组成员回到学校接受批斗。当事人拒绝被拘留,在周恩来尝试斡旋失败之后,静坐就一直持续到了9月中旬。8月23日起,「地院东方红」也在地质部采取了类似行动,他们派去了大约千名成员,要求曾进驻地质学院的工作组领导回去参加批斗会。当事人是地质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可以想见,这名官员自然也不愿意去。「地院东方红」随后又两次派 220 人去地质部示威,并最终在9月19日攻占了地质部大楼。

这些行动吸引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注意,认为可以借此改变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分裂的僵局。现在似乎可以鼓动大学红卫兵冲击政府部门, 「揪出」先前的工作组成员,并最终打击那些派出工作组的高级别「修正主义」官员。此前,中央文革小组从未成功地将大学红卫兵真正团结起来,但到了这时他们重新制定了策略,开始公开支持少数派以反对他们

的对手。

此时,新成立的高中纠察队卷入了大学红卫兵的派系斗争之中,自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计划的绊脚石。[[497]](#footnote-497)纠察队崇拜人民解放军,因为军队有铁一般的纪律,纠察队认为红卫兵也应该如此,有自我约束的意 1亠一 。此前,红卫兵到国防部的解放军总司令部外抗议示威,纠察队对此感到十分愤慨。纠察队反对暴力活动,而在对工作组官员的批斗会上, 少数派则常常诉诸暴力。8月31日,「西纠」宣布成立并发出声明仅六天之后,就展开了第一次公开的行动:国防部外的静坐集会已持续到第二周,「西纠」的一个小分队出现在「北航红旗」面前,试图强行驱逐抗议者,但却被击退。

9月7日,地质部发生了一场更具戏剧性的对峙事件,「地院东方红」在此抗议已有三天。9月5日,当他们抵达地质部并要求交出工作组领导人时,「西纠」也来了,他们包围了大学生,猛烈攻击静坐人群,用皮带抽或是拿砖头砸。「西纠」抓走了几名抗议者,之后还发传单谴责「地院东方红」冲击政府部门的行为。

此时的红卫兵运动因派系斗争本就已经深度分裂,少数派的新尝试虽然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由衷认可,但却在校园里遇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更为强大的对手。他们所面对的,是高中红卫兵第一个组织化的跨校 221 联盟,阻挡着少数派对党政官僚体制的攻击。更糟糕的是,纠察队背后显然有周恩来和其他反感暴力的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因此才能迅速壮大,不需要警察和军队就能限制少数派的暴力活动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央文革小组发起了一系列反制行动,在学生的派系斗争中选择公开站队,此举大大影响了学生的造反运动。[[498]](#footnote-498)如果造反要成功,既需要建立跨校联盟,也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明确支持。到9月底前,这两项都已具备;到了10月中旬,造反派就开始反击对手。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成。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明确支持红卫兵运动的某个派系,并且多次呼龥,希望相互敌对的学生派系能够团结起来。到了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放弃了这一立场,全心全意支持少数派,直接干预运动的走向。这一点在与红卫兵的会议之中就能看得出来。

在这些会议之后,毛泽东也决定公开支持少数派阵营。9月21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北航红旗」的学生领袖,对他们在国防部前的抗议表示支持。他们命令工作组负责人服从学生造反派的要求。同一周,「地院东方红」的抗议者也冲进地质部大门,突击搜查了工作组存放档案的办公室。他们砸开柜子,把反对派学生的档案都带走了。「地院东方红」于9月23日返回地质学院,从多数派手中夺权, 并争夺学校广播系统的控制权,大规模争斗导致一百多人受伤。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的消息迅速传遍北京,整个城市的少数派都夺取了所在学校的广播系统。局势开始逆转。

9月26日,在「三司」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公开地表示了对这一新造反联盟的支持。周恩来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毛泽东对少数派的支持,为他们平反,并摘掉这些少数派先前被贴上的反党标签。为了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为了削弱他们为搜寻工作 222 组领导而进一步冲击部委的动机) ,周恩来宣布所有这些人被收集上来的「黑材料」将不会留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

随着学生运动的风向改变,新一批红卫兵领袖迅速崛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清华大学突然高升的蒯大富,他之前只是清华少数派中的一个小角色,之所以能成名,是因为早先曾和中共副主席薄一波公开对抗, 并指责刘少奇的夫人、参与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王光美。[[499]](#footnote-499)尽管如此蒯大富在清华少数派中仍不受重视,因为少数派的领袖认为他善变而鲁莽,不值得严肃对待。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要的就是蒯大富的鲁莽和善变。蒯大富等公开挑战薄一波和王光美,说明他敢于攻击高层领导人,拥有挑战几乎所有人的意愿。中央文革小组希望能够通过学生运动打击刘少奇的势力,蒯大富自然是最佳人选。9月23日,张春桥单独约见了蒯大富,鼓励他成立新的造反组织,并且保证中央文革小组会予以支持。第二天,蒯大富就宣布成立新的造反组织,此后迅速上升,爬上了造反运动的顶峰。

## 十月的转折

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权威评论文章,明确了对首都「三司」的支持,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篇社论对文革的直接目标提出了新的定义,并对此前四个月的事件做出了新的评价。文章称,工作组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被那些反对毛泽东和试图破坏文革的人所操纵。社论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并指出国家官僚组织中有更高级别的官员策划了这场阴谋。[[500]](#footnote-500)

为了将这条新路线的精神下达全国,毛泽东在10月的后三周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该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陈伯达报吿。事实上,报吿文本由毛泽东本人事先反复修改,总结了文革运动的阶段性进展。陈伯达描述了文革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指责某些干部和红卫 223 兵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并改变文革路线。他为红卫兵的暴力行为正名, 否认红卫兵「行事冒险」,称他们不是「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陈伯达还攻击了那些和工作组往来密切的红卫兵,认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动立场」是由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而怀有的傲慢。[[501]](#footnote-501)陈伯达将此类行为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并归咎于刘少奇和邓小平。二人在党内被进一步打压。 [[502]](#footnote-502)

现在,学生运动的矛头指向了那些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一一一曾经试图以任何形式转移、缓和或者镇压学生激进运动的人都成为斗争对象。从陈伯达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工作组先前以避免暴力活动为由限制红卫兵行动,现在成为了批判的目标。同样,那些曾与

工作组合作,且在之后事件中站在工作组一边的红卫兵也遭到批判,曾组织起来防止造反派打人和杀人的红卫兵也未能幸免,被指控也和这条反动路线串通一气。报吿称这些人至少是保守派,很可能是反动分子。这样一来,曾在8月份的运动中冲在前列的学生积极分子被迫靠边站, 有些还遭到了侮辱。

那些此时还捍卫自己立场的多数派变得士气低落,在学校里失去了影响力。他们建立跨校联盟的努力也失败了。在北京乃至全中国,「红卫兵」这一称呼尽管没有完全消失,看起来却越来越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关联。而「造反派」一词越来越受欢迎,成为学生组织的主流名称这反映了他们不同于第一批红卫兵,因为后者和中央文革小组起过冲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已经发话:这些早期的红卫兵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勾结,他们最好和造反运动的新方向保持一致。北京各方反应迅速:这座城市很快就爆发了一场大浪潮,少数派冲击政府部门,搜查工作组领导的办公室并带走档案。在其他大城市里,少数派的联络站向地方红卫兵组织传达了造反运动的新方向,鼓励造反派攻击省级和市级的

高中纠察队此时也陷入了混乱。他们的立场显然已经被毛泽东驳斥,周恩来也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国务院办公厅自然也不再提供支持。

224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于打杀受害者的行为采取了明显漠不关心或看似暗中默许的态度,有鉴于此 一些纠察队的老成员重新组成了更小的战斗队,也开始加入使用暴力的行列。纠察队作为一个市级跨校协调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学校自身的纠察队们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维持凝力。包括许多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领袖在内的一些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这是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大胆举动,但注定会以失败吿终。

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介入学生运动,建立起了新的联盟,同时拯救了少数派。造反运动又活跃起来,但严重依赖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庇护和指令。二者的联系愈渐明显和正式化。新造反联盟中的学生领袖可获得开展运动所需的资金和其他资源,中央文革小组的网络也日益扩张,二者越来越牢固地整合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访问校园、参加集会、发表讲话、指导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特派员向中央文革小组看中的学生领袖传达指示或直接下达命令,必要时还会威胁他们的对手。在接来下的几个月里,造反派领袖紧紧依靠帮助,从中获取动向并寻求批准和指导。43

## 抵抗与镇压:红卫兵的命运

多数派的前任领袖和试图制止红卫兵暴力的高中生们现在却遭人唾弃,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盲从者的标签。其中一些人开始反击, 他们模仿少数派早先反对工作组的做法,通过大字报、传单以及新的跨校联盟发起了反攻。他们把反对资产阶级路线运动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他们操纵学生运动,打压异己观点,镇压那些敢于批评他们的人。反击运动搅乱了好几所高校,学生们又激动地辩论起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出现了,这引发了对中央文革小组更为大胆的挑战。中央文革小组的神圣权威遭到挑战,那些新近被钦点的造反派追随者自然愤怒无比。异见者的运动从1 1月中旬开始,方式愈发大胆。最 225 终,中央文革小组对持异见者实施镇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红卫兵运动就此终结。

这次运动的中心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北航多数派红卫兵抱怨说中央文革小组忽略了他们,还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者」而置之不理。44他们把自己的遭遇比作工作组进驻时的少数派,并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蔑视群众观点、官僚主义、善于摆布人、镇压学生运动,是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写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看来这些平时口口声声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并未认清反动路线的所在… …官气十足的关锋、戚本禹就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了。」随着运动升级,持异见的学生质疑中央文革小组本身,认为其形迹可疑,看起来像是一个地下党组



1. Walder (2009, 167一171 )·
2. 接下来的几段总结了在

174 184 中一段更长的描述。

织,密谋把国家和党推入混乱之中。最具煽动性的大字报出现在12月中旬,指责中央文革小组把自己伪装成左派,实则是为了策划政变。

多数派的领袖在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挑战中央文革小组。北京林业学院的一位前红卫兵头头传播了一张名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用了之前少数派反对工作组时相同的口号。他指出,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和国家体制里没有地位,也从未有人说过其免受他人的批评。如他所说,「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 不深入下面,不调查… …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见到中央首长讲话就抢得要命,视为珍宝… …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

这些情绪也出现在高中校园里的大字报和辩论之中。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来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试图组建一个新组织 226 协调抵抗,这一组织被称为「联动」。这些创始人就是那些在8月份反对红卫兵暴力时发布了<紧急呼书>的学生,许多人曾在8月18日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时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可现在对中央文革小组公开表示反对。1 1月27日,他们首次开会并组成跨校联盟,其成员都是想法一致的海淀区高中生,并在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 [[503]](#footnote-503)

这场运动在北大引起不小的影响,在那里,聂元梓仍宣称自己拥有绝对权威,因为毛泽东对其「革命大字报」倍加赞许,聂元梓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不可动摇的,在很多方面她确实如此。但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对聂元梓和她的追随者来说却不可忽视,让他们感到不安。先前,聂元梓和她的团队曾与北大工作组积极合作,他们从来没有像其他学校的少数派一样,领导一场抵抗运动赶走工作组。8月和9月北大红卫兵运动兴起时,聂元梓曾试图对其实施绝对控制。她发号施令,彷佛自己的权威不可撼动,这导致那些要求自治的红卫兵激进分子发起反抗。聂元梓表现出明显的独裁倾向,指控造反的学生犯有政治罪 她声称,反对她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这就疏远了很大比例的北大红卫兵,使得很多最初支持聂元梓的人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上,包括那张著名大字报的大部分合作者。北大被疏远的造反派也效仿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以此为武器反对聂元梓。 [[504]](#footnote-504)

操纵学生运动的企图遭到强烈抵制。毛泽东本想把学生造反塑造成信奉自己而唯命是从的工具,可现在这一举措遭到了公开的挑战,而毛泽东所信任的学生代表也被公然嘲讽。然而,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到12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反击。12月3日, 《红旗》刊登的社论指责,持异见者的运动是「一小撮走资派煽动的、对真正左派阵营的攻击」。[[505]](#footnote-505)社论呼吁对阶级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开启了新的造反派系讽刺性的转变,这一抗议运动本来是为了反对工作组的独裁做派,现在却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支持者。12 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造反派领袖,学生们不禁问起该如何处理 227 持异见者的挑战。康生则对他们说:「我们必须实行对反革命的镇压, 这是民主的最高形式… …我们必须实行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 …只有革命者才有言论自由。」

更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发生, 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再次反击,江青在中学生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为反对高中纠察队的新运动奠定了基调:「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 …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于是,江青作了一项令人惊讶的指控,公开批判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干部对纠察队提供组织帮助和物资补给的行为。江青指责纠察队自身应该对红卫兵运动的残酷和暴力负责:「我们一定要对这样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的罪犯坚决地实行专政。」江青扭曲了不少历史,据她所 ,纠察队是「一群反动杀人犯组成的暴力团伙,他们从走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妨碍毛泽东的文革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幕后支持。」她声称,学生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父母的革命传统使之拥有贵族背景」,而他们的暴力行为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些特权而孤注一掷的选择。

造反派现在感受到了中央对他们的期望,随后便发起一波镇压浪潮。造反派学生抓捕了持异见的红卫兵,并将他们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967年1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称「文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那些在新加强的公安条例下被逮捕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公安警察散布城市的各个角落,逮捕持异见的学生,给他们戴上手铐,然后把他们像被审判的罪犯一样装在卡车里游街示众,成群的造反派学生在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便高呼口号。

中央文革小组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详细公开的辩护。

228 他们的批判运动完全忽略了来自异见者的批评,只关注纠察队和「联动」所谓的暴力和反动性质。这两个组织被扣上「新法西斯主义」的帽子, 被指控企图保护资本主义复辟,是国务院官员策划阴谋的一部分,这些官员曾帮助过纠察队,并且通过他们与刘少奇和邓小平有某种联系。实质上二人指导了这些行动,而直接涉及此事的周恩来却得以全身而退。

运动如此尖鋭,无疑是出于两点:很多纠察队和「联动」的领袖都曾是全国闻名的红卫兵,而他们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反对暴力的学生,但这一立场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斥责。这场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似乎对暴力没有责任,反而让他们做出不支持暴力的姿态。批判运动在全国传播的基调就反映在官方的小册子中:「『联动』分子疯狂地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毫不奇怪。『联动』现在表现得很粗鲁,像疯狗一样。不论谁是革命的,他们都反对。不论谁是反革命的,他们都支持。他们想要的只是全国的混乱。尽管他们获得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小丑热烈的掌声和秘密的示好,他们早已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持异见的红卫兵遭到镇压,这标志着学生运动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终结。而代表了这一趋势的是朱成昭的命运,当时却几乎没人注意到他。朱成昭是「地院东方红」的一名头头,也是「首都三司」的缔造者之一。在12月,他开始对运动的方向提出怀疑。朱成昭认为造反派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为遭受工作组打击的学生平反,消除他们档案中的「黑材料」,控制他们所在的学校,并且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明确支持。在和同僚的会面中,他抱怨说文革已经失去了群众运动的特点。朱成昭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在发动一场群众运动,而是在煽动群众互相斗争,或是如他所说,文革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朱成昭还抱怨说,对青少年红卫兵和「联动」这种组织实施的迫害太过极端。朱成昭的这些言论使他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感到无比震惊,其中一人随后向中央文革小组吿发此事。朱成昭之后失去了领导地位,并被关押起 229 来。几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揭露了「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还在学校组织了批斗会。朱成昭被形容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地院东方红的叛徒」。他的「反革命集团」「恶毒地攻击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炮轰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与了反革命政变的策划,背叛国家、投靠敌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朱成昭之后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十多年的光阴。 [[506]](#footnote-506)

## 造反派联合的最终瓦解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向其背后的支持者抛出了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首先是关于阶级出身问题的情绪化分歧,中共对于阶级出身实施的政策本身就概念模糊且自相矛盾,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解释不清,陷入窘境。接下来是红卫兵运动早期领袖的一系列声明,他们对使用暴力的红卫兵表示鄙视,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然后是大学里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裂,对抗使学生运动陷入僵局,让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再次互相攻击。接着是纠察队的成立,毛泽东命令禁止限制学生的暴力造反,但纠察队巧妙地绕开了这一禁令,很快就与多数派达成默契,结为同盟。再往后,他们协力组织和宣传新的造反派联盟,并选出新一批学生领袖试图改变整个学生运动。最后,持异见的红卫兵发起了极具攻击性的反抗运动,公然挑战中央文革小组,先前曾有「禁止暴力镇压学生激进分子或用公安力量摧毁持异见者」的命令,现在又不得不反悔。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毛泽东本想利用激进学生运动实现自身目标,但最终失去了信心。造反派只剩下了最后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在异见学生被镇压之后,造反运动得到加强,且有了纪律,似乎终于准备好执行他们最根本的任务: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手中夺权。而这却最终演变成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 [[507]](#footnote-507)

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指示造反派头头从北京市当局手中夺 230 权。聂元梓和蒯大富宣布了成立北京公社的计划,这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是由毛泽东的忠诚支持者和造反派头头组成代表大会。然而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之前,造反派头头是团结一致的,先是反对多数派,接着又压制异见者。而现在,他们在夺取党和政府部门权力的过程中成为了竞争对手。协调工作很快失败,局面一派混乱。来自不同大学的「夺权小组」来到同一栋政府办公大楼,争论到底谁能优先夺权。在其他案例中,一所大学的造反派夺了某个政府部门的权,而另一所大学的造反派随后而至,宣布本该是自己来夺权,因此形成对峙。乱上加乱的是,大多数党政机关其实早已有了由自己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造反团体,而他们又总是分裂成不同派别。当学生造反派来夺权时,他们又和互争吵,不知道该支持哪一方。

造反派头头对待自己的对手毫不宽容,他们将妥协和克制都视作修正主义。但这也就削弱了他们在夺权时团结起来的力量。到1月底,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因为争夺国家部委、政府机构和报刊媒体而陷入武斗。造反派联盟刚取得胜利,新的仇恨就开始在他们的领导人中滋长。来自地质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分子结成了联盟,并逐渐和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形成公开的对立。让局面变得更为混乱的是,为了针对北大聂元梓和清华蒯大富,地质学院和北师大的造反派还转而支持在北大、清华校园里那些反对聂蒯二人的势力。

2月初的夺权计划被迫取消。面对混乱的北京造反派运动,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他们夺权到此为止。首都北京将不再由群众来夺权。相反, 北京将在行政命令下组建新的革命委员会,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部队扮演主要角色。[[508]](#footnote-508)学生造反派失去了他们的机会。他们将不会成为在中国各地日益扩大的夺权运动中的领导力量。

# Blank Page

## 章瓦解和分裂

红卫兵不断制造麻烦,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一次次干预红卫兵的行动,使其保持团结一致,可每次他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毕竟,大学生只是数量很少的精英群体。1966年,全国共有7 ·4亿人,而大学生只有不到67 · 5万。这个群体规模太小,内部还四分五裂,无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产生预期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转而发动工人队伍。

直到1966年11月,官方仍然不鼔励城市工人建立自己的造反团体。

11月10日,《人民日报》吿诫工人要留在生产岗位上,不要离办厂去

「交流革命经验」。正如之前试图限制学生的暴力行为一样,周恩来在与「群众代表」的数十次会议中也竭力让经济领域免受文革的影响。但是,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漠视这一禁令,在与红卫兵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多次会面中,中央文革小组反复强调革命意识对工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 工人造反派

1 1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在幕后鼔动工人发起造反运动。11月6 日,北京造反派学生在上海的联络站已经和上海市17个国营工厂中的



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41 ).

232 政治活跃分子会面,学生们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消息。在他们的鼓励下,工人们建立起一个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并任命时年32岁的王洪文作为负责人。王洪文是工厂的保卫科党员干部,在6月里起草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大字报,并且与派到厂里的工作组发生过冲突。

该组织要求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可以想见,上海市委拒绝了此事,不愿看到这个类似独立工会组织的成立。超过2,000名「工总司」的成员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请求北京官方的支持。周恩来下令将火车停在上海市郊。工人们于是阻断了连接上海和南京以及华北的铁路,南北铁道交通完全中断。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之前是上海的官

---

|  |  |
| --- | --- |
| 了让工人停-止阻断铁路的行为并返可上海 ; 弓 |  |

员,于是被派去谈判

桥答应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 给予官方承认一并将事件责任归咎于上海

3

张春桥的单方面行动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同事感到吃惊,他们最初反对这一做法,但毛泽东却很快表示同意。上海达成的协议是否标志了全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到这时仍不得而知。周恩来召集了工业部部长和地区党委的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强烈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认为由此造成的混乱将使生产陷入停滞。11月22日,周恩来将他们的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但被拒绝。12月9日,北京终于发布文件,确认工人有权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但要求他们只能在工作之余参与政治活动。随后,另一份类似文件将这一政策扩大到集体农场。

该项决定意义重大,从根本上扩大了全国造反运动的规模和范围。 1966年,全国有国营工厂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计5 ,200万人,比大



1. pe andLi ( 1997, 31一33 , 4577)·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也从11月中旬起在上海待了几周,在此期间她鼓励反对上海市委领导的造反运动(Walder2006, 1034; Wang 2001 , 754-762 )。
2. Perry and Li ( 1997, 32一36)·
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42 144).

学生总数多出75倍。[[509]](#footnote-509)本质上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等于开了绿灯,整个工业界的工人们都动员起来。这一影响立竿见影,且发展剧烈。1966

年12月初,工人造反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学生运动却被挤到了一边。 233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相信,工人更加听从指挥,内部也会比学生更团结,可他们迅速意识到并不是这么回事。很快,他们就遇到两

们很快得出结论 一一一;一认为一是• 」 「修正主义」一管理者导

人对工资发放和生活水平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些人 味关注生产耳标,牺牲人的福利建国后,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工人的薪水很低,消费品短缺,住房也很紧张,而这是自1957年以来工人第一次有机会公开提出要求,希望提高工资标准和生活水平。其次,大学和高中的党组织在[[510]](#footnote-510)月和7月被工作组摧毁后即陷入瘫痪,而与此不同,全国各地工厂里的党组织基本完好,并且仍然活跃。他们迅速网罗工人中的支持者,建立自己的造反团体,从而对抗其他造反派的破坏运动。工厂党委的领导层内若是之前就存在某种对立,那就刚好借助派系林立的造反活动相互攻击。工人造反运动因此迅速扩张,同时也像学生运动一样四分五裂。鉴于工人规模要大得多,出现的问题自然更加严重。

### 地方政府的土崩瓦解

工厂工人分裂成几个派系之后,工作时间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也难以继续执行。工厂被内部冲突扰乱,而一些派系和其他企业中的盟友联合起来,开始在工厂以外的地方进行武斗。新生的造反派组织攻击工厂干部,在街头扰乱交通和公共服务。随即,党员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也领导起自己的造反派,予以反制。6对于这些群众运动,工厂干部和市政当局几乎没有阻止。毛泽东现在既然已经批准工人组建起自己独

立的组织,方当局很快就意识到由忠诚的工人团体组成的群众动员在) 〕自〕身利〕他们学会默许这些造反派的组建,为他们提供私下甚至是明面上的支持。

234 依靠工厂党组织和工会所拥有的工人网络和大量资源,这些忠于当局的组织以惊人速度成长,并对先前的造反派形成重大挑战。在上海, 「工总司」在1 1月中旬成立并得到承认后不久,一个叫做「上海赤卫队」的反对派工人联盟也宣布成立,并且很快发动起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走上街头。



、

组织却依靠现有的党内和工会网络在一非常短的时间内集结了大量成

在工厂层面,工人间的冲突和分歧往往反映了工厂领导的内部分歧。扬子江机械制造厂就是典型案例,本书曾在之前的章节里描述过该厂,讲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分裂现象。1964年的运动将厂里的领导层分裂成两派,分别拥有第四机械工业部(四机部)和南京市委的支持。当文革蔓延到工厂里时,之前被南京当局支持的党员派系将支持他们的工人动员起来造反,意图打倒与四机部结盟的干部。由四机部支持的工厂干部转而动员起自己的拥护者,从而抵御这些攻击。工人造反运动在1966年11月和12月迅速发展,一边寻求到了南京市委的支持,随后加入到更大的市级造反联盟中以保卫市委。而另一边由四机部支持的干部所动员起来的派系也加入到属于自己一派的造反联盟中,意图推翻南京市当局。8

一个后果就是经济需求迅速上升;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标准和生活水平,而这就需要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破坏了照搬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核心。在上海,随着「工总司」和「赤卫队」的矛盾加剧,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情绪催生了上百个新的造反组织,他们主要的要求就是获得更高的



1. pe andLi ( 1997, 71一85)·杭州和武汉也有相似的发展,见Forster(1990, 20一29 )和Wang ( 1995, 90-94 )的报吿。
2. DongandWalder(2011a, 18一22)·工厂党员干部之间的分歧也决定了上海工人派系的分裂,这些分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已开始并逐渐加剧(Perry andLi 1997, 30一31 , 4577 132 136 )。

工资和福利补贴,要得到永久城市户口,分配到新公寓,想要调到新岗位或是更换工种。临时工和合同工也组成造反组织,要求在国有部门获

|  |  |
| --- | --- |
| 得稳定的工作;而固定工则要求立即大幅提升多年未涨的工资;另外, 在大跃进后的衰退期被分配到农村的工人要求回到他们原来在城市的工作岗位;工资微薄的学徒要求晋升和涨薪;在小型的非核心集体工厂和合作社中的工人则要求获得之前只向国有部门岗位提供的医疗和福利。  工人将工厂和政府的干部挟为人质,直到他们同意这些要求为止。许多情况下,他们被迫一次付清「串联费」。工人的要求在12月迅速升级,先前只是充满抱怨的小群体,现在扩展到隶属于「工总司」和「赤卫队」的大型造反组织。[[511]](#footnote-511)这些要求表达了工人因计划经济而产生的不满, 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先前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些,他们也不希望事情会变成这样。然而,这也恰恰印证了工业界官员们早前的预测,所以他们当初才坚决反对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  严重影响还不止这些,党政机关中的职员迅速组成了造反组织。既然工人能造反,那就没有理由约东文职管理部门和国家权力机构中的职员造反。哪怕是在党政部门总部的办公室职员也组织起了他们的造反派,指控所在单位的高层干部,扰乱正常工作,或是和部门内的其他造反组织竞争,并且和外界的造反组织建立联系。随着造反运动的扩散, 党员干部甚至无法保证自己部门的职员还能听自己的。 [[512]](#footnote-512)  到1966年底,中国的大城市很快变得一片混乱。工人们离开岗位,去参加反对地方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常常与那些支持地方党组织的工人激战。铁路和轮渡服务被中断;船只无法在港口装卸货物;工厂也被迫关闭。自8月下旬以来,军队和安全部门收到禁令,不得干预造反活动。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以武力镇压了持有异见的红卫兵, | 235 |
| 这一禁令在地方上仍然有效,所以地方党组织无法调动部队。党员干部 | 236 |

基本无法控制城市街头的混乱局面,甚至逐渐丧失对自己部门职员的控制,他们向北京发出报吿,称自己的部门已经「瘫痪」。到这时,很多地方领导人实际上已经被造反派拘留,并不断被送去参加群众大会和「批斗会」。11文革的意图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必须继续实施下一步举措。

### 上海一月革命

上海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饱受摧残。12月,「工总司」和「赤卫队」的冲突升级,使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当「赤卫队」最终意识到他们无法保卫上海市委时,他们放弃效忠上海市委,转而调头攻击政府当局, 情况变得愈发严重。12月23日,他们动员了30万工人,在市中心举行集会「批判上海市党委的反动路线」。他们要求获得上海市长的承认,后者立即同意。但是第二天,上海市长在「工总司」的强迫下又拒绝承认「赤卫队」。此事一经广播报道,两三万「赤卫队」成员包围了上海市委的办公处,要求和市长当面对质。

12月29日,「工总司」动员了将近十万人包围「赤卫队」的抗议者。一场暴力武斗随之发生,「赤卫队」人数上处于劣势,因此遭受重创。12 月31日,大约两万名「赤卫队」成员沿着通向北京的铁路游行抗议。 

他们到达上海郊区时,遭到大量「工总司」人员的袭击。这场战斗再次阻断了进出上海的铁路交通。工人不是离开工作岗位去街头游行,就是在工作地点进行武斗,工厂、交通枢纽和码头都陷入瘫痪。造反派工人包围工厂干部,要求他们交出现金,后者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国有单位银行账户上的钱很快被取光,到了工人手里。工人们一时间获得大笔现金,立马涌入零售店采购。很快,本就稀缺的消费品全部售空。食品短缺随之出现,市民们急忙出门想去银行里取钱,公共交通又随即陷入瘫痪。 12



见DongandWalder (2010, 679 80)、FOISter ( 1990, 2432 )和Walder ( 1978, 35一36 )。

12 Perry and Li ( 1997, 86一88 114 116 , Walder ( 1978, 46一50) ·

面对这番混乱的局面,一场精心策划的「夺权」运动开始了,旨在恢复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同时将上海党政领导替换成忠于毛泽东路线 237 的干部。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他们与「工总司」协调行动,授权造反派接管主要媒体并命令他们发表社论, 要求恢复秩序。这些社论声称,上海当局通过煽动派系斗争、引诱工人提出经济要求,企图阻挠文革,而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513]](#footnote-513)张春桥要求「工总司」在1月6日组织一场群众集会,「推翻上海市委」。这场集会有十万人参加,党委第一书记、市长和上海市委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都在台上低着头,被迫接受批判。 [[514]](#footnote-514)

此举有效地瓦解了上海市委。很快, 56个成员中有45人被免职, 市长和所有七名副市长都被罢免。1月9日,上海地方报纸以「工总司」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名义发布了一则<紧急通吿> ,颁布一系列恢复稳定的措施。人们在经济上的要求受到谴责,并被批判成「修正主义的阴谋」。毛泽东吿诉中央文革小组,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是正确的,而且整个国家需要「学习上海经验,一致行动起来」。1月12日,一份贺电发至全国各地,对上海的夺权运动大加赞赏,并且鼓励其他地方也采取类似行动。「赤卫队」则发表了一份题为<向毛主席请罪书>的声明作为响应,为他们之前反对「工总司」的行为道歉。 [[515]](#footnote-515)[[516]](#footnote-516)

|  |  |
| --- | --- |
| 的头头王洪文则是他们的重要帮 |  |

张春桥在1月19日宣布,新的市政权力机构取名为「上海市人民公社」。然而,也许是因为造反派学生创立的「北京公社」最后搞得一塌糊涂, 2月中旬,毛泽东吿诉张春桥名字应改为「革命委员会」,张春桥遵命,在2月23日宣布更名。革委会中,张春桥是主任,姚文元是第一副主任, 工总司J

238 张春桥明确表示,现在权力「已经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禁止对权威提出进一步的挑战。张春桥命令造反派撤出街头,回去工作。从

8月的禁令到现在他头一回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防止人们对权力机

的进步冲击 一一亻也从南京军区调动一部队 一; 一一还派一出一忠于一自一己一的工人派系民一)

17



学生和工人造反派中都存在反对张春桥夺权的声音。第一个挑战来自一个叫做「红革会」的大型学生造反派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对这场夺权深表怀疑。因为有军队的支持,夺权运动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被「革命」的空洞口号所掩盖的暴力镇压。毕竟,张春桥自己就是上海市委一位颇具资历的成员。此外,他还把最先攻击上海市委的学生晾在一边,反而与「工总司」合作。1月27日,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的会议中,「红革会」将两人围困了六小时,试图迫使他们为调用军队镇压造反派而道歉。虽然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作任何妥协,最后还是被释放了,但第二天学生激进分子就绑架了张春桥的一名重要副手,把他关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张春桥派军队前去解救。学生们于是分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攻击张春桥派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军队。作为响应,张春桥动员工人在公共场所巡逻,防止人们进一步表达异议。中央文革小组拍发了一份公开电报,称对张春桥的攻击是「完全错误」的,并警吿那些坚持己见的人, 再继续下去「将会有严重后果」。学生造反派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进攻。 18

同样地,张春桥还面对来自「工总司」盟友派系的挑战。有好几个组织反对计划中的上海公社,因为他们未能参与组建公社的谈判过程, 因此拒绝解散,不愿被整合进「工总司」。耿金章是造反派系「二兵团」的负责人,他动员了人数众多的工人联盟,公开挑战王洪文,还宣布要成立另一个公社。2月下旬,公安部队逮捕了耿金章,解散了他的兵团。从那时起,上海再也没有大派系之间的街头武斗。虽然派系冲突仍



1. Walder ( 1978 , 51一63)·
2. Perry and Li ( 1997 20一21 , Walder ( 1978, 60) ·

然存在,但都被限制在个别工厂之内。[[517]](#footnote-517)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支持上海的 239 夺权运动,允许部署公安部队和地方民兵,使得上海在中国大部分地方公共秩序崩溃之时成为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

### 地方夺权

上海的一月革命成为全国其他地方的榜样,似乎可以说这是一场群众运动的结果。几个较大的群众组织支持张春桥,而他们的头头也被吸收进新的权力机构。张春桥是毛泽东可以信赖的激进分子,他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倡议,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最终,上海一系列事件表明:在当权派被推翻后,夺权运动可以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收到指示,以类似方式夺取权力。

虽然上海激发起全国的夺权运动,但黑龙江则为新的权力架构提供了一个被认可的名字:「革命委员会」。有趣的是,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夺权过程中未受影响,之后组建了一个包含造反组织领导人、革命干部以及军队干部的新政府。潘复生当时刚刚来到黑龙江,在 1965年10月才从别处调到这里。所以,他和地方领导人没有什么牢固的关系,也不用对黑龙江原先领导的行为负责。潘复生从一开始就公开欢迎学生造反,和周边在位更久的同事保持距离,表现得像是当地红卫兵的支持者。8月中旬,他在哈尔滨主持了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模仿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角色。当学生指控省里的高级干部时,他欣然同意,甚至主持了几场对其他省级高层领导人的批斗会。当1月下旬造反组织叫嚣着要夺权时,潘复生也公开欢迎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下,他于1月31日成立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自己任一把手。也有好几个大的造反组织提出反对,但是潘复生派遣了军队前去镇压。中央文革小组在2月2日正式批准了这个新的地方政府。[[518]](#footnote-518)比起「公社」,毛泽东更 240 喜欢「革命委员会」,学生们之前没能办好「北京公社」,他也因此很反对「上海公社」这个名字。

对那些迫切希望遏制文革破坏性一面的人来说,夺权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当初就反对工人加入,现在,周恩来积极支持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因为他认为这是摆脱混乱秩序的唯一途径,于是开始鼓励全国其他地方的夺权行动。在南京,造反派头头仍然犹豫不决时,周恩来直接打电话让他们从江苏省党委手中夺权。[[519]](#footnote-519)然而,他的举动却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猜疑,他们认为周恩来突然表现出的左倾热情,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违背了原则,仅仅是为了恢复现状。中央文革小组担心,由周恩来策划的夺权可能会成为恢复现状的幌子。两边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将会使成立新权力机构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68年,中国各省的混乱和暴力程度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剧。

上海模式如果在全国范围推广,显然会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觉得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这看起来似乎正是他们在1967年初所期待的。一开始,他们遵循上海和黑龙江的套路,取得了一些成功:先找到一名对毛泽东路线忠心耿耿的高级官员,确保他能够获得当地相分造反力量的支持,然后让其负责夺权。到2月中,又有三个省份以这种方式夺权并获得认可:贵州、山东和山西。在每个省,北京的官员都能找到一个资历足够深的地方官员,且此人已经展示出对中央文革小组行动计划的绝对忠诚,还有来自造反派的大量支持。每个省的夺权行动都引起了反对的声音,这和上海的情况一样,每个省的新任领导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都部署了武装部队前往镇压反对派。 [[520]](#footnote-520)

在这之后,夺权运动陷入停滞。一直到8月份都没有其他革命委员会被批准,而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也就只有一个新的省级革委会获得批

准。在其他地区策划夺权的努力未能成功,中央文革小组要么无法找到

|  |  |
| --- | --- |
| 一个可以信赖的高级官员带头,要么是造反派分裂严重、势均力敌,无法发动足够的力量成功夺权。当其余省份的政治局势悬而未决时,军队就被调来维持秩序。如果省级的夺权行动没有得到批准,更低层级的夺权自然无法开展,这意味着一系列问题在基层都没有得到解决。  江苏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成员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夺权的造反派为此饱受困扰,而前者一直在协调夺权谈判。1月初,该省大部分的高层领导都被造反派控制,而交通枢纽和码头都因为街头武斗完全瘫痪,周恩来打电话给当地的造反派要求他们夺权。可是,数天谈判都无法确定新权力机构人选,一些造反派头头之后便决定自己单独行动。在地方武装力量的支持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下,他们在1月25日宣布夺权。没有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立即抗议,还冲击了地方党报的大楼,阻止公布夺权通吿。夺了权的造反派满怀期待,等着北京的批准,但首都那边却一直没有回复。相反,周恩来命令他们去北京谈判,解决造反阵营中的分裂问题,促成内部团结。各派的头头组成大型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和周恩来以及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激烈谈判,但双方无法就哪一位高级官员担任政府新领导的问题达成一致。最终,谈判陷入僵局。而江苏从3月初起就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实质上这是一种维持稳定的策略。当问题解决之前,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受命维持秩序。 [[521]](#footnote-521)  广东的情况也很类似,只不过夺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江苏一样,城市里的大型造反运动无法就夺权达成统一。当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没有得到其他造反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就开始自己夺权时,会被其他造反组织边缘化。不过,广东的夺权运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或许是想模仿黑龙江的潘复生,在造反派前来夺权时表示欢 | 241  242 |

迎。赵紫阳同意交出权力,并承诺他的领导班子和职工会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这样既能保证夺权成功,同时也能维持秩序。造反派同意了,这一安排显然很受周恩来赞许,他在北京称:这是未来夺权的首选形式。但是,落后的造反派马上反对这种安排,称之为「假夺权」,因为省里的高级领导都还在位。这一指控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共鸣,他们同意这个说法,并且支持这些造反派的主张。周恩来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最终无果,被迫将广东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522]](#footnote-522)

### 军队干预的后果

因为造反派一贯的分裂倾向,军队的支持对稳定新权力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已经获准成立的第一批省级革命委员会对此心知肚明,而其他省份宣布夺权成功的造反派也急切地寻求军队的支持。在1月最后一周,毛泽东批示林彪,呼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随之下达了一份指示,要求「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援助,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随后关于澄清如何执行这一指示的请求促使毛泽东1 月28日又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群众组织冲击军事设施,并且授权地方指挥员镇压「右派」和「反革命组织」。 [[523]](#footnote-523)

这一关键的命令推翻了1966年8月颁布的禁止人民解放军干预造反运动的禁令。军事管制改变了军队和夺权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一旦宣布军事管制,军队就有了更大的权威。如果该省还没有一个被北京批准的革委会,那么军队干部就没有地方文职部门指导行动(这不像上海和黑龙江) ,军方被迫自己来判断不同造反派的主张,若有地方造反组织不服从军事管制,军方也要自己考虑该怎么办。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情况都与此类似,军事管制并没有加快革命委员会的形成,反而无意中将军队 243 拖入了地方的派系冲突中。分裂的局面不断加剧延长,进一步推迟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1月下旬,军队「支左」命令颁布后两个月间的事态发展进一

步奠定了派系暴力的基础。造反组织和武装部队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当解放军实施军事管制时,面对的是已经占领了办公楼和其他公共设施的造反组织。尽管这些夺权者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但造反派认为他们的夺权合理合法,并经常试图捍卫夺权成果。当军队接管战略地点时,便削弱了已夺权造反派的影响,无意中加强了那些在夺权中落后的造反派的力量。这扰乱了地方对抗势力之间的平衡。正因如此,当军队欲接管战略地点时,他们常常遭到据守造反派的强烈反抗。[[524]](#footnote-524)

这些冲突后果严重。失去战略地点控制权的造反组织常常将军队的行为解读为对群众运动的非法镇压。他们很明白,失去战略地点就失去了他们的夺权势力,他们害怕这会削弱他们与其他造反派的竞争实力。

当冲突演变为暴力时,随之而来的是逮捕,这深埋下了派系对立的种子。

在最初的冲突中,遭受打击的造反派经常动员起他们的成员,包围军队大院进行抗议,策划抵抗军队的运动。这些对峙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尤其是对造反派这一边。2月末,青海一处军营外就发生了一起屠杀169名造反分子的事件,新疆、内蒙古和河南的枪击事件也造成了平民伤亡。相比于死伤的个案,更常见的是对抵抗军队的造反组织的大规模逮捕。在四川,造反派包围成都军区司令部,后来成千上万人因此被捕。在广州和南京,冲突并不那么激烈,但也导致宣称夺权的派系成员被捕入狱。[[525]](#footnote-525)那些坚持暴力抵抗的造反组织则被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他们的头头和积极分子被监禁,而组织则被取缔。

为了支持已获准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觉得军队暴力镇压有什么不对,认为军队在上海、黑龙江还有其他地方保卫新权力架构的行为正当合理,甚至很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 244 抵抗都被视为非法行为;军队的行动是为了保卫文革的地区性胜利果实。然而,北京还在试图厘清不同造反派不同的主张时,军队已经在地

方上积极镇压造反派,这会破坏当地的权力平衡。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很多人来说,这场运动是他们鼓励和培育了好几个月的成果,现在军队的介入让毛泽东开始担心起来:军方的政治立场尚不明确,现在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强行解决地方冲突,文革可能会因此过早结束。

1967年2月中旬举行的党内领导人会议上,这些担忧进一步加剧, 最高级别的军队将领就文革造成的混乱愤怒地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526]](#footnote-526)林彪可能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副手,但其他军事官员似乎对文革造反没有那么热衷,地方指挥员尤其如此。

到3月中旬,毛泽东断定军队已经做得太过了,他们的行为大大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毛泽东无法接受的程度。他下令逮捕了几名地区指挥员,并且肃清了有问题的地方部队。4月6日,林彪为了回应毛泽东的担忧,对军队下达了一道新的指示,扭转了1月命令中的重点。林彪要求军队决不能向群众组织开火,并停止逮捕群众。军队不得取缔群众组织,也不能将其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已经取缔的造反组织要马上恢复,已经贴上的政治标签则相应取消。在未来,只有北京官方才有权这么做,反对解放军与否将不再是判断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真左派」的标准。 [[527]](#footnote-527)

这些命令迫使军队收敛已经强硬施行的军事管制,并导致在2月和 3月遭到打击的造反派组织东山再起。这也带来了意外的后果,因为实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当造反派头头和他们的追随者获释之后,造反组织很快恢复,也摘掉了反动的标签。但是,想要他们假装过去两个月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绝对不可能。现在,他们对地方军队指挥员深感 245 不满,一是因为他们在其手中遭受打压;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的组织被镇压时,他们作为夺权领导人的权力被压制了。虽然4月6日的指令禁止了军事镇压,但是被释放的造反派现在有了一个崭新的而且更为迫切的政治目标:重新获得他们在军队手中衰退的影响和威望,并削减军事管制。

此外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军队无意间也将自己卷入派系冲突之中。夺权运动几乎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被边缘化或被排斥在外的造反派自然会不满意。上海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二兵团」和「红革会」都反对「工总司」策划的夺权。因为有毛泽东的明确支持,新的上海当局自信地部署军队前去镇压反对派。可在中国其他地方,情况则完全不同,反对派夺权后苦苦等待北京的批准,却始终未得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一派成功夺权,别的造反派则持不同意见,因此十分欢迎军方介入,制约夺权者的行动。这些未能夺权的造反派认为军事管制非常适宜,因为武装部队拒绝承认已夺权造反派的主张。而到了4月份,这些被军队镇压的造反派系得以重新崛起,获得了之前的权力和地位,开始表达对军队的不满。而那些始终未能夺权的造反派这时感到必须站在军队这一边,因为军方的行动间接地帮助了他们。新的派系冲突由此奠定了基础:反对军队和支持军队的造反组织之间开始酝酿新的斗争。

### 派系暴力的基础

1967年的夏天,实施军事管制的行动无意中带来了暴力元素。在南京,造反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夺权(「好派」) ,另一派反对夺权(「屁派」)。302月份,两派在北京的谈判宣吿失败,中央文革小组偏向「屁派」的主张。这一派系中颇有一些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在秋天反对江苏省党委的运动中就为中央文革小组所熟知。当军队对南京的战略地点实施军事管制时,「好派」的队伍与之发生冲突,随后一部分 246 人被逮捕,「好派」就开始抗议军队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屁派」觉得军队的行动无可指摘。

4月初,禁止武装部队镇压造反派的指示颁布,冲突的核心开始发生变化。「好派」和「屁派」之间的冲突除了夺权之外,现在加入了另一个根本分歧:对待军队的态度。当「好派」的头头从监狱中获释后,他



30这一描述基于Dong and Walder ( 2010, 2011b )。

们发起了反对军队「错误路线」的运动。「屁派」则站在军队这一边。双方势均力敌,而「屁派」和军队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两个造反联盟之间关于夺权和军事管制的对抗在春末升级,双方开始争夺学校、办公楼和其他地点。街头武斗更为普遍,而「好派」指责军队在幕后支持「屁派」。4月的指示命令军队撤出,所以军队很少干预双方的武斗,两派间的暴力便不受约束。

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从支持「屁派」转而支持「好派」。他们起初支持「屁派」中的知名造反分子,但中央文革小组现在担心军队会扑灭造反的火势,「好派」对南京军区的冲击正好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行动,而「屁派」现在则支持军队。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开始和「好派」合作,加强对军队的抵抗,而江苏军方则发现自己陷入了不断发展的派系斗争之中。在4月新指示下达之后,军队不再有权力制止双方的街头武斗。这就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广州的事态与南京大致相同。当地的造反派在1月末夺权运动中因相同原因而产生分裂。[[528]](#footnote-528)被排除在夺权运动之外的造反派指控这是一场「假夺权」,因为其保护了那些之前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官员。这一说法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共鸣,尤其是周恩来将广州的夺权捧为模范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在2月的北京谈判中支持反对夺权的派系。当谈判陷 247 入僵局后,军事管制在2月底开始施行。南京发生的一切以同样的次序在广州上演。夺了权的造反派抵抗军事管制,遭到逮捕,组织也被取缔。另一派造反派则赞同军队的行动。当4月指示要求军队释放被捕造反派时,他们动员起来攻击军队,赢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两派现在更为势均力敌,双方冲突在全省各地升级。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被称为

「红旗」,而支持军队的一方则被称为「东风」。 [[529]](#footnote-529)[[530]](#footnote-530)

在[[531]](#footnote-531)武汉,造反派围绕一月夺权也同样经历了最初的分裂过程,但之后的事件发生了非常不同的转向,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全国性影响。在湖北,造反派就夺权中的代表权问题而分裂,在夺权中占上风的派系和地方军队产生冲突,后被谴责和镇压。333月下旬,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北京和周恩来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会面,而他们一致认为占主导地位的造反派行为是不正确的,并且不能容忍造反派对军队的攻击。陈再道从这些指示中获得信心,返回武汉并指挥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运动,镇压抵抗军队的造反派,逮捕他们的头头和大量追随者,摧毁了该组织,并将许多成员批判为反革命分子。

站在对立面的派系则支持军队的行动,检举和批判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派系成员。然而,他们也很快与军队发生了冲突。3月初,他们在自己仍然掌控的《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吿军队对其对手的镇压不应误导保守派,让他们误认为现状将会继续维持下去。出乎造反派预料的是,军方将这篇社论解读为对他们的攻击,便迅速夺取了报社的控制权并迫使其领导进行自我批评。现在,这边的造反派系也已失势。

军队开始稳定公共秩序、恢复生产。依靠在之前几个月里被严重打击的党组织和工会,他们在工厂里建立了「促生产」队伍。新的造反组 248 织在成员身份和政治立场上比较像之前的「上海赤卫队」,后者当时被动员起来保卫上海市委。这些组织坚定地支持军方在武汉恢复秩序。 [[532]](#footnote-532)

4月6日对军队的指示发布后,武汉军方先前的行动正是指示中明令禁止的。这就给了造反派东山再起的决心,他们在攻击陈再道将军的运动中又一次联合起来。被取缔的造反组织又建立起来,并宣吿重生, 他们在城里游行,突袭了两大日报的办公楼,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抗议,要求释放在押成员。 [[533]](#footnote-533)

与南京、广州和杭州不同的是, 1967年5月和6月在武汉发展起来的新派系并不是像先前一样分成敌对的两派。造反派已经联合起来对抗军队,而另一个叫做「百万雄师」的全新联盟则组建起来站在军队这一边,并且和党组织、安全部门还有民兵都有密切联系。东山再起的武汉造反派开始对武汉军区发起进攻,在全市发动绝食抗议,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成员,并且要求重新承认他们先前被取缔的组织。5月初,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爆发了小型的冲突。军方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造反分子,但是坚定地认为取缔造反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在5月和6月间,造反派重建并扩大了他们的组织,而「百万雄师」也同时壮大起来,坚定支持当地军方。 [[534]](#footnote-534)

两派势力不断壮大,而军队此时无法使用武力,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限制不断升级的派系暴力武斗。记录显示, 5月末开始就有人在武斗中丧命,而大规模暴力还在后面。到这时,每个派系都开始武装自己,主要使用棍棒和长矛,并开始占领楼房、办公室和工厂等地,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反抗对手的攻击。「百万雄师」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们由退伍老兵组成了有纪律的部队,并且接管了城区里的好几个工厂以及市委总部。武汉军方多次呼吁结东街头暴力,但是因为无法使用武力,他们的呼无人重视。

武汉成为了一个战场,整个城市都在进行街头武斗。根据造反派统

249 计的数字,在5月和6月间共发生174起暴力冲突,涉及7万多人,导致 158人死亡、超过千人严重负伤。「百万雄师」在6月发起了对造反派的大规模攻势,系统性地夺取了造反派手中的地区。据称有数十人死亡, 而受伤的人更多。造反派也陷入了混乱。6月23日,「百万雄师」占领了主要造反组织的司令部,在此过程中死亡25人。武汉造反派走到了彻底失败的边缘。 [[535]](#footnote-535)

密切关注这些事件的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困境感到震惊。6月 26日,他们向武汉军区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命令陈再道阻止对造反派的进一步攻击。电报批评了「百万雄师」,并警吿称那些打死人的必将受到惩罚。两派被请到北京参加谈判。「百万雄师」行动受限,街头武斗得到控制,而两派代表也各自准备在北京为自己进行辩护。 [[536]](#footnote-536)

### 武汉事件

淡判地点很快转移回了武汉,因为毛泽东突然开始了对南部省份的视察,武汉是第一站。毛泽东于7月13日秘密抵达武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同前来,随后周恩来也加入其中。王力和谢富治在当地一所大学会见了造反派,消息一下子在全城传开。[[537]](#footnote-537)毛泽东在7月15日和16日决定了方案,被镇压的反对派应得以恢复,并受到平等对待,「百万雄师」也不应该被解散,但定性为「保守派组织」, 而武汉军区的领导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谢富治和王力向军队指挥员和群众组织传达了这些指示的要点。消息在全城传开,造反派主张强调对「百万雄师」和军方的批评,而在王力对军官的一次讲话中没能把握好分寸,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毛主席的这一决定更倾向于批评「百万雄师」,似乎代表了「百万雄师」的彻底失败,他们的头头和积极分子深感愤怒,其中很多人拒绝和信这是毛泽东的最后裁决。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王力,认为他该对此负责,而

同情「百万雄师」的士兵也持此观点。 [[538]](#footnote-538) 250

7月20日晚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后来被称为「武汉事件」。当晚,一批同情「百万雄师」而心怀不满的士兵闯入谢富治和王力的住处,对他们动粗,还绑架王力作为人质。毛泽东此时就住在附近的一栋别墅里,士兵的突然侵入引起了他的警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毛泽东赶紧离开了武汉,乘飞机前往上海。有谣言说,中央文革小组否认了王力的观点, 毛泽东也改变先前的说辞。「百万雄师」在全城举办庆祝游行,还张贴了批判王力的标语。王力最后被转移到军队关押,并于7月22日获释。王力[[539]](#footnote-539)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和伤痕累累的身躯飞回北京,像英雄归来一样受到热烈欢迎。

北京对王力归来的反应震惊了原本处于欢呼雀跃中的「百万雄师」。 7月20日晚上的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声讨「武汉的反动分子」。7月27日,北京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号召武汉人民行动起来,与武汉军区的「坏头头」和「百万雄师」作斗争。陈再道和他的下属被遣送北京,被指控试图发动军事政变。「百万雄师」被频频谴责,并迅速瓦解,退出政治舞台。重新得势的造反派开始攻击曾经的「百万雄师」成员。在未来几个月里,造反派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仅在武汉就有超过600人被杀害,约6· 6万人遭受永久性的伤害。[[540]](#footnote-540)在「百万雄师」被击败后,造反派因为权力分配而不和,再度走向分裂,无法达成妥协。而新的军事当局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造反派两边都极大地扩张自己的势力,并恢复了他们的暴力对抗。[[541]](#footnote-541)

#### 充满暴力的1967年之夏

「武汉事件」引发了对军队政策的根本转变。7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共同刊发社论,号召「揪军中一小撮走资派」。社论表明了对 251 造反派的强力支持,后者开始挑战地方军事指挥员。全国范围内,军队发现自己面临新的冲击。那些与军方有冲突的派系开始利用这场运动从而在派系斗争中取得上风。在武汉和其他地方,造反派立即开始了一场抢夺军事装备的运动。先前的指示命令军队不得向群众组织开火,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抢夺武器时,军方就很难控制局面。在此期间,毛泽东本人号召「武装左派」,以便与敌人作斗争,而一些地方军队则开始向他们认可的造反派系提供武器和弹药。[[542]](#footnote-542)

事[[543]](#footnote-543)态在全国各地产生了爆炸性影响。1967年的8月和9月,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和造反派对军队的攻击都达到了顶峰。在重庆,一次动用军队武器的武斗卷入了大约一万名战斗人员,导致了近千人的伤亡。另一场武斗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大炮,重庆的一个港口区被夷为平地。长江的航运因此中断超过六周。[[544]](#footnote-544)在9月的前几天,长江港口城市泸州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超过三万人参与其中,并使用了军队的武器,导致二千多人死亡。该市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港口地区的码头更是被夷为平地。 [[545]](#footnote-545)在江苏,许世友的部队自4月以来就一直处于守势。「好派」和「屁派」的武斗在6月升级,「好派」发起一系列突袭,冲击军方手下的公安局办公楼。在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在地方上的代表鼓励「好派」直接攻击许世友。他们指控许世友是「江苏的陈再道」,说他必须被「揪出来」。许世友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在心腹下属的护送下,许世友撤到邻省安徽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反对许世友的造反派认为很快就可以推翻当地的军事领导,于是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当派系斗争失控时, 江苏的军队仍然驻扎在兵营里,按兵不动 [[546]](#footnote-546)

在广州,「红旗」一派受到武汉事件的鼓舞,加强了对敌方「东风」一派和广州军区的攻击。使用了军队武器的大范围武斗在广州和周边地区爆发, 8月中旬,在工会大楼发生了一场长达四小时的枪战,船厂和 252 码头仓库的两场武斗中甚至用上了枪枝、炸弹和手榴弹。在其中一场武斗中,太古糖仓被焚毁,烧坏了所有的精炼糖。[[547]](#footnote-547)在浙江,两派之间的战斗也在升级。双方都抢夺了武器弹药,或是从支持他们的部队手中获得武器。在港口城市温州,一场激斗将市中心的大片商业区烧为平地。被敌方派系俘虏的人员遭受折磨甚至处决。因为军队不能使用武力,所以也就无法控制该省的局势。 [[548]](#footnote-548)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对攻击地方军事指挥官表现出强烈的支持,军队因此开始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迹象。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就面对来自其下属空军部队和其他一些军官的挑战,而江苏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公开支持带头攻击他的造反派。[[549]](#footnote-549)浙江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同的军队在地方斗争中支持不同的派系。在杭州,空军和一些地面部队承诺支持「联总」攻击浙江军区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 [[550]](#footnote-550)

毛泽东在匆忙逃离武汉后仍住在上海,他在整个8月里都注视着这些省份的动态,但似乎还没有决定该如何回应。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鼓励造反派攻击军队,并传达毛泽东的指令,要去给代表左派的群众组织分发武器。此举不仅没有恢复地区派系斗争的平衡,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破坏和伤亡。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地方军事部队内部有严重的政治分歧,在派系斗争中积极介入,支持不同的派别,这也有可能会导致军队自身的瓦解。一些革命委员会在1967年初成立,镇压了一部分造反派,现在这些组织又重建起来,挑战革委会。毛泽东在8月的讲话中似乎透露出一种稳坐钓鱼台的轻松,好像这一切都照着只有他才知道的宏伟计划在进行。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审视最近的一系列决定,发现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产生新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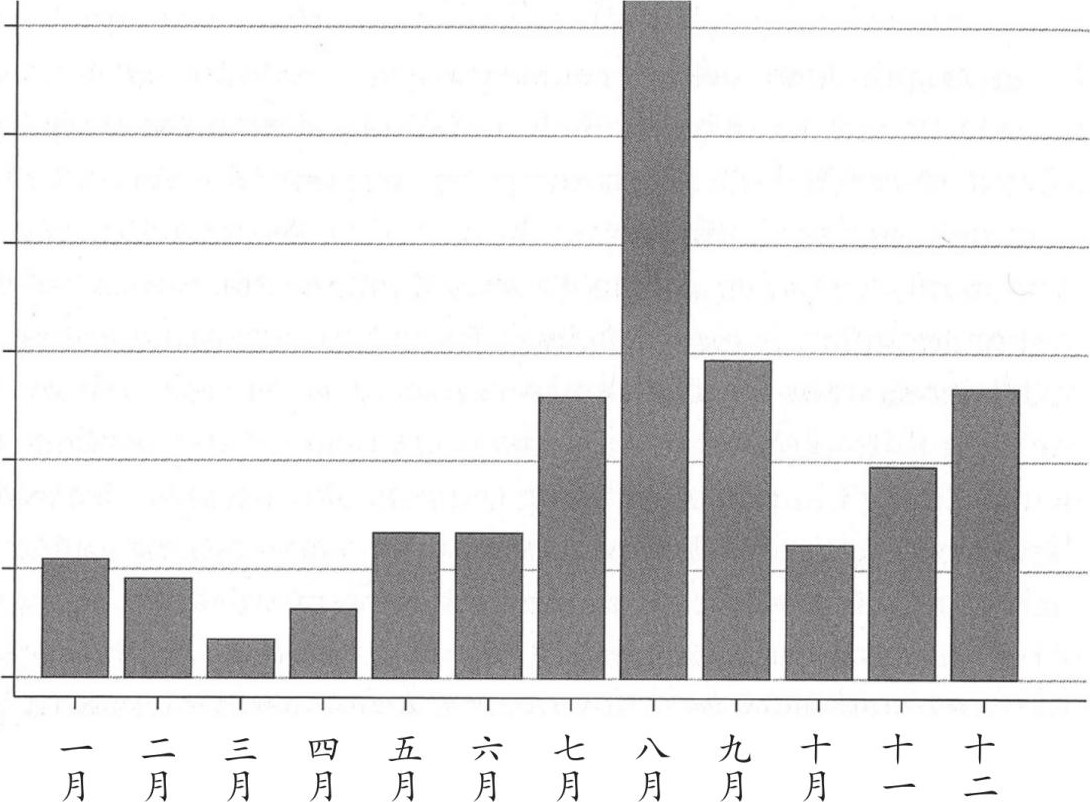
253 建立新秩序

8月末,毛泽东再次改变路线。他表达了对「揪军中一小撮走资派」口号的疑虑。8月30日,毛泽东下令逮捕并公开羞辱几名中央文革小组中参与了攻击军队的激进分子,包括因「武汉事件」而出名的王力,还有其他几名曾为反抗军队的造反运动提供支持的工作人员。[[551]](#footnote-551)这人成了毛泽东武装造反派和允许攻击军队决策的替罪羊。看到毛泽东立场的明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著名成员,特别是张春桥和江青,很快就撤回了他们对各省造反派的支持。[[552]](#footnote-552)毛泽东命令军队停止分发武器, 并从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弹药。军方收到指示,如果造反派以武力抵抗,军队就有「开枪自卫的权利」。 [[553]](#footnote-553)

这在江苏这样的省份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8月16日,仍在上海的毛泽东命令张春桥飞往许世友在安徽的藏身之处,并亲自护送他到上海。第二天,毛泽东会见许世友,向他保证不管是许世友个人还是南京军区这个组织都不会有事。张春桥很快命令他在南京的造反派联盟停止攻击许世友的部队。周恩来利用毛泽东的态度转变,在和地方造反派的多次会面中强调,现在应停止对解放军的攻击。周恩来毫不含糊地命令南京造反派停止他们的运动。两派虽然照做,但是仍然彼此不合。[[554]](#footnote-554)

图11 · 1 1967年暴力冲突的次数(按月计算) 254

1500



月

月

1250

1000

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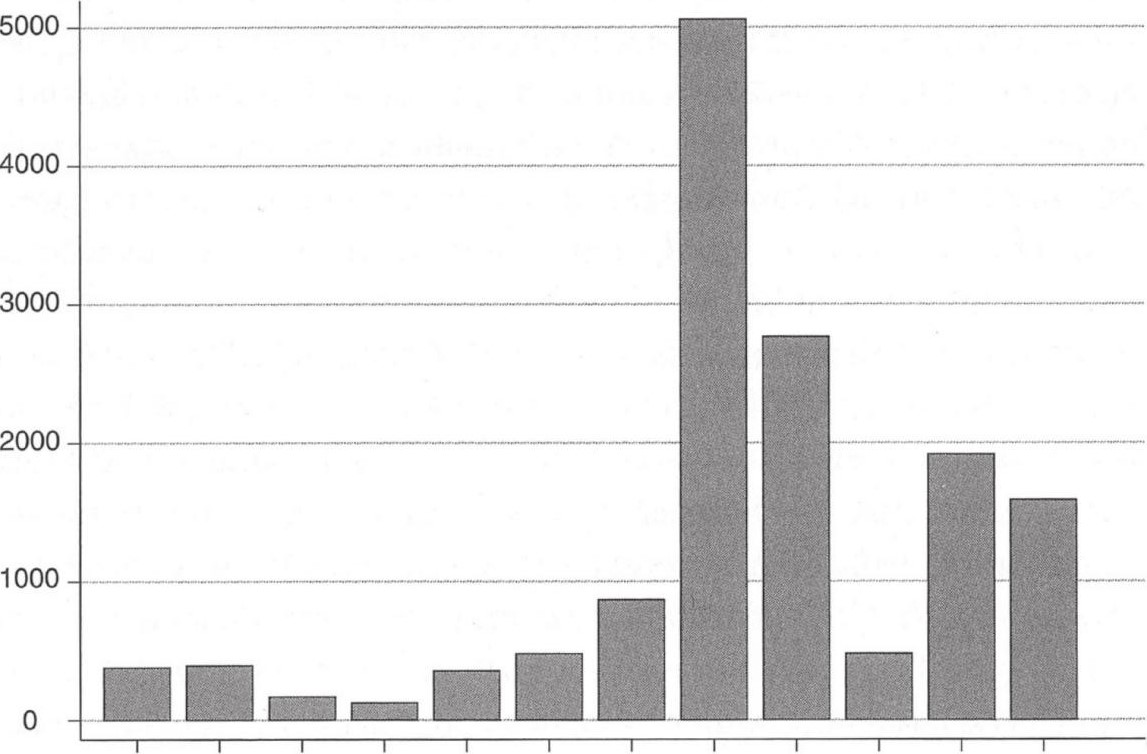
500

250

0

数据来源: Walder(2014)

图11 ·2 1967年政治运动中的死亡人数(按月计算)

死亡人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十 十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一 二月 月

数据来源: Walder ( 2014 )

图1L1展示了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号召武装造反派并鼓励攻击地方军队的影响。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和对政府办公楼、军队设施的冲击在 1967年8月激增, 9月份毛泽东改变立场,开始大力支持地方军事指挥员,暴力事件次数迅速回落到先前水平。向造反派分发军事装备的影响则更大。图1L2显示,向武斗人员分发武器后,派系冲突变得更加致命。 1967年7到8月,有记录的武斗次数只增加了两倍多,但因为这些冲突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却足足增加了五倍。想要从造反派手中收回武器也十分 255 困难,这意味着8月之后每月的死亡人数仍然远远高于之前的水平。

毛泽东最终放弃了操纵地方造反组织与军队之间冲突的想法,觉得此举无法取得他想要的成果。到1967年9月,毛泽东得出结论,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军队。上海模式已死。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相应的最高职位几乎都被军事指挥员占据,而且军官也在处理安全和宣传工作的重要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结果让造反派头头非常失望, 他们本来想和上海的造反派头头一样获得重要职位。然而在1967年大部分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的暴力冲突使得不论哪派的造反派头头都不可能真正获得实权要职。他们曾带头攻击军队,现在算是落到了军方的手里。

在军事管制下,重建政治秩序在很多省份都是漫长而充满争议的。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需要六步。第一,武斗的群众派系和他们的军方支持者必须停火;第二,代表们需要前往北京,并在北京当局的监督下做自我批评,然后讨论如何解决分裂的问题。第三,就新革委会的人员名单达成一致,更准确地说,是迫使代表团接受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革委会人选。第四,批判并罢免那些不愿意妥协或放弃武斗的派系头头。第五,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禁止那些跨单位或跨学校活动的群众组织。第六步也是最后一步,让他们回到地方上,在更下一级的市、区和县重复这一过程,在学校和单位里开展批评运动,从而打破派系关系,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加强军队的权威。

江苏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569月4日,在毛泽东要求造反派停止攻击许世友将军后不久,周恩来力劝两个造反联盟签署停火协议,并命 256 令江苏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代表到北京。敌对的各派系在南京和江苏其他重要城市选出了一百八十多名代表。曾积极攻击许世友以及支持许世友的两派军官也分别成立了各自的代表团。

谈判从「学习班」开始,每一派都被要求就他们之前几个月中的行为做出自我批评,但这些会议总是频繁地陷入激烈的争论中。谈判无意中又重新点燃了南京和江苏其他城市的街头武斗,因为每一派都想增加自己的实际势力,以提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反对许世友的派系坚持对许世友的指控。激烈的会议一直持续到12月,考验着周恩来和康生等领导人的耐心,他们在许多场合都生气地谴责了固执的代表们。12 月,谈判还是处于僵局,武斗沿着沪宁铁路沿线重新爆发,铁路交通再次中断多日,这也使得军队走向分裂,各自支持他们的造反派盟友。



56这一描述基于D。ng and Walder ( 2012a )。

经历了四个月激烈而徒劳的谈判后,毛泽东发话了,逮捕许世友在军队里的敌人,以及支持这些人的造反派头头,并将其批判为煽动派系斗争的「黑手」。这些人在南京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被批斗,受到粗暴对待。地方媒体对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展开了尖鋭的批判。「煽动冲击军队」现在成为一种罪名,将受到严厉惩罚。在北京的代表和他们在当地的追随者们受到威胁,禁止他们追求进一步的派系斗争目标。中央军委处罚并转移了那些参与过反对许世友战斗的军官和部队。这一场镇压最终结束了在北京的争论,并熄灭了江苏的派系斗争之火,中央的集权性决策让这场持续四个月的谈判终于在1968年1月结束。

1968年2月,在肃清了反对许世友的激进造反派和军官之后,新代表团在北京开会,选举产生江苏革命委员会。到这时,其实已经没有什 257 么开会的必要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让许世友领导江苏革委会,而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将哪些前江苏高层党政领导纳入新的班子。经过短暂的讨价还价,周恩来咨询许世友后与其达成共识,将拟定的人选报给代表团,名单在3月20日获得一致通过。名义上说,新革委会的165名成员中大多数都是「群众代表」,但其实造反派成员基本没有实权。革委会很少召开全体会议,其「常务委员会」倒是经常会面并做出重要决定。而常委会完全被军队官员掌控,他们在革委会成员数量中只占不到五分之 ,但垄断了所有的关键职位。许世友是革委会一把手,而四个副手中除了原省委书记彭冲,其余都是军官。负责政治、生产和安全等关键部门的也都是军官。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副手。每个造反派系中各有一个突出的头头被任命为39名常委中的一员,可没人有真正的实权。许世友和他手下的军队继续将江苏置于牢牢的军事管制之下。

江苏省革委会是29个省级革委会中第17个成立的。最后一个是 1968年8月成立的广西革委会。广西省毗邻越南,发生了严重而持久的武斗,丝毫没有响应中央对停火谈判的呼吁。后来广西派往北京的谈判团本身也受到了暴力的影响:广西的军队司令韦国清在他的宾馆里受到造反派的袭击和殴打,后者也从广西赶来与他对质。广西的造反派结成了两个省级的派系大联盟。一派叫做「四二二」,他们反对韦国清,但得到[[555]](#footnote-555)了驻扎在省会南宁的解放军主力的支持,后者直接听命于北京。「联指」支持韦国清,同时他手下的军队也表示支持。因为军方各自支持不同的造反派联盟,北京的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的耐心已经到头了。7月3日,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下令, 严厉镇压广西任何一个抵制军事管制的组织,而支持「四二二」的解放军主力也被调离该地区。造反派仍然控制着南宁,韦国清发起了总进 258 攻。他的军队在7月中旬轰炸了南宁,摧毁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战斗在南宁持续了两周,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 1万多人被捕,后来超过 2,300人被处决。

这次进攻由解放军正规部队和全副武装的「联指」战斗人员在全省发起。战斗随后深入到农村地区,触发小城镇和村庄内的大屠杀,有些看起来和省里两大派的冲突根本没什么关系。[[556]](#footnote-556)在宾阳县, 7月26日至8 月6日,所有的公社都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共有3 ,681人惨遭杀害。而宾阳县在整个文革期间被杀人数一共是3 , 951人,其中93 %都发生在这短短的1 1天里。[[557]](#footnote-557)在东兰县,「联指」的头头和他们的军队盟友动员了 3 ,000名武斗成员,在县里清洗了他们的敌人,逮捕1万多人,处决 1 ,016人。 [[558]](#footnote-558)

广西的暴力事件摧毁了造反派的有生力量,并最终使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置于严厉的军事管制之下。在29个省中,解放军将领获得了其中20个省的管辖权。在广东、辽宁、山西、云南和湖北,军队领导了 81 %至98%的县级以上革委会。[[559]](#footnote-559)在江苏,军队领导了所有的区级单位和下级68个县中的60个。[[560]](#footnote-560)军管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国的党政体制。那些曾经扺抗过军事管制的造反派现在已经完全处于军队的掌控之下。

### 北京苦涩的结局

在当局试图于各省建立「大联盟」的几个月里,在首都北京的学生造反派也出现了同样的派系斗争。大学造反派分裂成两大联盟,分别叫做「天派」和「地派」。冲突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两个最大的校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学校的造反派因为聂元梓(北大)和蒯大富(清华) 领导权争议而分裂。聂元梓和蒯大富是「天派」的领导人,而地质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派则是「地派」的中坚力量。他们坚定地支持聂元梓和蒯大富的反对者。 [[561]](#footnote-561)

259 「天派」和「地派」之间的对立从1967年初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头疼的问题。尽管聂元梓和蒯大富在1966年底作为首都造反运动的典范而成了全国名人,现在却变成了政治包袱。两人的行事都在各自学校里引发了造反运动的内部分裂。而「天派」和「地派」在全北京的僵局逐渐演变成校园暴力冲突。为了筹办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一边招募自己的人选,一边攻击那些倒向另一派的人。他们开始逮捕囚犯,还设立了审讯室来逼供。造反派先巩固好自己控制下的学校大楼,并继续抢夺学校里的地盘。到1968年春天,北大和清华的校园里就好像在进行着一场内战,没有任何权威部门可以调解双方的暴力冲突。[[562]](#footnote-562)

北京大学的冲突在1968年3月到达顶峰,「地派」的一大批造反分子在校园里游行,要求揪出聂元梓。聂元梓组织她的战斗人员前去抵抗, 随后几天里,武斗开始爆发,上千名「地派」和「天派」的增援人员加入了战斗。[[563]](#footnote-563)双方的冲突仍在继续,互相的指责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4 月时,聂元梓的人占据了上风。对手只能掘壕固守,她看起来似乎站在了胜利边缘。聂元梓的反对者试图躲在防御工事后继续坚持,并停止了小报的发行。当他们试图恢复水电、并向自己的地盘运送食物时,冲突随即爆发。聂元梓的手下扣押并审讯任何他们能抓到的反对者,还让他们参加公开批斗会。有好几人都被折磨致死。4月底,聂元梓举办了一系列公开审判,批斗那些被她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她还设立了监狱,在里面关押了超过200名干部和教师,这些人常常被殴打折磨,受到刑讯

聂元梓不容任何妥协,并要求对方彻底投降。临近7月末,她准备进行最后的战斗。她的人手切断了对方地盘的水电供应,用瓦片、长矛和砖头展开战斗,一直打到附近的街道上。7月27日,聂元梓听说一大批工人和士兵包围了隔壁的清华大学之后,她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对策,

囤积了燃烧瓶和其他武器,还部署了哨岗。然而,在7月28日凌晨3 260 点,聂元梓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

叫聂元梓去开会的原因正是那天清华发生的事件。蒯大富和对手之间的斗争早就发展成了暴力武装冲突。从5月初起,清华校园里大楼防守坚固,阵地犬牙交错,处于攻势的始终是蒯大富一方。一开始,学生们用棍棒、长矛、匕首、砖头和弹弓武装起来,受伤人数不断增加。临近4月底发生了第一起死亡事件。5月初,对方阵营的成员抬着遇害者的尸体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在那里举行抗议集会。接着是一系列小型校园冲突,又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俘虏则被残忍殴打。在其中一个头头被杀后,反对派在5月末又举行了一次游行,带着尸体上天安门广场抗议。

5月30日,事情出现转折。在一次进攻反对派所占大楼的袭击中, 双方使用了长矛、刀具、燃烧瓶和手榴弹,甚至还用上了一辆自制坦克。蒯大富的部下放火烧了这幢楼,并在反对派战斗人员试图逃离时捕获他们。在这场长达11小时的武斗结束后,三名学生丧命,超过300人负伤。蒯大富的部下获得了步枪,在校门和被包围的楼房进出口部署狙击手,开始瞄准那些试图离开或进入的人。冲突仍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手榴弹、燃烧弹、土炮和工程专业学生设计建造的土坦克投入其中。蒯大富的对手陷入绝望,向北京市革委会反复求救,希望将清华戒严。7 月7日,他们又带了一具战友的尸体上天安门广场游行请命。可战斗仍在继续, 7月9日,校园里的一幢刚建不久的新大楼几乎被烧毁。到7月末,已有12人被杀,好几百人受了重伤。学校里大部分人都逃走了, 估计不到400名顽固的武斗分子还留在校园里。

毛泽东这时已经对蒯大富和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失去了耐心,很难想 261 像他们在两年前还是毛泽东看重的人选。毛命令负责保护国家领导人安全的精鋭部队派出军官从附近六十多个工厂中召集上千名工人,并组建一个由军官组成的领导核心,动员起将近三万人的力量于次日早晨聚集于清华校外。他们只带着《毛主席语录》,因为毛泽东不希望武装军人进入校园并用致命武器镇压造反派。因此,这支浩浩荡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进校门,高呼毛泽东的语录,把双方隔离开来,并开始清除路障和防御工事。

蒯大富认为这一举动是为了窃取自己的胜利果实,并宣布是党内领导层中的黑手派来的工人队伍。他命令追随者发起抵抗。在长达12 小时的冲突中,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士兵试图进入建筑、劝说蒯大富的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却遭到蒯大富方面的袭击。最终,蒯大富还是选择了投降,可这时他们已经杀了宣传队中的5名成员,并使其中超过700人受伤。

当清华的敌对情绪逐渐减弱时,蒯大富、聂元梓和其他三名来自「天派」和「地派」的著名红卫兵头头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当他们在7月28日凌晨时分抵达时,面对的是以毛泽东本人为首的一批高层官员,其中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遭受严重清洗后的整个党内最高领导班子几乎都来了。会议从凌晨3点半开始,足足持续了五个小时。

经过编辑的会议记录后来被印成小册子公布。在会议记录中,毛泽东和继表现出操心、讽刺、威胁和愤怒的心情。[[564]](#footnote-564)组织这次紧急会议显然是因为清华所发生的一切。而会议刚开始,毛泽东就对蒯大富表示强烈不满。蒯大富迟到了,毛泽东频频询问此人为何还未到场。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马上说明了召开会议的目的:「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任务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虽然毛泽东的讲话带着他特有的凌乱逻辑,但中心意思很明确· 红卫兵运动到此为止。毛泽东对他们的行为深感失望,大学校园也将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这一消息作为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五位红卫兵领袖的名义下达全国,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262 了… …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毛泽东明确表示,主要的错误,就是持续的派系武斗:

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 …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 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郐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

毛泽东明确表示他的耐心也已经到头了·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红卫兵被吿知立刻返回校园,等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到来。到8 月末,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部队向北京的大学校园派去了1万多名士兵和1.7万名工人。当这些看过去有点像1966年工作组的宣传队到达校园时,学生们发现文革彷佛又回到了原点。不过,宣传队可不容忍任何反对或批判。几乎每个工宣队都由军官领导,他们毫不含糊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 Blank Page

|  |  |
| --- | --- |
| 12早军事管控  1967至1968年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人们都认为军事管制和革命委员会将会「让社会重归秩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新阶段发生了剧烈而扭曲的社会变革,新的迫害运动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大批城市学生和官员被下放到乡村,从事体力劳动。大学关门,政府机构空无一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新的顶点,与集体性宗教膜拜几乎无异。数百万人被投进监狱,面对刑讯、虐待,或是在搜捕政治阴谋假想敌的行动中被处决,亦或是选择自杀。这些运动所造成的死伤远远超过了红卫兵的狂暴行动和造反派联盟之间的派系武斗所造成的破坏。  清除造反组织  军队领导下的思想宣传队扺达后,开始强制执行「无产阶级专政」, 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这才幡然醒悟。这些宣传队里有工厂工人和部队军官,拥有军管会的支持。宣传队的目的不是宣布谁赢谁输,也无意再让运动积极分子继续做政治秀。宣传队认为,造反派没能实现大串联,双方都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必须进行再教育,坦白自己的罪行,并强制参加「学习班」。这一再教育过程的口号是「斗批改」,军管会采取 | 263  264 |

了一系列系统的措施,来消除造反派头头的影响。切断了他们与其他学

校和单位同盟间的沟通,并稳步地消除他们在学校、工厂和政府部门的派系隶属关系

「斗批改」运动是一场强制性的运动,包含相互批评、思想改造等环节。在这场运动中,近几年来的派系分裂被消除。在强制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各级派系领导人被强制要求写下对自己的批评,承认在群众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学习班的指导员会详细评估这些忏悔,学员也要相互做出批评。相互批评常常揭露出没有被人们坦白的新错误,那些不愿意承认罪责的人就会被拖去参加由军队官员组织的批斗大会。举办学习班的理想结果是将组织充分改造,让人们成为团结、守纪、服从的人民公仆,服务于领袖毛泽东,因为他成功化解了分裂造反派的派系

全国知名的造反派领袖也没能幸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北大聂元梓的案例,她因为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获得毛泽东的赞誉,也是北京革委会委员,可此时却受尽屈辱。11968年7月与毛泽东的那场会面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结东,会后,聂元梓回到大学校园, 她的派系下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热烈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进驻。宣传队于8月中旬进驻北大后,事态急转直下。聂元梓一派的派系报纸被立刻关停,宣传队要求所有人交出武器,解散斗争工作,士兵控制了所有播音设备,释放了所有被关押在私设监狱的囚犯,并要求各方不得再相互攻击。聂元梓很快得到消息:她必须反思自己强制镇压批评意见、造成并持续暴力分裂的作为。

双方派系的领导都被强制参加学习班,坦白自己在过去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然而聂元梓拒绝承认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依然坚持抨击自己的对手。10月,宣传队召开了三千多人参与的批斗大会,指责聂元梓反抗 265 宣传队。11月下旬,聂元梓又受到大会批斗,指责她的「资本主义立场」和「腐化伪善的作风」。

1969年9月,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最终成立,军队干部担任一把



1 这一说法基于Walder ( 2006, 1044一1045 ; 2009, 247一248 )。

手。在六位副手中,有三名是军队干部,一名是宣传队的工人,其余两名才是大学方面的人物,聂元梓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一举措实际上就是摆摆样子:毛泽东曾经公开赞扬这位大字报写手,必须给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留足面子。聂元梓被孤立,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进行「再教育」,唯一一次露面是作为党代表参加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而事实上这也只是摆个样子,没有实际意义。九大期间,虽然聂元梓有政治问题,她还是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北大革委会成立两个月后,聂元梓就被下放到某个国有农场参加劳动改造。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聂元梓的名字也被悄悄地从北京市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删去。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知名的红卫兵领袖,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565]](#footnote-565)8月上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除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系的武装,并释放所有被拘禁的人员。部队负责确保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顺利进驻清华大学,而1969年1月,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一把手就是该部队的指导员。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清华大学由宣传队负责管理。[[566]](#footnote-566)蒯大富被下放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兵工厂里,在1970年被调回清华,但是被孤立,并受到审讯,罪名是怀疑他参与地下极左组织。最终,蒯大富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可是依然受到「严密监视」。

北京的其他知名造反派领袖都遇到了相似的命运。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在1968年10月被送到北京附近的一处部队驻地参加体力劳动

1970年中,她回到北师大,却因涉嫌极左阴谋而面临审讯。在此次受挫后,直到1970年代中期,她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工作,并受到监视。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也同样被孤立,于1968年末接受调查。 1969年末,韩爱晶被送往湖南的一处工厂参加劳动,并受到监视。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在1969年1月被发配到四川的一处工厂。总之,在新建立的权力机构中,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北京学生运动领袖都失去了地位。

## 266 巩固革委会

北京著名造反派的经历只是军队消除派系力量这一整体战略的一个缩影。在江苏,省级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567]](#footnote-567)月在南京成立,一把手就是许世友将军。4无论造反派领袖有什么影响,都随着他们原来造反派组织的逐步解散而消除了。第一步就是将学生、工人和农民分别归入市一级的「人民大会」中,这有效地阻止了政治积极分子跨校、跨单位的活动。这一措施并没有立即消除派系斗争,但是将斗争有效地控制在了各个学校和工厂内部。接下来就是组织学习班,强制派系领袖参加,并开展「斗批改」运动,逐步化解派系联系。要是有地方派系领袖反抗,这些人就会成为运动的首要目标。随后发起的对抗各种政治阴谋运动进一步打击造反派的活跃分子,许多人还因此进了监狱。在一连串举措中, 江苏的军队没有大规模调动军事力量,但逐步加紧了对该省的控制。[[568]](#footnote-568)造反派领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在革命委员会的职位只是一个虚名。 1968年5月,他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邻近的上海学习模范经验,之后他们的不满更为强烈。代表团回到江苏后,前造反派双方都公开赞扬上海的模式:与他们不同的是,先前在上海活跃的造反派领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王洪文)依然身居要职,掌握实权。曾经对许世友将军发起攻击的造反派成员更为沮丧,因为他们成为「斗批改」运动中的首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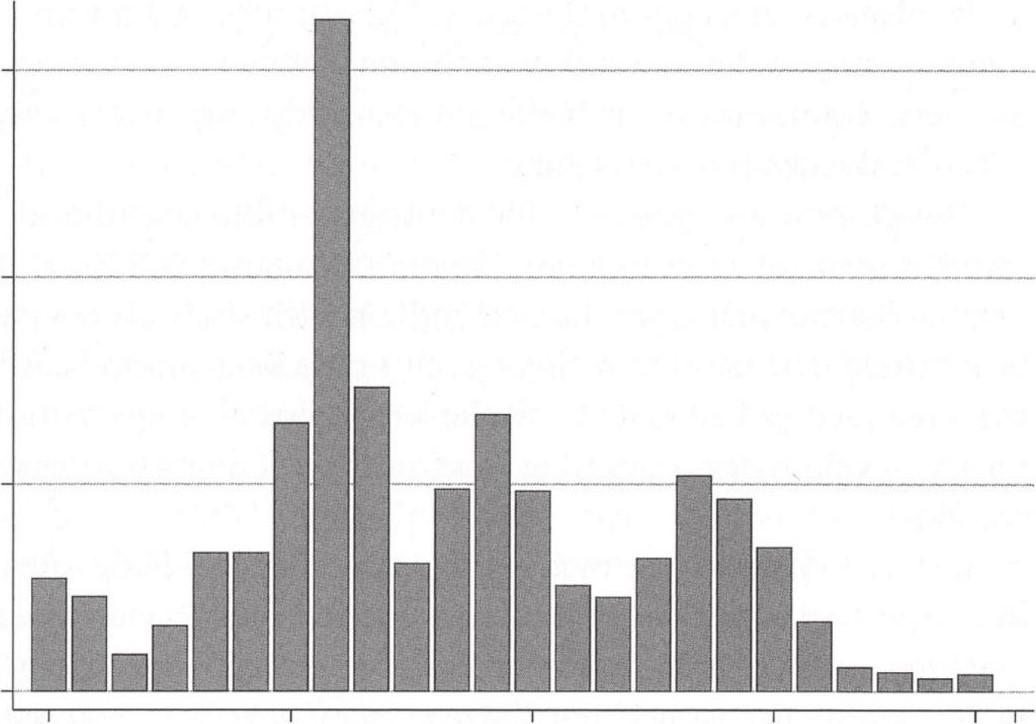
这一进程并不顺利,反抗行为偶尔还会引发暴力冲突。1968年4至 7月,南京共发生五起小规模冲突。由于跨行业组织已经被取缔,派系斗争只是在单位内部进行,已经与先前的大规模上街打斗大有不同。4 月23日,第一起这样的冲突发生在南京广播学院,是由一批强烈反感许世友的人挑起的。两派之间发生了争吵,部队很快就开进学院,要抓捕罪犯但遭到了反抗,附近单位的活动分子赶到学院声援自己的盟友, 一场激烈冲突就此爆发。5月4日,一家军队运营的制造厂发生了相似 267 的冲突,派遣部队很快来到现场。这反而促使反许世友分子在革委会总部大张旗鼓地游行示威。类似事件一直持续到7月份,其中一起还造成一名学生死亡。

冲突虽然不大,但是持续不断,这让军方很头疼,只能组织更多的学习班。到1968年8月,江苏省已经举办了150万场次的学习班,还是没有根除派系争斗,许世友感到非常苦恼。虽然街边武斗已经绝迹,大规模造反派联盟也被瓦解,位于基层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十分脆弱。

1968年7月,毛泽东传唤北京红卫兵领袖,批评了他们的做法,与此同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两份措辞严厉的指导性文件,支持广西和陕西用强制性手段遏制派系斗争的做法。许世友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南京的造反派领袖在学习班被孤立,谁要是反抗,就会受到言辞犀利的批评。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工厂,发起的运动都针对反抗权威的造反组织。学校被清空后,当局的措施实行起来更加顺畅。1968年末,大学生都被分配了工作,全部离开了南京,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大学里反对许世友的势力大都离开南京,校园里剩下的老师学生也都被派到工厂、矿场或是乡下从事体力劳动,直到1970年

才回来。

图12· 1暴力事件的数量,按月计算( 1967一1968 ) 268

1500

事件 1000 数量

500

0

1967年 1967年 1968年 1968年 1968年

七月 七月 

来源:彬据Walder ( 2014 )的数据计算

江苏的案例基本与全国的总体情况一致。图12 · 1明了军管措施和革命委员会的影响。这一数据表明, 1968年夏天对群众派系斗争的处理是有效的。造反派系间的武斗次数、攻击政府部门和军队驻地的次数明显回落。1968年9月,这一混乱而暴力的文革阶段宣吿结束。

## 关闭大学

最初几年,社会动荡不安,大学没有新生入学,也不开课,更没有人获得文凭、顺利毕业。1966年6月,大学入学考试被取消,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1966年春季学期,已经在读的大学生在未来两年仍然留在学校,但其实在校园冲突变得危险而暴力以后,许多人陆续逃离了大学校园。到1968年秋天,全中国的大学和高中学生既没有完成学业,也没有进入工作岗位。1966、1967和1968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没有书读。现在,是时候决定该如何安排这些学生和大学了。

最初,最重要的当然是要确保军事管控,管理好相互斗争的学生派系。教职员工和学校管理层已经遭受学生的攻击接近两年之久,现在又面临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和意识形态塑造。大学并没有重新开放,没有录取新一批学生。在校生的课程在1966年中断,却也没有恢复上课,相反,共产党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大学被无限期地关闭,学生、教职员和管理人员都被赶出了校园。

第一步,在1968年底宣布所有的学生毕业,并给他们分配工作。

269 大乱之后,要在学校中建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一来,原来的造反派领袖就没有办法在新的权力机构里亻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大多都被分配到了十分偏远的地方,不是在工厂里做工,就是担任一些低水平的技术员工。最幸运的学生当了兵 这还是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才能享受的。学生造反派领袖的政治生涯无论是在所处院校还是当地政府都基本宣吿结束。在揪出所谓的反动派和间谍之后,第二步是将几乎所有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送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其实就是一系列农村设施的统称,为的是通过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和官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被统一送到江西省某个湖泊泥泞的岸边,他们不得不

建立自己的住所,种植自己的食物。该设施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关闭。

绝大多数大学关门后,直到1972年才重新开放,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从五七干校被召回。第一批入学者的资格仍然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控制,新生入学率要比1966年水平低得多,直到1977年才恢复到以前的水平。7然而,最大的变化是入学资格的挑选方式。即便存在着阶级卷标系统,以前的全国考试还是素质优先,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很占优势。可是他们现在被贴上了「反动派」的标签,这种考试形式被废除。现在,没有学生能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所有的大学新生都是从集体农场、工厂车间和士兵队伍里挑选的,现在唯一的标准就是申请人的阶级标签、政治积极性和当地革委会领导根据政治考察开出的推荐信

## 下放农村

新的大学入学方式意味着高中毕业生不得不放弃眼前的大学计划, 而去参与没有期限的体力劳作。有些学生们没有进入高中,或是刚刚完成了职业技术学校的课程,就被分配到工厂或其他城市单位上班。绝大 270 多数高中毕业生被派往偏远农村,进行无限期劳作,成为了普通农民。这种做法在1960年代初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开始了,当时规模还不是很大,主要是安置没考上大学、在当地又找不到工作的高中毕业生。9可现在,这一措施在全国都变得非常普遍。

农村生涯漫漫无期。城市青年被要求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一些人入了党,后来成为生产大队或是公社的干部。幸运的少数人能够打动他们的上司,并获得大学的推荐信,作为「工农兵」学生入学。



1. 有关五七干校的描述可参看ⅦeandWakeman ( 1985, 251-273 )。此外, 个知识分子在河南经历的回忆录可参见Yang ( 1984 )。
2. 国家统计局( 1983 , 511 )。
3. Andreas (2009, 188一210)·
4. Bernstein ( 1977a, 36一44), White ( 1978 ; 1979)·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青少年刚开始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村生活, 吃不惯低热量的以谷物为主的农村饮食,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这超越了以往青年学生们在城市里所经历的一切。有些年轻女孩子本来身子骨就弱,现在要远离家庭独立生活,还不时遭到农村干部的性骚扰甚至是强奸。10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1 , 800万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在这几年中,只有72万人最后以「工农兵」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园。

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中有另一部分人是被逐出权力层的政治人物。从1966年开始,根据阶级成分或是其他负面政治标签而揪出的「可疑分子」和他们的全家老少都被下放到农村,这一政策在革命委员会的管控下迅速扩大。这种放逐原本是永久性的,但是当毛泽东进入晚年之时,这些人开始抗议他们的处境。在天津市,约15 ,000人被驱逐到农村地区, 25 ,000名家属也随之下放,人数加起来大约是天津城市人口的 12

## 官员的劳动改造

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接受意识形态改造。这一举措也适用于在官僚机构工作的职员。大部分人都要在五七干校参加长时间的劳动改造,或是到工厂做工。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全国各地的政府办事机构几乎空无一人。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数时间都在进 271 行体力劳动。办公室里只剩下极少数骨干员工,维持最基本的功能。学术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止,政府服务减至最低。这种做法也被推行到大型国家工厂:工厂办公室被清空,工程师、会计员和其他技术人员都被下放到车床或是高炉上当技术工,或成为清洁和餐饮服务的辅助人员。 

这些人最终回到办公室工作时,他们的权威被大大削弱了。



10 Bernstein ( 1977a, 121一171 ; 1977b), Unger ( 1982)·

1 1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84 , 969 )。

12 Brown ( 2012, 137一168 )描述了城市情况及影响,具体驱逐数据可参见页139 和144 

最初,办公室职员被「下放」的运动规模远远超过了青年人到农村去的规模,但持续时间不长。在上海,有两万多干部被派到车间里工作,这是为了计划永久减少各级行政部门的人员编制。[[569]](#footnote-569)在天津,有 70%以上的办公室员工被送到体力活的岗位上。141969年底,河南共有 12,300名省级党政干部被分三批下放到农村劳改营,接受劳动改造。[[570]](#footnote-570)在湖北,有8 ,000多名干部从省政府被派往一处改造过的军营,务农改造。[[571]](#footnote-571)广东省共建成313个「五七干校」, 164,600名省、市、县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被派往这些地方劳改。当时,广东当局计划将政府人员的数量永久减少15万。17直到1971年,这一举措才逐渐撤销,到了1972年, 这些农村「劳改营」才彻底关闭。

## 清理阶级队伍

随着军管会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斗批改」运动逐渐扩展为对叛徒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更大范围和更为严厉的追捕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了大范围的清洗运动,一直持续到1969年。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渠道发动的。其一,在北京开展一系列调查,指控在文革大清洗中被打倒的国家官员。开展调查的是成立于1966年的中央项目调查组。在项目组组织的调查中,在全国范围内有近100万干部被捕调查。[[572]](#footnote-572)前不久被打倒的高官被指控为阴 272 谋反党。根据项目组的逻辑,阴谋必定有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必定隐藏在这些官员以前任职的地区。北京的调查人员命令地方当局调查可能涉

及更高级别案件的人。这一指令是地方革委会绝不敢忽视的,这便触发了全国范围内相关案件的辅助调查。

打倒内蒙古人民党的运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展起来的。起先,是对内蒙古最高官员乌兰夫展开调查,他在文革之初就被打倒。1968年春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逐渐展开,为的是彻底消除乌兰夫的政治影响力。革命委员对乌兰夫以「阴谋罪」立案,指控他领导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认为他与蒙古族分裂分子和苏联暗中勾结。运动继续推进,一大批人一•一一一一一主要是蒙古族人一一一一一一啵捕,遭到严刑拷问,一旦招供,还要被逼说出其余「同党」。直到1969年3月,北京才终于干预,终止了这场运动,可当时已经有79万人被牵连进去, 受到针对和询问,有12万人因殴打或酷刑而落下终生身体残疾,有 22 ,900人被杀、被处决或是选择自杀。 [[573]](#footnote-573)

清洗运动的大部分受害人并不是因中央项目组设立的案件而受到牵连。通常情况下,运动通过地方学校和工作单位独立发起的调查而开展。在北京几个示范性单位举行的运动开始之后,斗争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的批示文件,获得了毛泽东个人的认可,向全国派发。全国性运动也开始了。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奠定了运动的基调:无产阶级政权的胜利正在巩固,我们要继续大范围打击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和叛徒。1968年5月底,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经验被记录为最早的一份批示文件。该运动由工厂的军管会执行,委员会由现役部队人员组成,而这一部队同时也负责政治局的 273 安全保卫工作。工厂十分老旧,发起运动的人认为,曾为旧社会、国民政府和日占时期工作的人隐藏在工厂里的「非常复杂、剧烈和暴力」的阶级斗争之中。人们举行了群众大会,「揭露」叛徒,「揪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嫌疑人遭受批斗,被迫招供,并被吿知「只有那些充分承认错误的人才能得到宽恕」。 [[574]](#footnote-574)

为了开展该项运动,地方上的政府机构和工厂学校组织项目小组, 负责收集证据,找出这些人的所谓罪行。他们调出当事人的政治档案, 寻找嫌疑人之前不法行为的证据,他们从前的上司和同事也被约谈,以获取定罪信息。随着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新一波的指控、讯问和供认接踵而至。第一步是指控,通常没有证据支撑,最多是基于个人历史的怀疑或联想。指控的形式有时候是上级的一封书信,有时候是其他单位的一份函件或是派出的一位代表,有时候是当地自己的调查委员会,也有时是或公开或私下的「人民群众举报」。

运动造成第一批受害者之后,牵动新案件的源头就来自于审讯本身。最好的情况下,讯问只不过是威胁或殴打。被调查者被假定为有罪,要是不供认罪行,就被威胁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尽管北京方面已经做出指示,审讯要「有原则地」进行,但其实肉体虐待相当普遍。根据一份后毛泽东时代的回忆录文件,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十分极端的手段。嫌疑人要是承认了罪责,讯问并不会因此结束:「阴谋」就一定意味着有「同党」。嫌疑人必须供出其余同伙,要是不说,虐待就会继续,直到说出那些「同谋者」的名字为止。这样一来,被供出的「同党」就会面对同样的审讯:刑讯逼供、强制认罪、说出同党。这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往往会牵连大量受害者。由于他们承认的指控中有「反革命」一项,所以之后经常伴有处决。而其实,运动中许多人在审讯室里遭受酷刑而死,或者是不堪屈辱而选择自杀。受审者自杀是调查员不愿看到的,调查员会认为这是「畏罪自杀」,间接证明了受审者是「有罪」的,但是人一死,线索链就断了,无法揪出更多的同党,调查就陷入了死胡同。运动早期,像康生或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这样的人就对此表示担忧,认为 274 自杀事件阻止了调查的进行。 [[575]](#footnote-575)

当时,军队接管了北京大学,取缔了学生造反组织,并将其领导人收押改造。一个月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项目组忽略了过去两年校园中发生的一切,直接对900多名「有嫌疑的」干部和教师发起了调查。当事人被拘留在校园内,面临摧残身心的讯问。宣传队花了仅仅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就认定其中的542人是「人民公敌」。到当年年底, 18人自杀。死者中包括一名校党委高层,是第一批公开赞成聂元梓反抗学校权威者之一。而此时他的尸体在大学的游泳池中被发现,很明显是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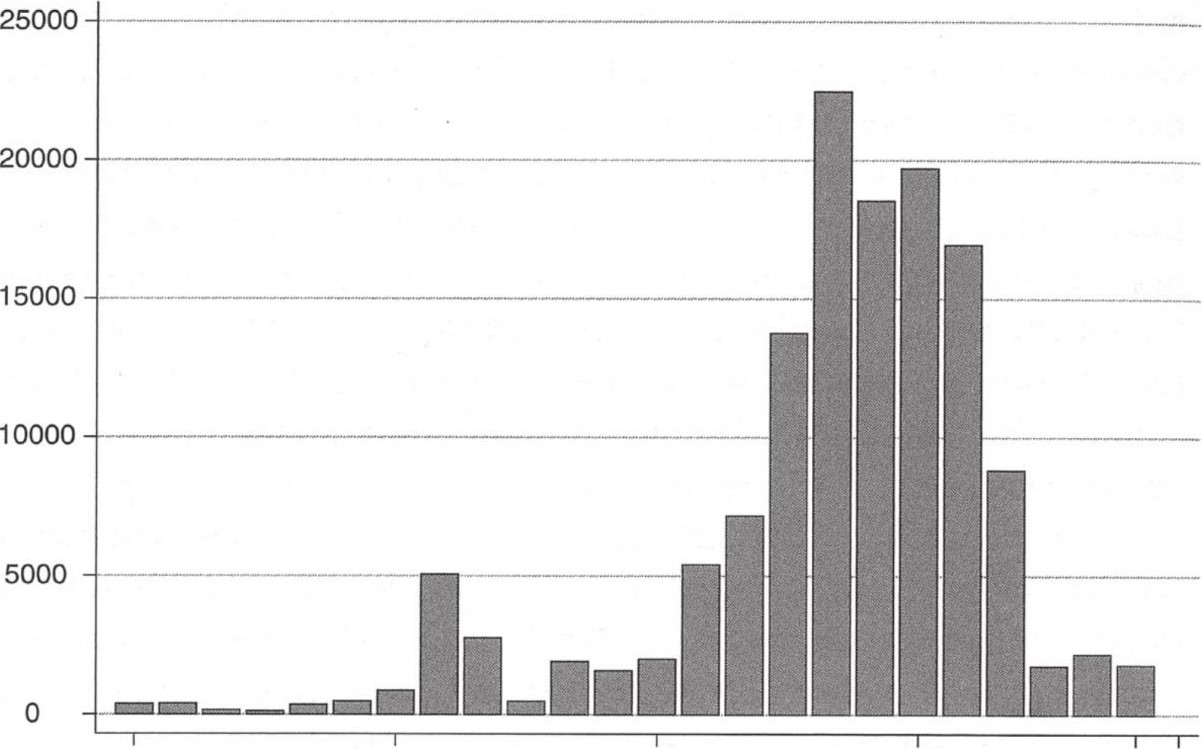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波及面很广。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害者都属文革早期就被打击的社会类别:有海外经历的、与国民党有联系的、来自地主家庭或是有资本主义背景的。但是也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让一个人成为运动所针对的目标:几十年来忠实为党的人会被指责参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间谍组织;那些1949年以前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反倒成为「国民党间谍」;有些人在文革早期积极参与派系斗争,可现在他们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阴谋;有人对江青发表了几句批评,或是不小心赞扬了刘少奇等领导人几句,就会遭到怀疑;先前得罪了现在负责开展运动的人自然受到报复;谁要是站出来指责项目组的酷刑和谋杀行为,或是为被打倒的党内领导说几句好话,都会成为主要嫌疑人。23这场运动造成了广泛的恐怖气氛,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嫌疑犯的严苛,也是由于该场运动广泛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虽然之前大范围的派系武斗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影响, 而上海幸免于此,但这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却给上海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上海市革委会想搞一场纪律十分严明的运动,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并将他们拉到公众面前批斗。这场运动从1968年1月开始,到1969 275 年4月结束,共有169 ,000人被调查。20名在文革前夕担任上海党政要员的人中,有17人被认定是「叛徒」。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被拘留并在狱中死去。上海市党政官员总共有900多人,其中约84%的人员被指控和拘留, 46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到1968年底,该运动造成的总死亡人数超过了5 ,000人,而这仅仅是负责调查的管辖部门所提供的数据。



1. Walder (2006, 1044一1045) , Wang (2006) ·这一时期的大学情况在Yue and Wakeman ( 1985, 233-250 )中有所描述。
2. 相关案例参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256一262 )。
3. Xu ( 1990) ·

|  |  |
| --- | --- |
| 图12 ·2文革运动中的死亡人数,按月计算( 1967一1968 ) | 276 |

广东先前经历了暴力的派系武斗,虽然被军方镇压,但派系仇恨仍然剧烈,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加剧了当地事态的恶化。在广东,军队支持「东风」派,打压「红旗」派,「红旗」派一直到最后都顽固地反对军管。1968年2月,虽然还有零星反抗军事管制的情况,广东政局已经基本稳定,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便紧随而至。当局为了镇压乡村地区的反抗,又进行了新一波的杀戮,仅这一时期就有三万多人丧生。 [[576]](#footnote-576)

死亡人数

1967年 1968年 1968年

1967年 1968年

七月 七月

来源:彬据Walder ( 2014 )的数据计算

图12 ·2就显示了和对于文革早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同时期发生的武力镇压反对派系一起,造成了一波重大的暴力伤亡,远远超过早前死亡最严重的月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967年8月死亡人数达到一个峰值,那个时期正是军事武器被分发给群众派系的时间。从1968年3至9月,因为清理阶级队伍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967年武斗死亡人数的峰值,而且那段时间连续五个月每个月的死亡人数大概都要比武斗时期高出四倍。通过对比图 12 · 1就能看出,造反派武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开始降低时,清理阶级队伍造成的死亡人数反而达到峰值。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但没能解决派系暴力武斗所造成的弊病,事实上反而使其变得更为严重。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初衷是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潜在的敌人身上, 来镇压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但难以否认的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革委会的成员中有在早年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的背景和政治倾向难以统一。新的权力机构又加入了军方的人,他们是其中的主导者,经常怀疑来自造反派系的领导人。现在地方干部也加入了进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文革早年成为造反派的攻击对象,后来许多人为求自保,就对某些造反派宣誓忠诚,而这些造反派为了在「大联合」中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就接受了他们。因此,最后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中包含了从造反派中选上来的领导,有时候是来自两个死对头的领导。这些新组建的权力机构和项目小组里如果没有明显的敌意,那也是充满不安全感和互相猜疑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演变成类似其他历史背景中的宗教法庭和政治迫害。新成立的当地机构十分相信:在新的运动中必须 277 狂热地履行上级交派的任务,否则他们的忠诚就会受到怀疑。新近发生的一切让他们觉得:就算你是当权者,如果没能狂热地完成上级任务, 就有可能成为运动中的受害者。

革委会和项目组的成员始终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因此没有人勇敢到站出来制止那些狂热而暴力的审讯、质疑那些牵强而荒谬的指控。要是一个人为那些受指控的人说话,希望审讯手段能温和些,或是希望控制受牵连的人数,那么此人可能自己就会遭殃,被怀疑「同情敌人、通敌叛变」。肉体和心理的折磨在刑讯逼供时变得越来越普遍,事态就开始恶化。招供必然牵连出一群人,再招供、再牵连,循环往复,一大批人就这样被连带了进来。一个人必须要鼓起十足的勇气甚至几近鲁莽,才能去质疑人们所供内容的准确性,才能去审视所谓「庞大地下叛徒网络」是否真的存在,才能去要求不应该仅仅通过质疑就定一个人的罪,或是指出一份供词并不能成为足够的事实依据。一个人要是做这些事,他无疑是在挑战领袖的权威、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情人民的敌人。

从大跃进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红卫兵运动到造反派武斗,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其他毛泽东支持的运动一样,无休止地推进,造成了超出预期的破坏。[[577]](#footnote-577)这些运动就像没有刹车的汽车,横冲直撞,直到毛泽东自己觉得事态发展太过严重,这才缓了下来。可这时候要挽回损失为时已晚。文革期间受迫害死亡的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总人数估计达到60万至80万之多。 [[578]](#footnote-578)

## 毛崇拜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及其后续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人人都别着主席的像章,毛的塑像随处可见, 海报也到处都是。基本上每家每户墙上都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也都有毛 278 泽东的半身像摆出来,谁要是敢不放,就有可能受到政治怀疑。在公众场合,毛泽东的塑像在大学校园、机关门口、城市广场被一个接一个树立起来。在公共假日期间,人们往往会涌上街头,高举毛泽东的画像, 或是簇拥着摆出英雄般姿势的毛泽东塑像,跳起高度一致的舞蹈,在街上游行。[[579]](#footnote-579)各种大礼堂里都聚集着成百上千的人,他们跳着高度统一的舞蹈,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拜,并向领导人表示衷心。如果有人不经意间弄脏了毛主席画像,或是丢弃了印有毛主席照片或手迹的报纸,就会受到审查,面临「不忠于伟大领袖」的指控。每家每户都要妥善保存印有毛主席照片或是画像的东西,因为丢弃这些东西会带来政治危险。

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最早源于林彪军队的有目的的推动,由军管会实行,这就是所谓的「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 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而「四无限」指的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纲领。大众对毛泽东的爱戴长期以来受到官方支持。不过,对国家领导人的真正的普遍的尊敬现在已经转变,借用两位此方面的专家所言,「此时的崇拜已经成为一个由国家机器支持的有组织的运动,仪式组织精细,毛泽东说的什么陈词滥调都被神化成警世恒言有人稍有偏离或是质疑就会受到强硬制裁。」[[580]](#footnote-580)

北京针织总厂的模范经验成为了运动的核心元素之一。负责该厂的军队官员发明了一种能够在工作日宣传忠心的方法。换班的时候,工人并不是直奔岗位,而是先聚集起来,面对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聆听他老人家对工人们的教导」。在工作期间,工人们会大声朗读贴在墙上的毛泽东语录,以此激发工作热情,换班的时候,他们会互换《毛主席语录》,以此显示「相互关心、互帮互助」。下班的时候,他们又会聚集到毛泽东的画像前「汇报工作」,仔细反思一天下来的思想和工作情况。

279 工厂领导将这些都写成报吿,在1967年底递交给了毛主席。毛泽东在旁边做了批阅:「我看过了,非常好,谢谢你,我的同志!」[[581]](#footnote-581)这份报吿被转发全国,随后不久,数百万人都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里参与了类似的有组织的崇拜仪式。 [[582]](#footnote-582)

毛泽东崇拜的另一个关键元素在于能「生动地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无法解决的困难。新闻和广播经常报道一些这样的事迹:人们认真研读毛泽东的文章,即使没有接受过科学的训练,也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一个著名桥段中,一组外科医生,虽然缺少必需的经验,也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麻醉师,但是受到毛泽东语录的鼓舞,完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手术,成功地从一名病患身上切下了一个重达100磅( 45公斤)的肿瘤。得了癌症的病人要忍受化疗和副作用的折磨,但是诵读毛主席语录就能「减轻痛苦」。没有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通过「研习毛泽东经典」,就能让聋哑人重新说话,能唱《东方红》,能喊「毛主席万岁」。在其他的案例中,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能让盲人复明,断手再续,甚至是起死回生。 [[583]](#footnote-583)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可能有这种神效,这么做只是为了彰显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去做那些本以为无法完成的事情。这些案例的言下之意是:只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能超越那些从现代科学技术科班出身的「资产阶级」专家,充分展现无产阶级的优越性。 [[584]](#footnote-584)[[585]](#footnote-585)

体现毛崇拜最著名的事情可能就是毛泽东给工人赠送芒果一事了。 1968年8月上旬,毛泽东给北京的部分学校和工厂送了一些芒果作礼物,结果受到了热烈的反响。当时,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来访,送给了毛泽东一筐金灿灿的芒果,毛泽东就让手下人把芒果分成好几份,分别送给北京的一些模范单位。一些芒果在8月5日送到了前不久在清华大 280 学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4 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喜讯,采用的通栏大标题是:「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586]](#footnote-586)旁边的文章则描述了校园里的反应·

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凙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氵戾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

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北京纺织厂也收到了一个芒果,革委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在仪式上工人们背诵毛泽东语录并且庆祝收到了这个礼物。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一个坛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 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革委会用蜡做了一个芒果的复制品,将「芒果」放回大厅的坛上,作为未来厂里开展毛主席仪式的中心装饰品

之后几个月,全国掀起了一波「芒果热」,芒果临时成为了向毛主席表达「无限忠诚」的象征。人们用蜡做了更多的芒果复制品,一些装在 281 玻璃盒子里,复制品被送往北京和全国巡回展览。各处工作单位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庆典和观摩活动。外省的革命委员会纷纷向北京发函,希望这些珍贵的芒果能够运往各地展览。那些从巴基斯坦带来的芒果早就开始腐烂,人们做了更多的复制品用以替代,随后送往全国,就像巡回演出的明星一样。芒果到达成都之后,估计有五十多万人前来迎接。芒果运输走的都是专列,所到之处都是盛大的游行。36毛泽东像章和海报以成百万的数量被制作出来,上面也都加入了芒果的图案。河南的一家香烟厂甚至推出了一款芒果牌香烟。后来几年,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也加入了芒果的元素,让芒果成为了贯穿故事的主线之 37

毛泽东崇拜的另一重要的元素是「忠字舞」。忠字舞反映了对伟大主席的尊敬和热爱,舞步据说最初来自于少数民族的舞蹈动作,后来加入了现代音乐的节奏和歌词。跳起忠字舞时,百万民众的心一起律动



1. Leese (2011 , 221 ) ·
2. Murck ( 2013 , 113一233 )一书对芒果崇拜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他同时记录了一家博物馆对芒果现象的展览,其中包含了芒果崇拜的相关照片与文物等大量细节。Chau ( 2013 )对1976年电影《芒果之歌》的主要情节有具体概述。

表达对主席的无限忠诚。忠字舞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能跳:火车上、公交车上或是飞机上都可以,工厂和政府的政治集会上更是要跳。

大家跳起忠字舞时,任何人都不得拒绝加入,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根据那个时代的人回忆,年轻女性在忠字舞中表现活跃,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成为一种娱乐的方式。而年长者则没什么节奏感,蓝领的工人跳起来会手足无措,不合拍子,总是显得很尴尬。 [[587]](#footnote-587)

审视这些事件,可能会觉得这是人们和信毛泽东思想的传奇力量, 因此集体而自发地进行这种狂热的膜拜,或起码是对毛本人能力的尊敬。我们当然无法知晓当时经历这些事情的千百万人心中在想些什么, 但是我们十分了解当时这些事情所处的政治环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为 282 的是揪出潜藏的叛徒和革命的敌人,而就在这时毛泽东崇拜也达到了高潮。整场运动有再明显不过的强制性元素:如果一个人不能展现出足够的热情,那他就要受到批斗的威胁。借用一位研究毛泽东崇拜的同行所说的,「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当时的环境实在是极不稳定又难以预测,动不动就抓人,为了保全自身,大家不得不参加到公开的膜拜活动中去。」如果不合群,「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哪怕念错了毛主席语录,或是冒犯了个人崇拜的象征物品,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588]](#footnote-588)

有记录表明,许多人在这一时期被指控「对毛主席大不敬」而进了监狱,甚至丢了性命,或是因为不小心出现了口误,或是不经意间将印有毛主席语录或画像的报纸当成了厕纸。[[589]](#footnote-589)平常人不需要目睹这些惩罚也明白对毛主席「不忠诚」意味着什么。这场运动旨在根除潜藏的叛徒, 在这场运动中,明眼人也都能看出有一些指控明显是错误的。可是如果不参与其中,自己和家人就可能有危险,而参与进去的成本又极低,只要稍稍花些功夫,表达一下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就可以避免项目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关注。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微妙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全国人民体现出

的非理性信仰也是迫于无奈。这与大跃进时期的自欺欺人如出一辙,只是形式截然不同:极大的压力要求人们步调一致,运动中的表现体现了一个人对领袖的忠诚。与大跃进时期所导致的大饥荒不同,表忠心运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破坏性,但其中的集体行为源出同门。这些表忠心的活动直到1969年6月才被彻底叫停。同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崇拜体现了其尴尬的一面,也因此开始受到质疑。

## 更多的调查运动

就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毛泽东崇拜达到高潮之后,针对「反革命」 283 的两项新运动开始启动,旨在加强军事管控,巩固革委会的权威。第一场运动是1970年2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并在当年年底之前推广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打」指的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国各地当时仍有零星的地下抵抗行为,或是冥顽不化的派系斗争。运动的这一方面就是要消除任何形式的残余反对行为。当时发动「一打三反」的文件是这样指导地方机构的·

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课暴乱、刺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浃杀。 42

而「三反」指的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三反运动的指向明确:要对新成立的地方权力机构形成有效约束,因为他们挥霍无度,饭局、送礼、修建招待所、装修办公室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有些单位之间还进行物物交换,说是「合作」的一种形式。



1. 同上,页226一231。
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02).

虽然打击对象的界定依然模糊不清,一打三反运动的涉及面比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窄很多,影响也小了不少,但是也造成了一部分死亡。在北京城区,有5 ,757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被抓,挪用公款和敛财相关立案6,200多件。在上海周边的农村地区,有64,000 人被「揪出来批斗」,其中死亡520人。在全国范围内,运动最初的八个月就逮捕了284, 800多人。43根据毛去世以后公布的地方历史记录估计, 一打三反逮捕的人只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四分之一,死人数量也要少

得多。全国范围内因为一打三反而死去的人不到1968至1969年清理阶 284 级队伍运动的10% ,且大多数死于处决。

另一场运动则是「反五·一六分子」运动。该运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之后,打击面更加集中,因此规模也更小。「反五·一六」目标明确:要打击一小撮极左势力、手段极端、企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地下密谋分子。这一运动的名字缘起于1967年,并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成员联系起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和其他成员成了1967年8月袭击军队的替罪羊。场45、一、一ㄇ、运动于1970年在多地开展起来,并在1971年到达顶峰。地方政府将这场运动解读为经过上边的授权可以抓捕、审讯、恐吓,甚至有时候是关押之前群众派系的领袖,尤其是那些不服从军事管制的人。之前的造反派领袖是不是很早就放弃扺抗毫不重要。革委会接到任务后,将这些人孤立起来,进行审讯,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怀疑中的全国性的极左阴谋团体有地下关联。

工人造反派很容易辨别,然后进行隔离和审查。然而,先前的学生造反派此时都被送到了偏远的集体农庄或是工厂。这些情况下,当局就把他们接回此前他们进行造反运动的地区,再进行审讯。比如, 1970 年,一些著名的北京红卫兵就从偏远农村被带回了原来的大学校园,随后便是对他们在派系活动中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审讯。46先前的武汉造



1. 同上,页306一307。
2. Walder (2014)·
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21一233)·
4. Walder (2009, 248一249) ·

反派领袖被关在所处单位临时搭建的牢房里,审问和这个「五·一六集团」有没有瓜葛。整座城市有33 ,659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若是被贴标签的人身居要职,立马免去。绝大部分人最终在「监视下」接受劳动惩罚。本来打算处决84名核心成员,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590]](#footnote-590)

在江苏,这一运动异乎寻常地剧烈。该省反对军管的派系遭受了最后的致命一击。运动从1970年春天开始,在年末达到顶峰,并零星持

285 续到1972年,江苏有超过13万人被指控为「五·一六分子」,其中

57 ,000人交代了自己与派系的地下关系。后来公布的数字表明,超过 6,000人在关押时留下了永久性的身心残疾,甚至是丢了性命。而在之后参加过内部调查的人则表示,真实的数字还要翻一番。 [[591]](#footnote-591)[[592]](#footnote-592)

在江苏的整场运动中,所有那些在大串联中谋得一官半职的前造反派领袖都被打倒,部分老资格的民政干部好不容易获得了「革命阶级」的标签,也被牵扯进去。许世友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最终完全建立了对整个省的绝对控制。该运动牵涉到了江苏革委会常委的大部分成员: 28个成员中有21位受牵连。其中,所有的9名前造反派领袖都被罢免, 8名老资格的省级干部也被调查,不过并没有全部丢了官衔。清洗运动也涉及军队内部, 1967年夏天曾经参与攻击许世友的军官被孤立,受到审问, 并被罢免。许多人进了监狱,其中一名显赫的军官在关押时死去。许多南京的造反派领袖被讯问和关押折磨得精神受创,即使后来被释放,都难以继续正常生活。

1968到1971年这一时期与前两年的群众动员和造反运动相比,事态出现了惊人的逆转,之前是党政机关里的任何人士都可能并确实受到挑战。起先,造反派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鼓动下挑战权威,可到后来却成为了被镇压和迫害的对象。一开始,学生和工人受到鼓励,挑战官僚主义权威,而最后新的军事化官僚机构镇压了前者。新的官僚机构进行了日益加剧的政治迫害,搞得城市里的居民人心惶惶。所有人被迫从事最奴性而幼稚的英雄崇拜,将毛泽东视为几乎超自然的存在,宣称他的「思想」有神奇的力量。

这一阶段很快就要过去, 1971年9月,一架三叉戟喷气式飞机离开 286 中国领空,不久坠毁在蒙古的山坡上,无人生还。这件事将中国推向了新的不确定的方向。五七干校被关闭,干部和白领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军管会被解散,军方的人逐渐撤出了政府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民政官员官复原职,四处传播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极端行为的批判。此前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工人终于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先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被军方压制,现在又动员起来抗议自己被边缘化。民主运动开始出现。就在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公开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也间接表达了对毛泽东的

通常来说,一场空难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后果,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林彪将军也在飞机上,他是毛泽东的既定接班人,被广泛认为是毛泽东崇拜的始作俑者,同时掌控着1968年以来实际控制几乎整个国家的军方。据传,他发动政变,暗杀毛主席未遂,随后逃离中国。

# Blank Page

## 13章不谐之音与异见之人

在林彪出事之前,他的下属就遇到了政治麻烦。这意味着林彪自己很快可能面临被降职,甚至更糟的情况。毛泽东的决断总是让人出乎意料,许多党内高层都成为受害者,与他们不同的是,林彪并没有默默地走下政治舞台。很明显,他试图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在途中坠毁。林彪的出逃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官方是这样向民众解释这一事件的:林彪在一场政变中企图暗杀毛主席,但未能得手,在逃亡苏联的途中,他的飞机燃油耗尽,机毁人亡。

无论林彪事件的真相如何,他的死激发了一连串的政治效应,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林彪在军队中推广了印有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并最终由红卫兵扩散至全国人民几乎人手一册,并成为毛泽东个人崇拜中「无限忠诚」的象征。林彪确保军队对文革的绝对支持, 并利用一切机会发表对毛泽东的溢美之词。林彪本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可现在居然被揭发出来是个叛徒,这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判断力,乃至毛本身的能力。人们甚至开始怀疑整场文化大革命背后的逻辑依据。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非常伤心,一连几个月都没有露面, 1972年的时候还得了一场重病。[[593]](#footnote-593)为了做出回应,毛泽东改变了先前的政策。许多资深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被打倒,毛泽东 288 决定修补与他们的关系,并将文革的极端暴力问题归咎于林彪和林在军方的小圈子。起初,毛泽东重用周恩来,试图依靠周恩来重新修复关系,摒弃近几年来破坏力惊人的极端政策。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批林」运动,谴责林彪集团在文革期间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毛泽东授权周恩来重新建立中国的民政管理机构,并慢慢撤出人民政府中的军方人员。

修补创伤的工作不经意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冲突,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次带来动荡,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军方的人要撤出政府,空出的职位由谁来填补?有两类人都想获得职位:第一类是在文革期间被「靠边站」的民政干部、有经验的党员和专家,此时许多人还在工厂生产区下放劳作或是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第二类是先前的造反派,他们早几年间发动了对老干部和专家的攻击。虽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在军管期间担任一些名义上的职位,但绝大多数人都丢了先前在革委会的官职,或是在1968到1971年的清洗运动中被打倒。军管时期,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到了这时候,这两类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时时刻刻都会再次爆发冲突。

在林彪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政治需要纠正先前所犯下的错误,这就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是毛泽东人生最后几年的首要矛盾。不可避免地,人们要问这样一个题:到底谁来接管领导权?什么样的作为和政策会被认为是「极左」的错误路线?什么是毛泽东路线的决定性因素,一旦脱离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取缔?对这些问题,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从上到下意见都非常不统一。在国家领导层中,在文革中被「靠边站」的元老级官员,现在对于「过度极端」有更广的视角,乐意恢复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路线。中央文革小组中得以幸免的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则不同,他们认为纠正文革极端路线本质上就是彻底否定文革本身。类似的政见分歧在各级领导中都有体现,



毛在1972年1月治疗肺部感染时健康恶化,几乎丧命。

更让早期干部和造反派领袖走到了互相的对立面上。在一些紧要关头, 289 毛泽东紧急介入,希望妥善处理这些不和,平衡好在国家领导层中互为对抗的力量。可是毛泽东的政策非常模糊不清、完全无法预测。两派争论喋喋不休,毛泽东就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摇摆不定。

年迈的毛泽东让他晚年的中国政治动荡不安。

就在这些冲突还未解决时,又有一股力量登上舞台:那些没有卷入派系斗争但又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的普通民众。他们曾经十分活跃,但为自己遭到背叛,老少市民对派系武斗深恶痛绝,生活很受影响,他们受教育和获得晋升的途径因文革而受到阻碍。这一阶段的早期,他们批评那些极端化的毛泽东思想,后来这种异见的表达越演越烈,在毛泽东死前不久,北京、南京和很多其他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街头游行。这些运动孕育着新的政治理念的种子,在后来短暂的民主运动中更为公开地表现出来。这些群众运动象征着:极端政策丧失了民众支持,毛泽东退出舞台之后,这些政策将难以为继。

### 批林运动

批林运动从1972年早些时候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官方对林彪事件的解释有很大一部分显然是捏造的,尤其是其中对林彪性格和动机的描述。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林也在空难中丧命。苏联的官员找到了空难现场,确认了林彪的遗骸,也找到了其家庭成员的尸体。但是,林彪并不是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阴谋家」。事实上,林彪并不情愿担任如此重要的政治角色,被选为接班人后也整日惶恐不安。[[594]](#footnote-594)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林彪参与了颠覆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政变活动。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林彪的儿子,一名很有影响力的空军将领,可能与其他年轻官员有过密议,要在父亲失势时组织反抗,但谈话最终被泄露。

很明显,在1969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他在1968年赋 290 予了军方过大的权力,并深深感到不安。毛泽东的位置要想坐得安稳, 绝大部分要依靠军方的支持,而军队掌握在林彪手中。中共九大之后, 各省党委才得以重建,而林彪领导的军方在各级党委中都占据了关键的一席之地。1971年8月,在一共29个省级党委中,有22个省的一把手是军方的官员,军方的人也占据了各省党委的大多数,很大程度上挤压了非军方背景的毛主义者。 3

政治局中林彪手下的将领们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幸存的激进派本就不和,到了1970年,矛盾更加激化。陈伯达改变了立场,放弃之前的非军方盟友,投靠了军方这一边。随着领导层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毛泽东决定打压一下军方的势力。陈伯达首当其冲。陈伯达虽然是毛泽东思想的早期设计者之一 一生都在践行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念,但1971 年1月,他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领头人被批斗成一名「伪马克思主义者」、「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想让林彪集团的军官们做出自我批评,可是他们的响应并没有让毛泽东满意,于是毛就在军方采取了人事调动,确保军队对自己的忠诚。而在此当口,林彪的儿子据传开始和别的军官密议,要排挤非军方的激进派,并反抗毛主席针对自己父亲和整个军队系统的措施。林家老少匆匆忙忙地登上了一架小型客机,因为怕追捕随时到来,起飞时都没来得及加满油。虽然这是看起来最合理的官方公开的事件描述,但由于官方保密,真相依然模糊不清。

无论事实如何,这就是官方的故事版本。随后的批林运动改变了中国后续的政治走向。政治局中林彪的左膀右臂都被清洗、抓捕,军队人事重新洗牌。但是林彪事件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出了个难题:该如何向公众解释此事,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呢?最终传递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耳朵里的信息包含了四个关键点:第一,林彪试图发动军



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00).
2. Jin ( 1999, 163一199), Leese (2011 , 231一23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25一336), Teiwes and Sun (2007, 31一34)·

事政变夺权;第二,林彪和他的同党们鄙视那些帮助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非军方激进派们;第三,林彪和他的同党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足的浩劫;第四,他们蔑视毛主席的权威。

|  |  |
| --- | --- |
| 1972年1月,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 这份文件成为批林运动的核心基石,但也是事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文件首先下发给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层,随后是全体党员,民众也大都从党员口中知道了文件的内容。文件的核心据说是被指控的林彪同党写下的笔供的复本,表达了这群政治阴谋者发动政变的动机背后的逻辑。  无论这些材料到底是怎么来的,其中的内容让人震惊不已。文件表达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强烈不满。中央下发这份文件作为「学习材料」, 无非是想证明林彪是个叛徒,否则中国民众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但是作为针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及帮助毛发动文革的政治领导人的罪证公诉,文件中的批评着实打击了许多党内领导、无数党员和人民群众。  事实上,文件所列举的每一条激烈的批评都有其事实基础,几乎每一位卖过的人肯定都知道。  文件的第一个主题是:林彪和他的密谋同党们不认为文革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反而让中国社会变得一团糟,「政局不稳… …广大农民被压迫,经济陷入停滞,人民群众、基层干部和士兵的生活水平下降,大家都很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领导层非常腐败,混乱不堪,没有能力… …领导层内部就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事情发展到了极致。」6  文件列举了所有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员名单,表达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农民生活被忽视:「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把年轻人送到乡下本质其实就是「劳改」。红卫兵先是被利用,随后被抛弃:「最初红卫兵被欺骗和利用,成了火炮的弹药,而到了后来,他们又被压迫,成了替罪 | 291 |
| 羊」。民政干部也怒火中烧,「被压迫、被攻击,敢怒不敢言。」7 | 292 |



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37-339), Teiwes and Sun (2007, 34一35)· 6 Kau ( 1975 , 81 , 84).

7 同上,页84 

对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激进派一-一-即五年之后被定性为四人帮的成员,文件表达了轻蔑。这些人被说成是骗子和伪善之人,「笔杆子托派集团任意篡改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辞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事实上,根据作者所言,他们的政治纲领无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他们的社会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台相互残杀,和互倾轧的绞肉机。」[[595]](#footnote-595)

毛泽东崇拜的顶点刚刚过去,这份文件上对毛主席的评价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一个独断、专权、冷血又两面派的人,「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文件中指出,毛泽东清洗了那些曾经为自己鞍前马后的忠实同志,「历史上看,有哪一个人不是开始被他捧起来,后来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却成了阶下囚… …没有一股政治力量能和他共事始终… …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亲信也被他送进大 9

作者认为毛泽东绝不是伟大光辉的崇拜形象,反之,毛是一个独断的暴君,一个政治骗子,比中国历史上那些糟糕的皇帝好不到哪里去, 「他滥用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地位,历史的走向反面… …实际上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96]](#footnote-596)

现在我们也只能做些猜测:为什么这份文件对毛泽东和文革批评得如此之狠,他还要将它发给全国传看。没有毛泽东的许可,这份文件是不可能下发的,这就更加奇怪。Ⅱ不过,此事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份文件对于毛泽东来说,就好比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对于斯大林一样,将他批判成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严重破坏了毛 293 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光辉形象。不需要别人说,普通民众自己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生活有多糟糕,他们自己知道生活水平依旧很低,事实上变得更糟了。可这还是头一回阅读到对自己生活的苦难如此直白的批评。激进派是自私自利的骗子,意识形态的变节者,发明了「社会主义法西斯」这样暴力的新东西。毛泽东自己则变成了一个毫无章法的暴君,比横征暴敛、最后导致第一个统一王朝覆灭的秦始皇好不到哪里去。

诚然,那些始终坚定信任毛泽东的人看了这份文件,一定会觉得这是最坏的叛徒的无稽之谈。这可能是他们应该作出的反应。但是很多其他人肯定会觉得这份文件道出了他们长久以来不敢说的心声。那些在文革中被虐待、清洗或是受了大苦的人也会很认同上面说的话,包括很多那些早期满怀理想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号召、随后却被无情镇压的人。这份文件给中国老百姓展现了一个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对事实的解读,也提供了批评文化大革命、批评激进派甚至批评毛泽东的言辞素材和样板。这份文件的影响不久就会显示出来。1970年代,城市街边海报和地下刊物上都开始出现和似的言语和情绪,这代表当时中国出现了第一波公开异见的迹象。这些内容甚至出现在了1976年3月末4月初的天安门广场乃至中国的其他地方,而六个月之后,毛泽东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 1972一1973 :恢复政府职能

批林运动也旨在重建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并使政府官员恢复原职。林彪被描绘成一个在文革期间扭曲毛主席本意、极端行事的极左分



对分发这种材料,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不利于毛泽东的美好形象。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否决了纪的意见,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分发材料。

294 子,而文革造成的破坏也被归因于林彪集团的密谋:肆意扩大毛泽东崇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害人无数、破坏人民政府组织、修建农村劳改营迫害官员,这些事情都是为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权力所做的极左掩护。上百万张毛和林同时出现的照片,以及「红宝书」和其他带有林彪语录或者题词的材料都被销毁。 [[597]](#footnote-597)

以这场运动为政治掩护,毛泽东依靠周恩来逐渐开始修复所造成的破坏和千疮百孔的政府机构。这期间毛泽东自己身体不适,深居简出, 而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73年晚些时候。[[598]](#footnote-598)公众场合的毛泽东崇拜仪式被取消,五七干校关门,数百万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必再受「劳动改造」之苦,回到了城市和他们原来的岗位上。大学开始招收少量的「工农兵」学生,教授一些短期、基础的课程。各级党委在1966年以来都陷于停摆,现在开始重建,功能逐渐恢复后,革委会的权威开始下降,党委的权威开始上升。

在周恩来主事的这一段时间内,工作中心就是给官员平反,让那些曾经受过屈辱的官员重新回到重要岗位上来。1972年3月,周恩来准备了一份超过400人的名单,上面都是经过审查、并且能力符合要求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将这份名单递交给毛主席看,毛泽东也同意了。因为党委得以重建,基层政府的官员复位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这一点在中共十大上达到了顶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中央委员会人员组成和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很有不同:现役军方的官员数量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饱受屈辱的政府官员。最重要也最令人惊讶的回归者当属邓小平。1967年,他被批斗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在1969年患病,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而去世)。有了毛泽东的允许,邓小平在1973年2月从江西返回北京,并重归中央委员会,任副主席一职。 [[599]](#footnote-599)

邓小平一路升迁,在1973年接任周恩来的工作时达到顶峰,这都

是毛泽东的主意,他认为周恩来从1973年下半年起就不那么配合自 295 己,觉得邓小平是个可以替代他的更合适人选。[[600]](#footnote-600)政治局里的激进派们不相信周恩来,深深质疑周所做的事情。激进派认为周恩来就是个妥协之人,经常试图批评文革中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并且愿意为了行政的有效性而牺牲毛泽东的纲领。1972至1973年,周恩来发起了对极左主义的严厉批评,并在地方上给老干部复位,挤压了各省造反派的利益,因此政治局的激进派们都极力反对。[[601]](#footnote-601)他们抓住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的机会, 说周恩来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真的让毛泽东相信了他们的观点。随后,周恩来失去了共和国总理这一关键职位。 [[602]](#footnote-602)

此事对国内政治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邓小平接替了周恩来,继续重建政府部门,修复文革造成的破坏。其次,政治路线发生了偏移· 不再批判文革时期的极端做法,转而防范回到文革之前的企图。这一点在批林运动的改变上就能看出端倪。1974年1月,批林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对林彪罪名的解读也出人意料地变了:他现在被说成是一个反对文革的人,暗中想恢复文革之前的一切制度,是个像极了孔夫子的反动派。孔夫子则被描述成只会委曲求全、只想着稳定和谐的和事佬,恰好代表了那些反对革命的反动社会阶级。其实这些也是周恩来的质量,因此周才是这场运动本质上反对的对象。[[603]](#footnote-603)这标志着现在是时候反对那些企图恢复到文革前状态的逆流了。

#### 1974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孔运动有两大目标,第一,延续先前批林的路线,彻底根除军方对政府的影响。起先的批林运动大大降低了军方在中央政府和地方 296 政府中的影响力,但是没有被牵连进林彪案的军方官员依然在许多地方身居要职,民事官员还未完全掌控政府。1973年末,各大军区进行了规模巨大的人事调动,军区首脑都调到了新的军区。有些资格很老的军方将领在1968年以来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圈子,可现在到了新环境下,失去了原有的人际资源和地方盟友。批林批孔运动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暂缓撤销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政策。周恩来运用先前批林时的趋势,让政府机构效率更高,这同时意味着老干部和党领导将会重回要职。1974年的批林批孔正是毛泽东在幕后支持的一场运动,因为毛泽东阵营的人们并不希望老干部快速回归,也不希望文革的经济和教育政策这么快就被改弦更张。 [[604]](#footnote-604)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启动,公开鼓励人们批评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目标、希望恢复旧制的官员。这既包括地方军事官员,也包括老资格的政府干部。在许多地区,一大批地方力量动员起来,充分利用中央的这一模糊指示。一批造反派领袖在文革期间先是获得了要职随后在军事管制期间被军方排挤,给老干部复位时又没有重获官位,现在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先前的造反派利用这一运动,重新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在政治的舞台上默默无闻好几年之后,现在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与老资格的政府干部再次形成对抗的局面。因此,这次运动激发了群众动员和街头抗议,被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或是「第二次夺权运动」。[[605]](#footnote-605)[[606]](#footnote-606)这次运动给全中国又带来了动荡的局面,也激发了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抗议浪潮。

1974年在杭州发生的事件非常符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内涵。在批林运动期间,许多老干部重回要职,可这也损害了那些与先前造反运动有关之人的利益。211973年下半年,这些人鼓动自己的势力,批评那些现在于各省当政的干部,要求给自己党员身份并获得省市级政府或

|  |  |
| --- | --- |
| 是工厂的领导职位。在工会组织重建工作上,年轻的造反派和老资格的干部互不相让,都试图获得主导权。221973年下半年,由于未能入党, 也未获得官职,不满的反对派们在全省聚集起来,打算去北京抱怨自己遇到的不公。杭州的街头也出现了大字报,批判省领导。接近年底时, 一群不满的造反派来到省党委驻地,围住了省领导,对他们恶语相向、拳打脚踢,要求获得更多的任命。造反派的领袖们安排了更多的攻击活动,准备向省领导发难,并在当地的大工厂鼓动工人组织起来反对「错误的政治路线」。 23  批林批孔运动体现了最高层对捍卫文革的支持。省级领导很快受到合力攻击,因为造反派组织起了大规模的集会,宣吿「反抗反动派有理」,并呼对抗「资本主义的反扑」,阻止他们「恢复旧制的企图」。24 造反派对省领导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他们中的数百人任命为政府重要职位的官员。作为反击,当地政府一口气吸收了8 ,000 名新党员,并将其中3 ,000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25第二项要求是建立工人民兵组织,随后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起来。起先他们的武器只是铁棍,在杭州和其他城市的民兵感到害怕,他们时不时地攻击守卫工厂和其他设施的官兵。杭州的造反派领袖宣称,组织民兵是为了从军队手中夺权。26民兵慢慢地获得了更先进的武器,发生的冲突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67年时的武斗,冲突扩散到了杭州的一些大型国企,并干扰了铁路运营。当局面对冲突的蔓延,表现得束手无策。27  而在南京,运动沿着另一条路径开展。批林批孔的主体是普通市民。他们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是受迫害者。在南京,老省级领导利用这一运动彻底消除军方在江苏政府部门中的影响,造反派领导在这一运动 | 297  298 |



22 同上,页120一128。 23 同上,页133一139。

1. 同上,页144一145 
2. 同上,页148-151。
3. 同上,页152一155、163一164 27 同上,页155一159、172。

中发挥的作用很小:在此前,造反派几乎被军方摧毁殆尽,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非常小的力量。政府干部声称自己是这些造反派的支持者,批判军方在1971年「反五·一六」运动中对他们的粗暴的镇压行为。在南京也出现了民众抗议示威,但带头的都是一些在文革中受苦的人主要是数万被贴上政治标签随后被赶出城市的民众。 [[607]](#footnote-607)

1968年以来,许世友将军在南京实行的是铁腕整治,在江苏省重建党组织时,他非常不情愿让政府官员回到核心岗位上。到了1973年底,依然有二千多名军方人士在党政方面担任要职。江苏省区一级的党委一把手都由军方控制, 68个县一级的党委书记中,也有39名是军方人士。[[608]](#footnote-608)许世友在1973年底被调往广州军区,离开了南京军区,政府干部这才有机会将剩余的军方势力清除。

在南京,老干部们发动起一场运动,批判军方在军管时期的镇压行径,尤其是对造反派领袖的迫害。但是这样做以后,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动员起了数千普通市民,他们走上街头,控诉军管时期自己受到的不公。对前几年军方行动的控诉让曾经被驱逐出城市的市民们涌了回来, 希望回到家中,并获得原先的工作。在军管开始时,江苏省有超过35 万人被强制送往农村,光是南京市就有13万人。许多人都来自所谓「剥削阶级」家庭,或是政治背景「不清楚」。1974年1月下旬,数千人回到南京城,向当局提出申请,希望重新获得城市户口,重回工作岗位。接近三个月来,这些上访者都在省市党委驻地前抗议示威,张贴海报,详述他们的苦难,并时常组织街边游行。他们的活动引来许多人观看,干扰了中心城区的交通。这一窘境一直持续到4月份,上访者变得愤怒起来,大批涌向火车站,要求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去北京上访。乘务员阻止他们上车,他们就坐在铁轨上,使得京沪铁路瘫痪数日之久。

299 南京当局与抗议者谈判,并达成一致,随后铁路恢复畅通。政府愿意为抗议者找工作,让他们回到原先的单位,但是这又不经意间造成了

更大的问题。上访者成功的消息一传开,又有5万人从南京周边的乡下涌进城来,要求获取同等对待。政府不可能和这么多上访者谈判,抗议者因此再次堵塞了城区交通,或是涌入车站要求去北京。铁路再次瘫痪,有些上访者竟然在高速公路上截下公交车和卡车。前去阻止的官员被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在运动结束之后,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街上的上访者清理干净。

在广州,另一股反对文革的力量在运动中登上舞台:先前的造反派活跃分子发起了一场自觉的政治批评运动。在广州,这些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造反派们走上街头,同样抗议军管时期受到的压迫,但是他们做的不仅如此:他们同样批评文革本身,这为后续另一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埋下了种子。这些想法被写成一篇长文章,贴在大街小巷,被广泛讨论和印刷。这一事件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197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的开端, 开始呼中国政治体系的改革,加强民主和法治。

1968年广州军区镇压反对派力量时,广州的「红旗」派反对军管, 因此受到严厉打击。1972年10月,「红旗」派先前的领导从监狱中释放,共有约三十人,他们与其他一些被迫害的老干部一道,讨论为什么文革会失败,他们的批评集中在当地的军方力量上。这样,在1973年下半年,其中一些人开始批评所谓的「林彪体系」,并开始起草文章,相互传看。1974年2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作者们就开始将这些文章做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并用集体署名「李一哲」。31最著名的文章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1974年11 月,文章被张贴在广州城的醒目位置。这是一系列的大字报之一,这些大字报给官员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更多的前「红旗」派人士。

这群人组织起了一连串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与其他深怀不满的 300 群体联合起来:退役的士兵希望涨工资,年轻的工人对工资和生活条件不满,下放的青年和从前的红卫兵希望严惩那些在1960年代末犯下罪



30 Chan, Rosen, and Unger ( 1985 , 9一16, 31一86),

3 1 同上,页2一6。这一笔名借用了三位合著者的名字: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

行的军队官员。[[609]](#footnote-609)这些行为获得了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同情, 赵紫阳自己在文革期间也被迫害,同样希望撤销军事管制。几个先前将批判矛头指向军队的红卫兵领导负责批林批孔,其中的一名受命调查军方干涉地方党报的案件,此事让他们有机会公开发表先前只是在地下传看的文章,并进一步向省领导请愿。 [[610]](#footnote-610)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虽然肯定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是此文也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文章最初的批判目标就是「林彪体系」,文风与前些时间流传的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一致,文章作者讥讽道: 1960年代后期半宗教性质「无限忠诚」运动不是现代社会主义,反而像古代的封建帝王崇拜。[[611]](#footnote-611)他们抨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中独断专行的作风,认为所谓的「反革命成分」定位十分模糊。他们反对那些希望回到文革状态,整天压迫、殴打、折磨,只为找出假想中的叛徒和阶级敌人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暴力行径标志着新的统治阶级正在形成,这个阶级用强迫手段和王权崇拜来巩固自身的独裁,阻止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国缺乏真正的民主,以及制约官员权力的法律。没有保障措施来捍卫人民免遭虐待的权利以及对强制权力的法律束缚,社会主义将会变成一种「社会主义法西斯」,这种现象就出现在最近三年的「林彪体系」中一一-换句话说,就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612]](#footnote-612)

301 文章的初衷是反对1974年批林批孔所代表的政治走向。文章的作者认为,新的运动只不过是为了回到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法西斯状态下。他们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反对恢复文革前的制度,而是建立新的制度,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制约独裁迫害,减少那些当权者的特权。[[613]](#footnote-613)这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思维,文章的作者和其他立场相似的人成为

1978至1979年后毛泽东时代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 [[614]](#footnote-614)

文章抨击一党专政,这给中央的政治人物敲响了警钟,政治局中的激进派更为震动,尤其是江青。江青批评这篇文章是「自解放以来最反动的」东西。1975年早些时候,广州城内召开了对这篇文章的批判运动,作者被拉到公众大会上批斗,此外还在学校和工厂的集会批评这一文章的论点。文章作者被流放到农村,针对赞同此文章观点者的调查案件就有数百起。 [[615]](#footnote-615)

每个地方的抗议活动性质不一,但是1974年中国很多地区社会动荡迭起,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工厂、铁路枢纽、造船厂,先前的造反派领袖挑战老干部,因为后者希望重获权威,并执行工作纪律。除了上述的南京和杭州外,上海的码头工人也开始罢工,抗议再次实行工资按件计算的制度。在铁路系统中,派系斗争,尤其是在重镇徐州,让运输严重受阻。钢铁、煤炭和其他重要物资堆在生产地运不出去,供应短缺造成生产停缓。1974年前三个季度,工业产量下降,近几年稍微向好的经济又开始下跌。

到了10月,这些问题最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呼要保持「团结稳定」。很明显,毛泽东希望造反派力量对抗那些企图恢复到文革前制度的人,但同时也不想回到全国混乱、不得不大规模依托军队力量强 302 制恢复秩序的1968年。接近年底时,毛泽东最终命令中央的官员果断采取措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他重新启用了邓小平。邓在1975年早期开始着力实施恢复秩序,发展经济的政策。 [[616]](#footnote-616)

### 1975 :恢复秩序,稳定经济

有了毛泽东的准许,邓小平果断地恢复党组织的建设,将民事机构

中的军方人员全部移除,并彻底终止了1974年造成经济衰退的国内冲突。相比于周恩来,邓小平所做的更多,做事也更果断。[[617]](#footnote-617)不过,到年末的时候,邓小平的举措又遇到了阻碍。毛泽东支持他重新建设党组织,消除派系冲突,创造「团结稳定」的局面,认为这样就可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邓小平所做的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邓希望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建立更强大的科研界,并恢复高等教育。这些举措事实上站在了「维护文革成果」的对立面。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不久就被孤立,受到批评。

不过,在被孤立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将军方的势力彻底从政府部门撤出。在一连串针对军界领导的演说和文件指示中,他批评军方机构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只为自己建立宽松舒适的环境,寻求一己私利和各种特权。他呼吁人民解放军重新专注于军务,不要掺和民政部门的事,因为这样不利于军队时刻准备好打仗,也让军方纪律涣散。他指令军方更新换代武器系统,并着力消除军队中的派系斗争。1975年8月,他要求一切军方人员从政府岗位上撤出。 [[618]](#footnote-618)

邓小平同样发起运动,重建全国的党组织。他帮助党委书记们恢复权威,并继续平反老干部和技术专家。他强调,党的权威是不可侵犯 303 的,决不允许挑战党的权威。他同时要求重新调查1968年之后入党的党员,不符合资格要求的、没有纪律意识的、还抱着派系斗争不放的, 一律开除出党。那些喊着升到领导层位置,或是已经坐到领导层位置的人,应该回到基层,先去积累领导层所必备的经验。[[619]](#footnote-619)

邓小平指导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着力解决派系斗争问题。首先关注的就是全国铁路运输系统,随后推广到煤钢等关键产业。这一行动的突出表现是他对徐州铁路局的拨乱反正。徐州是江苏省北部的交通要地,对华东华北的运输起着关键作用,可是深深的派系斗争严重影响了徐州铁路枢纽的运作, 1975年2月,他将铁路系统的权力从地方收归中

|

央,并成立铁道部,在中央文件中将那些反抗这一政策的派系描述为「走资派」,将那些破坏铁路设施的人认定为「反革命」。他将一个工作组派到由铁道部领导的徐州铁路局,并将先前的局长 一位造反派领袖一一一抓了起来。原局长的支持者们企图抵抗,也一并被抓。工作组召开了一系列公众集会,批判了派系斗争,要求立即杜绝破坏事件的发生,并完成运输任务。工作组将一大批活跃分子调走,取缔了地方上的派系网络。[[620]](#footnote-620)徐州的经验被迅速推广到全国,铁路系统的困难很快被解决。钢、煤等关键生产领域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到类似的破坏,现在也采用徐州模式进行恢复。 [[621]](#footnote-621)

在浙江,曾经在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时期组织起工人民兵组织的造反派们对邓的调整政策十分抵制。邓小平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杭州解决这一问题。造反派顿时倍感压力,工作组在凌晨突然来到该派系的大本营,带走了造反派的一号人物翁森鹤。人民解放军进驻杭州城内外的各大工厂,以防止社会动荡,其余的造反派领袖也受到惩罚,工人民兵组织被解散,省领导层人事进行改组,以配合这一调 304 整措施。 [[622]](#footnote-622)

### 激进派的最后抵制

邓小平果断地恢复秩序,重建党的组织权威,这些都是他的本职工作。毛泽东早就清楚,要把政府机构中的军方势力彻底清除,而邓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毛主席希望党组织能够快速恢覆,先前被打倒的干部能够回到岗位,发挥作用,而邓小平都积极地推进了这些日程的发展。毛泽东同样意识到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其中并不包括扰乱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派系斗争。毛泽东想要秩序、纪律和稳定,他认为这些可以帮助维护文革的成果。邓小平使用的主要是政治手段:建立党不容置疑的权威、强调团结守纪。这些举措都没有僭越毛泽东的界限。

但是,邓小平做的不仅仅是政治举措,同时也在建立现代经济的基础。虽然现在看来这些举措十分温和,但是当时可能已经让毛泽东怀疑邓小平,认为他对文革不忠诚。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当时的担忧不是多余的。邓小平采取的多项措施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秩序、维护稳定。他授权起草了一份重振中国经济,恢复发展的雄心计划,促进国外高科技的引入,并与国际贸易规则相接轨,接触外国信贷,通过促进按劳分配的原则,提振工人积极性, 加强行业自律。第二份计划则呼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重建中国科学院。这份计划提倡恢复专业期刊,希望军方和思想宣传队不要干预科学,引入更多的科研材料和设备,包括外文出版物,召回所有还在农村下放的科学专家,专注发展像计算机、激光、遥感等高科技领域和核 305 能、原子物理等基础学科。该计划同样呼振兴社会科学研究,建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份计划是关于高等教育的:计划重申了文革前那些专家学者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而不是让学生从工厂和农村里依靠政治推荐信入学,要求大学教育中去除「强制劳动教育」这一部分,加长课程时间,增加专业训练科目,提高学术水平。[[623]](#footnote-623)所有这些计划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的工业和科技已经远远落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领域也十分不足。这些新政策暗含的理念再明显不过:文革让中国更加落后。

1975年底,毛泽东已经深深感到不安。目前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让毛泽东迅速地对邓小平失去了信心,但是他的态度在9月份就开始急转直下,到了1 1月,毛泽东开始严厉批评邓小平的「错误政策」。 [[624]](#footnote-624)

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的感觉没有错:邓小平对巩固文革成果并不是很感兴趣,和反,他更致力于清除文革中那些破坏经济的政策,重建被毁坏的一切。1976年1月,邓小平不再于公共场合出现,也失去了领导层的职位。当月,周恩来去世,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并成为第一副总理,实际上就替代了邓小平的角色。48同时,一股强劲的「反修正主义」和「反复辟主义」运动开始了,首先针对的是在工业、科学、技术和高教领域支持邓小平政策的官员。49这些官员在大众传媒和街边大字报上被广泛批评,公众集会上也遭到批斗,像极了1960年代的景象。一名官员在批斗会上晕倒,并最后死于心脏病。这些官员的罪名是听从了一名未有指名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这位没有指名的走资派几乎毫无遮盖地指向了邓小平。

#### 1976 :清明节抗议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下放,复辟主义被严厉批判,这些事情都 306 集中在1月中旬同时发生,象征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再一次转向。在邓小平主政期间被打压的各省造反派领袖觉得机会来了,希望能够卷土重来。在南京、杭州和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里,造反派又动员起来,攻击犯了和邓小平同样错误的当地老干部。在这些城市,造反派领袖再一次挑战老干部,希望将最近任命的官员拉下马来。因此造反派张贴大字报,在政府大楼前举行抗议示威。50对他们来说,局势彷佛又要再一次转变,而他们已经准备好抓住机会,重回舞台。

而在事件中,普通市民第一次站出来反对。自从林彪死后,民间的情绪一直在悄悄酝酿,人们在地下组织学习小组,重新审视马列主义,



的观点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亦可参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404一412 )及ⅤOgel ( 2011 , 140一151 )。

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14一417)·
2. Teiwes and Sun (2007, 416一426)·
3. Dong and Walder (2014), Forster ( 1990, 235一242), Wang ( 1995 , 258一265) ·

从前的红卫兵开始反思自己运动失败的原因,普通民众开始写作匿名文章和请愿书,抨击文化大革命、江青甚至是毛泽东本人。[[625]](#footnote-625)在这场批判复辟主义、针对邓小平、暗批周恩来的新运动的最初阶段,相似的情绪也开始以传单和大字报的形式浮出水面。 [[626]](#footnote-626)

1976年早春,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情感开始以激烈的方式爆发。这种公众情感反映的是更广大群众的心中所想,而不是省里几个造反派异见分子那么简单,所反映的也与1月份做出的政治转向处在完全的对立面上。催生一切的是周恩来的国家葬礼,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人民公祭周恩来的阻止。1月15日,周恩来的官方国家葬礼规模盛大,但是相应的宣传报道却没能让群众满意。电视上也就是寥寥几个镜头,只字未提发表悼词的邓小平。葬礼后不久,中共中央就下发指令,要求禁止地方上举行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反而要求人们集中力量批判「右倾之风」,这显然是在批邓,而事实上是在间接攻击周恩来总理,因为在民众眼中,周的政策和邓在本质上是和通的。中央的这一表态激怒了公众,并催生了大范围的上街游行,人们开始批判政治局的激进派,间接地批判毛泽东

307 最早也是最知名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南京,始发于南京大学。南大也是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发源地,在1月份周恩来死讯公布不久后,南京的各大学校园和其他组织都召开了纪念仪式。[[627]](#footnote-627)可是几天后,中央下发了禁止纪念活动的指示,许多工作单位和学校取消了原有的计划。但是南大依旧我行我素。当地市民对如此不充分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现在居然还要被迫批判与周相关联的政策,更是大为愤怒。官方宣传丝毫没有在群众中点起热情。南京当地忠诚于毛泽东路线的造反派攻击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认为他们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合谋者

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公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无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周恩来。[[628]](#footnote-628)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回应,予以反击。第二天,南京大学四处贴满了大字报,言辞激烈地批评《文汇报》以及所有胆敢攻击周总理的人。大字报公开批评了那些以上海为大本营的政治局激进派。江青更是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有一个大字报的作者说「想念杨开慧」。杨是毛泽东早年的妻子,被国民党所杀。学生们游行到南京火车站和汽车站, 在出行的列车巴士上都贴满标语,将南京进行的运动通知到其他城市, 捍卫周恩来的名誉。

4月4日清明节前两周,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出现在南京城大街小巷,大字报宣示「我们永远缅怀周总理」。大量的花圈出现在南京城南部的一处小山上,这是国民党曾经用以处决革命者的地方,解放后就成为人们缅怀先烈、摆放花圈的场所。 一个400人学生团体希望进入却遭到阻止时,广场门口爆发了肢体冲突。随后,在3月28日,学生们走到城市中心,带来大量花圈。这引来无数人上街观看,大字报用更加犀利 308 的语言抨击政治局里的激进派,捍卫周总理的名誉。一张著名的大字报写道:「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批判张春桥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抱着深深的不安,中共中央在4月1日发布命令,要求停止上街集会,并将花圈和大字报全部清除。

4月2日,北京禁止纪念活动的指令到达了南京,干部和工人被要求遮盖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标语海报。[[629]](#footnote-629)但是,这些命令并不能阻止抗议示威的扩大。由于对禁止大字报和花圈的禁令非常不满, 4月3日,抗议规模反而更加空前,抗议者张贴海报,吶喊标语,比之前更加具有对立性与攻击性:「缅怀周恩来不是反革命」、「我们坚决和举着白旗对抗周总理的阴谋家对抗到底」。当日,约有14万人在城南的一处公园集会,接下来几日,南京街头的群众人数达到60万之多,并在4月4日达到顶峰。[[630]](#footnote-630)南京事件同时引发了江苏南部其他城市和县镇的示威活动 [[631]](#footnote-631)[[632]](#footnote-632)杭州市也出现了和对规模较小的类似运动。批邓运动激怒了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官员,他们张贴大字报,认为老干部们并没有腐化成「走资派」。《文汇报》将周恩来比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事彻底激怒了民众,他们开始张贴大字报批判上海市委,而后者其实就是政治局激进派的拥趸。4月1日,一个钢铁制造厂的党员们将一个巨大的纪念花圈送到了劳动局建筑的屋顶旗杆上,高处的花圈几个街区外都能看见。杭州的其他工厂和工作单位也纷纷仿效,浙江大学的人们亦是如此。满城的大字报宣示「反对周总理就是反对革命」、「小心那些像林彪一样的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夺取党内和国家权力」。这些政治性表述在市中心的商场、大学门口以及几处主要的广场最为集中。像南京一样,从杭州出发到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列车上也被人写满了

这些地方上的事件可能帮助催生了4月4日及5日在北京进行的更 309 大规模纪念活动。赴京列车上的标语十分见效: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最初几个标语中就有「我们坚定支持南京市民的革命斗争」。[[633]](#footnote-633)在北京,早在3月19号就有花圈被陆续送到天安门广场,但是被很快清除,公安局收到指令,要记录下那些送来花圈的人的名字。3月30至31日,南京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城,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越来越多,反对激进派的诗歌和文章被贴在广场上,前往观看的人也急剧增多。在4月4日前的短短几天,约有超过100万人到过天安门广场。公安局在广场一角设立了联合指挥部,里面都是工人民兵的成员和来自北京卫戍部队的士兵。他们广播宣传清明节是封建传统,各单位不应该派人送花圈来,南京发生的更是「反动事件」。不过,他们并没有和人群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逮

捕了小部分人,移走了一些花圈 [[634]](#footnote-634)

4月4日清明节当天,广场上的人数达到了约200万人,人们送来更多的花圈,还有诗抄、传单、海报,人们发表演讲,吶喊标语。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人们与公安开始发生零星的肢体冲突,有官员受伤。绝大多数的言论都是缅怀周总理的悼词,但是和南京一样,部分人也尖鋭地抨击政治局的激进派们,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更加惊人的是,其中出现了暗批毛泽东本人的内容。这场抗议显然是要反对毛泽东新发起的批邓运动,但更本质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没有被点名批评,但是部分海报和演说已经将他设为批判的目标。当天,广场上有一首著名的挽诗是这样描述政治局中的激进派的: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3 10 纪念碑下氵戾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635]](#footnote-635)

对政治局激进派和毛泽东本人如此直白的批评当然不会被轻易放过。当天深夜,党内领导召开会议,决定清除广场上的一切花圈,一些深夜还在广场上徘徊的人都被拘捕。官方并没有公开解释为何清除了所有的花圈,但是4月5日早晨8点,消息很快传开,约一万愤怒的市民在广场上集结,到了下午,人数又多了几倍。人们恼怒而激动:他们集中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要求送回花圈。一辆播送「批判阶级敌人」的警车被掀翻,公安局的联合指挥部也被抗议者占领并焚毁。警方和民兵直到深夜都没有和人群发生正面冲突,随着夜幕降临,一份北京市长的录音批评了那些「坏分子」和「欺骗民众的人」,要求人们都回家去。晚11点,录音已经循环播送了许多遍,公安和民兵最终手持棍棒来到广场上,将剩下的抗议者驱散,并在广场上拉起警戒封锁线。顿时流言四起,有人说广场上死伤惨重,但逻辑不通,因为当局显然能够在暴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控制住广场上的局面。次日,局面相对平静,数千民众来到广场上表达他们的尊敬,他们放下一个花圈,而花圈并没有被强制清除。

### 毛泽东最后的岁月

显然,政治局的激进派和他们的支持者为四五事件感到惶恐不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4月7日向毛泽东做汇报:「这起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公开举起支持邓小平的旗帜,并将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636]](#footnote-636)311 部分政治局的激进派们指责邓小平暗中指挥抗议示威,是反党阴谋的一部分,宣称邓当天就在广场上指挥一切。毛泽东并不相信这些,但是他

清[[637]](#footnote-637)楚地明白这些抗议活动意味着民间存在着强大的力量,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而周和邓只是这股力量的一个号召力。他命令撤去邓小平的领导职位,并正式任命华国锋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自2月以来华已经是代理总理了)。华国锋同时也成为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他成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为期四个月的「批判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运动也变成了一场批邓运动。廹63、一、一一事件是毛泽东人生中最后一次干预中国的政治走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政治局的激进派和他们在首都内外的支持者们继续批判邓小平的政策,成千上万同情天安门抗议或是表达相似情绪的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调查,据估计,又有大约一万人被拘捕。激进派又组织起集会游行,庆祝「摧毁反革命逆流」。[[638]](#footnote-638)反对老资格干部的活动又在各省开展起来,尤其是那些1975年被邓小平清除派系斗争压制的地区。像杭州、南京这些城市,先前的造反派领袖又开始攻击那些配合邓小平政策、镇压派系斗争的老干部。[[639]](#footnote-639)[[640]](#footnote-640)华国锋和其他领导试图继续维持稳定,在毛泽东设定的界限内重振经济,但他们发现受到了阻碍:无论修补文革破坏的政策多么温和,激进派官员们都不满意。

就在这一关键当口,毛泽东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5月11日,毛心脏病发作,虽然意识清醒,但是已经卧床不起。6月26日和9月2日, 毛又有两次心脏病发作,并于9月9日逝世,华国锋随后任代理主席。军队提高警戒,严防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任何政治动乱。1 1至17日,人民大会堂每天都举行悼念仪式, 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纪 312 念集会,约有一百万人参加。华国锋发表了悼词,赞扬毛泽东是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全国人民在约定的时间内集体默哀,工厂和火车头的汽笛鸣响三分钟。邓小平和他的亲信前不久全部丢失了官位,现在也被禁止参加这些活动。 [[641]](#footnote-641)

10[[642]](#footnote-642)月初,政治局的激进派们被逮捕,官方将其定性为密谋攫取权力的「四人帮」,这与当时对林彪事件的官方解释十分类似。逮捕「四人帮」实质上是一场政变,主导的官员非常明白这些激进派人士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害怕政治局的激进派会不断获取权力,甚至将其中一员推到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不过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证据显示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周内,政治局的激进派们真正做出夺取党内权力的尝试。

相反,抓捕行动似乎是事先组织好的。毛泽东死后一个礼拜不到, 华国锋会晤了其他高层,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先前已有一些高层领导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次华国锋采取主动,讨论如何将其从领导层中清除。他在9月下旬与其他政治局成员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指出与激进分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觉得可以在政治局发起投票,开除他们,但是这样做风险太高,为地方上的叛乱分子提供时问喘息反抗。[[643]](#footnote-643)「粉碎四人帮」的计划开始加速,并将更多的官员动员起来。北京的激进分子名单也被列出,指定逮捕。在适当的时候,北京卫戍部队将被命令占领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机场等首都的战略地点。

10月6日上午,政治局开会,邀请核心激进派成员参加。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达所谓会议地点时即刻被捕。江青和毛的侄子毛远新不久之后在家中被捕。北京卫戍部队控制了战略地点,行动在不到一个 313 小时内完成。[[644]](#footnote-644)接下来的一周内,各省、军区的官员被召集到北京,听取了关于此事的通报。首都30名激进分子的重要政治盟友也被捕。上海是激进派的大本营,上海的党内领导人无法与北京的盟友取得联系, 于是怀疑「修正主义者」已经掌权。他们10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民兵抵抗。10月12日,一些上海官员计划向全国的反击行动的支持者发出信号,要求大家罢工,组织示威,爆破桥梁,以巴黎公社的方式抵抗。不过,该计划从未得以实施。上海官员被迫去北京进行磋商,

他们回来后却对在北京的见闻三缄其口。10月14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公开,上海居民对此感到困惑。第二天,当人们知道被逮捕的人员名单时,民众对政变表现出强烈的拥护,所有抵抗计划也都被放弃。 [[645]](#footnote-645)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周,他自己也意识到可能无法赢得这场博弈。1976年夏天,毛对华国锋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对自己这场「最后的革命」在未来的评价进行了反思

我一生耸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另一件事你们知道,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中不成就动荡中交, 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

71

如果毛泽东认为华国锋能够在党内高层的高度分化中做好平衡,从而保护好自己的激进派拥护者,那么他再一次失算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妻子、侄子以及一众政治盟友都被关进了监狱。在接下去的几年中,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的荣誉被继续保留,但是他人生最终几年的政治遗产被否定。共产党随后就发动了「全面纠正文革错误」 314 的运动,彻底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前效忠的激进派官员。外界看来,似乎这些官员,而非毛泽东,才是文革「十年动乱」的罪魁祸首。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1981年,毛泽东去世仅五年之后,共产党就发表了官方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646]](#footnote-646)决议中明确地指出:「1966年 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 Blank Page

## 14章回望毛时代

毛泽东去世之际,并没有实现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制定的目标。他的两大成就一一一建立统一的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一一•基本上得以幸存,但是却遭受了严重破坏。毛泽东逝世后,留下了一个充满派系纷争而又分裂的共产党、一个需要从过去十年不断冲击中恢复的政府。工业化进程停滞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贫穷状况;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原地打转,在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高校体系有所倒退,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于全球水平数十年。因为毛泽东开展的各项运动,中国在发展方面严重落后于其他国家。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落后、孱弱,基本上没有实现1950年代初的目标。

### 意外的后果,沮丧的野心

1956年之后,基本上毛泽东的每一次干预都破坏了最初取得的成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双百运动。毛泽东试图在一个稳固而又安全的新社会主义政权当中,将自己打造成一位后斯大林时期自由化运动的捍卫者,即便党内其他领导人反对,但他还是呼吁群众公开对党内干部进行批判。批评出人意料地日益激烈,学生组织各类游行示威, 工人开始罢工,集体农场开倒车,农村地区也偶现叛乱,这些都表明,

中国的群众并不如毛泽东想象地那般接受共产党新政权。对于毛泽东来 316 说,双百运动后的「反右运动」在许多方面而言都是一次耻辱的失败, 这让他重新回到坚持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上,而这对于未来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带来巨大灾难的大跃进事实上是一次更为惨痛的失败教训。不同于斯大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坚信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还迅速对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改造便已经完成,远超计划。这给予了毛泽东巨大的信心,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经由政治干部发动与内战后期类似的动员活动,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动员中国人民的能力抱有信心,他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喷涌而出的精力和全国范围内的积极性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震惊,很少有现代国家可以发动这样的运动。但是,结果却与毛泽东的预想截然不同。除了在大灾荒中大量民众饿死,这场大跃进还破坏了农业和工业,花费多年都还没有恢复。毛泽东这一次失败得非常彻底,于是他放弃了之前自己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执念,转而在政治上先发制人,应对这场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失败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后果。

他生前一直在斗争,但并没有获得成功。

从文化大革命本身出发,这场运动至多可谓功过参半。它最终以失败而吿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化大革命却又极为成功。毛泽东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造反者对抗党国体制,这一体制在1967年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凭借造反力量,毛泽东在避免党国完全解体的基础上,破坏了原有的党政架构。后来,他又以革命委员会的方式建立起新的政府机构,代替原有的党国架构。但是这些都是徒有其表的胜利。毛泽东和他的激进分子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怂恿民众造反,但是他们试图引导和影响造反的努力总是落空。毛泽东最初的一些 317 战略失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经常改变原有的策略和道路。学生运动在最开始就已经出现分裂,学生拒绝团结在一起。在中央文革小组插手支持一派、抛弃曾帮助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派学生之后,这一派又成为了被抛弃的那群学生所反抗的对象。这些红卫兵异己分子被压制,为许多忠诚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学生造反派留出了活动空间。但是这些学生造反派又分裂成两个新派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在和互对抗。

毛泽东对学生失望之后,转而动员工人阶级。一开始,这一策略看似前景颇为光明。工人造反派联合在一起,迅速占领了地方党政机关, 但是工人们同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求上调工资和生活水平,还有许多人被动员起来保护当地党政领导人,与其他工人抗争,导致工业和交通陷入瘫痪。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最初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工人阶级造反派和忠诚的毛派分子联合起来, 从党政机关手中夺权,压制经济需求和反对声音 一些省份也照搬效仿,但是很快失效。1967年初,类似的夺权运动基本上都失败了,迫使毛泽东动用军队进行控制。这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地方武装力量加入到造反派的冲突当中之后,又进一步加深、延长了造反派当中的分裂倾向,将地方军队卷入到派系斗争当中。

1967年春夏,造反派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毛泽东试图将武斗的规模引导向积极的结果。他要求军队支持「左派」,批准造反派攻击那些在地方斗争中站错队伍的军队。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加剧了武装斗争,派系斗争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有所增加,而且现在又用上了军队武器。一些地区城市的所有街道在武斗中都被摧毁,一些曾经建立起脆弱秩序的省份又再次遭受动荡。毛泽东意识到他原本想要加强造反派力量、解决区域冲突的努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于是他又迅速转向全面支持武装力量,清洗中央文革小组中那些忠实执行他指示的替罪羊,呼吁群众放下武器。在经过长达一年、试图团结交战双方的艰难谈判之后,毛泽东 3 18 逐渐倾向于采取专制手段和军事独裁,严厉压制那些他曾经重视的造反派领导人,用更容易摆布的「群众代表」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大多数幸存下来的人都成为了傀儡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毛泽东试图制造一种假象:这些跌宕起伏都朝着有利于实现他的终极计划的方向发展。1968年末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新设的革命委员会被认为是伟大的胜利。事实上,它们确实是一种在旧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政府新形式。但是它们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运转, 最终存在时间也不长。除了上海和北京,基本上所有的省级革命委员会都被军队官员所占据,由委员会掩盖军事独裁本质。革命委员会延伸至基层,迅速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清洗运动,这场寻找阶级敌人的运动所拥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首屈一指。到了1969年, 毛泽东突然发现,他被迫给予军队大量权力,而这使得他极度依赖军队。他试图削减军队权力,但是却导致了林彪事件的危机。

林彪的死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依据,标志着中国短暂军事管制的结东。毛泽东余生一直都在做着极不稳定而又不成功的努力:从早些时候的动乱当中汲取些许意义。他将重建党政机构的任务交给周恩来, 让军队从政府机构中撤走,并让他领导一场运动,将由他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惨剧都归到「极左分子」林彪身上。随后,他又罢黜了周恩来,发动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功绩,同时继续让军队从政府官僚体系中撤走。当运动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陷入动荡,工业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之际,毛泽东又启用邓小平重塑纪律和秩序,稳定经济,接手重建政府职能的任务。眼见邓小平并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信条展现出任何尊重,毛泽东又罢黜了他,最终导致南京、北京等各地掀起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蔑视毛派激进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毛 319 泽东让中间派华国锋接手,希望他能够在毛派激进分子和资深官员当中取得平衡。但是,毛泽东逝世一个月之后,华国锋就开始逮捕、谴责毛派激进分子,迈出了后毛泽东时代不同道路的第一步。

事实上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在1956年后对于中国的贡献从他自己的角度而言并不成功,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破坏性的,他自己肯定也未料到会是如此。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带来的破坏远超积极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的党政机构,迫使那些内心对毛泽东理念有所质疑的官员靠边站,而且革命并没有产生持久性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不断尝试在意外的态势中寻找积极的一面,断言混乱最终必会带来更伟大的秩序。但是民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与不断加强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一道,都变得虚有其表,与毛泽东之前对于大跃进的「九分功,一分过」的坚持一样空洞。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他生前最后两年有所恶化,于是他似乎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遗产并不能被延续,领导层和社会当中的强大力量正团结起来反对他的遗产。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同事对毛泽东的遗产也抱有相同的看法。陈云曾经因为坚持中国发展必须保持平衡稳固而被毛泽东「靠边站」,他在1978年末有所保留地表达了这一普遍看法:「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中一位值得尊重、爱戴和杰出的伟人。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辉将受到一些磨损,但成就依旧斐然。但他死于1976年,对此,我们毫无办法。」[[647]](#footnote-647)

### 毛时代的国家发展路径

评价毛泽东时代不应当仅仅从毛泽东的目的和结果出发。更为重要

地是要全局看待中国在新政权和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这一体制在1950 320 年代由共产党所建立。当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巩固权力、选择苏联模式推动经济发展之际,他们也选择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极力推动快速实现工业化,而他的同事觉得这样的速度过快,在工业化实现之后,他又进一步通过政治动员加快生产。这种模式在苏联已经自证: 它擅长在战时动员和建立大规模重工业基础之际发挥效用。在中国建立苏联模式不久后,赫鲁晓夫开始转而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吹嘘苏联即将达到能够与美国匹敌的发展和繁荣水平。回头看来,这样的预言非常虚幻,但是在当时而言不但不牵强,还激发了毛泽东效仿苏联的决心。

在大跃进当中,毛泽东将这种发展模式推向了极致。他贬低技术专家建议,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党政机构动员工人、农民加班加点加速生产,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果就是严重的工业衰退和历史性的饥荒。 1960年代中期经济有所恢复后不久,毛泽东再次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攻击经济官僚,让各级官员和专家接受政治攻击,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下放去做苦力。在林彪事件之后经济有所紧缩,而后经济领域又成为了政治战场,各方就技术专家角色、企业管理方式、工作激励方式、工人生活等方面进行争论,而各级领导人因此而无法工作。

随着毛泽东时代逐渐落幕,很难忽视毛主义所带来的沉重代价。从某些角度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些许成功。公共卫生条件稳步改善。粗死亡率从1953年的25 · 7%下降到1976年的7 · 8%。婴儿死亡率从 1953年的175%下降到1976年的45%。出生预期寿命从1953年的40岁, 上升到64岁,这一数字通常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才能实现。[[648]](#footnote-648)这些 321 指标表明,政府基础设施有能力改善公共健康,为大部分人群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此外,也正是这些政府基础设施,在1950年代针对犯罪、毒品和性交易、城镇黑社会等现象展开了高效打击运动

这些成就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样令人咋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出按名义价值计算增长了十倍。工业产出增长了两倍。3从这个角度而 ,毛泽东版的苏联经济体系所取得的成就远超最初的预期。

但是在表面之下,显然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个显著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样迅速: 1952年之后,人口翻了一番,从5 · 84 亿增长到了9.32亿。人口压力阻碍了生产总值增长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错误的政治干预。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下令否定那些提议控制生育的人口专家,指责这样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属资产阶级马尔萨斯观点,后者将贫苦归结到穷人自己身上。此外,他推断,人口控制在经济上也不会带来什么价值,因为人类劳动力是所有价值的源泉,因此劳动力更丰富,经济也就更加繁荣。

不断膨胀的人口,与高投资发展战略一道,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将永远被困在温饱线附近。在毛泽东晚年,就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农业和工业都已深陷泥潭,而且问题还在不断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在1952年之后仍然是有所提高,

尽管在1961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和1967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下降。但是, 1950到1973年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累积年增长率仅为2 · 9%。在同时期,中国只能算是亚洲国家中档水平,多少高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印度增长率的两倍,但是远远落后于亚洲地区排名前六的国家,包括泰国在内(表14 · 1 )。

表14· 1亚洲国家/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50一1973 ) 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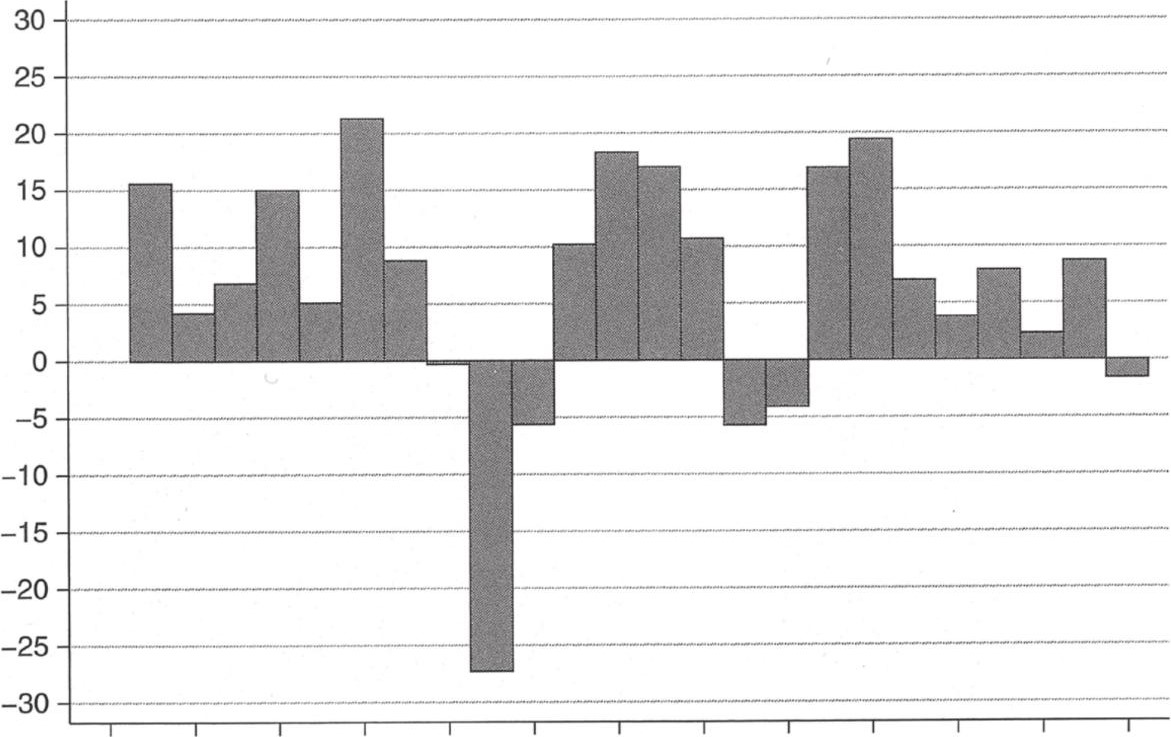
|  |  |
| --- | --- |
| 国家/地区名称 | 增长率( % ) |
| 日本台湾韩国  新加坡泰国中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丐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 | 8  6一  4  cn  01  1 |

来源: Maddison ( 2006, 143 )

备注:增长率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复合年均增长率

图14· 1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极不稳定。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增长率经常波动,不仅仅是因为大跃进和早期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总体上而 ,除了这两个阶段,经济发展形势还是较为积极,但是中国经济从未呈现苏联体系那样的稳固增长模式,而苏联模式本来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市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最为发人深省的是,经济在文化大革命破坏最为严重之后,也没有能够恢复。事实上,经济还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停滞。1970年后,军队从政府机构撤走、白领专家回到工作岗位之时, 增长率仅为2 ·[[649]](#footnote-649)%。1974年,经济基本上没有任何增长,这一年是政治动荡的一年,并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一年陷入衰退,下降了3 ·4%。 4 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是因为农业和工业双双出现了问题。集体农场竭力提升每亩耕地产出,产量提升勉强跟上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给城市的粮食收购在1970年代停滞下来,由于农业生产率并没有迅速提高,食品供给危机逐渐逼近。工业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在牺牲消费品、服务和住房的基础上,重工业领域吸收了大量投资。尽管低效,但是中国还是向重工业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 1953 年,重工业吸收了52%的全国投资;大跃进期间,吸收了87%的全国投资,之后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基本上每年都占到了80%以上。 [[650]](#footnote-650)

323 图14· 1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变化(不变价格) ( 1952一1976 )

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变化

一 %

一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年份

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1983 , 22和103 )

由于资源丰富,重工业利用资源的效率低下, 1970年后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图14 · 2展示了多要素生产率趋势。数据大于1.0表明工业产出大于投入;数据小于1.0表明产出小于投入。如果数据大于1.0 ,那么数字越大,产业利用资源效率越高。如果数据小于1.0 ,那么数字越小,国家经济资源浪费越大,对于资源利用也越偏离。图14·2清楚表明,中国工业在1970年代之前,效率都比较低下一一在大跃进之后, 极为低下。1970年代早期,要素生产才逐渐上升,同时伴随以快速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但是,紧接着,工业效率开始稳步下降,到1976年为止,除了1976年一年有所上升以外,其他年份逐年降低。

图14·2工业生产率趋势( 1953一1976 ) 324

多

要

素 1 ·4 生产率

一柯布

| 1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一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年份

来源: Kuanetal. ( 1988 , 583 )

这些明显的停滞迹象表明,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缺陷,而体系本应作为增长动力。中国经济机构,特别是工业的低效表现,消耗了本可以用于其他迫切用途的资源,此外成就也比较有限。一个损耗巨大的工业体系实际上从本可以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设施、住房、工资、消

费品生产当中吸走了大量资源。中国人民为了重工业体系做出了牺牲, 而重工业又因为政治原因而低效,使得中国处于落后状态。

中国根本无法承受经济停滞之重。1976年,也就是经过27年断断续续的社会主义发展之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63美元,基本上与处于贫困状态的印度持平( 164美元)。[[651]](#footnote-651)尽管高于孟加拉国( 140美元)这个当时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代表性国家,中国在1976年的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印度尼西亚( 286美元)。同时,中国远落后于韩国( 824美元) ,而韩国曾 325 在1950到1953年期间遭受战争重创, 1953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差无几。香港作为一个小港口, 1950年之前,根本无法与繁华的上海相媲美,但是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2, 849美元。处于战后经济上升中期的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5 , 111美元。如果将1976年的发展水平和后来中国的增长相比较,更能突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滞后。到1990年,在经过十年有限的市场改革之后,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14美元, 2000年为949美元, 2010年为4 ,433美元。

图14·3明显地展示了中国落后于其他相应经济体的程度,图中列出了不变价格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还运用了「购买力平价」调整不同国家间的价格,避免对比失真。中国一直以来希望追赶其他发达经济体,或者赶上其他更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这一希望越来越趋近于无法实现。中国的进步相较于台湾、韩国、日本、苏联、东欧国家的发展而言,基本上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差距逐渐增大。图14·4提供了另外的视角看待增长趋势。图中展现了这段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净变化值(并没有就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在这种计算方式下,中国的整体增长高于印度,但是落后于其他(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且远落后于东亚邻国。显然,中国已经被邻国远远甩在了后头,被困在低水平的发展水平之中,成为了该地区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

图14 · 3选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趋势( 1950一1976 )

12000

日本

人均国民生 苏联产总 6000 值

冖购买力平 东欧

价 8 一 韩国

中国/

0

1950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年份

来源: Maddison ( 2006 , 304 , 479 )

图14 ·4选定国家/地区经济扩张( 195 1976 )

6

人均国内生产 4 总值

比

3

率

冖一 976n950

一

1

0 印度中国苏联 东欧

来源: Maddison ( 2006 , 304, 479 )

326

韩国 厶糹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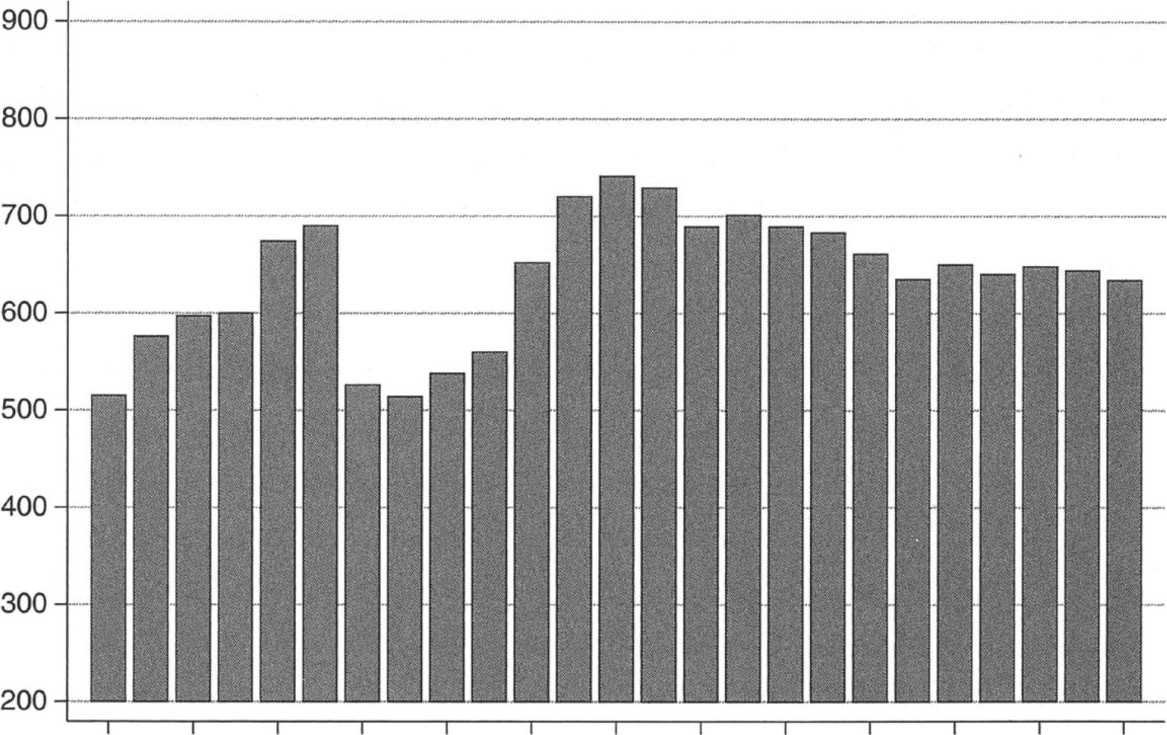
### 收入和生活水平

艰苦的生活状况和推迟物质繁荣是苏联发展模式的固有特点。对于重工业的过量投资成为快速增长的保障。但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破坏性的干预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政治运动,选择了一种曾在苏联早期历史中带来持续和活力发展的模式,但是毛泽东却将其变成了一种极为不稳定的模式,导致了中国工业发展仍处在较低水平之时经济就出现了停 327 滞。毛泽东努力打造一条让中国赶超苏联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显然失败了。毛泽东原封不动地保留苏联模式的核心,提高党内官员和政治积极分子的地位,摒弃那些接受过教育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这样的干预只是加剧了体系固有的低效问题。

尽管城镇居民相比于集体农户受到了很多优待,但是城镇居民还是要遭受工资停滞不涨,消费品、住房、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1963年最后一轮全国范围内工资调整之后,工人工资就不再增长。在那一轮调整当中,有40%的劳动人口在评级和薪酬方面都有所提升。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工人的工资都没有调整。与生产率挂钩的奖金在1966 年之后就在政治上被禁止了。单位试图弥补工资停滞不涨所带来的困难,找各类理由提供小笔资金补助或是提供物资和服务,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随着新一代工人加入到最低收入队伍当中,而且工资一直保持不变,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上逐步下降。图14 · 5展示了自1956年 328 工业国有化之后,城镇居民工资的下降趋势,而且在之后的20年当中继续下降。唯一一次例外就是大跃进期间工资的大幅下降,当时上百万新工人的工资都处于最低水平,之后随着经济遭受破坏,又被迫下岗。

1957年年均收入仅为700元, 1976年下降到630元出头。[[652]](#footnote-652)

消费品的供应在量和质上都无法满足需求,与之相匹配的是家庭预算逐渐紧缩。工业产品分配体系仍然在执行,而后十几年都没有被摒弃。按照周边市场经济体的标准,即便是在中国最为昂贵的商品也相对图14·5中国国营企业平均工资( 1952一1976 )

平均年

工资

一元

一

1952 1954 1956 1958 1960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年份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1983 , 490 )

比较简陋。这个时期任何一位城镇居民都能背诵一份家庭最需品清单: 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和特定品牌的自行车。缝纫机需要脚踏发动,其设计抄袭了1950年代苏联的一款缝纫机,而苏联的这款缝纫机又是仿制了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1920年代推出的款式。缝纫机是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每年分配下来的布料。收音机需要使用真空管。单速骑行的自行车则是城市交通的主要方式。

配给制度避免了人们为了主要工业产品进行排队,但是分配并没有解决物品短缺的问题。人们很难寻找到一些特定的产品:鞋子,合适尺码、风格的成衣,家具,厕纸,锋利的厨房刀具,加热时不会断裂的锅碗瓢盆。人们对于物品供应、质量和规格极为不满。国营商店市场时常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新鲜水果、蔬菜、鱼、猪肉的需求,即便有时候能够满足,物品也经常出现不新鲜、有撞痕或是气味难闻等问题。人们需要谨慎消费,由于合适规格和质量的消费品紧缺,产生了一种朋友间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并且与其他人构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前往中国的外国游人,本来期待看到一个免受泛滥的西方消费主义所影响的朴素平等社会,但是却发现熟人经常向他们求助,以他们的名义在向外国人出售商品的专营商店购买物品。人们格外关注购买稀缺消费品,且形成了一种互换好处的城市文化氛围,外国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329 城市生活水平下降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为住房。住房在1950年代就已经非常紧张、拥挤,在此后的20年当中,变得越来越拥挤。1953 年,房产的支出占到了基本建设的12 · 5 % ,之后逐年下降,而对于生产原料工业投资逐渐上升。在1966年后的十年当中,住房支出占到国家建设支出2 · 6%到6.5%之间。9于是新婚夫妇需要排长队等待住房,对于想要更大住房面积的年轻家庭来说,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同时,这也耽误了对现有建筑的维护修缮工作,这些建筑随着使用年限增加而逐渐破败。1956年,城镇居民人均拥有住房面积为4 · 3平方米;到了1976年这个数字降到了3.6平方米。根据官方标准, 50%的住房都被认定为「急需修缮」, 10%的住房属「危房」。 10

到了1970年代中期,四口之家住在单人间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一张桌子可以用于家庭吃饭,经过打扫之后就可以用于学习,晚上又可以作为床铺。缺少空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城市公寓还缺少基础设施。基本上所有公寓都没有独立卫生间和洗浴设施。卫生间在公寓走廊、庭院当中,有一些年代稍微久远的小区中,卫生间在街道上。一些公寓提供水龙头,但是大部分家庭都是使用公寓里的公共水槽。公寓里基本上也没有独立厨房;做饭区域基本需要共享。煤炉基本上是最为常见的室内供暖方式,同样煤球也是最常见的热源。通风不充分会导致居民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电风扇还比较少见;人们当时基本上不知道空



1. 同上,页179-186、194-205 
2. 国家统计局( 1983 , 339 )。

川 Walder , 194一196 ·

调为何物。除了高级干部,普通居民也都没有私人电话线。在城市小区当中,电话通常都是先打到居民所在居委会的办公室公用电话。在居委会工作的志愿者,通常都是些退休老年人,在接到电话后会把电话那头要找的人叫来。国际服务基本不存在,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人们仍然需要在市邮政局和电信局总部预约长途电话,并且还需要排队。

体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极为有限的城镇服务领域范围。在1950年代中期私营领域取消之前,中国城市挤满了小型家庭服务摊:食物摊和餐厅、招待所、茶馆、酒吧、各类小型零售店、理发 330 店、修理店、牙医诊所、磨刀店、中医铺、浴室等等。1960年代早期, 这些小店几乎都消失了。他们如果不是在针对私营经济的批斗中被关闭,就是被并入到集体或者国营服务企业当中。服务领域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国营饭店数量少、规模大但异常拥挤,并且以糟糕的质量和粗鲁的服务态度著称。单位尝试为员工补偿这些消失了的服务。这就是单位为员工提供餐饮服务、洗浴设施的主要原因。单位试图内化之前由私营领域提供的许多功能,但是它们不可能补全已经消失的所有服务,而那些不够幸运、只能为条件较差的单位工作的员工就无法享受这些服务。

### 平等和不平等

人们很容易就认为,这些受压抑的生活水平是强调平等胜于繁荣的经济体系所具备的典型特征。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不平等现象迅速攀升,而人们提到毛泽东时代,经常会想到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平等的国家。尽管现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远糟糕于 1976年,但是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平等印象只能说是部分正确。

衡量收入不平等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坚尼系数,从0到1 ,数字越高表明不平等现象越严重。按照这种计算方式, 1970年代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平等的国家为工业化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详见表14·2 )。一些国家坚尼系数仅为0· 20或是0·21 ,远低于1979年中国的0· 33。即便是苏联,一个在中国被毛泽东思想认定为资产阶级复辟的捍卫修正主义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却远优于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处于亚洲经济体的底端。中国不平等状况优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同时也优于印度,但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基本与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持平。台湾的收入分配明显比中国更为平等。相较于工业化市场经济,中国的排名也是如此。中国比美国和日本,还有加拿大、西德都要公平,但是与英国相差无几。

331 表14·2 1970年代收入不平等状况比较(坚尼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主义国家 | 坚尼系数亚洲国家/地区坚尼系数工业国家 坚尼系数 | | | | |
| 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苏联中国 | 0 ·20  0 ·21  021  0 ·21  0 ·22  025  0 ·27 0 ·33 | 中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 028  0 ·33  0 ·33  0 ·33  0 ·38  0·42  0 ·44 0 ·47 | 中国英国加拿大瑞典西德意大利美国日本 | 0·33  0·34  0·39  0· 39  0· 39  0·40 0·40 0·42 |

来源:社会主义和工业国家,数据来源于K。rnai ( 1992, 318 )和Jain ( 1975 , 41 , 107 ) ;亚洲国家数据来源于世界行( 1983 ,卷1 , 94 )和( 1975 , 108 )。中国的数据为1979年数据;所有其他国家数据为1970年代初期数年数据

对于在毛泽东时代末期来访中国城市的人来说,这些数据会有些令人惊讶。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展现出任何拥有显著财富的迹象。生活水平看起来整齐划一且非常朴素。衣服风格和交通方式(自行车)看起来高度一致。分配制度似乎有强大的平等效用。国有企业工人工资差距并不大。事实上这些印象并非那么具有误导性。中国城市收入分配是当时世界上最平等的。1981年城镇居民收入坚尼系数仅为0 · 16。在亚洲经济体当中, 1970年代巴基斯坦对应数据为0 · 36 ,马来西亚为0 · 52。11为什么



Ⅱ Riskin , 249 ·

中国城市当中收入分配如此平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收入分配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高,而跟亚洲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低呢?

答案就是:中国城镇和乡村之间、富裕地区和乡村贫困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出现这一现象基本上有两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发展模式目的在于从集体农场当中尽可能抽取所有粮食,降低价格,保 332 证乡村收入和主食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第二个理由事实上恶化了第一个理由当中出现的状况,因为户口制度和粮食分配制度对群众施加了极为严格的控制。农民不能迁居到城镇区域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即便是暂时性迁居也不被允许,而且农民也不能从最贫穷的农村区域转移到更为富裕的地区。[[653]](#footnote-653)其他亚洲城市出现更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因为没有土地的穷人迁居到了城镇贫民窟当中,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户口制度和粮食分配制度将贫穷的居民赶出城市,使他们被永远地钉在偏远而又赤贫的农村地区。在市场经济当中,劳动力会转移到城市或者其他经济发展更强大的区域,随着农村穷人迁居到城市,会使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收入水平变得更加平均。这也意味着,贫穷在城市更为凸显,因为穷人会聚集在贫民窟,这问题困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也就是像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平等和贫困状况比中国更加糟糕。这样的印象并非不正确,但是这仅局限于城市。这反映了中国户口制度的有效性,它成功地将穷人困在了偏远的农村地区,而并没有体现中国整体经济平等的结构,也没有表现出自身消除贫困的优越能力。

### 农村贫困

消除赤贫失败可能是1970年代末期最令人惊讶的事实,也反映了

毛主义最致命的失败之一。人们可能为认为,新中国极为出色的组织能力可能为农村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保证,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一个在大跃进时期动员成千上百万群众彻夜工作、让百万红卫兵和造反者攻击党领导层中修正主义者的政权,肯定能够保证最贫穷的群众有基本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毛泽东时代末期,大部分农村居民仍然绝望地生活在贫穷当中。

333 在1970年代末展开的调查呈现了一幅农村生活水平的朴素图景。中国农村当中五分之一的人口饮食摄入低于中国政府当时制定的每日卡路里摄入标准。中国政府的温饱标准事实上还低于国际标准。1976年平均每日总摄入跟亚洲地区贫困国家平均水平相近 高于孟加拉国,比印度高一些,但低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654]](#footnote-654)集体农场农民摄入的食物平均质量极低。集体农业强迫农民摄入谷物类农产品,导致菜油、肉类和其他蛋白质类摄入逐渐下降。按照国际标准,主食提供的卡路里在中国农民的饮食当中占比较大。后毛泽东时代政府对农村居民生活标准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在1978年, 30%的农村居民,也就是2.37亿人,收入低于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而中国政府制定的标准又远低于国际机构制定的标准。[[655]](#footnote-655)难以避免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冗长、动荡的挣扎年代,它所带来的结果是远非革命性的。台湾、日本、韩国在 1950年代所采用的非革命式土地改革为繁荣的农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农村市场经济普遍存在于小农基础上,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飞速发展一一一它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进行血腥的暴力土地改革。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集体农业被废除,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失败事实上是他自己造成的。

### 毛主义的人力成本

这些差强人意的成就都被巨大的人力成本所抵销。最高昂的人力成本就是3 ,000万人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当中饿死。近来研究显示,事实上这个数字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反右」运动或是因为「私藏」粮食、拒绝在饥荒中提供粮食,而被处决或是打死的。大跃进所导致的巨 334 大死亡人数只能与中国漫长历史当中更为触目惊心的片段和比较。1937 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亡人数估计达到1 ,200万,这数字当中包括200万因战而死和400万在1943年河南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656]](#footnote-656)[[657]](#footnote-657)现代历史上能够与中国大跃进中的饥荒相提并论的只有1932到 1933年期间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因为强制集体化而导致的饥荒,这段时间估计的死亡人数在570万到850万之间,在苏联人口当中的占比与中国饥荒死亡人数亻占比相当 

大跃进当中的死亡人数远超1949年以后中国故意发起的各类杀戮行为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土改和1950年代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的处决人数,后两者估计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同时,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也让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冲突和政治运动而死亡的人数相形见绌。根据一套几乎完整收齐的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地方县志数据,保守估计1966到1971年的死亡人数约为110万到160万左右。这些数据还表明,四分之三的人死于革命委员会和军队的各种行动,特别是1968年的前几个月当中,有一半的人数,也就是至少60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数字是造反派派系武斗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三倍。[[658]](#footnote-658)许多在武斗中死亡的人都是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错误的指令,将军事武器分配到群众派系当中去。必须认识到的是,因毛泽东而起的全国动乱爆发后,又展开了恢复秩序的严苛的运动,而这一恢复秩序的运动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其他种类的受害人数远超动乱本身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受害人数。如同大跃进一样,这些生命为了一个错误而又缺乏长远价值的事业而牺牲了。 [[659]](#footnote-659)

### 毛主义的局限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毛泽东都被誉为大胆而又 335 标新立异的思想家,拓展了马克思列宁思想,脱离了苏联教条,为解决共产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转为精英统治的机械官僚独裁问题而提出了非比寻常的解决方案。掌权时候的毛泽东肯定可以被称为大胆,甚至是鲁莽的。1960年代他发动的打破当权派的运动肯定是对于苏联教条和实践的一种巨大脱离,这似乎表明他思想的灵活性与创新性,将他排除在了苏联社会主义主流之外。

但是,如果将毛泽东的行为和产生的后果视为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人所带来的产物,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相反,这样一种说法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狭隘限制,反映了毛泽东的死板与教条主义,执拗于守旧和落后思想,不愿意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学习和适应变化。他的核心观点受他1930年代在延安时所吸收的一系列简单观点所影响。最为重要的观点可以在斯大林主编的共产党历史书《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找到,此书使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为清晰的观点。这些教条与毛泽东1920年代所拥有的早期观点相契合,这些观点包括在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中有必要进行暴力斗争,需要建立统一

而又拥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来领导群众。这些观点在内战这样残酷的考验下得以加强, 1940年代末动员全民在对抗国民党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场似乎不可能实现的胜利。

毛泽东一生都不愿偏离这些想法,而他在生前最后20年的行为事实上是抗争那些希望远离毛泽东核心思想的海内外共产主义人士的。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过时,而且带来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反动分子,在斯大林教条过时后依然坚持这些观点。

许多对毛时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发展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围绕毛泽东在一些关键转折点时做出的决定和干预,而此书也不例外。但是,当我们考虑毛泽东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就已形成的核心观点之际,我们指出事件发展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所推动的。共产党后来并没有修改共产党所设立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1949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事实上 336 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修改之前的这些决定,还因为他日渐感觉其他领导人有可能修改这些决定。

是什么样的核心思想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产生了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呢?第一个思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毛泽东认为只有暴力冲突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解放受压迫者。这些想法在1920年代就已经在毛泽东脑海中形成,并且在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有着全面清晰的表述。在这些文章当中,年轻的毛泽东坚持认为造反运动中的暴力事件是社会变革当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绝对不是糟糕的「多余」之物。对于破旧立新而言,有必要对精英使用暴力、进行羞辱。毛泽东不仅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真正的社会变革当中需要暴力,而且批评了那些对农民运动中的暴力事件有所畏惧的人。在他看来,他们丧失了加入革命的权利,成为了反动分子。

这些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后期的历史当中有所体现,包括在农村土改当中党政干部发动的批斗运动, 1950年代在中国城市巩固权力之际发动的批斗运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于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羞辱打骂。这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通过群众运动反抗固化的精英阶层。提到这次运动,就不可能不提到这一思想基石。毛泽东曾公开忽视那些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因为红卫兵运动而致死的人,他对于 1967年夏天的武斗死亡人数也毫不在意。对于那些对红卫兵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的官员,毛泽东也非常不屑,认为这反映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这些迹象都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呼官员支持红卫兵,这是对他们革命奋斗精神的考验,正如1927年对于农民运动的看法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证明他们到底是革命的共产党人还是反动的国民党人。毛泽东从革命生涯开始到去世前的一致态度就是,阶级斗争导致的暴力是不可 337 避免的,对于实现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必要的,人们不能因为不可避免的连带伤害而退缩。

第二个观点则是社会主义当中也存在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纵深推进,阶级斗争也会变得愈发残酷;对于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不同观点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源于苏联那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这是斯大林思想的核心,在斯大林晚年选择忽视这一观点,后继者全面否定这一观点、将其视为错误而具破坏性的观点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这启发了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寻找党内叛徒。这就是毛泽东清洗官员的正当核心理由,那些官员对于社会主义「草率推进」持批判态度,或者说他们有胆量挑战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这塑造了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理解: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国民党残余分子所掌控,剥削被压迫阶级,破坏毛泽东的伟大革命。他认为,只有阶级敌人才会以非人类的残酷方式对待饥饿的农民。这就是推动四清运动背后所蕴含的观点,四清运动是一场既不稳定也缺乏一致性的运动,而刘少奇一直积极推动,直至运动终止。苏联拒绝接受这一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非这一核心观点,也就难以想象会发生文化大革命。[[660]](#footnote-660)

第三个观点,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等级分明、有组织的共产党,党内纪律严明、思想行为统一。此外,还形成了对党内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一种崇拜,认为他们都是正确的,都不会犯错。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所谴责的「领导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有助于在党内形成纪律性和信仰,也正是此因素帮助共产党成功击败国民党,改造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和核心要义就是最高领导人本身有能力决定正确道路,决定什么样的政策是革命性的或是反动的。因为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曙光逐渐显现而变得更加严酷,最高领导人必须保持警醒状态,防止在领导层和全党范围内出现资 338 产阶级倾向。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认为对一位领导人树立起铁一般的信仰,有助于在作为斗争力量的共产党内维持统一和纪律一-一•否则就会陷入党派斗争混乱。毛泽东思想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革命党的这些特征必须要长时间保持,时间必须远长于他人认为有必要或者是合适的时间。革命不会随着权力的获得而停止,阶级敌人消灭、所有制改革之后也不会消失,革命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就要求领导层也保持革命状态。

第四个观点, 1930年代苏联在工农产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本身,这种形式具体而言就是拒绝私营企业、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此外,这种经济模式可以、也必须被快速建立,从上到下进行革命,方式如同1930年代斯大林创立这种模式一样。尽管斯大林本人曾建议中国采取一条更为平衡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在斯大林晚年时期,也开始承认「客观经济规律」适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原有观点。毛泽东始终拒绝重新考虑政治动员在推动经济变革和发展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拒绝承认现代科学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专业管理人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甚至拒绝承认,苏联模式那些广为人知的低效问题可以被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所缓解,也就是采用价格机制、竞争,为了提高效率,引入利润计算器制。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绝对不能考虑的,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就会被资本主义所替代。毛泽东断言,赞同这些观点的人代表了国内外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想要推翻社会主义。

毛泽东拒绝在这些观点上改变立场,除他以外的社会主义世界一直在改变。苏联教条主义的缓和开始于二战之后,并于1953年后速度有 339 所加快。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演讲之时,毛泽东的许多核心观点都公开受到攻击。新的教条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核心 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推动力,但是一旦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就消失了,任务就变为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无产阶级专政」和大规模镇压必须有所缓解。社会主义当中并不存在阶级斗争一一一这被全面谴责为斯大林最为错误的创新论点,缺乏马克思主义依据支撑。吹捧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时代变得极端,这事实上令人扼腕,这是一种荒谬的幻想,只用于掩护斯大林疯狂处决假想敌和真正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要义,这些都脱离并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是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一种犯罪。没有一位「最高领导人」应当被允许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哪些政策是革命性的,哪些政策是反动的。

毛泽东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些观点。他拒绝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应当缓慢而渐进,经济发展才能稳固平衡,大规模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他拒绝「过分」诋毁斯大林。1956年和1957年这短暂的两年间,他曾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为后斯大林时代的解放者,但是双百运动对他有所冲击之后,他又重新回到反右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道路,在大跃进当中为发展经济展开动员运动。在大跃进灾难之后,毛泽东又加深了自己对于阶级斗争这一斯大林核心要义的认识,精心策划反党计划和群众运动,打破官僚政党体系,代之以新的「革命」机构。毛泽东的行为看起来非常具有创新性,且属非正统的革命观点,但是他背后的核心动机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被认为是保守,甚至反动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人这么认为。

毛泽东经常被认为格外关注共产主义政权的官僚机制,这样的机制会逐渐出现自我加持的精英,为自己谋取特权,产生新形式的阶级压迫。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当中毛泽东的作为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不仅试图清洗掉那些对毛泽东理念缺乏忠诚度的官员,同时动员所有人打破党政机构、建立起新体制。

340 但是,这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非常突出的局限性。他拒绝考虑一个截然不同、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判断:问题深深植根于官僚社会主义当

中一-一所有生产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国家官僚手中,而官员又由一党执政的共产党任命。毛泽东需要解决官僚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问题,还要应对特权阶层这个由晋升体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晋升体系又建立在政治忠诚度之上。毛泽东拒绝反思苏联经济模式,特别是拒绝让市场竞争、物质奖励、计算利润发挥作用,他特别抗拒反思斯大林的观点,例如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正确观点,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例如对于实际问题的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对于苏联转向「资产阶级」这一判断事实上非常奇怪一•一苏联领导人因为依赖官僚专家、计件率和货币激励,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走向资产主义。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苏联都不具备:苏联不存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市场竞争,没有使用价格机制管控供给和需求。苏联拥有的官僚体系与中国1950年代向其学习的体系仍然保持一致,只是在运行层面上做了些许调整。

尽管毛泽东被誉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是一位反对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实上并不反对官僚阶级 他只是更倾向另一种官僚体系。毛泽东拒绝将权力让渡给拥有专业知识和接受过科学培训的官员。他希望党政官僚绝对服从于他和他的思想,官员按照政治忠诚度进行选拔和晋升。毛泽东所倾向的官僚体系通过效忠意识形态而实现,或者换言之,就是通过教条式政党掌控。当政党对于权力和特权的垄断不可避免地固化了占压迫地位的官僚阶层,毛泽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推倒重来,用对党忠诚并且目的更加纯粹的新人代替旧制。但是,这又重蹈了导致问题发生的原有状况:一个由对党忠诚的人所组成的阶层,对 341 物产、权力、工作分配和特权分配进行垄断。此外,通过以叛徒和阶级阴谋的罪名威胁对党忠诚的代理人,毛泽东迫使他们必须在服从命令的压力下反复推行破坏性的激进运动。这就是大跃进灾难的核心,党政干部下令大量提高产量,对取得的成就进行造假,从挨饿的村民当中夺取粮食一一一所有这些都受到反右运动的威胁。这也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核心,毛泽东在基层的新代理人积极响应清理阶级敌人的指令,不能也不愿意约东逐渐失控的迫害行为。

毛泽东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官僚阶级的顽固。他所认为的问题是体系不可避免的产物,而这个体系正是他所坚持的唯一体系,不可动摇,只能通过回到初始状态,重新焕发活力。毛泽东的判断导致中国陷入冲突和毁灭的循环之中,逐渐被困在落后的泥潭里。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由一位拥有极其狭隘、落后的观点且武断的领导人所导致的悲剧性失败。在这位逐渐年老的领导人去世之后,中国领导人才摆脱了毛泽东教条思想的循环逻辑考虑采取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组织和经济替代方案。考虑到十年后苏联帝国垮台,这似乎是一个适时的决定。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处在危机之中的中国,一个并不稳定的国家,社会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在那些曾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努力保留文化大革命遗产的官员被逮捕之后,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和其背后的核心观点,都要被摈弃。人民显然希望社会和政治更加稳定,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许多方面,毛泽东去世后所留下的废墟给予后继者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苏联处继承下来的制度已经被破坏,亟待 342 重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毛泽东无意间给予了继任者做选择的机会,跳出毛泽东思想的局限和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观念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从某些方面而言回到了起点,重新寻找能够踏上繁荣和国家强盛的道路。在1940年代末,苏联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选择,而这个体系一直到1960年代运转仍然良好。但是自1940年代末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最终面临了根本性选择。在 1970年代后期,苏联已经不再是那个30年前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增长率自此之后有所放缓,进入了停滞的状态,最终解体。匈牙利通过有限的市场改革、向小型私营企业妥协,成为了苏联集团当中的一片繁荣绿洲。而波兰未经改革,面临财政难题,导致价格飞涨,引发了团结工会运动,政权逐渐走向崩溃。

令人羡慕的增长模式就摆在中国家门口:日本的增长最让人惊喜, 除此之外还有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与1940年代情形不同,因为市场资本主义显然不会崩塌,同时也不会再经历1930年代的那般大萧条。在这些日益繁荣的区域当中,只有日本是宪法上规定的多党轮流执政国家,但即便如此,日本数十年来一直是一党执政。新加坡的一党执政更为严苛。韩国和台湾属领导人独裁,香港属英国掌控的殖民地。但是所有这些区域都融入了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指导私营经济活动,依赖出口增长实现繁荣。因此,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如果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但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就有可能加速中国发展。

在1978年底邓小平重回权力中心之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就已经开始改革。违20、」冃匕毛泽东理念的新政策执行缓慢,但是在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新领导层坚定支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他们与 343 科技专家和谐相处;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科学基础设施,重建大学体制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导层通过与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教育和研究交流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平;他们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送到国外;他们放弃了集体农业,支持家庭联产承包制;他们撤销了对小型私营企业和家庭企业的限制,特别是在服务领域;他们放松了对迁居的限制,邀请外国专家提供指导;向海外借贷,接受国际援助;他们开始试验价格和利润机制, 试图改革效率极为低下的国营工业领域;在「经济特区」,他们开始尝试接受外来私营企业投资。

也许人们会忍不住说:「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仍然是一片散沙;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极度分裂状态。年轻人被异化,许多人拒绝接受毛泽东时代,同时也拒绝共产党本身, 共产党遭受了巨大的信任危机。2009年,中国共产党庆祝了改革开放 30周年。但是人们常常忘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1979 到1989年,中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领导层就政治和经济改革程度和速



20 Teiwes and Sun (2011 ; 2013) ·

度产生了巨大分歧。此外,还经常出现呼吁民主的群众运动: 1978到 1979年之间出现的「民主墙」, 1980年为地方人大争取民主选举的学生运动, 1986年底全国范围内呼吁政改和民主的学生运动,还有1989年春天的学生民主运动,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动摇了共产党政权的执政基础,导致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对运动积极分子和旁观者的杀戮, 戒严几乎持续了一整年。[[661]](#footnote-661)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时代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共产党不得不经受1989年的政治危机,因为那一年东欧剧变,苏联开始解体。

从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毛泽东如今成为了一位和善的文化偶像。他的形象被印在中国的人民币之上,代替了毛泽东时代纸币上的工人、农民、拖拉机和压道机。他的脸庞出现在毛泽 344 东个人崇拜时期所生产的各类徽章、海报和人工产品上,数量以成百万计,现在这些东西在各地被推销给游客。文化大革命主题餐厅以红卫兵和「忠于毛泽东」时代的歌曲和舞蹈讨好顾客。由于不满于中国在转向市场国有资本主义道路上出现的腐败和不平等现象,「新左派」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毛泽东时代的积极成果;普通老百姓也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 为那是一个更简单、更平等、更少欲望和更少腐败的时代。在庆祝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共产党高层强调了毛泽东带来的积极成就,试图强化党的合法性,欢庆党的历史,强调国家荣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这些观点,与1970年代末的流行观点不同,因为1970年代末, 中国刚开始从毛的错误统治所带来的破坏中逐渐恢复。而现如今,对毛的评价却建立在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大范围遗忘之上。



Aird, John S. 1982.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267—297.

Andreas, Joel. 2006. "Institutionalized Rebellion: Gover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no. 55: 1-28.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 '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pplebaum, Anne. 2012.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Eastern Europe, 1944—1956. New York: Doubleday.

Apter, David E. , and Tony Saich. 1994.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h, Robert. 2006. "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88: 959—998. Ashton, Basil,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61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613—645.

Averill, Stephen C. 1995.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Pp. 79—115,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Armonk: M.E. Sharpe.

2006.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 '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Banister, Judith. 1984. "An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241—271.

1987. China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an, Paul A. , and Paul M. Sweezy.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ing, Arnulf. 1972.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June 17, 1953, tr. Gerald On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arkan, Lenore. 1990. "Patterns of Power: Forty Years of Elite Politics in a Chinese County." Pp. 191—215,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nett, A. Doak. 196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Aspec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Bureaucracy." China Quarterly, no. 28: 8—39.

Baum, Richard. 1969. "China: Year of the Mangoes." Asian Survey 9: 1—17.

1994.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ylis, Thomas A. 1974.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East German Elite: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ur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ton, Gregor. 1975.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 (1935—1938)." China Quarterly, no. 61: 61—94.

1992.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ton, Gregor, and Alan Hunter, eds. 1995.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 Is Road to Democracy, Yan '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liner, Joseph S. 1957.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nstein, Thomas P. 1967.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30 and 1955—56: A 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 1—47.

1968. "Problems of Village Leadership after Land Reform." China Quarterly, no. 36: 1-22.

1969. "Cadre and Peasant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Insecurity and

Deprivation: 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 Pp. 365—399, in

1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a.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b. "Urban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Problems of Adaptation and Remedies." China Quarterly, no. 69: 75—108.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 339—377.

2006.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A Study in Wilfulness." China Quarterly, no. 186: 421—445.

Bian, Yanjie, Xiaoling Shu, and John R. Logan. 2001.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 79: 805—841.

Brandt, Conrad. 1958.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Archie.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Ecco.

Brown, Jeremy. 2007. "From Resisting Communists to Resisting America: Civil War and Korean War in Southwest China, 1950—51." Pp. 105—12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 "Great Leap City: Surviving the Famine in Tianjin." Pp. 226—250, in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ed. Kimberl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 '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s Era of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ce, Gary. 2003. Resistance with the People: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in East Germany, 1945—195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Burns, John. "Rural Guangdong's 'Second Economy,' 1962—1974." China Quarterly, no. 88: 629-643.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4.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 '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n, Anita,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China

Quarterly, no. 83: 397—446.

eds. 1985.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E. Sharpe.

Chau, Adam Yuet. 2010. "Mao's Travelling Mangoes: Food as Relic in Revolutionary China." Past and Present 206: 256-275.

2013. "Political Awakening Through the Magical Fruit: The Film Song of the Mango." Pp. 78—95, in Mao's Golden Mangoe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Alfreda Murck.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and Verlag Scheidegger & Spiess.

Cheek, Timothy. 1984. "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 Wang Shiwei and Mao Zedong's

Yan 'an Talks in the First CPC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1: 25—58.

1997.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en, Jian.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2007. "The Chinese Communist 'Liberation' of Tibet, 1949—51." Pp. 130—15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956 a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and Cold War History." Modern China 40.

Chen, Theodore H.E. 1960.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h'en, Jerome. 1986. "Th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Pp. 168—22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no. 139: 644—668.

1997.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1

Systems." Pp. 23—50,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M.E. Sharpe.

Ch'i, Hsi-sheng. 1976.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ü, T'ung-tsu. 1962.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 '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ale, Ansley J. 1981.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 85—97.

1984.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39.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Short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nquest, Robert. 1986.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ll, Elisabeth. 1984. "Marriage Choice and Status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75—197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i, Qing. 1994. Wang Shiwei and "Wild Lilies ":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1944, tr. Nancy Liu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Armonk: M.E. Sharpe.

Davies, R. W. ,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2004.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avis-Friedmann, Deborah. 1991.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xp.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ruce J. 1993. "The Lessons of Defeat: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on Taiwan, 1950—52." China Quarterly, no. 133: 56—84.

Dikötter, Frank. 2003.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Camps in Shandong Province, 1942-1950." China Quarterly, no. 175: 803-817.

2010. Mao '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 '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 London: Bloomsbury.

2013. The Tragedy of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 57. London: Bloomsbury.

Dillon, Nara. 2007. "New Democracy and the Demise of Private Charity in Shanghai."

Pp. 80—102,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ittmer, Lowell. 1992.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2010.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China Quarterly, no. 203: 675-692.

201 la.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China Journal, no. 65: 1—25.

2011b.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Asian Studies 70: 425—447.

2012a.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China Journal, no. 68: 1—31.

2012b.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China Quarterly, no. 212: 893-918.

2014. "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g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China Quarterly, in press.

Doolin, Dennis J. , tr. 1964. Communist China: The Politics of Student Opposit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Drea, Edward J., and Hans van de Ven. 2011.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 27—47,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 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reyer, Edward L. 1995.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don: Longman.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lites and th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Villages of North China, 1900—1949." Pp. 261—28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nayevskaya, Raya. 1944. "A New Revision of Marxia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531-537.

Eastman, Lloyd E. 1981. "Who Lost China? Chiang Kai-shek Testifies." China

|

Quarterly, no. 88: 658—668.

1984.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kiert, Grzegorz. 1996. 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 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herick, Joseph W.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tzpatrick, Sheila. 1978.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Pp. 8—40,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ed. Sheila Fitzpatric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scribing Clas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n Soviet Russia." Journal ofModern History 65: 745—770.

2005. Tear Off the Masks!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liv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ster, Keith. 1986. "The 1976 Ch'ing-ming Incident in Hangchow." Issues and Studies 22, no. 4: 13-33.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 1976. Armonk: M.E. Sharpe.

1992. "Spontaneous and Institutional Rebell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Weng Sen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39-75.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1991.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ung, K. K. , ed. 1982.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Sun Yefang 's Critique ofSocialist Economics. Armonk: M.E. Sharpe.

Galbiati, Fernando. 1985. P 'eng P '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o, James Z. 2004.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The Call of the Oases: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Xinjiang, 1949

53." Pp. 184—204,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Press.

Gardner, John. 1969. "The Wii-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 Pp. 477—539,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Garside, Roger. 1981.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Gasster, Michael. 1980.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Pp. 463—534,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l: Late Ch 'ing, 1800—1911,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trell, Peter, and Mark Harrison. 1993. "The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es in Two World Wars: A Comparative View."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46: 425-452.

Goldman, Merle. 1967.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he Uniqu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of 1961—62." China Quarterly, no. 37: 54—83.

1975. "China's Anti-Confucian Campaign, 1973—74." China Quarterly, no. 63: 435-462.

1981. China '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man, René. 1962.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t Peking University: May—June 1957." China Quarterly, no. 12: 138-153.

Goldstein, Melvyn C. 1989. 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egory, Paul R.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Stalinism: 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Secret Arch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illermaz, Jacques. 1972.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tr. Anne Desten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Halpern, Nina P. 1993. "Creating Socialist Economies: Stalin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mpact of Ideas." Pp. 87—110, in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ed.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msen, Peter. 2013.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Casemate.

Heilmann, Sebastian. 1993.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China

Information 8, no. 3: 1—19.

|

1994. "The Suppression of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and the Persecu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1976." Issues and Studies 30, no. 1: 37—64.

1996. Turning Away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Grass-Roots Activism in the Mid-Seventies. 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Henderson, Gail. 1993. "Public Health in China." Pp. 103—123, in China Briefing, 1992, ed. William A. Josep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Henderson, Gail E. , and Myron S. Cohen. 1984.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enriot, Christian. 1995. '"La Fermeture': 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1949-58." China Quarterly, no. 142: 467-486.

Hershatter, Gail. 1986.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nton, William.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Hoffmann, Charles. 1974.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ofheinz, Roy, Jr. 1969.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45." Pp. 3—77,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 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oper, Beverley. 1986. China Stands Up: Ending the Western Presence, 1948—1950. Boston: Allen & Unwin.

Hough, Jerry F. 1977. "Party 'Satur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Pp. 117—133, i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ed.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and Nancy Whittier He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enemann, Ralph W. 1966. "Urban Ratio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6: 44—57.

Hung, Chang-tai. 2010. "The Anti-Unity Sect Campaign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02: 400—420.

Isaacs, Harold R. 1961.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nd 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Press.

Jain, Shail. 1975.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 Compilation of Dat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in, Qiu. 1999.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A. Ross. 197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 The Yugoslav Case, 1945—1953. Cambridge: MIT Press.

Johnson, Chalmers A.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ogence of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ravsky, David. 1970. The Lysenko Affai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aple, Deborah A. 1994.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u, Michael Y.M. 1975. The Lin Piao Affair: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Kecskemeti, Paul. 1961. The Unexpected Revolution: Social Forces in the Hungarian Upris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hrushchev, Nikita S. 1962.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Special Report to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February 24—25, 1956."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At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CrimesOfTheStali nEraSpecialReportToThe20th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 accessed June 10, 2014.

Kirby, William C. 1984.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no. 188: 870—890.

Klochko, Mikhail A. 1964.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tr. Andrew MacAndrew. New York: Praeger.

Knight, Amy. 1993. Beria, Stalin First Lieutena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ånos.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tr. John Kna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47: 801—819.

1980. Economics of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mer, Mark. 1998.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1956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 Reassessments and New Findings: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 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 163—214.

1999.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no. 1: 3—55.

Kraus, Richard Curt. 1981.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uan, Chen, Hongchang Wang, Yuxin Zheng, Gary H. Jefferson, and Thomas G. Rawski. 1988.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1953—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 570—591.

Kuhn, Philip A. 1978.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 264-31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 'ing, 1800—1911,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2n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ng, James Kai-sing, and Justin Yifu Lin. 2003.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 51—73. Lang, Olga. 1946.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nge, Oskar, and Fred M. Taylor. 1964.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Lardy, Nicholas R. 1987a.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1st Five-year Plan." Pp. 144—184,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art l: The Emergence of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b.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Pp. 360-397,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l: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rdy, Nicholas R. ,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1983. Chen Yun Strategy for

China [s Development: A Non-Maoist Alternative, tr. Mao Tong and Du Anxia. Armonk: M. E. Sharpe.

Lee, Hong Yung. 1991.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of California Press.

Leese, Daniel. 2011.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Revising Political Verdicts in Post-Mao China: The Case of Beijing Fengtai District."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e, Steven I. 1987.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win, Moshe. 1974.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From Bukharin to the Modern Reform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wis, John Wilson. 1963.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i, Bobai, and Andrew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106: 1371—1408.

Li, Huaiyin. 2006. "The First Encounter: Peasant Resistance to State Control of Grain in East China in the Mid-1950s." China Quarterly, no. 185: 145—162.

2007. "Confrontation and Concili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State: Peasant Resistance to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50s." liventiethCentury China 33, no. 2: 73-99.

2009.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 200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Hua-Yu. 2006.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Instilling Stalinism in Chinese Party Members: Absorbing Stalin 's Short Course in the 1950s." Pp. 107—130, in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ed. Thomas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Lanham: Lexington Books.

Li, Wei, and Dennis Tao Yang. 2005.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113: 840—877.

Liberman, E. G. 1971.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Production.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Lieberthal, Kenneth. 1973. "The Suppression of Secret Societies in Post-Liberation

Tientsin." China Quarterly, no. 54: 242—266.

1980.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 Pp. 293—359,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l: The Emergence of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Cyril Chihren. 1981. "The Reinstatement of Economics in China Today." China Quarterly, no. 85: 1—48.

Liu, Jianhui, and Hongxu Wang. 2006. "The Origins of the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of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Summer 1955." China Quarterly, no. 187: 724—731.

Liu, Shaoqi. 1939/1984.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Pp. 107—168, in Selected Works ofLiu Shaoqi, vol. l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Louie, Genny, and Kam Louie. 1981. "The Role of Nanjing University in the Nanjing Incident." China Quarterly, no. 86: 332—348.

Lüthi, Lorenz M. 2008.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1960.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Pp. 3—18,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1989.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 '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hcewicz, Pawel. 2009. Rebellious Satellite: Poland, 1956, tr. Maya Latynski.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Kinnon, Stephen. 2011. "The 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 181—206,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l: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Publishing.

Mao, Zedong. 1926a. "An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among the Chinese Peasantr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Revolution." (January), pp. 303—309, in Schram (1994).

1926b.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Resolution of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Guomindang." (January 19), pp. 358 360, in Schram (1994).

1926c. "Some Points for Attention in Commemorating the Paris Commune." (March 18), pp. 365—368, in Schram (1994).

1926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 Problem." (September 1), pp. 387—392, in Schram (1994).

1926e. "Resolution on the Problem of Mintuan." (October 28), pp. 409—410, in Schram (1994).

1927a.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February 16), pp. 425—428, in Schram (1994). 1927b. "Report on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February), pp. 429—464, in Schram (1994).

1957.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peaking Notes)." (February 27), pp. 131—189, in 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1989).

1967, 1969/1977. A Critique ofSoviet Economics, tr. Moss Rober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rks, Robert. 1984.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rtin, Brian G. 1996. The Shanghai Green Gang: 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dvedev, Zhores A. 1969. The Rise and Fall of T D. Lysenko, tr. 1. Michael Ler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enkovitch, Deborah D. 1971. Plan and Market in Yugoslav Economic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tter, Rana. 2013.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11,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in Harcourt.

Moody, Peter R. 1977. Opposition and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Murck, Alfreda, ed. 2013. Mao's Golden Mangoe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ürich: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and Verlag Scheidegger & Spiess.

Nagy, Imre. 1957. On Communism, In Defense ofthe New Course. New York: Praeger.

Nathan, Andrew J. 1976.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28." Pp. 256—28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 1949, Part l,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eh, Hualing, ed. 198 la. 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ume I: Criticism and Polem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b. 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Volume 11: Poetry and Fi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i, Jean C.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lfare Regime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Oksenberg, Michel. 1968.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Ladder of Success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36: 61-92.

1976. "The Exit Pattern From Chinese Poli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67: 501-518.

Ostermann, Christian F., ed. 2001.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The Cold Wa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aige, Jeffer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Pantsov, Alexander V. , with Steven I. Levine. 2012.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eng, Xizhe. 1987.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639—670.

Pepper, Suzanne. 1999.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2nd 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erry, 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no. 137: 1—27.

2007. "Masters of the Country?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Pp. 59—79,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ry, Elizabeth J. ,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latt, Stephen R. 2012.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Riskin, Carl. 1987. China '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 Stanley. 1982.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Guangzhou'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no. 101: 1—31.

Rossabi, Morris. 2005.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we, William T. 2007.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ina' '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sinow, Dennison. 1977. The Yugoslav Experiment, 1948—19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ich, Tony, ed. 1996.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M.E. Sharpe.

Schoenhals, Michael. 1985. "Elite Information in China." Problems of Communism

34, no. 5: 65-71.

1986. "Origi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Unrevised Text of Mao Zedong's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99—112.

1996.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79." China Quarterly, no. 145: 87-111.

2005.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 Mao's Culpabi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Great Chaos' of 1967." China Quarterly, no. 182: 277—300.

2008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6." Pp. 67-87, i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Under Communist Regimes: Research Review, ed. Klas-Göran Karlsson and Michael Schoenhals. Stockholm: Forum for Living History.

2008b. "Out-Sourcing the Inquisition: 'Mass Dictatorship'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9, no. l : 3—19.

2013.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ram, Stuart, ed. 1994.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2: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December 1920—June 1927.

Armonk: M.E. Sharpe.

ed. 1995.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3: From the Jinggangsha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angxi Soviets, July 1927— December 1930. Armonk: M.E. Sharpe.

Schwartz, Benjamin I. 1951.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bestyen, Victor. 2006.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Selden, Mark. 1971.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rvice, Robert. 2004.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ybolt, Peter J. 1986. "Terror and Conformity: 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s,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1942—1943. " Modern China 12: 39—73.

Sheng, Michael M. 2006. "Mao Zedong and the Three-Anti Campaign (November 1951 to April 1952):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2, no. 1: 56-80.

Shirk, Susan L. 1982.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ue, Vivienne. 1980.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k, Ota. 1966. Econom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Czechoslovakia, 2nd rev. ed., tr. M.I. Parker. Prague: Orbis.

1967.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2. Czechoslovakia: The Bureaucratic Economy.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Silbey, David J. 2012.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Siu, Helen F. 1989.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 Bennis Wai-yip. 2002. "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 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s." China Quarterly, no. 171: 682-703.

Spence, Jonathan D. 1996.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Pp. 142—193, in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ed. James G. March. Chicago: Rand-McNally.

Strauss, Julia C. 2002.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80—105.

2006. "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China Quarterly, no. 188: 891—912.

Su, Yang. 2011.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ubman, William. 2003.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Norton.

Taylor, George E. 1940.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aylor, Jay. 2011.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new ed.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eiwes, Frederick C. 1976. "The Origins of Rectification: Inner-Party Purges and Education Before Liberation." China Quarterly, no. 65: 15—53.

Teiwes, Frederick C. , and Warren Sun, eds. 1993.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ization in China: Mao, Deng Zihui, and the "High Tide" of 1955. Armonk: M.E. Sharpe.

1995.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Pp. 339—387,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Armonk: M.E. Sharpe.

1996.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London: Hurst.

1997.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Pp. 151—190,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of China, ed.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Armonk: M.E. Sharpe.

1999.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M.E. Sharpe.

2004. "The First Tiananmen Incident Revisited: Elite Politic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t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Pacific Affairs 77: 211—235.

2007.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fiv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M.E. Sharpe.

2011.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China Journal, no. 66: 1—24.

2013. "Chin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um: Conflict Surrounding 'Chen Yun's' Readjustment Program, 1979—80." China Journal, no. 70: 163-187.

Thaxton, Ralph A., Jr. 1983.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 's Great Leap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en, Hung-mao.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Tucker, Robert C. 1977. "Stalinism as Revolution From Above." Pp. 77—108, in 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90.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Norton.

U, Eddy. 2012. "Dangerous Privilege: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the Early Mao Years." China Journal, no. 68: 32—57.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Pp. 121—141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ames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ban, George, ed. 1971. The 'Miracles ' of Chairman Mao: A Compendium of Devotional Literature, 1966—1970. Los Angeles: Nash Publishing.

van de Ven, Hans. 2011.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History." Pp. 446—466,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Slyke, Lyman. 1986.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p. 609-72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gel,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21: 46—60.

1967.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 China Quarterly, no. 29: 36—60.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keman, Frederic, Jr. 2007. "'Cleanup': The New Order in Shanghai." Pp. 21—58,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ndrew G. 1978. Chang Ch '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Pp. 41—61,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24—539.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09—328.

1996.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Pp. 167—198, in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ed. Elizabeth J. Perry.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China Quarterly, no. 188: 1023-1047.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in press.

Walder, Andrew G. , and Songhua Hu. 2009. "Revolution, Reform, and Status Inheritance: Urban China, 1949—1996.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1395-1427.

Walder, Andrew G. , Bobai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191—209.

Wang, Haiguang. 2015. "Radical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and Ethnic Rebellion: The Communist Encounter with a 'New Emperor' in Guizhou's Mashan Region, 1956." I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Peter Chen-main. 1999. "A Bastion Created, A Regime Transformed, An

Economy Reengineered, 1949—1970." Pp. 320—365,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 Murray A. Rubinstein. Armonk: M. E. Sharpe.

Wang, Qisheng. 2011. "Th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Ichigö." Pp. 403—418,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Shaoguang. 1995.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Y.C. 1967. "Tu Yueh-Sheng (1888—1951): A Tentative Political Biography." Journal ofAsian Studies 26: 433—455.

Watson, Rubie S. 1990. "Corporate Property and Local Leadershi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898—1941." Pp. 239—260,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stad, Odd Arne. 2003.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 Lynn T. , Ill. 1978. Careers in Shanghai: The Social Guidance of Personal Energies in a Developing Chinese City, 1949—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no. 79:

481—510.

Whyte, Martin K. 1974.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yte, Martin K.,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bur, C. Martin. 1983.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28." Pp. 527-72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1983.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l: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ylie, Raymond F. 1980. The Emergence ofMaoism: Mao Tse-tung, Ch '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 Fei. 2014. "Rival Rebel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Guangzhou's Mass Factions in

1967." Modern China, in press. doi: 10.1177/0097700414533633.

Yan, Jiaqi, and Gao Gao. 1996.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 and ed. D. W. Y. Kw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Yang, CK. 1959.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IT Technology Press.

Yang, Jiang. 1984.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 " tr. Howard Goldbla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Yang, Jisheng. 2012.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r.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Yang, Kuisong. 2008. "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China Quarterly, no. 193: 102—121.

2011.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Warfare in North China." Pp. 308—327,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How a 'Bad Element' was Made: The Discovery, Accusation, and Punishment of Zang Qiren."ln Maoism at the Grass 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John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Martin C. 1945. 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ang, Tianshi. 2011.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Pp. 143—158,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ick, Joseph K. S. 1995. 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GMD Struggle for Beiping—Tianjin, 1945—1949. Armonk: M.E. Sharpe.

Young, Ernest P. 1983. "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The Era of Yuan Shih-k'ai, 1912—16." Pp. 208—25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 Liu. 2006. "Why Did It Go So High?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87: 732—742.

Yue, Daiyun, as told to Carolyn Wakeman. 1985.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aleski, Eugene. 1980. Stalinist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1933—1952, tr.

参考文献

Marie-Christine MacAndrew and John H. Moo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Zhou, Nun, ed. 2012 · The Great尹a e China, 7958一79b2• Documentary /0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iy Press.

Zweig, David S. 1978 ·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 C , Qu r , no. 73 : 140一159 · 卜伟华, 2008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1966一1968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2000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 19卷)。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1984 ,《中国教育年鉴( 1949一1981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王力, 2001 ,《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香港:北星出版社。

王友琴, 2004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社。

· 2006 ,《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第2期,页 42一55。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 1998 ,《北京大学纪事( 1898一1997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地, 2005 ,《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北京:华文出版社。

吴雪晴, 2002 ,《1976年「南京事件」始末》,《百年潮》,第8期,页18-24 沈志华, 2008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1956一1957 )》。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林蕴晖, 2009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1953-1955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金延锋, 2000 ,《当代浙江简史( 1949一1998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徐建刚, 1990 ,《四人帮迫害上海干部群众的三场运动》,《上海党史》,第12 期,页18一25 海枫, 1971 ,《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

统计局, 1983 ,《中国统计年鉴( 1983 )》。香港:香港经济出版社。

参考文献丨

郭德宏、林小波, 2005 ,《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1989 ,《当代中国的天津》。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0 ,《当代中国的河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a ,《当代中国的湖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b ,《当代中国的广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当代中国的上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2005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东省地方史志纂委员会, 2005 ,《广东省志》(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Blank Page

按笔划排序,页码为原书页码、本书旁码

<九评> ( 1964 ) , 195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138

<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 , 136一3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 , 138一39 , 149一50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大字报) ,

299一30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136, 138

「三家村札记」(前线杂志专栏) , 187

「五族共和」, 36, 37

「百花齐放」的演讲(毛, 1956 ) , 137, 139

「海瑞罢官」(吴晗) , 187一88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291一93 , 30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毛泽东) , 43

「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 , 53 , 82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大字

报) , 22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14

GDP (国内生产总值) , 83 , 321一26 一月革命(上海) , 12 , 236一39, 317 一打三反运动, 283一84 , 300 一贯道, 67 一号作战计划, 22 丁玲, 28 , 134 七千人大会( 1962 ) , 182 , 183 , 187, 197 , 199 九大( 1969 ) , 265 , 282, 290 , 294 二兵团, 238 , 245 二战, 3 , 15 , 32, 83 , 95 人口增长, 321 ; vs.死亡率, 275一77, 333-34 ; 与大跃进, 169一70 人民日报, 214, 231 , 250, 272 , 280, 312 八路军, 20一22 十一中全会, 214 三反五反, 76, 77 , 124 三反运动, 62, 76 三司, 221 , 222 上海:共产党解放, 63一64 ;与清队, 274一75 ; 犯罪在, 68, 69 ;文革在, 196一97, 245 , 248 ;与四人帮, 313 ; GDP,325;中学生在, 270 ;一月革命在, 12 , 236一39, 317;工会在, 70;体力劳动改造在,

271 ;军管在, 242 , 243 , 266;作为模仿,

240, 255 ;抗议在, 147 ;与清明节抗议, 307;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 301 ;秘密结社在, 67 ;工人造反派在, 231一32 ,

234一38 , 245 , 308 上海人民公社, 237 , 238 , 240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232 , 234一38 ,

245 上海市革委会, 237 , 274, 318 上海党委, 232, 236 , 237, 238 , 248 土改:在内战, 18 , 33 ;与阶级标签 47 49,

109 ;与阶级斗争, 17 , 40一45 , 61 ;与集体化, 53 , 56, 123 ;与共产主义胜利, 17 ;死亡人数, 334;经济影响, 49一51 ;在日本, 51 , 333 ;与地主, 45 , 47, 50, 51 ;与生活标准, 333 ;与地方精英, 4r72, 45 , 46, 60;与军管, 40一41 , 46一47 ;与国民党, 4172, 45 , 51 ;政治影响, 4579 ;与秘密教门,67 ;与农村精英, 4172 , 45 , 46 , 60 ;暴力在, 33 ,

46, 47, 50一51 , 52 , 211 大字报, 207一08 , 293 , 305 , 306 ;与中学,

214 ;在百花齐放中, 210 ;与一月革命, 238 ;李一哲, 299 ;与军管, 264 , 265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299一301 ;在北大, 207一8 ;在清明节抗议, 307-8 ;与红卫兵的抵抗, 224 , 225 , 226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298 ; 与工人造反派, 232 大众媒体:与文革, 1 1 , 206, 208 , 247, 256 ; 与四人帮, 312 ;与百花齐放, 140 ;与一月革命, 237 ;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吿, 130 ;与毛崇拜, 279 , 280 ;与军管, 264 ; 与政治运动, 305 ;与清明节抗议, 307; 与红卫兵, 11 , 207 , 216, 23另参见新华社,人民日报大学:录取, 113一14, 116, 207 , 267一68, 269, 270 ;与反右运动, 149 ;攻击, 71一75 ; 关闭, 267一69 ;与文革, 14, 115 , 206, 207一13 , 219一22 , 230;百花齐放在,

14377 ;与毛的遗产, 315 ;在军管下, 263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43 ;红卫兵在, 207一13 , 219一22 , 230;重新开, 294 ;科学在, 72, 74一75 , 304一5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 192 ;监控系统在, 105 ;听课及考试, 207 ;暴力在, 210 , 211 ;工作组在, 208一13 , 233 ;与武汉事件, 249.另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萧条, 84 大跃进( 1958一1960 ) , 152一79 , 197, 199 ;责任归属, 182一85 ;与农业, 153 , 154一55 , 157一61 , 170一71 , 178, 316 ;与反右运动, 152 153 , 156 160 175 178 ;与官

僚体系, 156 , 158-69 , 174 ;共产党在, 159一62 , 320 ;阶级斗争在, 152 , 153 , 155 , 163 , 166 , 167, 168 , 180, 181 ;与清队运动, 282 ;与集体化, 56, 153 , 154, 156, 157一58, 163 , 180, 181 ;公共食堂在, 157, 158 , 180 ,建设工程在, 157一 58, 160 ;与文革, 97 , 99, 162 ;死亡率,

333-34 ;人口学影响, 169-70;与经济,

97 , 99, 159 , 164一65 , 167, 168 , 178一79 , 183一84, 186, 316, 320一22, 326 , 328 ;瞒报, 10, 159, 161一64, 167, 168 , 182 ;与饥荒, 4, 10, 159 , 161一164, 169一173 , 178 , 181 , 182 , 184, 316, 320;与户口制度, 78 ;与工业, 153一55 , 157, 158 , 160, 173一78 , 180, 323 ;与毛, 82, 160, 163 , 164 , 168 , 174 , 178 , 337, 339, 341 ;群众动员, 154, 155 , 167, 173一74, 179 , 316, 332 ;镇压在, 162一69;起源, 153一57 ; 纠正, 180一88 ;自欺欺人, 159一62 ;与中苏分裂, 193 ;与苏联模式, 153一57, 180 ;有关统计, 162 , 170一71 ;目标,

156一57 , 159 ;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277, 316, 319 ;在农村地区, 171 , 173 , 184 ; 暴力, 162 , 164一65 山西, 46, 148 , 240, 258 山东, 240 工人: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与反右运动, 149 , 150;作为党员, 103 , 104;阶级划分, 109 ;在文革中, 4, 205 , 231一33 , 234, 259, 261 , 263 , 285 , 317;与林彪事件, 286 ;要求, 234一35 , 237 ;派系, 233一36, 237, 238一39 ;在大跃进, 173一74, 175 , 180 ;与百花齐放, 140, 142, 147, 148 , 315 ;与一月革命, 238 ; 与军管, 266 ;工业数量, 177 ;抗议, 300 ;与造反派, 259 , 261 , 263 , 317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薪酬, 327一28 , 331 ;白领, 235一36, 270一71 , 286 工人民兵, 70 , 303一04, 309 工分, 57, 58 , 59 , 157 工作组:在运动中 76 ;在中学 214 215 ,

219 ; vs.军管, 262 ;反对, 219-20,

225 ;在北大, 208一13 ;与红卫兵, 219, 221一22 , 226, 228 ;与恢复秩序, 303 ;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190, 191 , 192 , 193 ;在大学, 208一13 , 233 ;与暴力, 217, 219 ;与工人造反派, 232 工会:与共产党, 70一71 ;在文革中, 232,

234 , 247 ; vs.帮会, 68 ;与百花齐放, 147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 ;与秘密结社, 68一69 工业:与集体化, 57一58 ;与合同法, 88 ;与文革, 247 ;萧条在, 176 ;与去斯大林化, 127, 136 , 137 ;在东德, 126;私有部门退场, 76一77 ;与大跃进, 153一55 , 157 , 158, 160, 173一78 , 180, 323 ;重工业, 82 , 85 , 91 , 154, 157 , 322一23 ;囤货的心态, 88一89 ;动力, 182 , 195 ;公私联营, 79 ;与生活标准, 86, 97 , 324, 326一27 ;与毛, 315 , 320, 321 , 338 ;市场机制在, 304 ;现代化, 302 ;国有化, 62, 123 , 127, 128 , 327-28 ;组织亻匕, 86一89 ; 产出, 177, 183 , 323一24 ;数量vs.品质, 175一76;农村, 57-58, 158 , 160, 174, 178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85一86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社会主义转型, 54 , 61 , 79, 125 , 153 ;苏联模式, 82一83 , 86, 91 , 124 , 233 , 234 ;监督系统在, 105 ;暴动在, 147.另参见国有企业;工人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 , 222 中央文革小组, 202一3 ;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与攻击军队, 251 , 252 , 253 ;强烈攻击, 224一29 ;与黑龙江, 239 ;与一月革命, 237 , 238 ;与林彪, 288 , 290;与解放军, 24374 ;与夺权, 240, 241 ;迫害, 317 ;与造反派, 245 , 246, 247, 249, 259 , 317 ;与红卫兵, 205一7 , 220一30,

231 ;与革委会, 24374, 255 ;与学生, 213 , 214, 215 , 219 , 228一29;与工人造反派, 232 , 233 , 235 ;与武汉事件, 250 中央委员会:与文革, 201 , 202 , 203 , 205 ,

265 294;与大跃进 165一66, 168 , 182 ;

丨

与清明节抗议, 306 , 307, 308 中央项目审查小组, 204一5 , 271 , 272 中共十大( 1973 ) , 294 中国社会科学院, 305 中国科学院, 304 中学, 267 , 270 ;在文革中, 213一19, 221 ,

225 , 226 互帮互助团队, 53 , 54 五七干校, 201 , 269 , 270一71 , 286, 294 五反运动, 62 五四运动( 1919 ) , 146, 211 五年计划, 83 , 154 内部参考, 118 , 146, 206 内蒙古, 36, 37, 243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272 内战( 1945一1949 ) , 31一35与共产党, 15 ,

16一19, 38一39, 100 , 123 ;与阶级划分,

110;结东, 35一37 , 38 ; vs·大跃进, 174, 179;通胀, 32, 34;土改在, 18 , 33 ;遗产, 38一39 ;林彪在, 31一32 , 34 , 35 , 197 ; 与毛泽东思想, 335 ;群众动员在, 16, 31 , 33一34, 39, 151 , 179, 201 ;国民党在, 37, 15 , 16, 18 , 31-35 , 38 ;在农村地区, 18 , 32 , 33 , 38 , 53 公安警察:与镇压反革命, 65 ;在文革中, 216, 235 ;与去斯大林化, 137 ; vs ,帮会, 68 ;与户口制度, 78 ;与一月革命, 238-39 ;与工会, 70 ;与清明节抗议, 309一10 ;与红卫兵, 207, 218 , 221 , 227; 与秘密教门, 67 ;苏联模式, 82 , 104,

105 ;在城市地区, 63 , 64, 80 公安部:招生, 105一6 ;与革委会, 230 ;监控系统, 104一6 六一八事件( 1966 ) , 210一12 反五一六分子运动, 284, 298 反日抗争·另参见日本侵华反右派运动:与阶级标签, 148一51 ;在大跃进里, 152一53 , 155 , 160 , 162, 165一68 ; 与毛, 188 ;与大跃进倒退, 181 , 184, 185 ;在农村地区, 52 反右运动( 1957 ) , 9一10, 148一51 , 185 , 316 ; 与文革, 211 ;与大跃进 152 153 , 156,

160 , 175 , 178 天主教堂, 47, 64 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4日) ·参见清明节抗议天安门广场:抗议在, 293 , 343 ;造反派在,

260 ;红卫兵集会在, 207, 214, 219 , 239 天津, 35 , 67, 68 , 270, 271 天派, 258-59, 261 , 262 太平天国运动( 1850一1864 ) , 2 孔子, 295 少数民族, 36, 105 , 281 巴基斯坦, 279, 322, 330, 331 , 333 巴黎公社, 42 戈扬, 142 户口制度, 62 , 63 , 104, 110, 145 , 332;在城市地区, 64, 77一78 , 234 文化大革命( 1966一1976 ) , 4一5 , 10一13 , 200一 262 ;「成就」, 302 , 304, 316一17 ;与官僚体系, 122 , 200, 201 , 202一5 , 285 , 320 ;政治运动, 313一14;与共产党, 13 , 195一99 , 201 , 202-5 , 214 , 314, 316 ;批判, 286 , 291一93 , 296, 298, 299一301 , 306 ;死亡率在, 317 , 334;与邓小平改革, 305 ;与经济, 97 , 99 , 321 , 322 , 326 ;与四人帮, 1 , 341 ;与大跃进, 97 , 99 , 162 ;中学生在, 213一19 ; vs.百花齐放, 210一11 ;迫害领导层, 200一201 ; 与林彪, 287 , 293-94 ;地方政府在, 233一36 ;与毛, 11一12 , 82, 260一61 , 313 ,

317一18 ;与毛泽东思想, 201 , 285 , 336, 337 , 339;毛的准备, 195一99 ;群众动员在, 201 , 205一13 , 232一33 , 316, 332 ;起源, 180一99;与解放军, 4, 12, 198 , 220, 235 , 316 ;与民众抗议, 5 , 11 , 13 , 318 ; 与清明节抗议, 309, 31 1 ;地方夺权在, 239一42 ;反对文革, 263一86;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 192 , 208 , 209 ;纪念品, 344 ;学生在, 11 , 12 , 13 , 213一19, 231 , 317;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319 ;大学在, 115 , 207一13 ;与苏联, 10, 13 , 194 , 195 , 205 , 233 ;暴力在, 210一11 ,

212 ;工人在 4 1 1 205 231一33 , 234,

259 , 261 , 263 , 285 , 317 ;与周恩来, 13 , 198 , 295.另参见中央文革小组;派系, 造反派;红卫兵文革简报, 206 文汇报, 307, 308 文学, 28, 134一35 , 186 , 196 ;与百花齐放,

141 , 143 日本:经济, 13 , 322 , 325 , 326, 342 ;不平等在, 331 ;土改在, 51 , 333 ;投降, 15 日本侵华:与共产党, 6, 15一16, 17 , 18 , 19一22, 27 , 100 ;与内战, 3 , 32 ;与阶级划分, 110, 1 1 1 ;与内战, 272一73 ; 与合作, 66;死亡人数, 334 ;毛有关, 313 ;军事影响, 19一22 ;与国民党, 15 , 19一24 ;政治影响, 22一24, 3 1 ;在城市地区, 64 毛远新, 310, 312 毛泽东:与抗日, 20一21 ;与反右运动, 151 , 与官僚阶层, 81 , 121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 65 , 66;共产党官方决议, 314;与中央文革小组, 203 ;在内战中, 3 , 31 , 34一35 , 38 , 39 ;与政府管控, 294;有关阶级斗争, 42一43 , 188 , 335 , 336一37, 339, 340, 341 ;与清队运动, 272 , 277 ; 与集体化, 54一55 ;批判, 187, 286 , 291一93 , 300 , 306 ;作为文化象征, 343一 44 ;与文革, 1 1一12 , 195一99 , 313一14;逝世, 31 1-12 ;与邓刁、平, 294一95 , 302-5 ; 与去斯大林化, 128 , 134, 135一36 , 137 ; 与经济, 82 , 89, 91 , 97一99, 315 , 319一 26 , 338 , 339, 340 ;葬礼, 1 ;与四人帮,

1一2 ;芒果, 279一81 ;大跃进, 82 , 160, 163 , 164, 168 , 174, 178, 337 , 339, 341 ; 与中学生, 213一14 ;与百花齐放, 137, 138 , 139 , 14576, 150 , 339 ;与匈牙利, 133 ;与一月革命, 237, 239 ;遗产, xi, 5 , 14, 315一19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9 ;与林彪, 287一88 ;与刘少奇, 10,

1 1 , 182一83 ;与马克思主义, 25一26, 27 , 154 , 202 ;与群众动员, 39 , 320, 338 ;与军队, 198 , 242一45 , 252一58 , 263 , 264, 267 , 278 , 289一90 302 ;有关少数民

族, 37 ;与农民革命, 41 , 43 ;有关「人民战争」, 22 ;个人忠诚, 196一98 , 201 , 202 ;与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121一22 ; 与夺权, 240 ;迫害, 27 , 136 ;与清明节抗议, 310一11 ;与造反派, 260一61 , 317一18 ;与整风运动, 30 ;与红卫兵,

4, 11 , 205 , 207, 208 , 221一25 , 228 , 229,

231 , 336 ;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0一84, 187 , 188 ;与革委会, 255 , 256 ;与农村 vs.城市革命, 61一62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6, 300, 301一2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0一91 ;与苏联模式, 82 , 91 , 124 , 315 , 321 , 335 , 340, 341 ;与斯大林, 129, 136 , 149 , 166, 184一85 , 292 ;与斯大林主义, 82, 84, 135 , 316;与学生, 212 , 213 ;与没有预期到的ㄠ士果xii, 6, 9 , 10, 277 , 316, 319 ;与苏联, 10一11 ;在苏联, 153一54 ;有关暴力, 43一44 , 217, 224, 228 ;与妇女, 28 ;与工人造反派, 232 , 233 , 235 ;与吴晗, 188 ;与武汉事件, 249-50;与周恩来, 11 , 295 , 318 毛泽东思想, 33471 ;关于官僚主义, 335 , 339 , 340一41 ;与陈伯达, 26-27, 197, 290 ;与文革, 201 , 285 , 336, 337, 339; 死亡人数, 333一34 ;与去斯大林化, 137 ;关于经济, 89 , 338 , 339, 340 ;关于专家, 99, 279, 321 , 338 , 340 ;与知识分子, 71 , 72 ;与林彪, 197 ;与毛崇拜, 124, 278 , 337一38 , 339, 340 ; vs.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 335 , 339 ;与军管, 264 ;与宣传队, 262 ;与斯大林主义, 335 , 337 , 338 , 339 ;与苏联, 337,

338一39, 341 ;暴力在, 335一36 毛泽东选集, 188 王力, 203 , 249一50, 253 , 284 王大宾, 265 王任重, 169 王光美, 222 王希晢, 299 王明, 25 , 27 , 29 王洪文, 1 , 232, 237 , 238 , 266, 312 王实味, 28 146 361n77

王蒙, 139 主体思想(朝鲜) , 130 北大附中, 214, 215 , 225 北伐, 41一42 北京:共产党解放, 35 ;与清队运动, 271一 72 ;与文革, 196一97 , 202 ;与一打三反运动, 283 ;与清明节抗议, 308一10 ;造反派在, 258一62 ;红卫兵在, 206, 223 ,

229一30 , 235 ;秘密教门在, 67 北京大学:与清队运动, 274;文革在, 207一8 , 226, 258一59 ;教职工, 269 ;百花齐放在, 14374, 146 , 211 ;六一八事件在, 210一11 ;与军管, 264一65 ;与造反派派系, 258一59 ;红卫兵在, 226, 230 ;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2一93 北京公社, 230, 237, 240 」匕京市委, 186, 187 , 193 , 199 , 202 , 229 北京市革委会, 230 , 260, 262 , 264, 318 北京师范大学, 214, 230, 258 , 265 北京纺织厂, 280

」匕京航空学院, 219一20 , 221 , 225 , 230, 265 北京针织总厂, 278 北京新华印刷厂, 272一73 北京卫戍部队, 230 , 309, 312 北师大女附中, 214, 215 去斯大林化, 150, 197 ;与官僚制度, 121 , 127 ;与毛, 128 , 134 , 135一36, 137 ;与个人崇拜, 9 , 127 , 128, 137 , 194, 195 ; 与中苏分裂, 11 , 194 ;在苏联集团, 11 ,

125一28 , 151 台湾, 4, 34, 35 ;蒋介石在, 23一24 ;经济模型, 342 ; GDP, 322 , 325 , 326 ;收入不平等在, 331 ;土改在, 51 , 333 四二二派系, 257 , 258 四人帮, 1 , 2 , 292 , 312一13 ·另参见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四川, 243 , 265 四六指示, 244一45 , 246 , 248 外国人, 64, 105 , 328 , 343 尼古拉·布哈林, 154 市场经济:需求约束, 89一91 ;萧条, 83 , 84,

176, 178 ;与去斯大林化, 128 ;全球的,

xii, 17, 123 , 342 ;不平等, 93 , 119, 331 ; 与毛泽东思想, 89, 338 , 340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25 , 342, 344;农村, 56 , 58, 181 , 182, 333 ; vs ·社会主义经济, xii, 89 布尔什维克, 26 民主, 27, 71 , 73 , 121 , 145 , 166, 167, 227 ;社会主义, 144, 299-301 民主运动, 286, 289, 299 , 301 , 343 民主墙, 142 , 145一46, 149, 343 民兵:地方, 41 , 45一47 , 49, 248 , 313 ;传统, 48 ;工人, 70一71 , 297, 303 , 309一10 犯罪:镇压运动, 53 , 62 , 321 ;贩毒与卖淫, 7 , 62 , 69一70, 80, 321 ;毛关于, 41 ;农村, 60 ;镇压, 7 , 49, 63一65 , 67, 68 , 80; 与传统地方治理, 48 ;城市, 63一64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131 , 132 生活标准:与干部队伍, 117一18 ;批判, 143 , 293 ;与去斯大林化, 127, 128 ;与工业亻匕, 86, 97, 324, 326一27 ;与毛, 315 , 321 , 326一30;后文化时代, 13-14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41 ;抗议, 233 , 234一35 , 286, 289 , 300, 317 ;农村, 58一59, 333 ;与苏联模式, 326一27 ;城市, 54 , 94一97 , 327一30, 331 ;在苏联,

320 ;与单位制, 93一94, 327 田家英, 182 伊斯兰教, 67 全国总工会, 70 共青团, 9 , 67 , 106, 116, 145 , 147一48 共产党·参见党内审查, 64 , 127, 134一35 ,

140 , 142, 186 共产党: 1927年迫害, 3 , 15 , 22 , 44, 45 , 68 ; 1949胜利, 2, 4, 15一39 ;与抗日, 6, 15一16, 17, 18 , 19-22 , 27 , 100 ;与反右运动, 151 ;强烈攻击, 123一51 ;与官僚体系, xii, 2 , 27 , 40, 100, 123 ;与内战, 15 , 16一19, 38一39,川0 , 123 ;与清队,

272 ;与文革, 13 , 195一99, 201 , 202一5 , 214 , 314, 316 ;与邓小平, 302一3 ;党纪, xi, 23一29, 3 1 , 38一39, 120;与经济 60 99 155, 327 ;演亻匕 100一122 ; 对胜利的解释, 16一19 ;在大跃进中, 159一62 , 320 ;等级, 1017 ;与百花齐放, 13978 , 149 , 210;与一月革命, 237 ;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吿, 130 ;与工会, 70一71 ;忠诚, 112一17 ;与毛, 8 , 102 , 278 , 314, 315 , 344;与毛泽东思想, 335 , 336 , 337一38 ;军事化, 16, 19 ;与国民党, 3-4, 15 , 19, 22 , 23 , 27 , 31 , 41 , 42 , 43 , 44, 45 , 68 , 100 ;与朝鲜, 130 ;组织架构, xi, 6, 8 , 23 , 100一122, 102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02一3 , 343 ;胜利后的地位, 100一101 ;宣传部, 186, 193 , 199 , 202 ;内部迫害, 25 , 27一28 ,

120, 136, 159 , 200一201 ;重建, 14, 293 , 294 , 304, 318 ;与整风运动, 28一29, 3 1 ; 与红卫兵派系, 223 , 229 ;与秘密教门, 67 ;在农村地区, 15 , 20, 24, 51一53 , 52 , 61 , 100 , 103一104 , 106 ;秘密服务, 29 ;书记处, 193 , 203 , 211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一93 ;与苏联模式, 80-81 , 82 ;斯大林化, 25 ;学生攻击,

207一13 ;斯大林, 104一6 ;在城市, 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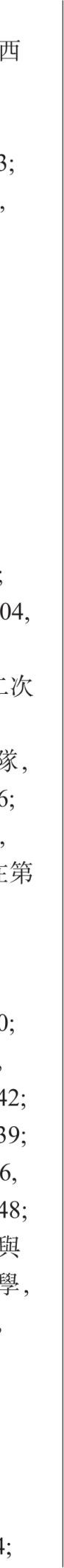
61一62, 100 , 103 , 104, 106;与前苏联,

6一7, 15一16 , 25 , 100 ;与工人造反派,

232 , 234, 236 ;在延安, 6一7, 16, 19, 25 , 27一3 1 , 34, 38 , 120·另参见官僚主义; 干部;共产党政治局共产党军队·参见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 红军共产党党员, 15 , 100一101 , 270 ;与阶级划分, 107, 108 , 110 , 112 ;邓小平的意见, 303 ;与党纪, xi, 24一25 , 38一39, 120 ; 与教育, 112一13 ;与精英, 8 , 104 , 108 ; 与百花齐放, 142, 144 ;动机, 8 , 116, 120一21 ;由农民组成, 103 , 104;与政治互动, 115一16, 117 ;招募, 106一8 , 117 ;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6, 297 列夫·托洛茨基, 26 匈牙利, 331 , 342 ;与去斯大林化, 127, 128 ; 与百花齐放, 138 , 139 , 144 ;苏联模式,

98 , 128 ;暴动在, 131 , 132一34 印度尼西亚, 321 , 322 324, 330, 331 , 332, 33

印度:经济, 321 , 322 , 324, 325 , 326, 332 , 333 ;收入不平等, 330 , 331 , 332 ;与西藏, 36, 37 回族, 37 地主, 72, 110 ;与清队, 274 ;与集体化, 53 ; 与大跃进, 168 , 169 ;与土改, 45 , 47



48

50, 51 ;毛, 41 , 42 地派, 258-59 , 261 地院东方红, 219一20, 221 , 228 , 229 地质部, 219一20, 221 安徽, 164, 251 , 253 托洛茨基主义, 28 , 29 朱成昭, 228一29 朱德, 21 江西苏维埃, 15 , 20, 25 , 28 , 45 江青, 28 ;逮捕, 1 , 312 ;与清队运动, 274 ; 批判, 306, 307 ;与文革, 199, 203 , 204, 214 , 215 , 227, 253 , 261 ;与文艺界, 196 ;与清明节抗议, 309一10;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有关暴力, 217 江苏: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一85 ;攻击军队, 251 , 252 ;文革在, 240, 241 , 245 , 246; 百花齐放在, 148 ;军管在, 253 , 258 , 266 , 267 ;革委会在, 255一57, 285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一98 江苏党委, 240, 245 百花齐放( 1957 ) , 9 , 10, 13578 ;批判, 148一51 ;与共产党, 139-48 , 149, 210; 与集体化, 14778 , 315 ; vs ·与文革, 210一11 ;与知识分子, 75 , 140一41 , 142 ; 与毛, 137 , 138 , 139 , 145-76, 150, 339 ; 关门整风vs.闭门整风, 137一39, 146, 148 , 149, 150, 205 ;大众反应, 139一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5 , 186, 187 ;与苏联模式, 140, 143 , 210, 211 ;在大学, 143-47 ;与工人, 140, 142, 147, 148 ,

315 百万雄师, 248 , 249一50 米丘林, 74一76 考试:科举, 48 ·,高考, 207 , 267一68 , 269 自行车, 85 , 93 , 96, 117, 328 , 331 自杀, 135 146, 165 ;与清队运动, 272 74; 与文革 189 198 199, 200 211 , 216,

263 ;与社会主义转型, 47 , 72, 76 西藏, 19, 36 , 37, 52 住房, 14, 85 ;与工业化, 86, 324 ;与生活标准, 327 , 329 ;与党员身份, 101 , 118 ; 配给, 95一96 ;与苏联模式, 233 ;与国有企业, 90一91 , 92一93 ;城市, 356n25 佛教, 67 吴晗, 187一88 宋教仁, 3 戒严, 5 , 126 , 133 , 260, 343 批林批孔运动, 295一301 批林运动, 289一93 , 295 , 296 批斗会, 305 ;与清队运动, 273 ;在文革中,

236, 259, 264 ;在黑龙江, 239 ;与毛泽东思想, 336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批评/自我批评:在文革, 193 , 198 , 247, 249;与大跃进, 156, 162 , 181 ;与知识分子, 71一72 , 73 ;与军官, 264, 290 ;与革委会, 255 , 256·另参见批斗会抗美援朝, 73 折磨, 24, 25 , 300;在清队运动中, 273 , 277 ; 在文革中, 205 , 252 , 259 ;在大跃进中, 164, 165 ;赫鲁晓夫, 129 ;在土改中,

33 , 47;与军事控制, 5 , 263 , 272, 273 , 274, 277 ;在整风运动, 29一30 , 197;在三反运动中, 76 李一哲, 299 李正天, 299 李立三, 70 李怀印, 59 杜月笙, 68 汪东兴, 198 私人慈善, 64, 77 私有行业, 76一77 , 93 , 181 , 329一30, 342 贝利亚, 127 , 128 贝鲁特, 130 , 131 赤卫队, 234 , 235 , 236, 237 辛亥革命, 3 周恩来:于抗日, 21 ;与反复旧主义运动, 306;在内战中, 35 ;关于集体化, 55 ;

与文革, 13 , 198 , 204, 218一19, 221 , 227 , 228 , 24072, 246, 253 , 255一57, 261 , 294 ;逝世, 305 ; vs.邓刁、平, 302 ; 葬礼, 306一07 ;与大跃进, 154, 155 , 156 , 169, 181 , 182 , 184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 ;与毛, 11 , 295 , 318 ;与西城纠察队, 218一19, 220, 223一24, 227一29 ;在清明节抗议, 13 , 305-310, 311 ;在整风运动, 30 ;与红卫兵, 218一19 , 221 , 227, 228 ;与革委会, 255 , 256, 257;与工人造反派, 231 , 232 ;与武汉事件, 249 周培源, 73一74 孟加拉国, 323一24 , 333 宗教:与私人慈善, 77 ;镇压, 53 , 65 , 66一67 , 80 ;传统的, 59 ·另参见佛教;天主教堂;道教;新教教堂官僚体系:与易货贸易, 88 ;与共产党, xii, 2 , 27 , 40, 100 , 123 ;与内战, 16, 27;与阶级划分, 108 ;与文革, 122 , 200, 201 , 202一5 , 285 , 320 ;与去斯大林化, 121 , 127 ;与经济, 81 , 98-99 , 123 , 340 ;与就业, 63 , 79 ;与大跃进, 156, 158一69, 174 ;与土改, 263 , 270-71 ;与毛, 8-9 ,

81 , 121 , 340;与毛泽东思想, 335 , 339, 340一41 ;军事化的, 39 ;国民党, 80 ;农村, 56一57, 59, 158一59;自欺欺人的, 159一62 ;苏联模式, 80 , 81 , 120一21 , 123 , 174, 201 , 340 ;传统, 48 , 79 , 80 ;城市, 62 , 63 , 78一81 居民委员会, 78 , 96 延安, 6一7, 19 , 197 ;在内战中, 16, 33 , 34, 38 ;肃反在, 25 , 27一28 , 120 ;在整风运动, 25 , 27一31 拉伊克•拉斯洛, 132 拉科西, 127, 132 拉马克, 74 明朝, 36 易货贸易, 88一89 , 93 服务业, 62, 63 , 85 , 329一30 杭州, 65 , 199, 303 , 306 ;文革在, 248, 252 ; 与清明节抗议, 308 , 311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 296一97 301

东风派, 247 251-52 275 东德, 104, 125 , 126, 147, 331 东欧:与中国, 80 , 83 ;共产主义解体在欧洲, 343 ;经济, 97 , 154, 186, 325 , 326 ; 与大跃进, 157 ;收入不平等, 331 ;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吿, 128一29, 130 , 151 ; 后斯大林时代, 125一28 ;暴动在, 136,

148 林希翎(程海果) , 14374 林彪:死亡之后, 5 , 286, 288一89, 290,

318 , 320;被运动, 13 , 288 , 289一93 ,

295一302 ;在内战中, 31一32, 34, 35 ,

197 ;与文革, 196, 197 , 198 , 204, 261 ,

287 , 293一94 ;死亡, 5 , 13 , 286, 287,

289 , 306;与毛, 12一13 , 197, 198 , 244,

278 , 287一88 ;与解放军, 197, 242, 287, 289一90;阴谋, 12一13 , 312 ;与清明节抗议, 308 ;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3 ;与周恩来, 296 林彪体系, 299一300 武汉, 247-49 , 284, 306 武汉事件( 1967年7月) , 249一51 , 253 武汉军区, 248, 249, 250 河南, 158 , 168, 169, 271 ;大饥荒在, 334 ;暴力在, 243 波兰, 331 , 342 ;去斯大林化在, 127 , 128 , 130 , 131 ;与百花齐放, 144 ;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吿, 130 ;暴动在, 131-32,

133 , 147 知识分子:与反右运动, 149 , 150;攻击, 29 ,

62 , 71一75 , 124, 134 ;共产党控制, 123 ; 与共产党党员, 108 ;与阶级划分, 109, 110 ;批评/自我批评, 71一72, 73 ;与去斯大林化, 127 ;与百花齐放, 75 , 140一 41 , 142 ;与劳动改造, 269, 270-71 ;与毛, 336, 344;在波兰, 131 ;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0, 181 , 182, 185一88 ;在城市地区, 61 ;与苏联, 72一75 ;在延安,

27 小区组织, 64 , 79, 96一97, 104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一93 , 234 , 277 ;和文革, 208 , 209 ;与毛泽东思想, 337

社会主义教条, 134, 186 社会主义经济, 82一99 ;与反右运动, 150, 151 ;与官僚体系, 81 , 98一99 ;与消费紧缩, 94一97 ;萧条, 13一14, 176, 178一79, 181 ;与去斯大林化, 127一28 ;破坏,

301一2 ;出口导向, 14;缺陷, 97一99 ;

GDP, 321一26 ;与大跃进, 97, 99 , 159,

164一65 , 167, 168 , 178-79, 183一84,

186 , 316, 320一22 , 326, 328 ;增长,

83一86, 91 ;囤积, 88一89, 90, 98 , 159,

164一65 , 167, 168 , 182 ;收入不平等, 330一32 ;毛时代, 315 , 319一26 ;与毛泽东思想, 338 , 339 ; vs.市场经济, xii, 89 ;市场机制在, 89 , 98 , 99 , 186, 304; 与大众动员, 79, 98一99 , 151 ;与政治忠诚, 155 ;价格控制在, 86 , 94一95 ;生产性投资vs.非生产性投资, 84一86, 94; 恢复, 185 , 302一5 , 304, 318 ;改革, 302 , 311 , 325 , 34173 ;资源限制, 89一91 , 173 , 176;科学管理, 97一98 , 99 ;斯大林关于, 55 ;与工人造反派, 235 ,另参见苏联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转型:与去斯大林化, 127一28 , 136 ;在东欧, 125 ;经济, xii, 61 ,

14 &79;工业, 54, 61 , 79, 125 , 153 社会结构:与干部, 59 , 117一19 ;共产党控制, 123 ;与集体化, 56一59 ;不平等在, xiii, 7 , 331-32 ;与土改, 4579;毛在,

41 ;传统农业, xii, 7 , 40一45 金日成, 130 金融行业, 84 , 86, 87 长征, 15 长春(满洲) , 35 青海, 243 青帮, 68 俄国, 83.另参见苏联保加利亚, 125一26, 331 前线(杂志) , 187 南京:与反五一六运动, 285 ;与反复旧主义运动, 306 ;在文革中, 240, 24576, 247 , 248 , 256 ;文革在, 243 ;日军大屠杀 20 ;军管, 245一46 , 258 , 266 67 ;国

民党在 20 23 24 35 ;市委 191-92, 234;抗议运动, 144 , 146, 147 ;与清明节抗议, 307 , 308 , 309, 311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一99, 301 南京大学, 209, 307 南京军区, 238 , 241 , 246, 252 , 298 南清村(广东) , 49 南斯拉夫, 98 , 127 , 128 , 134, 138, 143 , 144,

331 城市地区:下放, 235 , 269一70, 284 ;官僚体系在, 62, 63 , 78一81 ;干部在, 61 , 63 , 270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 62, 64,

65一66 ;共产党在, 43 , 61一62 , 100, 103 ,

104, 106 ;在内战中, 34 ;阶级划分在, 109一10 , 112 ;犯罪在, 63一64 ;在文革中, 235一36 ;大跃进在, 171 , 173 , 184 ; 户口制度在, 64, 77一78 , 234;与百花齐放, 140;生活标准, 54 , 94一97 , 327一30, 331 ;与毛的遗产, 315 ;迁移到, 57 , 77, 78 , 332 ;与国民党, 24 ;人口, 176 ; 被下放者返回, 298一99 ;革命在, 38 , 61一81 ;与农村集体化, 57一58 ;社会结构, 7, 77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 监视系统在, 105 ;单位制在, 92一94 城市精英, 7, 77 姚文元, 1 , 196, 203 , 237, 238 , 312 威廉、辛顿, 46一47, 52 宣传队, 269 , 304;与清队, 274;与毛崇拜, 279一80 ;与军管, 264, 267 ;与造反派,

261 , 262, 263 , 265 思想改造运动, 62 , 71 , 75 , 124 , 211 , 264, 268 政府:在文革, 4一5 , 233一36 ;地方, 4579 ,

52, 233一36 ;共产党控制, 101一4 ;传统, 48.另参见官僚体系政治局, 101一2 ;与文革, 202 ;与林彪, 290 ; 激进派在, 306, 307一8, 309一10, 312;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301 ;常委, 1 , 102 , 166, 202, 204 217 ;与周恩来, 295 政治精英:与共产党, 8, 104, 108 ;与阶级划分, 109 ;在毛泽东思想, 336, 339 ;特权, 118 ·另参见中国共产党,精英会

员,传统农业, 59, 114-15 ;破坏, 7, 40, 80 ;与土改, 4172, 45 , 46 , 60 ;与地方政府, 48 柏林墙, 125 派系: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一89, 290;与毛泽东思想, 338 ;与毛的遗产, 315 ; 在国民党, 23 , 31 ;与清明节抗议, 311 ;在红卫兵中, 209, 212-13 , 215 ,

218一22 , 223 , 229, 230, 317 ;在学生中, 212一13 ;镇压, 302, 303 , 304 ;在工人中, 233一36, 237 , 238一39 ;与武汉事件,

250 科学:毛有关, 338 ;限制, 140 , 185 , 187 , 315 ;复兴, 186 , 304一5 , 333一34 ;社会主义, 72 , 74一75 , 121 , 279.另参见专家纪登奎, 292 红军:与阶级划分, 101 , 110 ;与传统战争, 7, 16 , 18一20;与土改, 4677 ;与长征,

15 ·另参见解放军红革会, 238 , 245 红旗(杂志) , 198 , 202-3 , 222 , 226 , 250 红旗派, 247, 251一52 , 275 , 299 红卫兵: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在北京, 206 , 223 , 229一30, 235 ;与中央文革小组, 205一7, 220一30, 231 ;控制, 201一2 ; 异见者, 206 , 224一29 , 230, 235 ·幺上东 229一30, 261一62 ;派系, 209, 212一13 , 215 , 218-22 , 223 , 229 , 230, 317 ;在黑龙江, 239 ;在中学, 213一19, 221 , 224; 在林彪事件之后, 13 , 286, 287, 291 ;与毛, 4 , 11 , 205 , 207 , 208, 221 , 222一24, 225 , 228 , 229 , 231 , 336 ;群众动员, 332 ;与媒体, 11 , 207 , 216, 230 ;与军管, 263 , 264 ;抗议, 13 , 225 , 286, 299, 300 , 306;与公安部警察, 207, 218 , 221 , 227;与清明节抗议, 13 , 306 , 307 ; 纪念品, 344 ;超出预期的结果, 277 ; 在大学, 207一13 ;暴力, 215一19, 220 ,

223 , 224 ;与工人造反派, 231一32 红宝书, 197, 287, 294 美国:与中国内战, 34 ;经济, 83 , 178 , 320, 331 ;与大跃进目标 156 ;与百花齐放

140 ;与知识分子, 71 , 73 , 74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吿, 130 ;在朝鲜站在, 123 ; 与中国私人慈善, 77 ;配95 ;与红卫兵异见者, 228 ;与科学, 75 ;与西藏,

37 ;与苏联, 153 , 194;与周恩来, 295 胡风, 128 , 134 胡风反革命集团, 134, 137 , 142 , 143 胡乔木, 182 胡适, 72 英国, 71 , 73 , 95 , 154, 156 ;经济, 331 ;与西藏, 36 , 37 计划生育运动, 79 军管会, 263 , 271 , 272 , 278 , 286 军阀, 22, 32 , 42 重庆, 3 , 15 , 20, 35 , 251 革委会, 266一67 , 283 , 316 ;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与攻击军队, 252 ;下放, 270 ; 在」匕京, 230 , 259, 260 , 262, 264, 318 ; 与中央文革小组, 24374, 255 ;与清队运动, 271 , 272, 274一77 ;与死亡人数, 334 ;结东, 294 ;在江苏, 255-57 , 285 ;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 ;与毛, 255 , 256, 280 ;与军管, 263 , 265 ;与解放军, 230, 242 , 243 , 318 ;与夺权, 239, 240 ;在上海, 237, 318 韦国清, 257 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218一19 , 220,

223-24, 227, 228 , 229 香港, 49, 72 , 342 ; GDP, 322, 325 个人崇拜:对于蒋介石, 26 ;与去斯大林亻匕, 9 , 127 , 128, 137, 194 , 195 ;在东欧, 125 ;对于金日成, 130 ;与中苏分裂, 194 ;对于斯大林, 9 , 26 ·另参见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档案, 63 , 94, 104, 105 , 116 , 135 ;与党员身份, 107 ;与阶级划分, 109一10 警察·参见公安警察哥特瓦尔德, 126 孙中山, 3 孙冶方, 98 , 186 徐州, 303 ;铁路局, 303 徐懋庸, 141

旅游, 63 , 79-80, 94, 118.另参见农村-城市迁移核武器, 194 泰国, 321 , 322, 331 浙江, 71 , 148 , 252, 303 ·另参见杭州浙江大学, 71一72 , 308 浙江军区, 252 消费品, 85 , 93 , 94-96, 154, 233 , 236, 322 ; 配14, 328 ·另参见生活标准乌克兰, 56, 334 乌兰夫, 272 特罗菲姆李森科, 74一75 秘密报吿(赫鲁晓夫; 1956 ) , 128一30, 193 ; 与东欧, 125 , 128一29 , 130, 132 , 151 ;与百花齐放, 14274 ;与毛, 11 , 135 , 136,

149一50, 184, 338一39 ;发表, 130 秘密结社:与工会, 68一69 ;毛有关, 41 ;镇压, 53 , 65 , 66一68 , 80;传统的, 60 秦始皇, 145 , 292 , 293 纳吉•伊姆雷, 127, 132 纽约时报, 130 翁森鹤, 303 耿金章, 238 袁世凯, 3 配给:与干部队伍, 119 ;消费品, 14, 328 ;在东德, 125 ;口粮, 54, 57 , 58 , 95 ;与户口制度, 77 , 78 ;住房, 95一96 ;收入不平等, 332 ;方法, 94-95 ;与小区或者政府没有区别, 79;城市, 63 , 64;在农村, 95 陕西, 19, 267 马克思一列宁主义:与阶级划分, 108 ;与百花齐放, 138 , 140, 145 ;与知识分子, 71 , 72 ;在林彪事件之后, 306 ;与毛,

25-26, 27, 154, 202 ; vs.马泽东思想, 335 , 339;与后毛时代的改革, 342; vs· 苏联修正主义, 195 ;关于城市vs.农村革命, 38 , 41 斗批改运动, 263一64, 266, 271 参考消息, 118 参考数据, 118 国民党:与抗击日军, 15 , 19 24;于共产党

37, 15 , 19 22 23 , 27, 31 41 , 42 43 ,

44, 45 , 68 , 100 ;在内战, 3一4, 15 , 16 , 18, 31一35 , 38 ;于阶级划分, 111 ;与清队运动, 272 , 274 ;与合作, 66 ;腐败, 68, 80 ;与文革, 205 ;派系在, 23 , 31 ; 与青帮, 68 ;与大跃进, 168 ;与百花齐放, 141 ;与工会, 70 ;与土改, 41一42 , 45 , 51 ;与毛泽东思想, 335 , 336, 337 ; 军事, 23一24 , 32 ;与少数民族, 36一37; 与私人慈善, 77 ;在农村地区, 4 172 , 45 , 51 , 61 ;与秘密结社, 67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与斯大林, 37 ;与地下党, 205 ;活跃在地下的, 53 , 64, 65 ; 在农村地区, 64 ;弱点, 22一24, 31 国企:易货贸易在, 93 ;共产党党员在, 103 ; 囤积在, 88一90 ;劳动改造在, 271 ;与私有部门, 76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1 ;与社会主义产业转型, 79 ;与苏联模式, 82, 83 ;供给与生产在, 86一91 ; 暴动在, 147 ;作为福利提供者, 91一94 国防部, 219-20, 221 国家统计局, 162 国务院, 198 , 218 , 219, 223 , 228 基督教, 60, 67 ·另参见天主教堂婚姻, 79, 94 , 96, 112 妇女:作为党员, 107 ;与阶级划分, 112 ;与忠字舞, 281 ;在农村地区, 270;在卖淫, 69 ;对妇女的暴力, 211 ;在延安,

28 专家:与阶级划分, 109 , 110;经济, 322 ,

327 ;海外, 72一73 , 343 ;与大跃进, 154, 155 , 174一75 , 180 , 185 , 320;林彪事件之后, 288 ;与毛, 99, 279, 321 , 338 , 340 ;职业的, 109, 110, 117, 121 , 137,

142 ;平反, 182 , 302 , 343 康生, 202 ;与清队运动, 273一74 ;与文革,

197 , 198 , 199, 203 , 204, 208 , 215 , 227 ,

261 ;与去斯大林化, 137 ;与整风运动, 29, 30 ;与中苏分裂, 194一95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2 , 193 张春桥, 1 , 12, 308 , 309 ;逮捕, 312 ;与文革,

196, 203 , 222, 232 , 253 ;与一月革命,

237一38 , 239 ;与清明节抗议, 309-10 戚本禹, 203 , 225 捷克斯洛伐克, 126, 147 , 331 教育:与共产党, 101 , 108 , 123 ;与阶级划分, 108 , 109 ;与文革, 215 ;对邓小平的恢复, 302 , 305 ;外国的, 211 ;与百花齐放, 140, 142 ;与机会, 116;与政治活动, 116 ;与政治忠诚, 112一14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43 ;在单位中,

92 , 117 ·另参见中学;学生;大学梅德韦杰夫, 74 清明节抗议( 1976 ) , 13 , 305一10 ;之后, 310一14 清洗反革命集团运动( 1955 ) , 135 , 137 清理阶级队伍, 12, 271一77 , 318 ;批评, 294, 300 ;死亡率, 275 , 276 , 277, 334;与毛崇拜, 281一82 ;与毛泽东思想, 341 ;与一打三反运动, 283一84 清朝, 2一3 , 36, 123 清华大学, 258一59, 260 , 265 , 269 ;毛崇拜在, 280 清华附中, 114一15 , 214, 215 , 216一17, 225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5一302 , 303 , 318 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 ) , 163 第四机械工业部, 234 统一战线( 1925一1927 ) , 15 , 19 , 41 , 42 , 43 许世友, 241 , 251 , 252, 285 , 298 ;与军管,

253 , 266, 267 ;与革委会, 256, 257 贩毒, 7 , 69, 80 造反派, 4一5 , 11 , 12, 13 ;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 285 ;四二 257 , 258 ;在北京, 258一62 ;与反复旧主义运动, 306 ;与中央文革小组, 245 , 246,247 , 249, 259, 317 ;与清队运动, 274, 275一76 ;地派,

258一59, 261 ;东风派, 247 , 251-52, 275 ;天派, 258一59, 261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一89 ;与毛, 260一61 , 317一18 ;与军管, 263一66;百万雄师, 248 , 249一50 ; 与一打三反运动, 283 ;与解放军, 242一49 , 257一58 , 261 ;红旗派, 247, 251一52, 275 , 299 ; vs.红卫兵, 223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 296 297一98

301 ;镇压, 263一67 ;联指, 257 258 ;与暴力, 24579 , 259一61 ;与武器, 251 , 253一55 , 275 , 317, 334 ;与工人, 259,

261 , 263 , 317 陈一阳, 299 陈再道, 247一48 , 249 , 250一51 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 202 , 203 ;与文革, 197一98 , 199, 222-23 , 261 ;在林彪事件之后, 290 ;与毛泽东思想, 26一27,

197 , 290 陈云, 154, 156, 319 陆平, 193 陆定一, 198 , 199 劳改:与镇压反革命运动, 65 , 66 ;批评,

291 , 294;与文革, 263 , 265 , 267 , 269 , 270一71 ;与百花齐放, 148 ;与政治运动, 135 , 150 ;在农村地区, 267, 269 ; 在苏联, 127 单位制, 79一80 ;与干部队伍, 118 ;与教育, 92 , 117;与住房, 95一97 ;与身份认同,

94 ;与住宿标准, 93-94, 327 ;与服务, 92一94, 330 ;与监查, 104 就业:官僚化, 63 , 79 ;与阶级划分, 108 ;共产党控制, 101 ;与政治活动, 116 ;与造反派头头, 268一69 ;在国有企业, 90,

91 , 92 彭冲, 257 彭佩云, 193 彭真, 137, 187, 193 ;与文革, 198一99 ;与百花齐放, 139 彭湃41 彭德怀, 10, 180 , 183 , 197 ;与大跃进, 166 ,

167 ;与毛, 188 98 扬子江机械厂, 191一92 , 234 斯大林:与共产党, 6一7, 25 ;与中国内战, 21 , 31 , 35 ;与阶级划分, 109 ;与集体化, 54一55 ;逝世, 124 ;与经济, 154;与遗传学, 74一75 ;与大跃进, 316 ;与百花齐放, 143 , 144 ;与土改, 42;与毛, 129 , 136, 149 , 166, 184一85 , 292 ;与少数民族, 37;个人崇拜, 9 , 26 ;被清除, 27 , 134, 135 ;被指控, 9, 11 , 125 , 127 ,

184 , 193 ·另参见秘密报吿斯大林主义:谴责, 127, 132, 138 ;与百花齐放, 138 , 210 ;与毛, 82 , 84, 135 , 316 ; 与毛泽东思想, 335 , 337, 338 , 339 ;与迫害, 27一31.另参见去斯大林主义;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斯里兰卡, 322 , 330, 331 朝鲜, 130 朝鲜战争( 1950一1953 ) , 52 , 64 , 67, 73 , 82 ,

123 游击战, 7, 16一21 湖北, 258 , 271 湖南, 3 , 43 , 183 , 265 程海果(林希翎) , 14374 华沙, 131 , 133 华国锋, 1 , 305 , 311 , 312, 313 , 319 菲律宾, 321 , 322 , 330, 331 贵州, 52一53 , 66, 240 贸易协会.参见工会贸易政策, 14 , 173 , 304 越南, 17, 257 开门整风vs ,闭门整风, 137一39, 146, 148 ,

149 , 150, 205 阶级斗争:与反右运动, 150, 151 ;与资本主义, 26, 72 , 228 ;与阶级划分, 109 ; 与共产主义胜利, 17一18 ;与去斯大林化, 127, 137 ;在东德, 125 ;与大跃进, 152 , 153 , 155 , 163 , 166, 167 , 168 , 180, 181 ;与百花齐放, 139 , 144 ;与知识分子, 185 ;与土改, 17 , 40一45 , 61 ;毛关于, 4273 , 188 ;在毛泽东思想, 335 , 336一37 , 339, 340, 341 ;党内, 26, 188 ;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 121 ;与科学, 72, 74一75 ;与中苏分裂, 194 ;社会主义下, 6, 151 , 181 , 189, 337;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 191 , 193 ;与社会主义转型, 14879 阶级标签:与反右运动, 150一51 ;划分,

108一12 , 113 , 357n4 ;与共产党党员, 107 , 108 , 110, 112 ;与清队运动, 274 ; 与大学招生, 269 ;对联上, 215 ;在文革里, 210, 215一17, 223 ;与性别, 112 ; 与大跃进 169, 181 ;与百花齐放 145 ; 世袭, 1 1 1 , 113 ;与土改, 47, 49; vs ·精英, 113一15 ;与机会, 112一17 ;与惩罚, 270, 298 ;与整风运动, 29;与红卫兵,

227, 229 ;注册登记, 63 雅诺什·科尔奈, 89 集体化, 7 , 53一60, 86 , 123一24;与农村合作社, 54, 55 , 93 ;负债劳动力, 57 ;与大跃进, 153 , 154, 156, 157一58 , 163 , 180, 181 ;与户口制度, 77 ;与百花齐放, 14778, 315 ;与工业, 57一58 ;与土改, 53 , 56 , 123 ;与生活标准, 58一59, 333 ;制造业的, 62 , 63 ;与毛, 54一55 ,

188 ;与毛泽东思想, 338 ;与公社组织,

56一57;与农民, 40 , 53 , 57 , 59 ;在波兰, 131 , 132 ;与后毛泽东时代改革, 343 ; 快速完成, 55一56 ;扺制, 9, 56;与农村经济, 56一59 , 60 ;服务业, 62 , 63 ;与社会结构, 56一59 ;苏联, 129, 178 , 334 ; 与政府采购系统, 57一60 云南, 52 , 258 冯雪峰, 134 黑市, 57 ·另参见易货贸易黑龙江, 241 ;文革在, 239, 240, 242 , 243 传统经济:与集体化, 56一59, 60 ;通胀,

32, 34, 70 ;与土改, 49一51 ;农村, 53 ,

56一59 , 60 ;社会主义转型, xii, 61 ,

148一49 ;城市, 61 , 62, 79 奥哈布, 131 干部:被虐待, 47 ;与反右运动, 149 ;在内战, 27 , 33一34 ;阶级背景, 29 ;与集体亻匕, 55 , 56 , 59 ;与文革, 200, 291 ;与林彪之死, 286 ; vs.专家, 174一75 ;在大跃进, 152 , 155一56, 158一59 , 161 , 164 65 , 168一69, 174一75 ;与百花齐放, 138 , 13970, 141 , 147一48 , 205 ;与信息, 118一19 ;与工会, 70 ;与土改, 33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 ;与毛泽东思想, 336 ;与党纪, xi, 24一25 , 38一39 ; 与政治运动, 52 , 271 , 274, 306 ;特权, 59, 117一19;迫害, 25 , 27一28, 120, 136, 159 ;与清明节抗议, 311 ;等级系

统, 117-19 ;与整风运动, 28 , 29, 120, 135 , 137, 193 , 197 , 199, 203 , 337 ;平反, 293一95 , 296 ;与秘密教门, 67 ;限制, 119一20 ;革命, 101 , 113 , 115 ;农村, 51一52, 59, 61 , 168一69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7一98 ; vs.秘密结社, 68一69 ;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一90, 191 ;在大学, 210 ;城市, 61 , 63 , 270 ;在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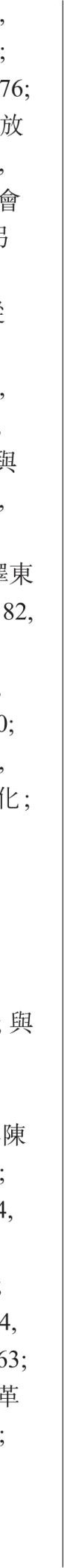
25 , 26, 27 新加坡, 322 , 342 新四军, 20一21 , 22 新教教堂, 64 新华社, 118 , 206, 312 新疆, 19, 36, 37 , 243 杨尚昆, 198 , 199 杨开慧, 307 杨庆堃, 4879 极左分子:批斗, 265 , 284, 318 ;批判, 288 ,

293 , 295 , 296 经济特区, 343 群众抗议, xiii;与文革, 5 , 11 , 13 , 3 18 ,• 与林彪之死, 286 ;在东欧, 126;与百花齐放, 9;在林彪事件之后, 289 , 293 ;有关生活标准, 233 , 234一35 , 286, 289, 300 , 317;在南京, 144, 146, 147 ;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 296, 297一98 , 301 ; 在江南门广场, 13 , 293 , 309一10, 343 · 另参见清明节抗议群众动员:反对官僚, 122 , 285 ;在内战中,

16, 31 , 33一34, 39, 151 , 179, 201 ;传统战争, 7, 18一19 , 33一34, 83 ;在文革中, 201 , 205一13 , 232一33 , 316, 332 ;在大跃进中, 154, 155 , 167, 173一74, 179 , 316; 与毛, 39, 320, 338 ;在农村地区, 46 ; 与社会主义经济, 79 , 98一99, 151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在城市地区,

62, 64 义和拳, 2 叶群, 204 解放军:与四六指示, 246, 247 ;攻击 250一52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65 ;与中央文革小组, 243一44 ;在内战中, 31-35 ; vs.民事控制, 293-302 304 ;在文革中, 4, 12, 198 , 220 , 235 , 24279, 257一58 , 261 , 316 ;与死亡总数, 334 ; 在黑龙江, 239 ;在一月革命, 238 ;与江青, 196 ;与土改, 407 1 ;在林彪事件之后, 288 ;与林彪, 197, 242 , 287 , 289一90 ;与毛, 198 , 242, 243一44, 245 , 289-90, 302 ;群众动员, 18-19 , 31 , 33一34, 80;军管, 263一86, 317 ;动机vs. 武器, 197 ;与政治运动, 282一83 ;与夺权, 240, 241 , 242一45 , 246 ;与造反派, 242一49, 257一58 , 261 ;与红卫兵, 207 , 218 , 221 ;与革委会, 230, 318 ;在农村地区, 52, 61 ;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98 ;夺权, 100 ;在城市地区, 62 , 63 ; 与武汉事件, 249一51 解放军报, 206 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 26, 72 , 228 ;全球亻匕, xii, 18 , 342 ;与毛, 8 , 1 1 , 188 , 338 , 340 , 341 ;市场导向政府, 344;与科学, 75 , 99 ;与社会主义经济, 89 , 91 , 99 , 186, 322 ;斯大林关于, 55 ;在苏联,

194 , 195 ;缺陷, 83 , 84 , 85 , 90 农民:作为债务劳动力, 57 ;作为共产党党员, 103 , 104;阶级划分, 109, 110 ;与集体化, 40, 53 , 57, 59 ;与文革, 291 ; 与大跃进, 154, 162 , 186 ;于百花齐放, 147-48 ;与土改, 50, 60 ;毛有关, 41 , 43 ;与军管, 266 ;民族主义, 17;与革命, 40一45 ;传统精神, 17 ; vs.城市工人, 61.另参见农业;农村地区农村一城市迁移, 57, 77, 78 , 332 农村市场, 53 , 182, 333 农村地区:与反右运动, 149 ;武装力量在, 60 ;下放, 235 , 269一70 , 284;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 52一53 ;共产党在, 15 , 20, 24 , 51一53 , 61 , 100, 103 , 104, 106 ;共产党党员在, 103 , 104, 106 ;内战在, 18 , 32 , 33 , 38 , 53 ;与阶级划分, 112 ;与共产党胜利, 16一17 ;文革在, 232 ;口粮配给在, 54, 57, 58 , 95 ;百花齐放在, 148 ;工业在, 174, 178 ;劳改在, 267,

269 ;与毛的遗产, 315 ;迁移, 57, 77, 78, 332 ;军管, 51一53 ;国民党在, 24 ; 与一打三反运动, 283 ;人口总数, 176 ; 贫困在, 331 , 332一33 ;难民, 173 ;下放者回来, 298一99 ;革命在, 38 , 40一60 61一62 ;社会结构在, 7 , 40一45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暴力在, 258 ·另参见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土改农业:与去斯大林化, 136, 137;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被用于, 158, 160, 174 ;与粮食出口, 173 ;与粮食采购,

53 , 171 , 172, 322 ;与粮食生产, 154, 157一60, 163一64, 170一74, 332, 333 ;与粮食配54 , 57 , 58 , 95 ;与大跃进, 153 , 154一55 , 157一61 , 170一71 , 178 , 316 ;与收入不平等, 331一32 ;与毛泽东思想, 338 ;方法, 160一61 ;自留地, 182, 184 , 188 ;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0,

181 , 183 , 184 ;与社会主义经济, 86, 321 , 322 , 332, 333 ;国家控制, 56一60; 有关统计, 170一71 ;生活水平, 8 , 14, 58, 333 ;目标, 154一55 ·另参见集体化; 农民;农村地区道教, 67 达尔文, 74 达赖喇嘛, 37 夺权, 23972 , 317 ;与解放军, 240, 241 , 24275 , 246 ;在第二个文革中, 296 ;与周恩来, 241 , 242 , 246 宁夏回族自治区, 265 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77一82, 319 ;与陈伯达, 26, 197 ;与清队运动, 281一82 ; 与去斯大林化, 9, 127, 128 , 137, 194, 195 ;与百花齐放, 9 , 135 , 136 , 137, 143 , 144, 210 ;与林彪, 13 , 286, 292 ; 忠字舞, 12, 281 ;在毛泽东思想, 124, 278 , 337一38 , 339 , 340 ;在军管下, 263 ; 与纠正大跃进, 187 ;与反对文化大革命, 285 ;仪式, 12, 278一82, 294, 300 与中苏分裂, 194 廖沫沙, 187 满洲里(东三省) , 36 , 62 ;在内战中, 4,

15一16, 19 , 31-32 , 33 , 34;传统战争在, 83 ;日本侵华, 3 ;群众动员在, 98 ;国民党在, 3 , 22 汉族, 36, 37 监视, 104一6 维吾尔, 37 腐败, 59, 119, 159 ;攻击, 62 , 76一77 , 80 ;与毛的遗产, 344 ;国民党, 68 , 80;与一打三反运动, 283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 , 190 , 191 蒙古, 36, 37 ;飞机坠毁在, 286, 289.另参见内蒙古蒯大富, 222 , 230, 258, 259, 260 , 261 , 265 裴多菲俱乐部, 132 制造业:集体化, 62, 63 ;家庭生产, 58 , 343 · 另参见工业赫鲁晓夫, 9 , 10, 11 , 127 , 128 , 195 , 320 ;批判斯大林, 128一30 , 135一36, 185 ;与匈牙利, 131 , 133 ;与毛, 153一54, 292, 339;与朝鲜, 130 ;与波兰, 131 , 132 ; 赶下台, 190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0,另参见秘密报吿赵紫阳, 242 , 300 价格控制, 86, 94一95 刘少奇:与反右运动, 151 ;与内战, 35 ;与清队运动, 274 ;集体化, 55 ;与文革, 196, 199, 200, 204 , 209, 212 , 222, 223 , 228 , 262 ;逝世, 13 , 294 ;降级, 223 ;与去斯大林化, 137, 138 ;与大跃进, 10, 181 , 182一84, 185 ;与百花齐放, 138 ;与毛, 10, 11 , 182一83 ;与党员的纪律, 23 ;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89一90, 191 ,

192 , 337 广州, 146 , 298 ;文革在, 243 , 24677, 248 ,

251一52 ;国民党在, 35 ;第二个文革在,

299, 301 广西, 21 ;文革在, 257一58 , 267 广东, 271 ;清队运动在, 275 ;文革在, 241一42 , 258 ;在大跃进中, 164 ;社会主义转型在, 49, 148 德国, 7 , 31 , 74, 83 ·另参见东德格罗·埃诺,

132 , 133

暴力:与清队运动, 272, 275 ;与集体化, 55 ;在文革中, 210一11 , 212, 240 ;派系的, 24579, 259一61 ;在大跃进, 162 , 164一65 ;在河南, 243 ;在土改, 33 , 46 ,

47 , 50一51 , 52 , 211 ;毛有关, 43一44 ,

217 , 224, 228 , 335一36;与军管, 243 , 266 , 268 ;反对, 224, 225一26 ;与造反派, 24579, 259一61 ;红卫兵, 215-19, 220 , 223一29 ;在革命中, 4375 ;在第二文化大革命中, 297;在大学, 210, 211 ; 在城市地区, 62 ;与武器, 253一55 ;针对妇女, 2 1 L另参见折磨潘复生, 239, 242 蒋介石: 1927年清洗共产党, 3 , 15 , 22 , 44, 45 , 68 ;有关共产党党纪, 23一24;在内战中, 16, 31 , 32 , 33 , 34, 35 ;与青帮, 68 ;与日本侵华, 19, 20, 22一24 ;与土改, 41 , 51 ;毛关于, 313 ;与少数民族,

36一37 ;个人崇拜, 26;在台湾, 23一24 卖淫, 7, 62, 69一70, 80 邓子恢, 55 , 154 邓小平:批判, 304一5 ;运动, 306, 307 , 311 ; 与政府管控, 295 ;在文革中, 200, 203 , 204 , 209, 212 , 223 ;降职, 13 ;与经济,

302 ;在百花齐放中, 138 ;与毛, 11 ,

302一5 , 312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18 , 342 ;与清明节抗议, 310一11 ;与红卫兵异见者, 228 ;平反, 294一95 ;与纠正大跃进错误, 182, 184;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3 邓拓, 139, 187 学生:录取, 305 ;与反五一六运动, 284 ;与反右运动, 149, 150 ;在北京, 258一62 ; 与关闭大学, 267一69 ;在文革中, 231 , 285 , 317;在民主运动中, 343 ;派系在, 212一13 ;中学, 213-19 , 267, 268 , 269一70 ;与百花齐放, 14278 , 315 ; 与一月革命, 238 ;与劳动改造, 263 , 269一70 ;毛关于, 150 ;与军管, 266 , 267 ;数量, 231 ;在大学, 207一13 ;与工作组, 210一13 ;与工人造反派, 233 ·另参见红卫兵

整风运动( 1942-1944 ) , 25 , 27-31 穆欣, 203 卫生保健, 320一21 辽宁, 258 缝纫机, 96, 328 联合国, 37 联指, 257 , 258 联动, 225-26 , 228 联总, 247 薄一波, 222 谢富治, 204, 217一18 , 227, 249 , 250, 274 韩国, 13 , 342 ; GDP, 322, 324, 325 , 326 ;土改在, 51 , 333 韩爱晶, 265 聂元梓, 208一10, 230, 259一61 ;与清队, 274; 与军管, 264一65 ;与造反派, 258 ;与红卫兵异见者, 226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2, 193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一1951 ) , 49, 69 , 77, 106, 124, 142 ;在农村地区, 52一53 ;在城市地区, 62 , 64, 65-66 垄断机制, 71 庐山会议( 1959 ) , 165一67, 178 , 183 , 185 ,

187, 197 泸州, 251 罗瑞卿, 198 , 199 谭厚兰, 265 边境地区, 105 , 149.另参见少数民族关锋, 203 , 284 苏联:顾问, 64 ;边界, 36;管理制, 80, 81 ,

174 ;与共产党, 15一16 , 100 ;与中国分裂, 11 , 82 , 97 , 193一95 ;中国干部在, 25 , 26, 27;与中国内战, 19, 31 , 32, 35 ; 与中国知识分子, 72一75 ;中国宣传攻势, 194一95 , 203 ;阶级划分在, 108一9, 110 ;与清队运动, 272 ;共产主义解体, 343 ;集体化, 54一55 , 57, 59, 124;与文革, 10, 13 , 205 , 228 ;去斯大林化在, 9, 11 , 121 , 124, 125一28 , 151 ;在东德,

126 ;经济, 89, 91 , 97, 325 , 326 ;饥荒, 55一56, 124 , 334 ;与大跃进, 157 ;与百花齐放, 138 , 140, 143 ;与匈牙利, 131 , 132-34;收入不平等在, 330, 331 ;克格勃, 104, 105 ;与土改, 42 ;与林彪, 287, 289 ;与毛, 99 ;与毛泽东思想, 337,

338一39, 341 ;与国民党, 35 ;与朝鲜, 130 ;与波兰, 131一32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 342 ;迫害128 , 129 , 200一201 , 205 ;配给95 ;发射卫星, 84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0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194;在二战中, 7, 83.另参见东欧;秘密报吿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25一26, 54,

82, 167 , 335 , 337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 , 55 苏联经济模式, xi, xiii, 6, 26, 99 ;萧条在,

176 , 178一79, 181 ;与大跃进, 153一57,

180 ;与收入不平等, 331一32 ;工业,

82一83 , 91 , 124, 233 , 234 ;与土改, 53 ,

123一24;与生活标准, 7一8 , 14 , 94一97,

233 , 326一27 ;资源约东在, 89一91 , 173 ,

176 ;成功, 7, 84, 320, 322 苏联模式: 官僚的, 80 , 81 , 120一21 , 123 ,

174, 201 , 340 ;与百花齐放, 140, 143 ,

210, 211 ;与毛, 26, 82 , 91 , 99, 315 , 321 , 335 , 340, 341 ;政治的, 80一81 , 82 ,

84, 104 , 105 , 140 , 143 , 210 , 211 ;修正,

154, 156, 186 饥荒:与内战, 32, 47;死亡率, 333一34 ;与大跃进, 4 , 10, 159 , 161一65 , 169一73 , 178 , 181 , 182, 184 , 316, 320 ;在河南

( 1943 ) , 334 ;在苏联, 55一56, 124, 334 铁托, 127 , 138 铁路:在抗日战争, 20一21 ;破坏, 232 , 235 , 236, 256, 297, 298 , 299, 301 , 303 ;」灰复, 299 , 303 ;安全, 105

# Blank Page







1. Nathan ( 1983), Wilbur ( 1983 )· [↑](#footnote-ref-1)
2. Kuhn ( 1980) , Rowe (2009, 149一296)· [↑](#footnote-ref-2)
3. Kuhn ( 1978), Platt (2012), Spence ( 1996) · [↑](#footnote-ref-3)
4. Esherick ( 1987), Silbey (2012) · [↑](#footnote-ref-4)
5. Rowe ( 2009, 149一296 )对此有非常好的综述总结。 [↑](#footnote-ref-5)
6. Young ( 1983 , 217一228) · [↑](#footnote-ref-6)
7. Ch'i ( 1976), Nathan ( 1976), Gasster ( 1980)·

   Isaacs ( 1961 ), Wilbur ( 1983) · [↑](#footnote-ref-7)
8. Mitter (2013 , 5一6)· [↑](#footnote-ref-8)
9. Wilbur ( 1983 , 620-672 )描述了分裂和清洗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也分裂了国民党本身。所提及的党内人士来自于Lee ( 1991 , 16一17 )。 [↑](#footnote-ref-9)
10. Ch ' en ( 1986, 204一216 ;关于人数的预估,参看页198 ) ,Dreyer(1995, 185一 200 ;关于人数的预估,参看页186一187及199 )。 [↑](#footnote-ref-10)
11. 参见Stinchcombe ( 1965 , 169一180 )和Tilly ( 1978, 189一222 )。 [↑](#footnote-ref-11)
12. Schwartz ( 1951 )提到了对于这一观点的早期表述。 [↑](#footnote-ref-12)
13. Tayl。r ( 1940 )中有这一争议的最早版本,之后在Johns。n ( 1962 )处有具体阐释。 [↑](#footnote-ref-13)
14. Selden ( 1971 )是对这种解释有影响的早期倡导者。 [↑](#footnote-ref-14)
15. 这与中国和越南作为阶级冲突的表现的更广泛的解释是一致的,例如 Moore ( 1966 )及Paige ( 1975 )。 [↑](#footnote-ref-15)
16. Thaxton ( 1983) and Marks ( 1984),承接了Scott ( 1976 )的「道义经济学」观点。 [↑](#footnote-ref-16)
17. Hofheinz ( 1969, 1977) · Benton ( 1992 )对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撤离后共产主义力量在中国南方的活动的详细描述强调了这一点。

    Van Slyke ( 1986, 651一652)· [↑](#footnote-ref-17)
18. Van Slyke ( 1986 674 676). [↑](#footnote-ref-18)
19. Westad (2003 , 61 )· [↑](#footnote-ref-19)
20. Dreyer ( 1995 317 318), Van Slyke ( 1986, 621 )· [↑](#footnote-ref-20)
21. Taylor (2011 , 142) · [↑](#footnote-ref-21)
22. 这些事件以「西安事变」著称(Ch'en 1986, 226一229 )。 [↑](#footnote-ref-22)
23. Taylor (2011 , 150) · [↑](#footnote-ref-23)
24. Ch'i ( 1982, 4273), Mitter (2013 , 98一108), Yang Tianshi (2011 ). Harmsen ( 2013 ) 对于1937年淞沪会战国民党惨烈的防御有专书。 [↑](#footnote-ref-24)
25. Mitter (2013 , 124一144)· [↑](#footnote-ref-25)
26. Taylor (2011 168 169) ; MacKinnon (2011 )· [↑](#footnote-ref-26)
27. Van Slyke ( 1986, 613 ), Benton ( 1999),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290)· [↑](#footnote-ref-27)
28. Van Slyke ( 1986, 613一614). [↑](#footnote-ref-28)
29. Van Slyke ( 1986, 63 1 ). [↑](#footnote-ref-29)
30. 更激进军事抵抗的拥护者包括周恩来、王明、彭德怀和朱德(Apterand

    Saich 1994, 58一59 ;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13一314 )  [↑](#footnote-ref-30)
31. Van Slyke ( 1986 672一673 )· [↑](#footnote-ref-31)
32. Van Slyke ( 1986, 676一681 ) ;亦可参见Yang Kuisong ( 2011 )及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44一51 )描述了这一时期河北中部某县城抵抗活动的毁灭。 [↑](#footnote-ref-32)
33. Taylor (2011 , 168一169) · [↑](#footnote-ref-33)
34. Ch'i ( 1982, 68一81 ), Van Slyke ( 1986, 705一709), Wang (2011 )· 29 Ch' i ( 1982, 81 )· [↑](#footnote-ref-34)
35. Eastman ( 1984, 156)· [↑](#footnote-ref-35)
36. van de Ven (2011 )· [↑](#footnote-ref-36)
37. Eastman ( 1984, 130);亦可参见Drea and van de Ven ( 2011 )。 [↑](#footnote-ref-37)
38. Eastman ( 1984, 136)· [↑](#footnote-ref-38)
39. Taylor (2011 , 297一298)· [↑](#footnote-ref-39)
40. Lüthi (2008, 25一26) · [↑](#footnote-ref-40)
41. Wilbur ( 1983 , 719一720) · [↑](#footnote-ref-41)
42. Ch'i ( 1982, 23)· [↑](#footnote-ref-42)
43. Ch'i ( 1982, 37)· [↑](#footnote-ref-43)
44. Ch'i ( 1982, 40一82)· [↑](#footnote-ref-44)
45. Eastman ( 1984, 207一208) · [↑](#footnote-ref-45)
46. Dickson ( 1993), Eastman ( 1981 ), Taylor (2011 , 191一196, 212一217) · [↑](#footnote-ref-46)
47. Averill ( 1995 , 96一99; 2006, 389一391 ), Guillermaz ( 1972, 216一217)· [↑](#footnote-ref-47)
48. Averill (2006, 390);亦可参见Pantsov and Levine ( 2012, 239一245 )。 [↑](#footnote-ref-48)
49. Rowe (2007, 310一316, at 313) · [↑](#footnote-ref-49)
50. Rowe (2007, 313一315); Benton ( 1992, 313一314)· [↑](#footnote-ref-50)
51. Benton ( 1992, 239一240, 264, 282一283 , 316一317, 337一339) · Apter and Saich ( 1994, 49一54)把清洗描述为当地游击队和中央指挥部之间的冲突。亦可参见Saich ( 1996, 530一550 )。 [↑](#footnote-ref-51)
52. 这篇文章是运动期间高级干部研究的「第一份重要文件」(Apter and Saich 1994, 275 , 277 )。 [↑](#footnote-ref-52)
53. Teiwes and Sun ( 1995 , 341一342), Van Slyke ( 1986, 616). [↑](#footnote-ref-53)
54. Benton ( 1975 , 341一342);亦可参见Apter and Saich ( 1994, 54一59 )。 [↑](#footnote-ref-54)
55. Lüthi (2008, 26一29),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17一3 1 8), Teiwes and Sun ( 1995)· 57 Leese (2011 , 8一12)· [↑](#footnote-ref-55)
56. Wylie ( 1980, 10一12) · [↑](#footnote-ref-56)
57.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9 ) , Hua-YuLi (2006, 91一101 )· [↑](#footnote-ref-57)
58. Hua-Yu Li (2006, 101一102)· [↑](#footnote-ref-58)
59. Tucker ( 1977), Walder ( 1991 ) · [↑](#footnote-ref-59)
60. Hua-Yu Li (2010),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35), Wylie ( 1980)· [↑](#footnote-ref-60)
61. Teiwes ( 1976, 20一32) · [↑](#footnote-ref-61)
62. Seybolt ( 1986, 57一65)· [↑](#footnote-ref-62)
63. Teiwes Sun 1995 , 364 365 370一375), [↑](#footnote-ref-63)
64. Seybolt ( 1986, 66) · [↑](#footnote-ref-64)
65. Seybolt ( 1986, 67) · [↑](#footnote-ref-65)
66. Teiwes and Sun ( 1995 , 373一375), Walder (2009, 15一16) · [↑](#footnote-ref-66)
67. Seybolt ( 1986, 40) · [↑](#footnote-ref-67)
68.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348) · [↑](#footnote-ref-68)
69. Westad (2003 , 122一123 ). [↑](#footnote-ref-69)
70. Levine ( 1987, 224一226)· [↑](#footnote-ref-70)
71. Dikötter (2013 , 64一74), Westad (2003 , 134). [↑](#footnote-ref-71)
72. Levine ( 1987, 229)· Thaxton ( 2008, 83一88 )对中国北部一个村庄的描述也强调了内战期间共产党对于农村人口采用强制性手段进行动员工作的巨大成 [↑](#footnote-ref-72)
73. Westad (2003 , 198-199). [↑](#footnote-ref-73)
74. Westad (2003 , 199一208) [↑](#footnote-ref-74)
75. Dikötter (2013 , 3一8, 20一22). [↑](#footnote-ref-75)
76. Yick ( 1995) · [↑](#footnote-ref-76)
77. Dikötter (2013 , 22一32), Westad (2003 , 221一255)· [↑](#footnote-ref-77)
78. Brook (2010, map on 41 ) · [↑](#footnote-ref-78)
79. Chen (2007, 132-133), westad (2003 , 234一235) ·这种立场的转变和二战后在苏联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例异曲同工一-一斯大林首次强调了苏俄在「文化、启蒙运动与边境秩序」上所起到的作用(Service 2004, 496797 )。 [↑](#footnote-ref-79)
80. Gao (2007) · [↑](#footnote-ref-80)
81. Goldstein ( 1989, 58一66) · [↑](#footnote-ref-81)
82. Goldstein ( 1989, 522一610) ; Westad (2003 , 92一94)· 106 Goldstein (1989, 619一690) · [↑](#footnote-ref-82)
83. Goldstein ( 1989, 690一736) ; Westad (2003 , 92一94)· [↑](#footnote-ref-83)
84. Chen (2007, 157一159) [↑](#footnote-ref-84)
85. 另一个早期倡导者是广东省中国共产党活动家彭湃, 1927年,他在广东省东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1929年被国民党处决(Galbiati 1985 )。 [↑](#footnote-ref-85)
86. Pantsov and Levine (2012, 156一157)· [↑](#footnote-ref-86)
87. 毛泽东( 1926a )。 [↑](#footnote-ref-87)
88. 毛泽东( 1926b )。 [↑](#footnote-ref-88)
89. 毛泽东 1926e 。 [↑](#footnote-ref-89)
90. 毛泽东( 1926d )。 [↑](#footnote-ref-90)
91. Wilbur ( 1983 , 591-594) · [↑](#footnote-ref-91)
92. Brandt ( 1958 , 88一90), Taylor (2011 , 61一62), Wilbur ( 1983 , 606一608)· 10 毛泽东( 1927b )。 [↑](#footnote-ref-92)
93. 毛泽东( 1927a , 430 )。 [↑](#footnote-ref-93)
94. 毛泽东( 1927a , 446 )。 [↑](#footnote-ref-94)
95. 毛泽东( 1927a , 434735 )。 [↑](#footnote-ref-95)
96. 毛泽东( 1927a , 467 )。 [↑](#footnote-ref-96)
97. 毛泽东( 1927a , 433 )。 [↑](#footnote-ref-97)
98. Schram ( 1995 , 36) ;亦可参见Pantsov and Levine ( 2012, 196 )。 [↑](#footnote-ref-98)
99. Wilbur 1983 , 673一681 , 690一696 · [↑](#footnote-ref-99)
100. Hinton ( 1966, 110一117) · [↑](#footnote-ref-100)
101. Hinton ( 1966, 132-138) · [↑](#footnote-ref-101)
102. Hinton ( 1966, 139一146) · [↑](#footnote-ref-102)
103. Hinton ( 1966, 222一240) · [↑](#footnote-ref-103)
104. Hinton ( 1966, 275一3 1 1 )· [↑](#footnote-ref-104)
105. Hinton ( 1966, 332一366).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92-110)描述在此期间另一个北方村庄发生的类似暴力事件:最初的恐怖主义土地改革是通过制造阶级斗争,然后是两拨工作小组来纠正此前运动的错误。 [↑](#footnote-ref-105)
106. Thaxton ( 2008 , 70一83 )描述了另一个村庄的革命过程,这个村庄距离辛顿研究的村庄不远,在内战期间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权力交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地区每一次权力交接时都受到了暴力报复。这使得最残酷的暴力民兵领袖进入了乡村新政府的高层。 [↑](#footnote-ref-106)
107. Ch'ü ( 1962), Rowe (2009, 48一62), Siu ( 1989, 41一87)· [↑](#footnote-ref-107)
108. Barkan ( 1990), Duara ( 1990), Watson ( 1990) · [↑](#footnote-ref-108)
109. Yang ( 1959 , 103 , 106) ·亦可参见Siu ( 1989, 88一115 )对附近县城的描述。 [↑](#footnote-ref-109)
110. Yang ( 1959, 109一110)· [↑](#footnote-ref-110)
111. Yang ( 1945 , 143一156 and 173一189 )描述了山东北部的相似村庄。 [↑](#footnote-ref-111)
112. Yang ( 1959 , 146一166) , [↑](#footnote-ref-112)
113. Yang ( 1959, 167一175) · [↑](#footnote-ref-113)
114. Yang ( 1959, 169, 174).亦可参见Huaiyin Li (2009, 5)和Siu ( 1989, 116一142)。 [↑](#footnote-ref-114)
115. Riskin ( 1987, 51). [↑](#footnote-ref-115)
116.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84, 86, 105) and Huaiyin Li (2009, 1 1一19)从村庄层面详细描述了土地改革。 [↑](#footnote-ref-116)
117. Wang ( 1999, 324-328), Tien ( 1989, 23-24)· [↑](#footnote-ref-117)
118. Bernstein ( 1968) · [↑](#footnote-ref-118)
119. Brown (2007) · Dlkötter (2013 , 76一80)记录了中国南方地区广泛的集体反抗和个别叛乱。 [↑](#footnote-ref-119)
120. Strauss (2006)· [↑](#footnote-ref-120)
121. Dikötter (2013 , 83 )· [↑](#footnote-ref-121)
122. Schoenhals (2008b, 72) ·这一数据包括城乡地区,但不包括土地革命期间的死亡人数。Schoenhals ( 2008b, 68一73 )提供了对死亡人数不同估计的批判性评述。Strauss ( 2006, 91 )指出被处以死刑的人估计高达五百万之多。 [↑](#footnote-ref-122)
123.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111一122), Lardy ( 1987b) · [↑](#footnote-ref-123)
124. Oi ( 1989, 4374), Shue ( 1980, 214一245)· [↑](#footnote-ref-124)
125. Cheng and Selden ( 1994, 660)· [↑](#footnote-ref-125)
126. Bernstein ( 1967) · [↑](#footnote-ref-126)
127. Oi ( 1989, 1372), Siu ( 1989, 143一167)· [↑](#footnote-ref-127)
128. Tucker ( 1990, 69一145) · [↑](#footnote-ref-128)
129. 根据serice ( 2004, 566 ) :「此处展现出了惊人的亻为善。如果说曾经有人试图通过纯粹的意志和暴力来改变一个经济体,那一定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的领导下。」 [↑](#footnote-ref-129)
130. 毛泽东( 1977 )。 [↑](#footnote-ref-130)
131. Hua- Yu Li (2006, 61一94) · [↑](#footnote-ref-131)
132. Teiwes and Sun ( 1999, 20一52, 70一77)· [↑](#footnote-ref-132)
133. RISkin ( 1987, 86)· [↑](#footnote-ref-133)
134. Bernstein ( 1967), Conquest ( 1986) · [↑](#footnote-ref-134)
135. Bernstein ( 1967), Dikötter (2013 , 208一225) ·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122一198) , Huaiyin Li (2006 ; 2007 ; 2009, 23-49) , and Thaxton (2008 , 89一117)追溯了从家庭农场到集体一波三折的变化过程。以上文章都具体描述了每个阶段遭遇的严重问题和很多家庭农场微妙而公开的反抗一一一在后期尤为明显。Bernstein ( 1967 )、Liu和Wang ( 2006 )分析了当地干部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使得集体化速度加快,甚至快于预期速度。 [↑](#footnote-ref-135)
136. Oi ( 1989, 132一145). [↑](#footnote-ref-136)
137. Oi ( 1989, 5) · [↑](#footnote-ref-137)
138. Oi ( 1989, 43一65)· [↑](#footnote-ref-138)
139. Ash (2006), Oi ( 1989, 55)· [↑](#footnote-ref-139)
140. Oi ( 1989, 135一137), Walder ( 1986, 54一56) · [↑](#footnote-ref-140)
141. Burns ( 1981 ), Oi ( 1989, 138一141 ) · [↑](#footnote-ref-141)
142. Huaiyin Li (2009, 44一47) · [↑](#footnote-ref-142)
143. Huaiyin Li (2009, 5 )· [↑](#footnote-ref-143)
144. Pepper ( 1999, 386一390) , Wakeman (2007)·

     Strauss ( 2006 )也提到了第四种运动,旨在动员民众完成小区任务,如植树、灭鼠灭蚊,或清理城市小区的健康危害。 [↑](#footnote-ref-144)
145. Gao (2004, 69-79), Vogel ( 1969, 46-51 )· [↑](#footnote-ref-145)
146. Gao (2004, 47一51 ), Vogel ( 1969, 51一55)· [↑](#footnote-ref-146)
147. Brown (2012, 16一22), Gao (2004, 5 1一64), Vogel ( 1969, 55一60), Wakeman (2007). [↑](#footnote-ref-147)
148. Wakeman (2007, 23一25)· [↑](#footnote-ref-148)
149. Wakeman (2007, 43)·

     Dikötter (2013 , 50一51 , 53一55), Wakeman (2007, 52一58).

     Ⅱ Dikötter (2013 , 104一120, 124一127), Hooper ( 1986)· [↑](#footnote-ref-149)
150. Lieberthal ( 1980, 53一77), Strauss (2002)· Dikötter (2013 , 83一99)主要基于党内档案描绘了运动的生动场面。 [↑](#footnote-ref-150)
151. Gao (2004, 140一146), Vogel ( 1969, 62一65), Yang (2008) · [↑](#footnote-ref-151)
152. Gao (2004, 144). [↑](#footnote-ref-152)
153. Schoenhals (2008b , 72) ;亦可参见Gao ( 2004, 140 )及Strauss ( 2002, 87-89 ; 2006, 901 )。Dikötter ( 2013 , 99一100 )基于党内档案发现,城乡地区的可信死刑数据估计在二百万人左右。 [↑](#footnote-ref-153)
154. Yang (2008, 109) · [↑](#footnote-ref-154)
155. Dikötter (2013 , 89一92), Strauss (2002, 89一92), Yang (2008, 110)· [↑](#footnote-ref-155)
156. Yang (2008 , 112一120)· [↑](#footnote-ref-156)
157. Dikötter (2003)· [↑](#footnote-ref-157)
158. Dikötter (2003); Dikötter (2013 , 243一254)· [↑](#footnote-ref-158)
159. Hung (2010, 400) · [↑](#footnote-ref-159)
160. Lieberthal ( 1973 , 245一250; 1980, 22一25), Hershatter ( 1986, 120一131 ) · [↑](#footnote-ref-160)
161. Martin ( 1996, 79一189), Wang ( 1967)· [↑](#footnote-ref-161)
162. Lieberthal ( 1973 , 250一255 ; 1980, 60一77). [↑](#footnote-ref-162)
163. Lieberthal ( 1973 , 261一264)· [↑](#footnote-ref-163)
164. Dikötter (2013 , 51一53)· [↑](#footnote-ref-164)
165. Henriot ( 1995), also Hershatter ( 1997)· [↑](#footnote-ref-165)
166. Henriot ( 1995)· [↑](#footnote-ref-166)
167. Hershatter ( 1986, 210-240), Perry ( 1993 , 109-237)· [↑](#footnote-ref-167)
168. Perry (2007)、 [↑](#footnote-ref-168)
169. Perry (2007) · [↑](#footnote-ref-169)
170. Andreas (2009, 20一22). [↑](#footnote-ref-170)
171. Chen ( 1960, 33 )· [↑](#footnote-ref-171)
172. Chen ( 1960, 31一33 )· [↑](#footnote-ref-172)
173. Gao (2004, 146-151 ) · [↑](#footnote-ref-173)
174. Dikötter (2013 , 180一187)· [↑](#footnote-ref-174)
175. , 2)· [↑](#footnote-ref-175)
176. Chen ( 1960 [↑](#footnote-ref-176)
177. Chen ( 1960, 62一63 )· [↑](#footnote-ref-177)
178. , 63 64 · [↑](#footnote-ref-178)
179. Joravsky ( 1970, 40一54) · [↑](#footnote-ref-179)
180. 苏联科学家梅德韦杰夫(Medvedev) ( 1969, 134 )将李森科发表在他自己的杂志上的科学发现称为「欺骗」,并对「这些无知且可耻的文章被宣传为科学进步的成就」而感到痛惜,这些「神话般的转变」主要来源于斯大林的权威。 [↑](#footnote-ref-180)
181. Medvedev ( 1969, 134) · [↑](#footnote-ref-181)
182. Joravsky ( 1970), Medvedev ( 1969)·中国领导层最终意识到米丘林是错的,李森科是江湖骗子, 1956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中国科学家拆穿了他的理论(Lüthi, 2008, 52 53 。 [↑](#footnote-ref-182)
183. 参见苏联科学家KI。chk。的中国回忆录( 1964, 10一33 , 64-65, 82-88 )。 [↑](#footnote-ref-183)
184. So (2002, 694)· [↑](#footnote-ref-184)
185. So (2002, 698)· [↑](#footnote-ref-185)
186. Dikötter (2013 , 157一163 ), Gao (2004, 159一163), Sheng (2006)· [↑](#footnote-ref-186)
187. Sheng (2006, 72一79). [↑](#footnote-ref-187)
188. Dikötter (2013 , 163 ), Sheng (2006, 76)· [↑](#footnote-ref-188)
189. Dikötter (2013 , 163一173 ), Dillon (2007), Gao (2004, 160一179), Gardner ( 1969), Lieberthal ( 1980, 125一152)· [↑](#footnote-ref-189)
190. 国家统计局( 1983 , 214 )。 [↑](#footnote-ref-190)
191. Cheng and Selden ( 1994, 655一657) · [↑](#footnote-ref-191)
192. Cheng and Selden ( 1997, 32-46) · [↑](#footnote-ref-192)
193. Whyte and Parish ( 1984, 22一23)· [↑](#footnote-ref-193)
194. Whyte Parish 1 8一22)· [↑](#footnote-ref-194)
195. 国家统计局( 1983 , 214 )。 [↑](#footnote-ref-195)
196. Whyte and Parish ( 1984, 37一42) , Walder ( 1986, 68一74). [↑](#footnote-ref-196)
197. Davis-Friedmann ( 1991 , 102一116), Walder ( 1986, 44一45) , Whyte and Parish ( 1984, 71一76) · [↑](#footnote-ref-197)
198. Henderson Cohen 1076), Whyte and Parish ( 1984)· [↑](#footnote-ref-198)
199. Kirby (2006, 881一882) · [↑](#footnote-ref-199)
200. Commissl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1939), Hua-Yu Li (2010)· 3 Hua-Yu Li (2006, 1 , 170). [↑](#footnote-ref-200)
201. Kirby (2006, 882), Lüthi (2008 , 39一40)· [↑](#footnote-ref-201)
202. Dittmer ( 1992, 17一25)· [↑](#footnote-ref-202)
203. Kaple ( 1994)· [↑](#footnote-ref-203)
204. Gatrell and Harrison ( 1993) · [↑](#footnote-ref-204)
205. 根据Maddison ( 2006 )提供的可下载数据库计算得出。 [↑](#footnote-ref-205)
206. 同上,页478。根据可下载数据库计算得出。 [↑](#footnote-ref-206)
207. 同上,页279。根据可下载数据库计算得出。 [↑](#footnote-ref-207)
208. Halpern ( 1993 , 110)· [↑](#footnote-ref-208)
209. Komai ( 1992, 160一202 )对于增长模式的特点有所描述; zaieski ( 1980 )探讨了苏联这种增长模式的源头和演进方式。 [↑](#footnote-ref-209)
210. 此类批评的详尽描述见Baran and Sweezy ( 1966 )。 [↑](#footnote-ref-210)
211. Kornai ( 1979)· [↑](#footnote-ref-211)
212. 例如,可以参考Berliner ( 1957 ) ,他的研究依托于对从苏联流亡出来在战后欧洲担任经理职位的人的访谈。 [↑](#footnote-ref-212)
213. Walder ( 1992)· [↑](#footnote-ref-213)
214. 根据Komai ( 1992, 175 )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这些数据涵盖了两个独立时间段内( 1965一1973与1973一1983 )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和7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工业投资在全国投资当中所占比重最低为匈牙利的34% ,最高为中国的54% ;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最低为丹麦的16% ,最高为英国的32%。根据Gregory ( 2004, 122一123 ) ,「对比研究发现,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经济颇为不同。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以来对重工业和国防投入颇多,服务、外贸较少,投资率更高,城镇化率更低。」 [↑](#footnote-ref-214)
215. 根据Komai ( 1992, 187 )数据进行计算。该研究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三个国家与法国、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 [↑](#footnote-ref-215)
216. Henderson and Cohen ( 1984), Walder ( 1986). [↑](#footnote-ref-216)
217. 其他社会主义经济体允许出现工作调整;中国对于换工作的严苛限制是为了防止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此外还因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 Walder 1986, 68一75 )。 [↑](#footnote-ref-217)
218. 同上, 40一43 Whyte and Parish ( 1984, 71一76) · [↑](#footnote-ref-218)
219. 这一数据指的是天津,来自于Walder ( 1992 )文章当中所引用的调查数据。同一项调查显示, 44%的人口居住在当地政府提供的公房当中, 18%居住在自有房当中,房子主要来源于1949年之前家庭继承。 [↑](#footnote-ref-219)
220. Walder ( 1986, 59一67)· [↑](#footnote-ref-220)
221. Zaleski ( 1980, 465一481 )· [↑](#footnote-ref-221)
222. Huenemann ( 1966), Whyte and Parish ( 1984, 85一100) · [↑](#footnote-ref-222)
223. Walder ( 1986, 210一212)· [↑](#footnote-ref-223)
224. Kornai ( 1959), Lewin ( 1974), [↑](#footnote-ref-224)
225. Baylis ( 1974)· [↑](#footnote-ref-225)
226. 早在战前就出现了相关讨论。在提出这些观点的战后经济学家当中,最为著名的包括Kornai ( 1959), Lange (Lange and Taylor 1964), Liberman ( 1971 ), and Sik ( 1966; 1967 ; 1972)。 [↑](#footnote-ref-226)
227. Fung ( 1982), Lin ( 1981 ) · [↑](#footnote-ref-227)
228. 毛泽东在他未经发表的阅读笔记当中提出了对后期斯大林经济学的反对意见,他阅读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晚年的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1950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service ( 2004, 566一567 ) 描述了斯大林时代晚期社会主义经济学当中的主体,以及他们如何修正战前的有关教条。 [↑](#footnote-ref-228)
229. 同上,第9卷,页4078。 [↑](#footnote-ref-229)
230. 同上,第12卷,页1227。 [↑](#footnote-ref-230)
231. 同上,第12卷,页1229。

     参看Lee ( 1991 , 56一57 )。

     这些数据是根据Walder, Li, and Treiman ( 2000 )文中的调查数据所计算得出的。 [↑](#footnote-ref-231)
232. 苏联也有类似的模式,参看Hough ( 1977 )。 [↑](#footnote-ref-232)
233. gel ( 1965 )是第一位研究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政治压力的学者; Whyte ( 1974 )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分析了这些不同。 [↑](#footnote-ref-233)
234. Lewis ( 1963 , 106一107), [↑](#footnote-ref-234)
235. 本段根据Li and Walder ( 2001 )。 [↑](#footnote-ref-235)
236. 关于年轻人面临这一体系提供的就业机会时的选择,以及这样的机会在初届中年之际是如何变少的, Oksenberg ( 1968 , 64一65)可能是第一个做出描述的学者。 [↑](#footnote-ref-236)
237. 本段和下段的数据来自于Walder, Li, andTreiman ( 2000 )。正如前面一些段落,这些数据并不是百分数,而是根据事件一历史模型估计出来的概率。

     数据反映了人的特性是如何影响加入共产党的概率。 [↑](#footnote-ref-237)
238. 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 [↑](#footnote-ref-238)
239. Fitzpatrick ( 1993) · [↑](#footnote-ref-239)
240. Fitzpatrick ( 1979)· [↑](#footnote-ref-240)
241. Fitzpatrick ( 1978), Tucker ( 1977) · [↑](#footnote-ref-241)
242. Fitzpatrick (2005 , 24, 37一49). [↑](#footnote-ref-242)
243. 同上,页14一18。 [↑](#footnote-ref-243)
244. Walder and Hu (2009)· [↑](#footnote-ref-244)
245. 参nBrown (2015)、Leese (2015)及Yang (2015)。 [↑](#footnote-ref-245)
246. Croll ( 1984 )· [↑](#footnote-ref-246)
247. Stacey ( 1983) · [↑](#footnote-ref-247)
248. 本段根据Walder and Hu ( 2009, 1413 ) ; Li and Walder ( 2001 ) 当中有类似的 [↑](#footnote-ref-248)
249. Lang 1946 · [↑](#footnote-ref-249)
250. Walder (2009, 23)· [↑](#footnote-ref-250)
251. Walder(1995).在成分历史背景调查数据可用之前, Oksenberg ( 1968 , 67 )得出了类似的观察结论:「一旦有人选择了体制外的目标,那么他之后就不能够去追求体制内所提供的目标。」 [↑](#footnote-ref-251)
252. 本段和后一段根据Walder, Li, and Treiman ( 2000, 200 )所撰写。Bian, Shu, andLogan 2001 根据不同的一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footnote-ref-252)
253. Li and Walder (2001 , 1398 , 1402)· [↑](#footnote-ref-253)
254.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0 , vol. 14 , 1224一1231 )。 [↑](#footnote-ref-254)
255. Schoenhals ( 1985 · [↑](#footnote-ref-255)
256. Baring ( 1972, 3一49), Bruce (2003 , 159一165) · [↑](#footnote-ref-256)
257. Kramer ( 1999, 13)· [↑](#footnote-ref-257)
258. 同上,页15。 [↑](#footnote-ref-258)
259. 同上,页15一17。 [↑](#footnote-ref-259)
260. 同上,页17一22 ; Ostermann (2001 , 113一142)· [↑](#footnote-ref-260)
261. Baring ( 1972, 51一113 ), Bruce (2003 , 165一199), Kramer ( 1999, 40一45 , 48一50, [↑](#footnote-ref-261)
262. 一54), Ostermann (2001 , xxxi—xxxvi, 1一21 ) · [↑](#footnote-ref-262)
263. Brown (2009, 234) , Kecskemeti ( 1961 , 40一46) , Knight ( 1993 , 194一200, 203一 224), Taubman (2003 , 250一263) · [↑](#footnote-ref-263)
264. Nagy ( 1957 )撰写了一篇长度能够成书的报吿,为1955到1956年期间后斯大林时代这些更为温和的措施辩护,这一举措让他成为匈牙利去斯大林化的旗帜性人物。 [↑](#footnote-ref-264)
265. Applebaum (2012, 437), Kramer ( 1999, 5一6), Taubman (2003 , 275一277)· [↑](#footnote-ref-265)
266. Brown (2009 , 203一209), Johnson ( 1972, 65一121 ), Rusinow ( 1977, 32一70) · [↑](#footnote-ref-266)
267. Brown (2009 , 236一243) · [↑](#footnote-ref-267)
268. 同上,页240一243 ; Taubman (2003 , 270一271 )· [↑](#footnote-ref-268)
269. Khrushchev ( 1962, S20-S21 ) · [↑](#footnote-ref-269)
270. Taubman (2003 , 271一273) ·演讲的英文全文详见Khrushchev ( 1962 )。 [↑](#footnote-ref-270)
271. Taubman (2003 , 274)· [↑](#footnote-ref-271)
272. Lüthi (2008 , 4879), Taubman (2003 , 277一282)· [↑](#footnote-ref-272)
273. Taubman (2003 , 290)· [↑](#footnote-ref-273)
274. 根据一种说法,一位驻守在华沙的以色列情报人员拿到了副本,将报吿传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局又马上通过美国国务院传给了《时代》周刊(Taubman2003,284)。另一种说法认为,据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回忆,他亲自将讲稿交给了外媒记者(Leese2011, 29一30 )。 [↑](#footnote-ref-274)
275. Leese 2011 30) · [↑](#footnote-ref-275)
276. Kramer ( 1998, 168一174), Machcewicz (2009, 97一124) · [↑](#footnote-ref-276)
277. Machcewicz (2009, 125一157)· [↑](#footnote-ref-277)
278. Kramer ( 1998 , 168一174) , Machcewicz (2009, 158一189, 241一252) , Taubman 2003 291一294)· [↑](#footnote-ref-278)
279. Kecskemeti ( 1961 , 17一39, 71一82). [↑](#footnote-ref-279)
280. 裴多菲俱乐部是以一位匈牙利爱国主义诗人的名字而命名的,这位诗人领导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俱乐部的许多成员都是年轻的党员和年轻的团员积极分子,他们倾向于走改革路线(Applebaum2012, 448755 ; Brown2009, 279一280 )。 [↑](#footnote-ref-280)
281. Kecskemeti ( 1961 , 47-82), Taubman (2003 , 290)· Sebestyen ( 2006 )回意了这些事件,并且还为布达佩斯发生的街斗和后续镇压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描述。 [↑](#footnote-ref-281)
282. Brown (2009, 278一288), Kramer ( 1998, 175一210), Taubman (2003 , 294一299)·

     See also Ekiert 1996 49一98 , [↑](#footnote-ref-282)
283. Goldman ( 1967, 58一66, 119一122, 129一139) · [↑](#footnote-ref-283)
284. Lin (2009, 484一495) · [↑](#footnote-ref-284)
285. 同上,页523一525。 [↑](#footnote-ref-285)
286. Chen ( 1960, 88一90), Dikötter (2013 , 187一189), Goldman ( 1967, 129一157), Lin (2009, 501一521 ). [↑](#footnote-ref-286)
287. Lin (2009, 520一521 ) · [↑](#footnote-ref-287)
288. 同上,页558 Vogel 1969 136一138 [↑](#footnote-ref-288)
289. Leese (2011 , 30 36), Lüthi (2008 49一50), MacFarquhar ( 1974, 43一48)· [↑](#footnote-ref-289)
290. Lüthi (2008 , 50一53), MacFarquhar ( 1974, 43一48 ; 1989, 6一7) · [↑](#footnote-ref-290)
291. MacFarquhar ( 1974, 78一85) · [↑](#footnote-ref-291)
292. 同上,页100一102。 [↑](#footnote-ref-292)
293. Shen (2008 , 322一323 )· [↑](#footnote-ref-293)
294. MacFarquhar ( 1974, 148, 165),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0 , vol. 9 , 36、4071 )。 [↑](#footnote-ref-294)
295. Leese (2011 , 38一46) · [↑](#footnote-ref-295)
296. MacFarquhar 1974 120 121 [↑](#footnote-ref-296)
297. 同上,页178一183、189一199 ; Shen (2008 , 491一501 )· [↑](#footnote-ref-297)
298. MacFarquhar ( 1974, 177一178) ; Shen (2008 , 501-522) · [↑](#footnote-ref-298)
299. Leese (2011 , 51一54), Lüthi (2008, 63 , 70), MacFarquhar ( 1989, 9)· [↑](#footnote-ref-299)
300. Mao ( 1957), Shen (2008 470 476) 同时参看Goldman ( 1967, 187一191 )。 [↑](#footnote-ref-300)
301. Leese (2011 , 57一60) · [↑](#footnote-ref-301)
302. MacFarquhar ( 1974, 184一199) · [↑](#footnote-ref-302)
303. 十篇讲稿的翻译版可参考MacFarquhar, Cheek, and wu ( 1989, 191一362 ) ; Shen ( 2008, 476一490 )。 [↑](#footnote-ref-303)
304. 这篇短篇小说由一位年仅21岁的作家王蒙撰写完成,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这篇文章发表在1956年9月份的《人民文学》上。译稿详见Nieh ( 1981b, 473-511 )。 [↑](#footnote-ref-304)
305. Cheek ( 1997, 175一182), MacFarquhar ( 1974, 192一194). [↑](#footnote-ref-305)
306. MacFarquhar 1974 200 207 [↑](#footnote-ref-306)
307. Shen (2008 , 523-551 )· [↑](#footnote-ref-307)
308. MacFarquhar ( 1960, 5 1一53) · [↑](#footnote-ref-308)
309. 同上,页59一76。 [↑](#footnote-ref-309)
310. 同上,页117一120。类似的抱怨也可以参考Andreas (2009, 34一38)、Chen ( 1960, 152一170)及Shen (2008, 579-581 )。 [↑](#footnote-ref-310)
311. Nieh ( 1981b, 323一324)。作者为徐懋庸,文章名称为<「蝉噪居」漫笔>。 Goldman ( 1967, 191一202 )调查了小说家和诗人提出的批评, Nieh ( 1981a )翻译了批判共产党在文艺和诗歌上的教条主义的文章。 [↑](#footnote-ref-311)
312. MacFarquhar ( 1960, 88-89) · [↑](#footnote-ref-312)
313. 同上,页106一107。 [↑](#footnote-ref-313)
314. 同上,页49。其他严厉的批评可以参看Zhu ( 2005 , 195一201 )。 [↑](#footnote-ref-314)
315. MacFarquhar ( 1960, 73) ·讲话人名为戈扬,是一位资深的共产主义者和记者。其他类似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吁可以参看Shen ( 2008, 573一579 )。 [↑](#footnote-ref-315)
316. Wang etal. ( 1998 , 515一516). [↑](#footnote-ref-316)
317. Leese (2011 , 61 ) · [↑](#footnote-ref-317)
318. Goldman ( 1962), MacFarquhar ( 1960, 130一141 ) · [↑](#footnote-ref-318)
319. 根据Moody ( 1977, 189一192 ) ,林希翎是程海果的笔名,她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于1953年退伍,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footnote-ref-319)
320. Doolin ( 1964, 23一25)· [↑](#footnote-ref-320)
321. 同上,页60。 [↑](#footnote-ref-321)
322. 同上,页61一62。 [↑](#footnote-ref-322)
323. 同上,页65一66。这位作者呼应了王实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参见第二章。 [↑](#footnote-ref-323)
324. 基于内部资料, Shen ( 2008 , 584一596 )描绘了学生和工人的愤怒。 [↑](#footnote-ref-324)
325. MacFarquhar ( 1974, 221 ), Wang et al. ( 1998, 517) · [↑](#footnote-ref-325)
326. Shen (2008, 587-590), Zhu (2005, 218-222) · [↑](#footnote-ref-326)
327. Shen (2008, 590一591 ). [↑](#footnote-ref-327)
328. MacFarquhar ( 1960, 143一164), Shen (2008 , 591 )· [↑](#footnote-ref-328)
329. Perry ( 1994), Shen (2008 , 591一593 )· [↑](#footnote-ref-329)
330. Huaiyin Li (2009, 57)· [↑](#footnote-ref-330)
331. 同上,页55-76 ; Huziyin Li (2007)· [↑](#footnote-ref-331)
332. Shen (2008 , 593一594)· [↑](#footnote-ref-332)
333. Wang (2015) · [↑](#footnote-ref-333)
334. MacFarquhar ( 1974, 218一219, 225一240, 248一249, 261一269), Shen (2008 , 597一 608) · [↑](#footnote-ref-334)
335. Chen(1960, 171一201 ), Shen (2008, 637一673) ·双百运动期间,不仅仅是那些满腹牢骚的人批评了共产党。U ( 2012 )分析了那些享受特权、对共产党非常忠诚的人对党提出批评的动机,尽管他们要面临潜在风险。 [↑](#footnote-ref-335)
336. 例如参看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209一213 )。 [↑](#footnote-ref-336)
337. MacFarquhar ( 1974, 266一269) · Schoenhals ( 1986 )详细分析了这些变化。原文译稿详见Ma。( 1957 )。 [↑](#footnote-ref-337)
338. Leese (2011 , 65一66), Shen (2008, 673一680)、 [↑](#footnote-ref-338)
339. Shen (2008, 662) ;这一运动给著名文艺界人士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参看 [↑](#footnote-ref-339)
340. 同上,页17 ; Teiwes and Sun ( 1999, 70一71 ) · [↑](#footnote-ref-340)
341. MacFarquhar ( 1983 , 17) · [↑](#footnote-ref-341)
342. Lardy ( 1987a, 360) · [↑](#footnote-ref-342)
343. 同上,页362。 [↑](#footnote-ref-343)
344. Liebeffhal ( 1987, 300)·陈云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文章的英文版可参看Lardy and Lieberthal ( 1983 )。 [↑](#footnote-ref-344)
345. 在Lardy ( 1987a, 363 )看来,大跃进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的误解。 [↑](#footnote-ref-345)
346. MacFarquhar ( 1983 , 52-63), Teiwes and Sun ( 1999, 73一77) · Dikötter (2010, 15一24), Teiwes and Sun ( 1999, 85一86). [↑](#footnote-ref-346)
347. Teiwes and Sun ( 1999 90 93). [↑](#footnote-ref-347)
348. Liebenhal ( 1987, 30D· [↑](#footnote-ref-348)
349. Teiwes and Sun ( 1999, 96一97)· [↑](#footnote-ref-349)
350. MacFarquhar ( 1983 , 88一90), Teiwes and Sun ( 1999, 100一105). [↑](#footnote-ref-350)
351. Lardy ( 1987a, 367) · [↑](#footnote-ref-351)
352. 同上,页366  [↑](#footnote-ref-352)
353. 同上,页363一365 ; Yang (2012, 163一167)· [↑](#footnote-ref-353)
354. Dikötter (2010 47 55), MacFarquhar ( 1983 , 103一106), Yang (2012, 167一170). [↑](#footnote-ref-354)
355. Yang (2012, 168一169) · [↑](#footnote-ref-355)
356. Dikötter (2010, 56一63), Yang (2012, 77一78) ·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 1991 , 216-240 )和Thaxton ( 2008 , 118-156 )记录了河北省两个村庄和大跃进相关的实践行动。HuaiyinLi ( 2009, 82一102 )记录了江苏省一个村庄的运动。Siu ( 1989, 170一188 )记录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情况。 [↑](#footnote-ref-356)
357. Yang (2012, 168一169) · [↑](#footnote-ref-357)
358. 其他案例参见Yang ( 2012 , 274一275 )。 [↑](#footnote-ref-358)
359. Dikötter (2010, 166一173)· [↑](#footnote-ref-359)
360. 同上,页174一188。很多党的内部文件描述了事件发生后所带来的破坏英文译稿参看Zhou ( 2012, 72一90 )。 [↑](#footnote-ref-360)
361. 这些语录来自于Yang ( 2012, 32 )对当地的访谈 [↑](#footnote-ref-361)
362. 同上,页52。 [↑](#footnote-ref-362)
363. 同上,页52一56。 [↑](#footnote-ref-363)
364. Xue Muqiao ,引自Yang ( 2012, 257 )。 [↑](#footnote-ref-364)
365. XueMuqiao ,引自Yang ( 2012, 258 )。 [↑](#footnote-ref-365)
366. Yang (2012, 258) · [↑](#footnote-ref-366)
367. Bernstein (2006), Dikötter (2010, 67一72), Zhou (2012, 4一16). [↑](#footnote-ref-367)
368.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2月27日,由Yang ( 2012, 438一 439 )翻译。 [↑](#footnote-ref-368)
369. Dikötter (2010, 86一87)· [↑](#footnote-ref-369)
370. Bernstein ( 1984)· [↑](#footnote-ref-370)
371. Li andYang ( 2005 , 845一846 )比较了最初报吿的结果和随后几年大跃进之后的数据。 [↑](#footnote-ref-371)
372. Dikötter (2010, 85)· [↑](#footnote-ref-372)
373. 同上,页85一86。文献翻译见Zhou ( 2012, 23一25 , at25)。 [↑](#footnote-ref-373)
374. Yang (2012, 49) , [↑](#footnote-ref-374)
375. 同上,页335一336。在这个公社,超过1 ,000名当地领导人被免职, 173人被殴打致死。 [↑](#footnote-ref-375)
376. 关于这一鲜为人知的运动的大量文件参见Yang ( 2012, 28一37, 224一229, 335一 338 )和Zhou ( 2012, 18一19, 25一36 )。 [↑](#footnote-ref-376)
377. 年四川省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吿显示,当地官员建立私人监狱和劳改营,农民在里面被使用的酷刑方法,包括「吊人、打人、强迫人跪在燃烧的木炭上、穿刺人口、割手指、缝嘴巴、针扎乳头、喂粪便、向喉咙里填干豆等等」( Zh。u2012, 21 )。1961年河南省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吿列出了更多酷刑: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还有一种被称为「点天灯」的折磨一一喇去人们的衣服,把他们赤着身子挂起来,用氵由浇遍全身,然后点火(Yang2012, 30一31 )。 [↑](#footnote-ref-377)
378. Thaxton ( 2008 , 188一198 )提供了相关事件的乡村层面视角。 [↑](#footnote-ref-378)
379. 众多庐山会议相关的材料参见Dikötter ( 2010, 90一99 )、Lüthi ( 2008, 126一 135 )、MacFarquhar ( 1983 , 193一251 )、Teiwes and Sun ( 1999, 202一212 )。本段中的具体内容来自Yang ( 2012, 350一393 )。 [↑](#footnote-ref-379)
380. 对于「斯大林晚年」的形容,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官员不是指1937至1938年的大规模清洗和处决,这一时段的中国和苏联相比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相反,他们似乎是指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政治局成员的反复无常和恃强凌弱的行为,这是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高官对他强烈不满的一点(Service 2004, 53 1一540 )。 [↑](#footnote-ref-380)
381. Bernstein ( 2006 )追溯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和在大跃进期间对坏消息反复无常的反应,以及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防御型反应的原因。 [↑](#footnote-ref-381)
382. Bernstein (2006), Yang (2012, 384-385)· [↑](#footnote-ref-382)
383. 这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 Yang ( 2012, 367一383 )。 [↑](#footnote-ref-383)
384. 同上,页385一386。 [↑](#footnote-ref-384)
385. 同上,页387。 [↑](#footnote-ref-385)
386. 同上,页387。 [↑](#footnote-ref-386)
387. 同上,页388。 [↑](#footnote-ref-387)
388. 同上,页390、392。Thaxton ( 2008 , 143一156 )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对村干部们施加的压力,要求他们强烈拥护执行党政方针,并对失职者施加惩罚。 [↑](#footnote-ref-388)
389. Yang (2012, 445) · [↑](#footnote-ref-389)
390. 同上,页60一61。 [↑](#footnote-ref-390)
391. 同上,页62 [↑](#footnote-ref-391)
392.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的讲话, 1960年12月6日,由Yang ( 2012, 63 )翻译。 [↑](#footnote-ref-392)
393. 同上,页61。 [↑](#footnote-ref-393)
394. Lardy ( 1987a, 369一370)· [↑](#footnote-ref-394)
395. Li and Yang (2005, 845)· [↑](#footnote-ref-395)
396. Ashton et al. ( 1984, 626), [↑](#footnote-ref-396)
397. MacFarquhar ( 1997, 23一3 1 ) · [↑](#footnote-ref-397)
398. Ashton et al. ( 1984, 622). [↑](#footnote-ref-398)
399. Dikötter (2010, 269一273)· [↑](#footnote-ref-399)
400. 同上,页145一154。 [↑](#footnote-ref-400)
401. MacFarquhar ( 1997, 33一36) · [↑](#footnote-ref-401)
402. 国家统计局( 1983 , 126 )。 [↑](#footnote-ref-402)
403. 同上,页103 , Brown (2012, 77一107)· [↑](#footnote-ref-403)
404. 国家统计局( 1983 , 213 )。 [↑](#footnote-ref-404)
405. 对苏联饥荒的估计大致为570万到850万(Davies和Wheatcroft2004, 414一 [↑](#footnote-ref-405)
406. )。依照人口的百分比来看,这两次饥荒的严重程度大致和当 [↑](#footnote-ref-406)
407. Lardy ( 1987a, 395)· [↑](#footnote-ref-407)
408. 政治秘书包括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 Yang2012, 61 , 436 )。 [↑](#footnote-ref-408)
409. MacFarquhar ( 1997, 39一43 , 48一63) · [↑](#footnote-ref-409)
410. 同上,页61一120  [↑](#footnote-ref-410)
411. 同上,页137-145 [↑](#footnote-ref-411)
412. 同上,页145一152。 [↑](#footnote-ref-412)
413. 同上,页152一158。 [↑](#footnote-ref-413)
414. Yang (2012, 502) · [↑](#footnote-ref-414)
415. Lieberthal ( 1987, 325一33 1), MacFarquhar ( 1997, 158一168), Yang (2012, 502一 503) · [↑](#footnote-ref-415)
416. Yang (2012, 505) · [↑](#footnote-ref-416)
417. Goldman ( 1987, 432一444) · [↑](#footnote-ref-417)
418. 同上,页436 ; MacFarquhar ( 1997, 244一248)· [↑](#footnote-ref-418)
419. MacFarquhar ( 1997, 234-235) · [↑](#footnote-ref-419)
420. Goldman ( 1969, 59一60) · [↑](#footnote-ref-420)
421. Goldman 1987 437738) · [↑](#footnote-ref-421)
422. Goldman ( 1969, 62一63) · [↑](#footnote-ref-422)
423. Fung ( 1982, 82一110)· [↑](#footnote-ref-423)
424. Goldman ( 1969, 61-63) · 24 同上,页69一73。 [↑](#footnote-ref-424)
425. MacFarquhar 1997 155一157) · [↑](#footnote-ref-425)
426. Cheek ( 1997, 176一187) · [↑](#footnote-ref-426)
427. Goldman ( 1969, 79一83 ; 1987, 442一447), MacFarquhar ( 1997, 250一252)· [↑](#footnote-ref-427)
428. MacFarquhar ( 1997, 254-256) · [↑](#footnote-ref-428)
429. Goldman ( 1969, 74) · [↑](#footnote-ref-429)
430. Goldman 1981 32一36), MacFarquhar ( 1997, 252一253) · [↑](#footnote-ref-430)
431. Liebenhal ( 1987, 331一335), MacFarquhar ( 1997, 274一281 ) · [↑](#footnote-ref-431)
432. Yang (2012, 510-511 )· [↑](#footnote-ref-432)
433. MacFarquhar ( 1997, 283一286) · [↑](#footnote-ref-433)
434. Yang (2012, 512) · [↑](#footnote-ref-434)
435. Guo and Lin (2005 , 9一29) · [↑](#footnote-ref-435)
436. 同上,页30一99 ; MacFarquhar ( 1997, 334-348)· [↑](#footnote-ref-436)
437. Brown (2012, 111一136), Chan, Madsen, and Unger ( 1984, 37一73), Guo and Lin

     (2005 , 99一156), MacFarquhar ( 1997, 403一407)· [↑](#footnote-ref-437)
438. Guo and Lin (2005, 156一187, 204一252). [↑](#footnote-ref-438)
439. MacFarquhar ( 1997, 410一415) , [↑](#footnote-ref-439)
440. Lüthi (2008, 285一301 ). [↑](#footnote-ref-440)
441. Brown (2009, 264一265), MacFarquhar ( 1997, 416一417), Taubman (2003 , 3一17, 614-619)· [↑](#footnote-ref-441)
442. Guo and Lin (2005 , 253一274)· [↑](#footnote-ref-442)
443. MacFarquhar ( 1997, 419一425), Yang (2012, 516一517) · [↑](#footnote-ref-443)
444. Guo and Lin (2005 , 274-296), MacFarquhar ( 1997, 425-428) · [↑](#footnote-ref-444)
445. MacFarquhar ( 1997, 409一410) · [↑](#footnote-ref-445)
446. Dong and Walder 2011 a, 18 19)· [↑](#footnote-ref-446)
447. Walder 2006, 1025 1027) ·另可参看Guo and Lin ( 2005 , 187一203 )。 [↑](#footnote-ref-447)
448. 这是全国性的普遍模式一一一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分裂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展成基层的冲突(Guo and Lin 2005 , 296一349 )。 [↑](#footnote-ref-448)
449. Lüthi 2008 , 236 245). [↑](#footnote-ref-449)
450. 同上; MacFarquhar ( 1997, 353一354)· [↑](#footnote-ref-450)
451. Lüthi (2008, 260-272), MacFarquhar ( 1997, 349-350)· [↑](#footnote-ref-451)
452. MacFarquhar ( 1997, 360一362) · [↑](#footnote-ref-452)
453. 同上,页363。 [↑](#footnote-ref-453)
454. 同上,页363一364  [↑](#footnote-ref-454)
455.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5一17). [↑](#footnote-ref-455)
456. Leese (2011 , 122一124), MacFarquhar ( 1997, 382一384, 439一440)· [↑](#footnote-ref-456)
457. Leese (2011 , 94一107)·关于红宝书的汇编、印刷和发行的完整说明参见Leese ( 2011 , 108一122 )。 [↑](#footnote-ref-457)
458. MacFarquhar ( 1974, 148, 165) · [↑](#footnote-ref-458)
459. MacFarquhar ( 1997, 439-440), Walder (2009, 15一16)· [↑](#footnote-ref-459)
460. 参见第二章Walder (2009, 16) · [↑](#footnote-ref-460)
461. MacFarquhar ( 1997, 434一435) · [↑](#footnote-ref-461)
462. 同上,页447-448 ;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9-20, 36一37). [↑](#footnote-ref-462)
463. MacFarquhar ( 1997, 448一45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一27)· [↑](#footnote-ref-463)
464. MacFarquhar ( 1974, 180一184, 195一196, 202一207, 270一273 )· [↑](#footnote-ref-464)
465. MacFarquhar ( 1997, 445-44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一18)· [↑](#footnote-ref-465)
46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4一35). [↑](#footnote-ref-466)
467. 同上,页3874。 [↑](#footnote-ref-467)
468. 同上,页48一5 1。 [↑](#footnote-ref-468)
469. 同上,页4374。 [↑](#footnote-ref-469)
470. 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理与其他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和中央调查部(主管情报部)这两个部门头上。 [↑](#footnote-ref-470)
471. 康生和陈伯达是两个职位最高的人物,是1966年5月政治局候补委员。 [↑](#footnote-ref-471)
47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00一101 )· [↑](#footnote-ref-472)
473. 同上,页98一99  [↑](#footnote-ref-473)
474. 这一段和下一段基于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277, 281 )以及 Schoenhals ( 1996 )。 [↑](#footnote-ref-474)
475. Walder (2009, 154一171 )· [↑](#footnote-ref-475)
476. Leese (2011 , 129一134) · [↑](#footnote-ref-476)
477. ( 148 150)· [↑](#footnote-ref-477)
478.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56一57). [↑](#footnote-ref-478)
479. (2006, 1025一1026; 35 36). [↑](#footnote-ref-479)
480. Walder (2006, 1027一1028 ; 2009, 36一37)· [↑](#footnote-ref-480)
481. Dong and Walder (2011a, 11一12) · [↑](#footnote-ref-481)
482. 似乎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是设计好让刘少奇落马的。鉴于刘少奇之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采用的方法,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刘少奇会如何展开他的运动,他不反对派出工作组,也拒绝澄清自己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件事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63 )。 [↑](#footnote-ref-482)
483. 这一结论的证据见 ( 28 58 )。 [↑](#footnote-ref-483)
484. 同上,页56一57。 [↑](#footnote-ref-484)
485. 同上,页37一38 ,首都的其他主要大学也出现类似情况。 [↑](#footnote-ref-485)
486. 这一描述基于Walder ( 2006, 1028 )。 [↑](#footnote-ref-486)
487. Walder (2009, 62一63 , 70一84) · [↑](#footnote-ref-487)
488.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81一84), [↑](#footnote-ref-488)
489. 这总结了Walder ( 2009, 88一119)中一段更长的分析。 [↑](#footnote-ref-489)
490. 同上,页129一135。毛泽东完整的回信见页133。 [↑](#footnote-ref-490)
49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06一110), Walder (2009, 134一135). [↑](#footnote-ref-491)
492. Chan, Rosen, and Unger ( 1980), Rosen ( 1982, 109一118) , Walder (2009, 136 一138) · [↑](#footnote-ref-492)
493. Walder (2009, 137一142)· [↑](#footnote-ref-493)
494. 根据Wang ( 2004 )中的记录,其中还有20个这一时期的类似案例。 [↑](#footnote-ref-494)
495. 接下来的几段内容 150一 [↑](#footnote-ref-495)
496. 下一段 119一 [↑](#footnote-ref-496)
497. 下一段基于Walder ( 2009, 156一157 )。 [↑](#footnote-ref-497)
498. 接下来的几段内容基于Walder ( 2009 , 157一163 ) , 和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133 135 。 [↑](#footnote-ref-498)
499. Walder ( 67 73)· [↑](#footnote-ref-499)
50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35) · [↑](#footnote-ref-500)
501. Walder (2009, 164一166)· [↑](#footnote-ref-501)
50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136 140). [↑](#footnote-ref-502)
503. 接下来的几段总结了在 184 186 里一段更长的描述。 [↑](#footnote-ref-503)
504. Walder (2006, 1032一1034; 2009, 106一107). [↑](#footnote-ref-504)
505. 接下来的内容基于 186 200 。 [↑](#footnote-ref-505)
506. 同上,页201一202。 [↑](#footnote-ref-506)
507. 这部分内容基于Walder ( 2009, 203一217 )。 [↑](#footnote-ref-507)
508. 同上,页204一207。 [↑](#footnote-ref-508)
509. 国家统计局( 1983 , 123 )。 [↑](#footnote-ref-509)
510. Walder ( 1996)· [↑](#footnote-ref-510)
511. Perry and Li ( 1997, 97-111), Walder ( 1978 , 39-46) · Forster ( 1990, 27-28 )和 Wang ( 1995 , 112一113 )提到杭州和武汉也有类似的趋势。 [↑](#footnote-ref-511)
512. 案例见Dong and Walder ( 2011b, 428一430 )、Perry and Li ( 1997, 17一18 , 86 ) 和Walder ( 2009, 203一207 )。 [↑](#footnote-ref-512)
51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3一164), Walder ( 1978, 51-57) · [↑](#footnote-ref-513)
514.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4一165), Perry and Li ( 1997, 89) · [↑](#footnote-ref-514)
515.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65一166). [↑](#footnote-ref-515)
516. 同上,页166一169 ; Perry and Li ( 1996, 126一127), Walder ( 1978, 60一63 ) ·在 1976年,这三个领导人以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以「四人帮」的名义被肃清。 [↑](#footnote-ref-516)
517. Perry and Li ( 1997, 119一144), Walder ( 1978 , 58一59)· [↑](#footnote-ref-517)
518. Bu (2008, 390一39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171 )提到潘复生一开始让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担任最高职位,但却被更高层否决。 [↑](#footnote-ref-518)
519. Dong and Walder (2010, 678一682)· [↑](#footnote-ref-519)
520. Bu (2008 , 306一307, 383一3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8 , 124一125 ) , Wang (2001 750一753 · [↑](#footnote-ref-520)
521. Dong and Walder 2010)· [↑](#footnote-ref-521)
522. Yan (2014) · [↑](#footnote-ref-522)
52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5一177). [↑](#footnote-ref-523)
524. 案例参见Dong and Walder ( 2011b )。 [↑](#footnote-ref-524)
525. Dong and Walder (201 la, 2011b),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77一 181 ), Yan 2014)· [↑](#footnote-ref-525)
52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191一197). [↑](#footnote-ref-526)
527. 同上,页180一182  [↑](#footnote-ref-527)
528. 这一描述基于Yan ( 2014 )。 [↑](#footnote-ref-528)
529. 同样的分裂也出现在杭州的造反派中。和武装部队发生冲突并最终反对军事管制的一派叫做「联总」,而避免和军队发生冲突并在之后支持他们行动的一派叫做「红暴」()u 2008, 414一416; Forster 1990, 29一33 ; Jin 2000, [↑](#footnote-ref-529)
530. 一246 )。 [↑](#footnote-ref-530)
531. Wang ( 1995 , 113-121 )· [↑](#footnote-ref-531)
532. 同上,页121一128。 [↑](#footnote-ref-532)
533. 同上,页128一132。 [↑](#footnote-ref-533)
534. 同上,页138一141。 [↑](#footnote-ref-534)
535. 同上,页144一146、148。 [↑](#footnote-ref-535)
536. 同上,页147-148。 [↑](#footnote-ref-536)
53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6一208), Wang ( 1995, 149一150)· [↑](#footnote-ref-537)
538.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08一210), Wang ( 1995 , 150一154). [↑](#footnote-ref-538)
539.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0一212), Wang ( 1995 , 154一157)· [↑](#footnote-ref-539)
54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2-214), Wang ( 1995 , 165一166)· [↑](#footnote-ref-540)
541. Wang ( 1995 , 170一175)· [↑](#footnote-ref-541)
54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4一216), Schoenhals (2005 , 279一282, [↑](#footnote-ref-542)
543. 一289), Wang ( 1995, 161一163) · [↑](#footnote-ref-543)
544.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17). [↑](#footnote-ref-544)
545. Schoenhals (2005 , 292一293)· [↑](#footnote-ref-545)
546. Dong and Walder (2011b). [↑](#footnote-ref-546)
547. 广东县志编纂委员会; Hai ( 1971 , 150一175)· [↑](#footnote-ref-547)
548. Forster ( 1990, 44一50). [↑](#footnote-ref-548)
549. Dong and Walder (2011b). [↑](#footnote-ref-549)
550. Forster ( 1990, 47一48). [↑](#footnote-ref-550)
55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29一233 ), Schoenhals (2005 , 296). [↑](#footnote-ref-551)
552. Dong and Walder (2011b, 437-438) · [↑](#footnote-ref-552)
553. Schoenhals (2005 , 297)· [↑](#footnote-ref-553)
554. Dong and Walder (2011b, 438) , [↑](#footnote-ref-554)
555.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44一245)· [↑](#footnote-ref-555)
556. Su (2011 ), [↑](#footnote-ref-556)
557.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1990 , 116一117 )。 [↑](#footnote-ref-557)
558. 同上,页125  [↑](#footnote-ref-558)
559.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45一246)· [↑](#footnote-ref-559)
560. Dong and Walder (2012b, 901). [↑](#footnote-ref-560)
561. Walder (2009, 204一222), [↑](#footnote-ref-561)
562. 同上,页223一242  [↑](#footnote-ref-562)
563. 对北大和清华最后战斗的描述基于Walder ( 2009, 242一245 )。 [↑](#footnote-ref-563)
564. 这段毛泽东和红卫兵领袖的交锋基于Walder ( 2009, 245一247 )。 [↑](#footnote-ref-564)
565. 这一说法基于Walder ( 2009, 248一249 )。Andreas ( 2009, 138一142 )描述了大学里实施宣传队控制的局面。 [↑](#footnote-ref-565)
566. 对于这一段时期的描述,参看Andreas ( 2006 )。 [↑](#footnote-ref-566)
567. 有关江苏省的描述,是基于Dong and Walder ( 2012a, 24一29 )。 [↑](#footnote-ref-567)
568. Forster ( 1990, 56一91 )描述了浙江省及其省会杭州发生的相似过程。 [↑](#footnote-ref-568)
569. Contemporary China Editorial Office ( 1993 , 262)· [↑](#footnote-ref-569)
570. 同上。 [↑](#footnote-ref-570)
571. 同上。 [↑](#footnote-ref-571)
572. Schoenhals ( 1996, 109)· [↑](#footnote-ref-572)
57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7一258)· [↑](#footnote-ref-573)
574. 同上,页254一255  [↑](#footnote-ref-574)
575. 同上,页255一256。 [↑](#footnote-ref-575)
576. Contemporary China Editorial Office ( 1991b, 118). [↑](#footnote-ref-576)
57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9-260)· [↑](#footnote-ref-577)
578. Walder (2014)· [↑](#footnote-ref-578)
579. Leese (2011 , 210一219)· [↑](#footnote-ref-579)
58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62) · [↑](#footnote-ref-580)
581. 同上,页263。 [↑](#footnote-ref-581)
582. Leese (2011 , 195一202) · [↑](#footnote-ref-582)
583. Urban ( 1971 , 1一27), [↑](#footnote-ref-583)
584. Leese (2011 , 187一194)· [↑](#footnote-ref-584)
585. Baum ( 1969) , Leese (2011 , 219一221 )· [↑](#footnote-ref-585)
586. 接下来的这一段描述是基于Chau ( 2010, 257一259 )。 [↑](#footnote-ref-586)
587. Leese (2011 , 204-20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64)· [↑](#footnote-ref-587)
588. Leese (2011 , 174, 206一207)· [↑](#footnote-ref-588)
589. 同上,页207。 [↑](#footnote-ref-589)
590. Wang ( 1995 , 224-225)· [↑](#footnote-ref-590)
591. Dong and Walder (2012b, 900一901 )· [↑](#footnote-ref-591)
592. 同上,页901及905  [↑](#footnote-ref-592)
593. Teiwes and Sun (2007, 31一3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356 )认为, [↑](#footnote-ref-593)
594. Teiwes and Sun ( 1996 )对这一点,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 [↑](#footnote-ref-594)
595. 同上,页83。 9 同上,页89 [↑](#footnote-ref-595)
596. 同上,页83一84。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者,首次通过武力统一中国。他成为一个专制暴君,焚书坑儒,秦朝很快就灭亡了。

     根据TeiwesandSun(2007, 35 ) ,至少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反 [↑](#footnote-ref-596)
597. Leese (2011 , 238-239) · [↑](#footnote-ref-597)
598.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39一347)· [↑](#footnote-ref-598)
599. 同上,页360一365 ; Teiwes and Sun (2007, 42一85) · [↑](#footnote-ref-599)
600.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58一360). [↑](#footnote-ref-600)
601. Forster ( 1990, 116一118). [↑](#footnote-ref-601)
602. Teiwes and Sun (2007, 85一109, 132一146), Vogel (2011 , 61一79) · [↑](#footnote-ref-602)
603. Forster ( 1990, 1 1 8), Goldman ( 1975),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66一 373)· [↑](#footnote-ref-603)
604.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58一373), Teiwes and Sun (2007, 110一1 18 , 146-171 ) · [↑](#footnote-ref-604)
605. Teiwes and Sun (2007, 111 , 172一178)· [↑](#footnote-ref-605)
606. Forster ( 1990, 110一114)· [↑](#footnote-ref-606)
607. 这些段落中有关南京的描述是基于Dong andWalder ( 2012b )。 [↑](#footnote-ref-607)
608. 同上,页902。 [↑](#footnote-ref-608)
609. 同上,页9一12 ; Rosen ( 1985 , 4一5) · [↑](#footnote-ref-609)
610. Chan, Rosen, and Unger ( 1985 , 6一9) · [↑](#footnote-ref-610)
611. Leese (2011 , 243-244) · [↑](#footnote-ref-611)
612. Chan, Rosen, and Unger ( 1985 , 32一85 )可见此文的完整译文 [↑](#footnote-ref-612)
613. 同上,页10一13。Moody ( 1977, 209一216 )首次概述了此文并进行分析。 [↑](#footnote-ref-613)
614. Chan, Rosen, and Unger ( 1985 , 16一28), Rosen ( 1985). [↑](#footnote-ref-614)
615. Chan, Rosen, andUnger ( 1985 , 13一28 )记录了作者们此后的遭遇,他们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就被逮捕监禁,最终在1979年被无罪释放。 [↑](#footnote-ref-615)
616. Forster ( 1990, 164一172), Teiwes and Sun (2007, 197一199)· [↑](#footnote-ref-616)
61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1一382). [↑](#footnote-ref-617)
618. 同上,页388一391 , Vogel (2011 , 97一98)· [↑](#footnote-ref-618)
619. Vogel (2011 , 121 )· [↑](#footnote-ref-619)
620. 同上,页103-109。 [↑](#footnote-ref-620)
621.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2一387), Vogel (2011 , 109一114)· [↑](#footnote-ref-621)
622. Forster ( 1990, 198一219; 199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86一387), [↑](#footnote-ref-622)
62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00一402) , Teiwes and Sun (2007, 324一348), Vogel (2011 , 125-133 , 137一140) · [↑](#footnote-ref-623)
624. TeiwesandSun ( 2007, 363一381 , 388一399 )详细追溯了毛泽东的态度变化, 并观察到了在清华大学(毛泽东最喜欢的模范单位之一)中对高等教育的争论,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辽宁省的激进派首领)的干预,都在毛泽东 [↑](#footnote-ref-624)
625. Heilmann ( 1993 , 199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349一352) · [↑](#footnote-ref-625)
62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20一422) · [↑](#footnote-ref-626)
627. 这一段对南京事件的描述是基于D。ngandWalder ( 2014 )、Garside(1981, 110一114 )及LouieandLouie ( 1981 )。 [↑](#footnote-ref-627)
628. Louie and Louie ( 1981 , 339);同时参看Zweig ( 1978 )。 [↑](#footnote-ref-628)
629. 这两段的描述是基于Dong and Walder ( 2014 )。 [↑](#footnote-ref-629)
630. Wu (2002, 22) · [↑](#footnote-ref-630)
631. Yan and Gao ( 1996, 492)· [↑](#footnote-ref-631)
632. Forster ( 1986)· [↑](#footnote-ref-632)
633. Louie and Louie ( 1981 )· [↑](#footnote-ref-633)
634. 这一段描述是基于Teiwes and Sun ( 2004; 2007, 471一475 )和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422一427 )。亦可参看Garside ( 1981 , 115一135 )和Yan and Gao ( 1996, 492一501 )。 [↑](#footnote-ref-634)
635. Garside ( 1981 , 127)· [↑](#footnote-ref-635)
636. Teiwes and Sun (2007, 489)· [↑](#footnote-ref-636)
637.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427-430). [↑](#footnote-ref-637)
638. Heilmann ( 1994, 46一53),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 431一432) · [↑](#footnote-ref-638)
639. Dong and Walder (2014), Forster ( 1990) ,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footnote-ref-639)
640. )· [↑](#footnote-ref-640)
641. Teiwes and Sun (2007, 551一552), Vogel (2011 , 174一175)· [↑](#footnote-ref-641)
642. Teiwes and Sun (2007, 536一568 , 572-579)· [↑](#footnote-ref-642)
643. 同上,页570一571。 [↑](#footnote-ref-643)
644. 同上,页579一580  [↑](#footnote-ref-644)
645. 同上,页584一585。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443749 )描述了计划和实际逮捕之间如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 71 引自Teiwes and Sun ( 2007, 595 )。 [↑](#footnote-ref-645)
646. 引自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 2006, 3 )  [↑](#footnote-ref-646)
647. 引用自Lardy and Lieberthal ( 1983 , xi )。 [↑](#footnote-ref-647)
648. Banister ( 1984, 254), Henderson ( 1993 )· 3 国家统计局( 1983 , 13 )。 [↑](#footnote-ref-648)
649. 根据图14· 1的数据计算得出。 [↑](#footnote-ref-649)
650. 国家统计局( 1983 , 339 )。 [↑](#footnote-ref-650)
651. 此段数据和下段数据来自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footnote-ref-651)
652. Walder , 195 · [↑](#footnote-ref-652)
653. 苏联和东欧一直以来都以城镇经济为主,并不像中国那样拥有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因此苏联和东欧对于人口迁移并没有进行限制。人口更为自由的流动降低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footnote-ref-653)
654. WorldBank(1983, 101 )调整了中国1979年的数字,比1977年增加了19%。 [↑](#footnote-ref-654)
655. Oi (2008, 3) · [↑](#footnote-ref-655)
656. Mitter (2013 , 5一6)· [↑](#footnote-ref-656)
657. 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414一415)·据估计1933年苏联人口约为1 ,500 万,基于此,饥饿死亡人数比例为3.8%到5 ·7%之间。中国饥饿死亡人数为3 ,000万,占6·53亿人口中的4· 6%。苏联的估算数字范围较大,因为苏联不像中国那样在事件发生前后进行了人口普查,所以苏联历史学家只能在不完整的档案记录上做推断。 [↑](#footnote-ref-657)
658. Walder (2014)· [↑](#footnote-ref-658)
659. 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人数与1937到1938年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持平, 据估算,在「大清洗」时期,死亡人数约为80万到120万之间。但是由于总人口存在巨大差异,苏联因政治迫害而死亡的人口比例至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五倍(同上)。 [↑](#footnote-ref-659)
660. Walder ( 1991 )· [↑](#footnote-ref-660)
661. 参看Baum ( 1994 )。 [↑](#footnote-ref-661)